

新人
土地
国家



顾问
陈光兴
吕正惠
孙歌
许江
张颂仁

人間 思想

第五辑
新人 土地 国家

主 编
贺照田
高士明

人間

专题一：新人·土地·国家

——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文化、思想意涵

编者小引 / 贺照田

逼近历史的战栗——对李桦1946、47年间木刻创作高潮的尝试性理解 / 莫艾

一份自我辩难的“蓝图初稿”——1948年《新路》群体的建国思考 / 姜涛

建国的干部从哪里来？——接管天下之二 / 何浩

“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穷人乐》方向”为案例 / 程凯

模糊身份与弹性纠缠：1950-1954年福建省龙岩县的华侨土改 / 张侃 / 谢丹琳

重整河山待新生：天津解放初期工厂接管的历史实践与伦理意涵 / 符鹏

回应

漫长的建国：国家、土地、新人 / 王智明

国民党左派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道路探索 / 李志毓

群众路线如何建构现代国家？ / 吕德文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解读《艳阳天》的一个“外部”视角 / 鲁太光

社会史与精神史：“人民中国”的再理解 / 罗成

专题二：中国 / 左派

按语 / 卡维波

战后台湾人中国认识的形成与局限——从一个战后新生代的成长经验来看 / 郑鸿生

我的中国/左派分与合 / 徐进钰

中（国左）派 / 赵刚

中国/左派 / 卡维波

为人间思想

二十世纪“中国通史”写作的创造与转化 / 李淑珍

人间现场

香城故事（四） / 任强



梦周文教基金会
Meonchu Foundation

梦周文教基金会赞助

(平装) NT\$ 300

ISBN 978-986-928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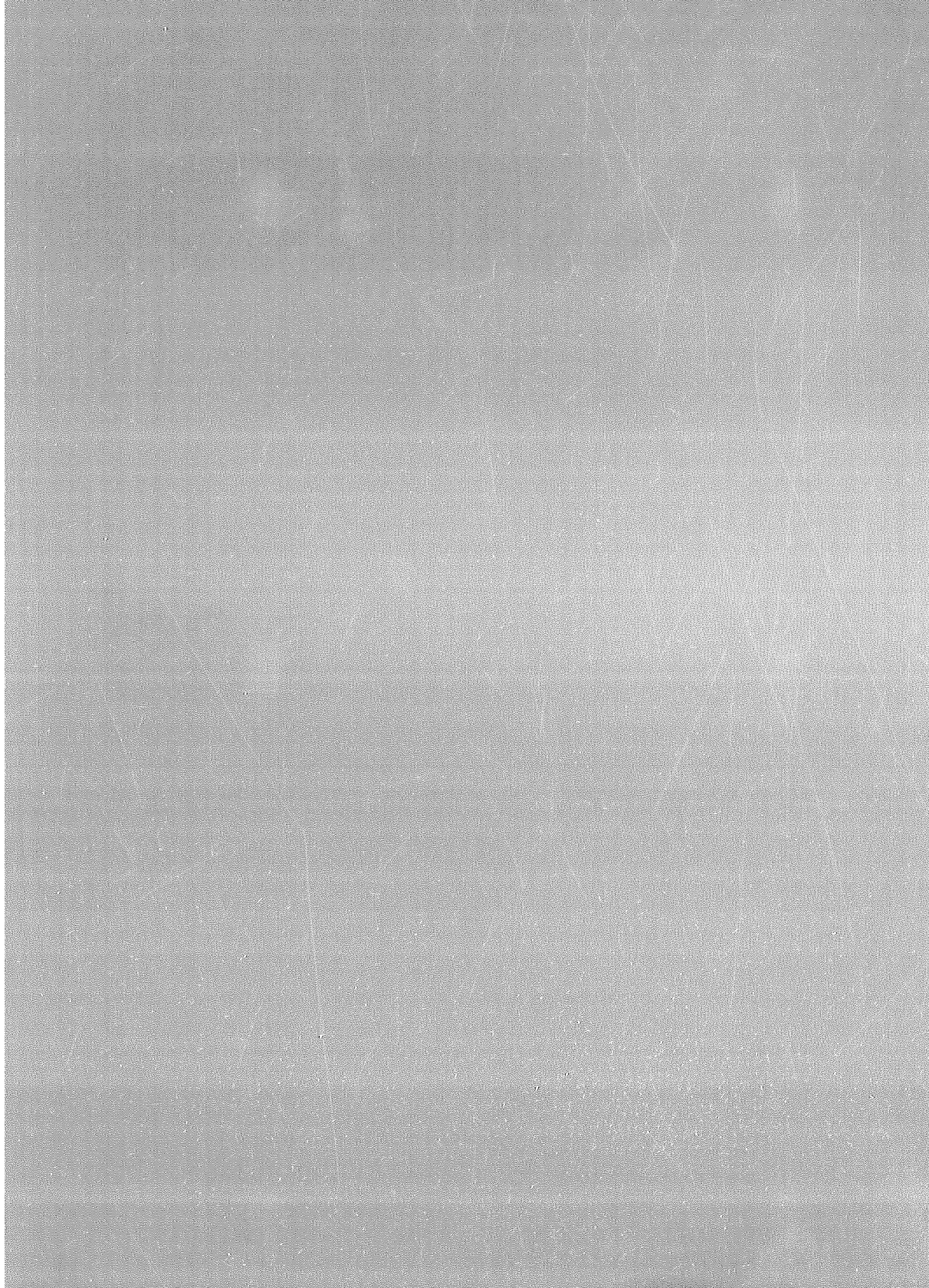


9 789869 282024

新人
土地
国家

人間
思想

人間



目 录

专题一：新人·土地·国家——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文化、思想意涵

编者小引

- 贺照田 2
- 逼近历史的战栗——对李桦 1946、47 年间木刻创作高潮的尝试性理解
- 莫艾 5
- 一份自我辩难的“蓝图初稿”——1948 年《新路》群体的建国思考
- 姜涛 39
- 建国的干部从哪里来？——接管天下之二
- 何浩 62
- “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穷人乐》方向”为案例
- 程凯 99
- 模糊身份与弹性纠偏：1950-1954 年福建省龙岩县的华侨土改
- 张侃 / 谢丹琳 134
- 重整河山待新生：天津解放初期工厂接管的历史实践与伦理意涵
- 符鹏 161

回 应

漫长的建国：国家、土地、新人

- 王智明 192
- 国民党左派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道路探索
- 李志毓 201

群众路线如何建构现代国家？

吕德文 206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解读《艳阳天》的一个“外部”视角

鲁太光 210

社会史与精神史：“人民中国”的再理解

罗成 222

专题二：中国 / 左派

按语

卡维波 229

战后台湾人中国认识的形成与局限——从一个战后新生代的成长经验来看

郑鸿生 232

我的中国 / 左派分与合

徐进钰 238

中（国左）派

赵刚 244

中国 / 左派

卡维波 253

为**人间思想**

二十世纪“中国通史”写作的创造与转化

李淑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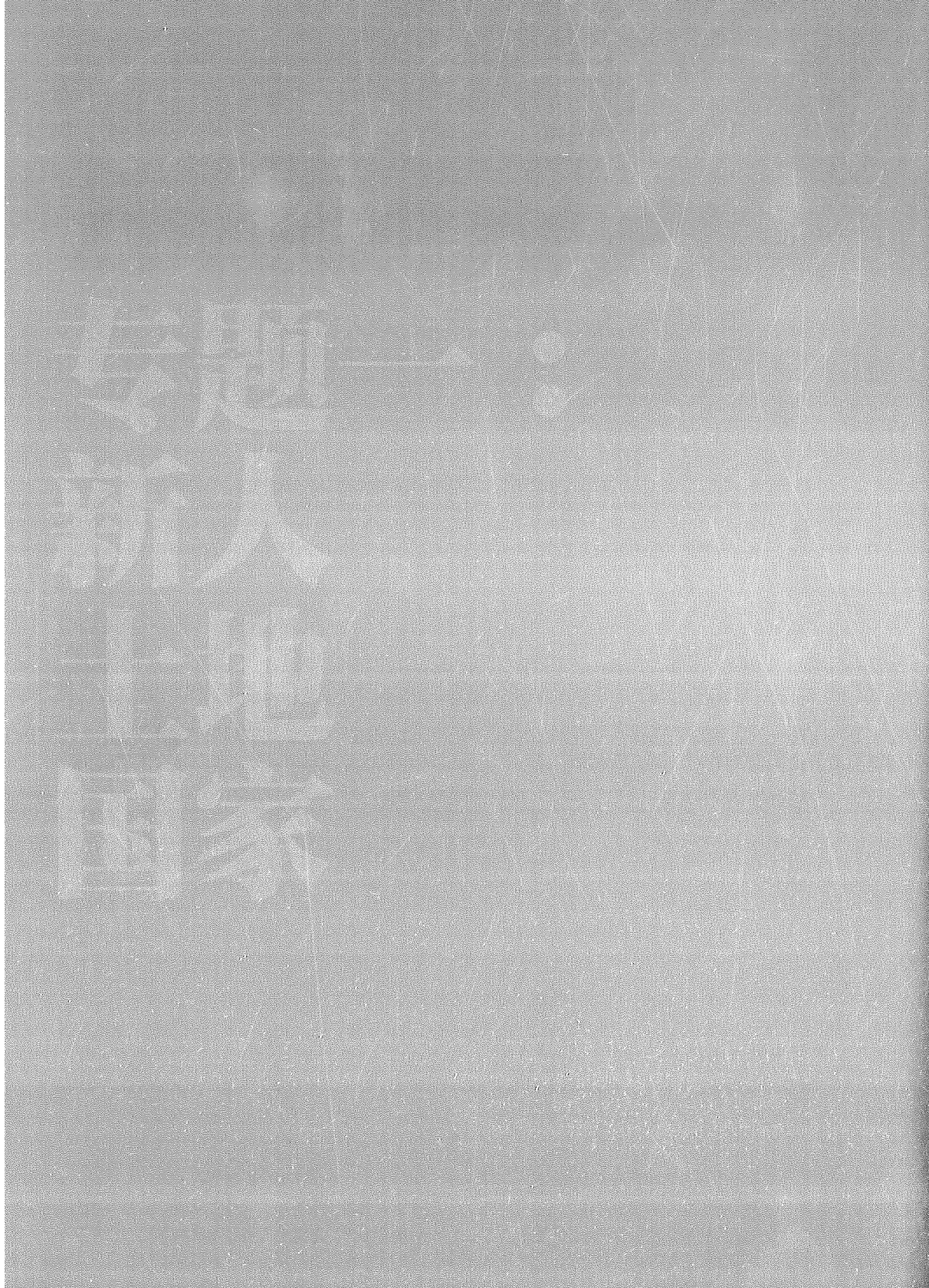
271

为**人间现场**

香城故事（四）

任强

317



编者小引

逼近历史的战栗——对李桦 1946、47 年间木刻创作高潮的尝试性理解

一份自我辩难的“蓝图初稿”——1948 年《新路》群体的建国思考

建国的干部从哪里来？——接管天下之二

“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穷人乐》方向”为案例

模糊身份与弹性纠偏：1950-1954 年福建省龙岩县的华侨土改

重整河山待新生：天津解放初期工厂接管的历史实践与伦理意涵

漫长的建国：国家、土地、新人

国民党左派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道路探索

群众路线如何建构现代国家？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解读《艳阳天》的一个“外部”视角

社会史与精神史：“人民中国”的再理解

编者小引

近年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仔细审视当代史研究的快速进步，优秀成果频出，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些很有贡献的成果，主要集中于外交领域，和对在历史展开中便被历史当事人注目的政治事件过程，及与这些政治事件直接相关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厘清、掌握；相比，一些——对我们要深入了解1949年后中国大陆人间状况，今天人间状况所由来，和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内在去深入省思此人间状况的——历史方面，则被关注、用心得非常不够。

亚际书院、《人间思想》所以特别支持“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正是由于当代史研究这一又让人兴奋，又让人不满的状况。因为“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的努力，一方面自觉立足于充分吸收消化当代史研究已有的蓬勃进展，一方面致力于认真开拓已有当代史研究缺乏重视，但对认识、理解1949后中国大陆的“人间”存在不可或缺的诸历史方面，正和亚际书院的“亚洲现代思想计划”关怀《人间思想》的关怀，有深切配合。

是以亚际书院北京办公室特别和“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合作召开当代史系列研讨会，至今已于2013年4月、2014年4月、2015年4月召开了三会议：“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历史、思想和文化意涵”“1950-1953：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历史、社会、文化和生活意涵”“新人·土地·国家——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文化、思想意涵”。《人间思想》则用第一辑《作为人间思想事件的1949》中的“专题：作为主体、文化、生活、观念契机的1949”和整个“回应”栏目，第三辑《作为人间事件的新民主主义》的“专题：作为人间事件的新民主主义（1950-1953）”和整个“回应”栏目，现在的这第五辑《新人土地国家》的“专题一：新人·土地·国家——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文化、思想意涵”和整个“回应”栏目，分别对这三次会议发表的论文、圆桌引言再请作者、引言者修订后作的选登。

为了读者更好地掌握《人间思想》一、三、五辑的这些大篇幅刊载，我特别把会议组织者于2015年4月“新人·土地·国家”写的会议邀请函中有关会议宗旨的部分附在下面：

2013年4月和2014年4月，“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分别筹办了当代史系列研讨会的两次会议——“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历史、思想和文化意涵”和“1950-1953：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历史、社会、文化和生活意涵”。根据预定计划，2015年我们将同期举办这一系列的第三次会议：“新人·土地·国家——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文化、思想意涵”。

这两年的会议，我们分别集中讨论了“建国”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些重要历史实践，从政治家、知识分子、工人、社会运动、电影、绘画、政治机制与政策等层面和角度，讨论建国初期历史实践的内在脉络是如何具体展开，其特定形态、面貌和程度如何？我们力图回到建国初的历史状况中，通过把握它们所置身革命史脉络、内在张力关系以及国内外环境，来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结构、实践成果与发展方向。我们希望这系列会议能不断重建或触碰中国革命在某个历史阶段的结构因素，并在这样一个“内在”视野下重新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以及“走向哪里？”由此把握当下“中国”这一特定形态得以形成的内在历史逻辑。我们的会议持续

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不过，虽然我们也讨论到，与建国初期政治运动、国家建设相配合而进一步深入日常工作、日常生活层面发挥影响的是对“新社会”“新生活”“新伦理”“新道德”“新人”的理解与塑造，但由此造成当时的社会风气、组织形态、主体状态表现出相当的朝气与活力的具体历史内容讨论得不够。

对此，这次会议论题将集中讨论1949-1954年之间的“新人、土地与国家”问题。所谓土地，首先指中国革命中的土地革命实践，当然也指涉这一实践对中国社会基体结构的翻转和打造，从而构成新的人间状况；这种新的特定历史状况，既与人的特定状态互为条件关系，同时又会对人的特定状态进一步提出新的历史要求。而这样的翻转和打造，又为新中国的成立和进一步展开奠定新的历史前提和社会前提。

这要求我们在时间范围方面有所放宽。论文可以涉及建国的历史前提，也就是抗战中后期的根据地建设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等革命实践内容、以及国统区的诸多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力图突出强调这些历史实践与

建国初期历史曲折展开之间的密切关联，而不是单纯讨论 1940 年代。

因此，我们把这次会议的论题核心设定为“新人、土地与国家”，而实际拉开的时间幅度则是建国前后，考虑的正是 1940 年代的历史实践内容如何引导或规定了建国的具体形态以及建国初期历史展开的具体方向、程度等。论述的指向和重心仍然是建国初期的历史实践。我们将重点追问：这种积极形态的达成对应着哪些历史条件，调动了哪些经验资源，怎样构成它的针对性，扭转了什么样的痼疾？以及在相对理想的成效中潜伏着何种隐患？这些问题的考察无疑有助于我们展开对建国初期实践中国有效性这一问题域的理解。

一个计划两天的会议当然无法就所有这些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但我们试图延续讨论建国问题时所累积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把握历史脉络中丰富而复杂的实践经验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对建国初期的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生活问题做一些初步而内在的整理。在这些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或许能推进对革命中的建国初期以及相应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形态的再理解。

希望会议组织者的现身说法有助于大家藉此了解“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了解亚际书院“亚洲现代思想计划”和《人间思想》的关怀、支持所在。

当然，我们会持续合作，直至有更多的朋友也进入对认识、省思 1949 后中国大陆的“人间”存在不可或缺的这诸历史领域，直至我们对 1949 年后中国大陆人间状况、今天人间状况所由来有切实、充分掌握，直至我们真的有足够积累与能力从此历史内在去批判性反省这人间的历史与现在。

当然，如此决心，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一努力方向的成效，不仅有关这些方面知识的准确与充分，而且和中国能否真的踏入充实而有光辉之境深切相关。

盼大家支持我们！

盼大家一直支持我们！

贺照田

逼近历史 的战栗

对李桦 1946—47 年间
木刻创作高潮的尝试
性理解

莫艾

一

一面在生活和精神重压下挣扎着的木刻家们，仍然饿着肚皮，伏在阁楼上的电灯下，用全副生命力，籍着锋利的刀尖，向坚硬的木板上刻，刻。刀尖在木板上面留下了有力的黑白线条，把今日最富现实性的历史，有血有肉地保留在一幅一幅的木刻画里面了。

这是李桦（1907—1994）在1947年4、5月间有关第一届全国木刻展览会的总结文章中的一段话。语言反映出创作者的状态：自觉而强烈的历史意识、充满了血肉苦痛的尖锐的现实感觉、困苦而激动的战斗性。内战阶段，国统区木刻创作呈现出一个整体性高潮，李桦、野夫、张漾兮等人的作品刻画了精神和肉体受到侮辱的人群、他们在悲惨与屈辱中急迫、激烈的

“行进”状态，以及冲破现实禁锢奔向新的历史方向的动势。（图1）在内战的历史时刻，木刻界如此具革命性的创造显然超拔了抗战及内战初期文艺界普遍的沉闷状态。将目光放置在左翼美术发展过程，相较此前及抗战阶段，内战阶段也显示了“突进”与“爆发”性。其中，李桦在上海时期“突破”的力度相当突出，构造出历史运动激烈的顶点状态与振聋发聩的精神力。

置于前后的发展脉络中，则李桦上海时期的创作具有转折意义，又一定程度显得突兀。向前看，在新兴木刻的早期发展与抗战阶段的困境中，李桦的突破意义重大。具穿透性的现实洞察和提炼、升华的历史意识，可视为直接投入中共指导的革命实践过程与提高思想认识，乃至重新构造表现方式与手法的结果。党的重要理论家冯雪峰也发挥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

另一方面，这一历史关头的创作爆发又内在凝聚着鲁迅所开创的左翼美术传统在困苦中始终积蓄的经验与能量。怎样的现实与政治契机成就了这样的创作？这高潮与作者此前漫长的探索历程是怎样的关系？为何恰恰是木刻这一媒介可能承担这样的革命任务？这些是笔者想要处理的基本问题。往后看，上海时期的高潮“昙花一现”，在紧接下来的北平阶段和建国初期未能延续，创作状态、手法和取向都发生了不小变化，画家再次迅速经历了挫折。受挫的原因相当复杂，并跟建国前后文艺界有关创作取向和现实主义问题的理解状况高度相关。

将创作高点与此前漫长的贮备期、其后再次受挫的历程连带起来，可能更为有效地认识高点的意义，以此为线索也更能体认革命与艺术在历史状况中不断变化的关系性。李桦高潮阶段的作品不仅代表了左翼木刻在民国阶段的创作高度，也意味深长地出现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美术实践“交汇”的历史时段。1930年代末期发端的“民族形式”论争、有关新兴木刻与左翼美术早期阶段的反思与检讨、有关“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影响力与思考、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后的实践、理论探索、解放区、国统区所对应的不同社会现实状况与艺术取向——这些隐含在“交汇”之后的种种问题，构成李桦上海时期创作的思想意识语境。在这交汇处，国统区木刻作者进行了怎样的借

鉴与转变，又在新的意义上坚持住了什么；在其后的北平阶段乃至建国后，这样的现实观何以迅速丧失，在变化的条件下该如何继承革命的宝贵经验——在这些方面，李桦的创作经历都可以开启我们新的思考。

二

《粮丁去后》《怒潮》系列、《快把他扶进来》等作，是在1946年5月到1947年9月这段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李桦在上海创作出来的。这正值内战危机全面爆发，反内战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阶段。处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节点，内战危机激发起尖锐的社会矛盾。抗战与世界范围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得有关人民、人民力量的意识凸显，促使公众反思世界历史与未来的走向。借助抗战契机所燃起的建设新中国的期待一度成为民众关注的核心。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内战的现实和日益恶化的社会状况浇灭了饱受战争屈辱的人们的希望。国民党的治理能力逐步恶化并引发多种后果：社会经济逐步处于整体性的崩溃之中，城市与乡村绝大多数人陷于物质的匮乏与精神挣扎。极端性和群体性的抗争事件不断爆发。政治抗议外，物质极端匮乏和大批市民的失业，导致1947年5、6月间上海、南京、北平等四十多个城市爆发“抢米”风潮。社会

局势的动荡、下沉，当局的政治腐败与威压，加剧了抗战阶段已长期郁积的精神苦痛与愤懑。伴随着日益动荡与压制性的社会现实，社会情感状态与人心动向逐渐凝聚为一个新的浪潮。

李桦的创作有力表现了激荡的时代动向。野夫、张漾兮、杨可扬、陈烟桥、王琦、黄新波等一大批国统区木刻作者在内战阶段也产生了各自的创作高潮。在经历了早期和抗战阶段后，1929年发端的新兴木刻运动至此集体达致新的创作高度。而这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历史局势催发的结果。经历抗战阶段深刻的民族屈辱与苦痛，木刻界并没有真正突破早期阶段被指摘的“抽象”“空洞”“概念化”的困境，表明社会局势对于艺术的催化作用须有更为内在的条件来配合，才能够实现。

李桦1934年开始从事木刻，至1946年已经历了12年的摸索。虽然创作勤勉并贡献了《怒吼吧，中国》（1937）这样的名作，他长期无法摆脱新兴木刻普遍的困境：内容空泛、表达粗糙、概念化与明显的欧化痕迹。^[1]抗战阶段，李桦有意识突破此前“闭门造车”的创作方式和小资青年的眼光、趣味，宣称中国“新艺术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广大的民众身上”，木刻需要采取“新的写实主义”。^[2]他在1937年加入国民党抗战军队并转战多地，1938年10月间开始画战地速写，1940年开始做水墨写生，探索表现现实、训练写实能力的新路径。^[3]从笔者目前搜集的

材料看，自1940年，李桦的创作显示出明确的变化：表现农村劳动场景、注重情节性并挖掘细节的“政治”意涵^[4]；人物刻画和表现手法上，有意抑制此前明显的欧化痕迹，摸索写实性的语汇，致力描绘中国人的面貌；引入线描语汇作为基本描写语言，抑制明暗因素与鲜明的黑白对照，追求明朗、单纯、具民间装饰感的风格感觉。（图2）总之，现实与乡村题材、政治性意涵的情节表现、“民族”风格、写实手法成为新的追求。在根据地之外，李桦获得突出的成绩并得到艾青、胡风、徐悲鸿等人的肯定。^[5]但转变远未成功。“现实主义”“民族化”“写实”这些画家一再提及的概念还根本没有获得能真正助益创作的理解消化路径。^[6]调整后的表达外在、生硬、呆板，画家早期勇猛锐利的能量也被削弱。

抗战阶段（尤其是后期）国统区文艺创作普遍沉闷、乏力并蔓延着“市侩”的精神状况。木刻界也难以突破此整体气氛。曾被期待发挥“利刃”作用的新兴木刻长期陷于困境，有关如何认识现实、突进对象、获得新表现路径的问题并未借助战争契机有所进展。战争带来的新现实停留在“景观”与直观式的精神刺激层面，无法内化为新的表现构造与主体的精神真切成长。在这样的前提下，李桦上海阶段的表现具根本的“飞跃”性，其意义超出个体。我认为突破在几个层面。其一，找到深入现实的路径，



图1 李健《起来》(“怒潮”组画之四), 1947年, 木刻



图2 李桦《秋日》，1938年，木刻

获得具现实深度与政治性理解的视角。其二，获得一种深的历史意识，得以观照、转化、形塑现实，并经由木刻这一特定媒介，在表现层面寻找到新的手法与构造方式。其三，创作主体被高度调动，呈现激越的“战斗”状态与把握、深入历史的强大意志。

谈到获取深入现实的路径，我认为画家对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的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李桦对市民阶层、特别城市青年学生的定位与表现，显现出突破性的政治感与现实把握能力。抗战结束后，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木刻工作者汇聚上海，在中共直接领导下展开工作。^[7]新成立的中国全国木刻协会在1946年号召全国木刻作者“投身在民主斗争的洪流中”，“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坚强无匹的战士”。^[8]李桦1946年5月由湖南来到上海，成为这一组织的核心成员。至此，画家结束了长达十三年的“无组织”生涯，投入到中共策划的反内战民主斗争。高潮阶段的作品是在紧张的工作/斗争状态与局促困苦的环境中诞生的。

作品表明，画家理解到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的基本方针与针对人群。有研究指出，内战期间中共在国统区的基本政策是争取最大多数的城市市民与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一二一运动”之际指出，“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

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9]学生运动将“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潮”^[10]。当时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指示地下党讲究斗争策略，转变工作作风，“结合国统区具体情况，号召进步青年‘勤学、勤业、勤交友’”，尽可能争取青年学生与市民阶层。^[11]反内战的宣传不是以激进的意识形态诉求，而是以市民、学生对丧失“温饱生活”的忧惧、对基本生活保障的诉求为动员基点。这是上海1946年6月学运期间两篇演讲稿的片段：

我们的父亲兄弟就将因内战而失业，我们自己就将因内战而失学了，因为内战，要把本国的工商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统统毁掉，叫什么人都活不下去。

我们读书以后的出路就将因内战而全断送了，因为内战一来，大小工厂店家都要统统关门。我们温饱的生活就将因内战而完全丧失了。^[12]

迅速发展至全国范围、规模的学运，从要求改善学生伙食标准、提高教育经费开始，进而联系到反内战诉求，在动员策略上贴近民众的生活感受。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的表述相当精彩：“在开始形态，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生活斗争，是生活斗争与政治斗争相互协通到一定时机又汇合成为全面性的政治斗争，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策略上都是为着准备组织

与领导这一新的高潮，把蒋管区民主运动向前推进一步！”^[13]

内战阶段，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特征与弱点的生活欲求，成为被中共期待有效调动和引导民众的重要因素。相较1920年代中期开始、饱受挫折的中共领导下的城市工人运动与政治斗争，内战阶段的斗争策略显然体现出中共日益成熟的政治性。在学运核心地参与行动的李桦认识到了这一层面。他创作的核心对象是一般的城市青年学生：他们有爱国热情，陷入无出路境地后起身抗争，却遭遇政府的压制与迫害。画家在此突破了概念化的眼光：他笔下的青年学生与市民不是英雄般的、有着明确政治立场的革命者，而是带着市民阶层的属性与特征的、现实中的弱者。画家将目光对准普通青年与知识分子软弱的、也是人之常情的一面，相当诚实地表现他们物质与精神层面的贫困与窘迫：羸弱的身体与精神的穷酸气，以及运动过程面对迫害的心理阴郁感与恐惧。（图3）《夜的恐怖》有意突出被捕青年惊恐而具蹉跎感的精神特征，虽然摹仿痕迹浓重、分寸把握不够成熟，但表现的视角与批判意味值得重视。

获得这样的认识并非“顺理成章”。从1930年代萌发至抗战后期，特别在与根据地/解放区木刻的参照视野中，新兴木刻始终被诟病无法做到“大众化”和深入“工农群众”。这在抗战末期还被特别强调。^[14]而某种意义上，

新兴木刻在早期和抗战阶段的表现主义面貌与它所植根的社会现实状况有深层的关联性。处于与根据地/解放区迥异社会状况的国统区作者，如何找到、又该找到怎样的“大众化”道路，是需要以自身所在现实作为基点来思考的。在此方面，李桦上海阶段的创作具有突破意义。敢于表现现实中真实的小市民状态，并将后者作为革命的“唤醒”对象，是顶着惯常的“偏见”压力的。此前木刻界对市民的描写多无法脱离抽象化、概念化的眼光。在内战阶段同题材的表现中，李桦的视角也不一般。另一位国统区木刻者杨可扬重点表现青年学生对进步思想、知识的接受及大学教授受到政府压迫的精神状态。成都的张漾兮则以城市小官僚、权贵阶层和城市贫民的对照为基本视角，以前者的腐败生活、习气反衬后者的贫困与受欺压。（图4）

作于1947年4、5月间，对抗战之后国统区木刻界创作的阶段性总结，表明画家对自己捕捉到的对象的政治意义有着清晰的认识。李桦肯定在市民阶层获得影响力，是值得骄傲的成绩：

（市民阶层）认为在今日只有木刻才是他们自己的艺术，因为木刻描写着他们的生活，表现着他们的希望，同情着他们的苦痛：为了在渺茫的生的苦难前途中，能够给他们一点慰藉、鼓舞和启示的只有木刻，所以他们把木刻拥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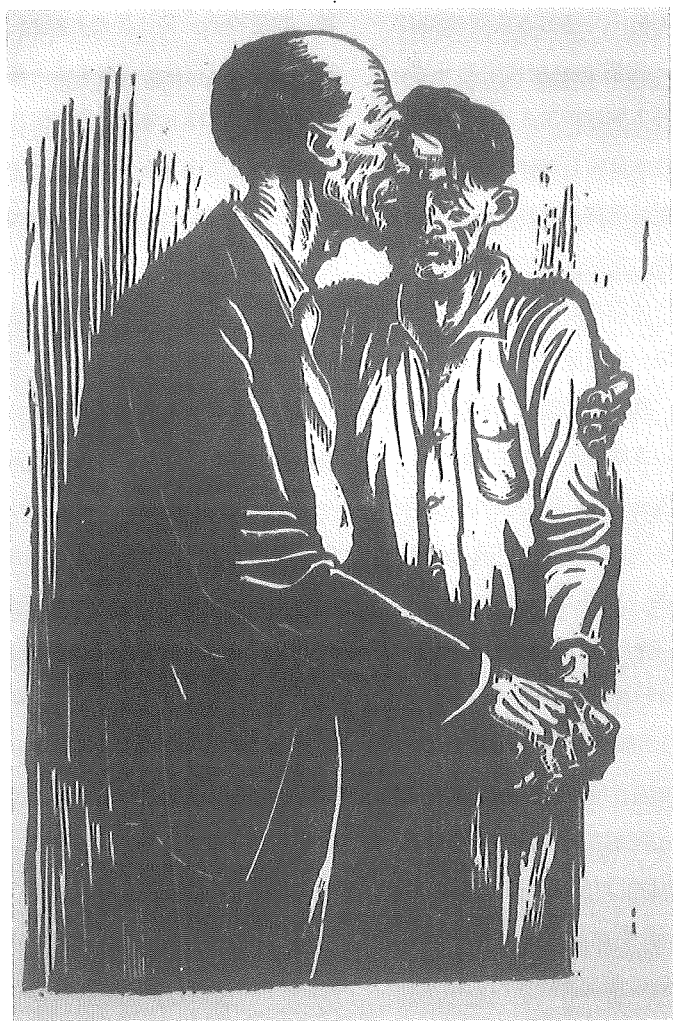


图3 李桦《释放后》，1946年，木刻



图4 张漾兮《擦皮鞋的孩子》，1945年，19×25cm，木刻

图5 李桦《抗粮》（“怒潮”组画之三），1947年，木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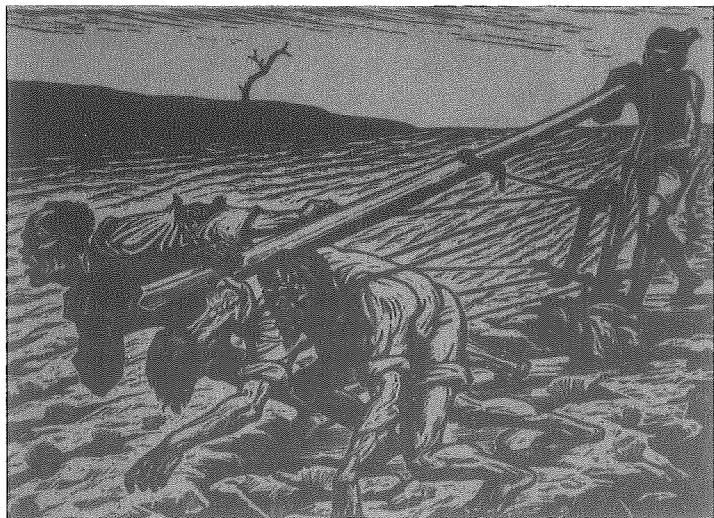


图6 李桦《挣扎》(“怒潮”组画之一), 1947年, 木刻

图7 李桦《抓丁》(“怒潮”组画之二), 1947年, 木刻

得非常紧……的确，木刻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而今日的小市民，在人民大众中占着一个极重要的位置，是争取民主运动中一股伟大力量，所以今日木刻在小市民中间发生着一种精神上的作用，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收获了。^[15]

对于李桦，这是他首次真正由对政治行动的理解而进入到对象中，构筑起创作者与对象间富于现实感的关系性。他渴望深入对象的内心、构筑认同、唤醒他们对自身悲苦处境的更深体验，激发反抗意识。

最近整理公开的李桦1944年间的日记表明，他在抗战阶段的随军生涯无法对创作形成内在支持。那时的他还是带着精神苦闷、执着于民族大义等道德感的小知识分子，虽对国民党政权、军队的腐败无力感到痛心，但仅能对现实采取疏离与旁观的姿态。^[16]新的政治经历无疑促成转变契机，思想意识方面的变化或许更为关键。从现有材料看，一个重要线索是党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的影响。上海时期战友邵克萍、王琦的论述表明冯雪峰与李桦等木刻作者有直接交往并发挥了指导作用。但当事者的论述不具体，笔者也还没有能力把握冯自身的理论脉络，因而无法做出更为切实的论述。^[17]

可以追溯的事实是，在观看《抗战八年木刻展》后，冯雪峰在1946年9月撰文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逃避黑暗的现实，逃避

人民的绝望的状态及他们中的确具有着的真实的绝望，——要从这黑暗和绝望掉过头去是不对的，——而是必需从人民所认定的具体的道路及其朴实的信心与力量，去击破黑暗和绝望的状态。我觉得，这是新艺术的一个根本的起点。”^[18]这一认识产生于抗战期间，和其他观点——艺术作品必须经由作者的主观投入，成为“与现实肉搏”的结果，需要创造具体、有血肉的形象、典型，反对“商人投机式的廉价的光明歌颂”和空洞的概念化表达等等——一道，特别指向知识界、文艺界沉沦的精神状况与乏力的创作路径。^[19]冯无疑认为这些状况在抗战结束后依然存在，并且需要持续与之斗争。有关新艺术道路起点的认识，还牵涉有关“现实主义”、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党的文艺路线争论等更为复杂、深广的语境。在基本的现实观之外，冯雪峰还强调木刻不应仅“单纯地暴露现实”，还要以“木刻特有的形象感染力”发挥作用，肯定木刻“单纯，朴实，明确，深刻，暗示，以及漫画化或典型化”特点“更能直接地表现人民的特色。”^[20]将表现形式与其可能表征的现实性联系起来的认识思路，无疑对木刻作者产生内在的引导作用。

冯雪峰有关艺术创造过程和方法的洞见及对于创造主体的要求，也极可能给予李桦以关键的启发。冯在1940年即强调艺术创造是“客观现实的认识过程”，“需要着社会的历史实践

的关心,热情和意志”,需要创作者克服种种偏见,以“伟大的热情”发见真实。他指出艺术创造该是“聚集着而且精炼了实践生活的斗争的战斗的过程”,在深入现实的过程中,创造者需要与自我、与对象进行搏斗。而“艺术形象的生长和完成”正伴随着“客观现实的真实的一步一步地被发见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得到“养护”,获得“生命与生气”。^[21]这些认识该对画家重新构筑现实理解路径,追求具血肉感与生命力的形象、语言起到关键作用。冯雪峰抗战、内战阶段杂文写作所孕育的历史意识、对革命形势动态性地把握方式、对人民性格的认识与高度凝练的意象,特别把握现实的方式,都极有可能给李桦以重要启发。冯的杂文显示,他一方面追求穿透现实、寻求社会的深层结构与动向,从现实中获取一个更高的层面;同时自觉于坚守一批判性的位置,有意识地与状况中的现实保持一种动态的紧张、质疑性关系,并在这样的张力关系中时时针对着不同阶段思想文艺界的贫弱予以批判、引导。^[22]认识方面的新资源和对中共民主运动的参与,可能合力促成画家的转变。

李桦此阶段作品的另一突破,是伴随着激荡的现实状况与革命行动,对历史意识的获得与呈现。上海时期作品迅疾而惊心动魄的革命势能,处于顶点状态、绝系的战斗意志令人震动。这并非对现实状况的对等“回应”,而是创

作主体以强劲的意志力和认知力从现实层面撕扯出一个新的空间,将人的内在意志和历史的发展动势注入到现实肌体之中,构造出一个爆发状态的新“现实”:历史运动的“怒潮”。《粮丁去后》《里外同心》《快把他扶进来》《怒潮》组画集体勾画出这样的取向。激越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觉,体现在富于创造性的空间关系与结构构造。《抗粮》(“怒潮”组画之三,1947,图5)所运用的强烈的透视对比,不仅显示了两个对立阶层的形象。前景地主被夸大的强悍身躯、外形线与后景以缩小比例呈现的突进人群之间,拉伸(构造)出一种被异常强化的、鲜明的空间/历史感觉。在这个空间中,激越的“小人”正从远方冲向前景的黑暗“堡垒”,马上就要冲过来。

《挣扎》(“怒潮”组画之一,图6)表面是对现实场景的写实描绘,实则被构造在新的视角与空间里。画家以触目的近景呈现了斜向的前进行列,观者几乎可以触摸到那充满血肉与苦痛感的身躯;同时,逼近的近景又创造性地构造出深远的空间/历史感。《抓丁》(“怒潮”组画之二,图7)更具挑战性:妇女的背影被夸大置于前景,原本平常的横向行进队列与逼仄的横幅被她向上的身躯与手臂“生生”拉扯出一极具动能的想象空间。在这样的构造里,创作者与观者仿佛共同行进于悲怆的历史激流,冲破现实的意志又决绝地指向画外。这历史/

空间感觉甚至显露在五二〇运动的宣传单《向炮口要饭吃》(1947, 图8)。传单看似简单“再现”了宣传口号。不过,在空旷的空间,一个穿着破皮鞋、瘦弱的城市饥民把残破的碗端向硝烟腾腾的巨大炮筒——这样直率而激烈的表达是一般状态无法呈现的。配合对饥民穷酸面貌富于“肉体感”的刻画,作品渗透了逼人的历史/现实感。这感觉渗透于表达者的“呼吸”,体现在各种细节,甚至不那么容易构造这种“姿态”的情节和形象:《挣扎》艰难犁地的农民压弯的身躯积蓄着将爆发的能量,《快把他扶进来》(1947)里跌跌撞撞奔进屋的青年的身躯裹挟着不可抵挡的势能。

作品的动人之处,还在于将历史势能与革命激流附着于那些丑陋、苦痛、沾满污泥、呈现出深深的屈辱烙印的躯体。画家以锐利的刀锋刻画了一个个干瘪、丑陋、衰老,如猛兽般粗糙、带着被侮辱的印迹,苦痛而愤怒的人群。在他的刻刀下,劳动者、青年、流离失所的老人、妇女,乃至儿童都获得“逼真”的身体感触。他们淌着汗、泪,混着血的破衣襟,颤抖而恐惧,或者为苦难所摧折,却又从麻木中挣扎出骇人能量的身躯,一再震动着观者。“惊心动魄”的品质,是经由这样的表现才可能被造就的。^[2]画家以沾满着血肉感觉的笔墨,将历史承载在如此深重的、人民的身躯中,这历史才真实、有重量,具备自那段现实深处生长出来、

沉重但却可能牵引现实走向新生的能量。也只有有这样的表达,在这样经由“革命”所锻造的表达中,我们才能够深切地体会、甚至触摸到创作者被重新赋形的身躯与意志。这深厚的现实性是画家在抗战之后获得的最大突破。

在这样的过程,我体会到画家渐渐培养出“进进出出”于对象、在主体与角色间往复的能力,并伴随着对历史意识的体会而碰触到构造表现方式这核心层面。《快把他扶进来》中逃进屋的青年呈现为内心状态的表达,屋内青年则体现着观察、描绘者的视角;《团结就是力量》(1947, 图9)的背景群体为观察视角,前景衣衫褴褛的青年又突入到角色内部;《抓丁》前景呼唤丈夫的妇女背影既呼应着壮丁人群,又呈现出焦虑的内心状态。这样的表现既不成熟,也不贴切契合于已有的任何一种表现范式,但时时游移的焦距与流动的视点状态恰恰体现出创作的心理与用力之处。在这样的探寻过程,人物心理、情节性、人物关系、空间关系获得表现与构筑。这是此前左翼木刻未能实现的。李桦实现的方式值得思考,他以创作性的方式尝试揉和表现主义,现实主义的手法、因素。这结合找不到先例,也未形成稳定的方法与面貌,却不妨碍表达的能量。在此,画家贡献出有关革命与艺术相互激发状态的精彩例证。

在新的构造下,表现语言发生了变化。在李桦的上海阶段,版画、特别木刻媒介的基本



图8 李桦《向炮口要饭吃》，五二〇木刻传单，1947年，木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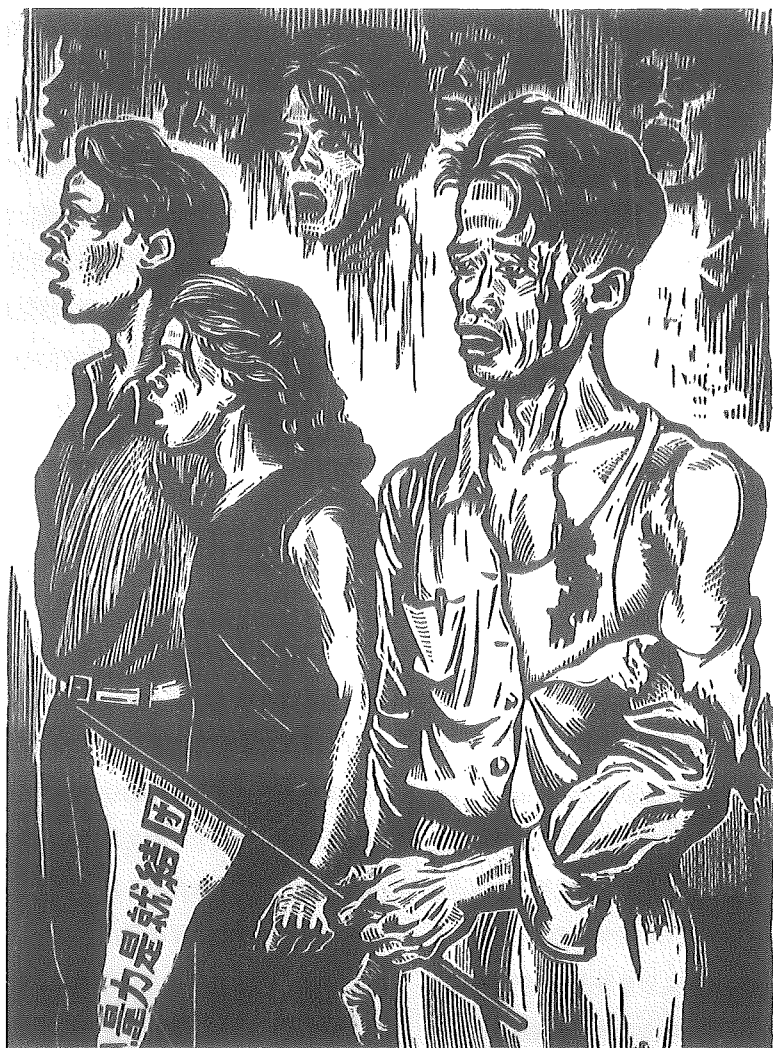


图9 李桦《团结就是力量》，1947年，木刻

语汇“黑白”，切实变为有力的表达语言。此前，它们基本被作为局部的表现、描绘手段。李桦则将之转化为一种整体性的语言，配合整饬概括的造型手法，表达沉重而激烈的内容与感受。在许多作品中，画家以娴熟的手法摆脱（超越）了真实光线的束缚，使黑白语言发挥动人的表现力，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如《汗》，1947）；或将之作为营造人物心理、场景氛围的手段（如《快把他扶进来》）。这时的线条也摆脱了抗战阶段拘谨呆板的状态，蕴含着一种苦涩而刚劲的感觉，犀利而具爆发感。

深入现实并获得历史意识的过程，也使得主体被高度调动、呈现激越的“战斗”状态。被压抑而趋向爆发的精神，与复杂现实纠缠的运动感，需要不断调整与应变的斗争状态，革命行动的危险性与“战斗”状态——这些都构成对主体精神、意志、现实感觉的塑造。^[24] 政治行动也对艺术创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李桦曾在1949年7月撰文详尽记述1947年“五二〇”运动宣传行动的方式：木协与学联组织取得联系，帮助制作木刻传单，在紧迫、隐秘、艰苦的条件下，木刻作者连夜赶制创作，学联负责印制并在接头分发给市民。^[25] 宣传工作者需要寻求最具号召力的方式唤醒民众，并在宣传过程被对象直接“检验”。^[26] 疾速的动势感与爆发到顶点的绝杀意志，映衬着行动过程的主体体验。被激发的主体又使表达充满跃

动的性格与饱满的活力。《团结就是力量》的速写式构图与手法相当不合规矩，镜头的焦点处于偏移状态，前景人物的充沛性与生动感却令人过目难忘。

隐藏、无法被剥离出表现过程的种种“出格”，更有力表现出主体被革命激发的状态。这是些不合规范却又抑制不住的表现。如《挣扎》前面低头伏犁者被夸张地伸长、因用力而骨节突起的脖子，《抓丁》前景小孩仰起的头，抓丁行列被前景妇女手臂“夹起”的人脸，右边低头的壮丁“抵力”的脖颈，画面左侧最边缘的两个“丑陋”的面部——冒着冲破作品构造的危险，画家尽力争夺每一寸空间表现他的主人公。《抗粮》中伏地老汉那似乎被神鬼附身、随时准备起来的令人惊悚的身躯，《起来》左侧中景前冲者被强力扭动的头部，都是在投入中全然忘却表现的“法则”才可能呈现的。正是在这样的表现中，我们看到一个逼近历史的周身战栗者。他无比兴奋地站在历史深处，全身心在扩大，时时陷于“失焦”的状态——在这样的时刻，画家进入历史，刻刀成为战斗者的武器。高潮阶段的创作处处以“表达”为最高目的。“表达”，从现实的逼迫中开拓新的世界——观者可以在在感受到这逼人力量的萦绕。在此，木刻成为冲破规范、构造新途径的媒介。这高度的创造状态令人联想到延安时期的古元、彦涵。这些深入到革命所搅动的现实深处被激发

的艺术实践，是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诞生而具世界意义的文化创造。

说到这直指“表现”的质朴与勇猛，我特别想说明，画家有意赋予“木刻”媒介以如此品格。看到其抗战、内战阶段占据不小比重的速写、写生、水墨作品，我顿然体会到，李桦是在美术的整体视野中理解木刻及其战斗性。速写、写生、水墨实践显示了一致与同步性，旨在突破以往的表现瓶颈，获取新的写实与表现能力。在抗战阶段的困境中，木刻一度被“写实”手法收编，“规矩”得丧失了木刻特性（如《前线生活》，1943）。而在上海阶段，木刻的语言特性被画家重新自觉并获得有力开掘。李桦在内战阶段还保持着两个“分裂”的形象：在速写和水墨中追求质朴、严谨与“正面感”，在木刻中却着意于激烈、苦涩，乃至“丑陋”。何以发生这样的转变？技术原因不是关键。在深入革命、获得新的历史意识与创造动力后，画家领悟到只有木刻、唯有木刻能够传达新的体验。他在美术的整体架构中努力重新寻回木刻的战斗性。这也是1920年代末期发端却时时陷于危机的新兴木刻最为内在的品质。

三

高潮阶段作品逼人的震撼力到底来自哪里？在那激烈的历史意识和深痛的现实感觉之

后，透露出—个坚韧勇猛的个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作为媒介，如果没有这样的表现的“基底”，新获得的政治和意识契机或许也无由发挥转化作用。我渴望知道，这作者、这革命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是被如何养成的，在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木刻行为对于他意味着什么。李桦和同伴的经历可以使后人更深认识到新兴木刻在中国现代美术历程中的意义。

在人格方面，李桦少年和青年时期即显示了过人的意志力。由于幼年家道中落，他十五岁成为广东省无线电台的报务员。十六岁后在广州市立美校的四年读书时光，往返奔波于电台、学校和家。为了保证白天到校学习，李桦把白班一律换成每天六小时的夜班，每夜在“战事频繁”的广州城中“冒险通过沿街的路障”，跋涉一小时到电台。收发工作需要高度专注，但“天亮后得不到休息，又要赶回学校上课，而且要掩饰着一夜工作的疲劳，装出和同学们—道的样子”，每天只睡三、四小时。在鲁迅和革命的影响下，二十五岁丧偶之痛促使他最终从油画转向木刻。木刻成为生命和情感的寄托。^[27]这是一个刻苦、坚韧，充满热烈行动意志与行动能量的青年。在他的带动下，—群年轻人组成木刻团体展开忘我的工作。^[28]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木刻吸引的多是这样的青年。江丰、野夫、陈烟桥等等都是这样能够“拼命”的。他们不满足于压抑的现

实，深陷于寂寞与苦闷，要寻求“发声”的空间与媒介。而革命在大多数时候并不能提供足够激发能量的土壤。新兴木刻者成长的环境与条件相当艰难。事实上，无论在抗战之前还是抗战之中，木刻作者多数在党的力量薄弱的地区，虽基本长期处于革命（党）宣传工作的外围地带，却遭遇严苛的政治压迫，多处于机动或流亡状态，缺乏稳定的组织与经济支持。同时，他们在观念与方法层面缺乏具体、切实的指导，可供借鉴的资源又不足以发挥有力的引导性。组织方面，流散与孤立的状况长期持续。^[29]新兴木刻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走过十几年的。表达抽象空洞、基本功薄弱、表现生涩粗糙、摹仿多种风格、语言甚至“辞不达意”是普遍状况。木刻作者好像荒野上呼号、冲撞却无法找到队伍的漫游者。即便如此，无数青年在木刻中投注了惊人的热情与能量。李桦、野夫内战阶段的作品显示，这样的热情与能量并未在长期的困苦中被彻底磨损。甚至在不理想的革命进程中，它们也获得持续性的保有，并在新的契机下获得充实与爆发。他们究竟是被怎样养成的？如何真正贴近他们的生活状态来理解木刻行为？经由这样的媒介，他们被点燃并发展出怎样的精神特质？对于八十多年之后处在不同现实状况中的后来者，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尝试以鲁迅的做法与木刻者的经验、状态为线索进行初步探讨。

鲁迅对于新兴木刻的种种扶持、引导和影响，已有众多论述。在此，我想重点讨论他在怎样的视野中引入木刻，他对木刻行为的“媒介”意义的理解，对青年状态的把握和引导。鲁迅的确把木刻视为革命的武器，但也认为革命、伴随革命的艺术需要有具备“平常心”，需要健全的人格与敏锐感受力的新人的养成。文艺通过“人”才可能成立：“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30]而这新人的养成，需要具包容力的大“圆”。面对逼仄的现实与急迫的革命要求，鲁迅的基本态度是，要尽可能提供这大的“圆”给青年。在根本上，鲁迅将木刻放置于革命与文化的张力关系中。

鲁迅对木刻青年的指导提示了许多线索。鲁迅明白，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前期，木刻青年大多无法摆脱现实限制而达到对现实深一层的把握，基本的政治意识也相当模糊、幼稚。事实上，对于大多数青年，木刻是他们摆脱苦闷、寂寞的方式。多数青年在自己的处境里面无从感知革命，仅通过外在渠道展开想象性的理解。^[31]李桦也不例外。1933年冬（开始木刻）到1935年的作品显示他沉浸于稚嫩的现代派作风与革命想象。“辞不达意”、幼稚粗糙是早期木刻的普遍状况。针对左翼的批评，鲁迅的反映是：确实“小资产阶级的氣息太重……但这是意识如此，所以有此气氛并非因有‘意

识堕落之危险’，不过非革命的而已。”这并非一朝一夕可改，“如果硬装前进，其实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绪还要坏。因为前者我们还可以看见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心情的反映，后者便成了虚伪了。当然，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去的。”^[32]虽然新兴木刻指向突破隔离于现实、逃进“艺术之宫”的作风，鲁迅并没有将木刻实践硬拉到不切实的想象中的“革命”层面，而是抱着平常、切实的心态，期待以朴素、真率、潜移默化的方式开启青年新的目光，致力于培养他们丰富、细腻的感受力与体会力。

鲁迅不是美术家，当时倾向革命的美术还处在萌发阶段，这使他无法具体设想成熟的革命美术形态。但，作为文学家，鲁迅有着对于艺术表现和语言的深刻理解、极高的鉴赏力与教养，涉猎也相当广泛。他所提供的木刻资源远超过现实革命直接所需，甚至有意“避开”急迫的革命需要，其艺术视野驳杂而具开放性。在这些资源中，有“近乎表现派”“粗壮有力，不求形似”的德国木刻，严谨而细腻的英国木刻、苏联木刻和部分中国传统资源。他所欣赏的画家包括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麦绥莱勒(Franz Masereel)、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法复尔斯基(V.Favorsky)。鲁迅喜爱并在中国发挥极大影响的苏联木刻，特别值得留意。鲁迅评价说，“这是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创作出来的木刻，革命给苏联艺术家带来了创造纪念碑式的作品

的有利条件，它具有一种吸引人的强大魔力。”而无论以当时激进(或机械)的左翼观点还是建国后的文艺标准，法复尔斯基、克拉甫兼珂(A.Kravchenko)的作品都会被认为太过“形式主义”。据陈烟桥忠实的回忆，鲁迅对这些作品抱以由衷的赞叹，认为它们具备“灿烂绚丽的技巧”、丰富而细腻的趣味、“独创性”及从现实中挣脱而出的精神能量。^[33]

这样的资源范围有客观的限制性。特别鲁迅所喜爱的1920、1930年代的苏联版画包含怎样的文化传统？苏联其时的社会状况与文艺取向在何种意义上可资借鉴于中国？如何理解苏联文化与革命间的关系性？它是否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典范？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探讨。后来的事实表明，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既对新中国美术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又因无法对应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而被试图修正与超越。尽管如此，在这一视野中，苏联版画和近代西欧木刻(英、德、法等国、包括比亚兹莱等人)间的关联性、其中的西欧现代派因素，这些资源与欧洲(俄罗斯)传统间的关系性，这些不同面向都是被鲁迅所意识到的。而在当时的国内语境下，这些资源的确透露出鲁迅对于革命文艺的期待、想象与理解。由此所显示的对艺术创造性的理解、对表达与精神旨趣的丰富性的追求，对艺术语言、形式的开放态度都值得深思。在当时，这类作品可以矫正革命文艺要

“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不然，即是贵族”的粗暴理解。^[34]与革命发生深层关联的艺术被期待获得更为自由、丰富的展现，而这特别有赖于新人的培养。鲁迅编辑的第一本木刻集《木刻纪程》意外收录了许多刻画细腻、风格恬静的风景、静物作品。他或许认为可借此培养青年的感受、观察力，促其朝向健全的人的趣味与精神发展。

鲁迅也多次强调要重视素描能力和基本功的训练，尽可能多作速写、写生。在技术目的之外，他期待青年人甩开各种套路（革命的宣传也是一种套路），睁开眼睛来观看、体会现实。^[35]介绍多种风格资源、尽可能提供较宽阔视野的同时，鲁迅特别关注学习者能否在学习过程中保有自己真切的感觉与体会。在开放的资源中，他时时强调初学者不宜摹仿“刀法简略，而黑白分明”的风格，因为“稍一不慎，即流于粗陋也”。对李桦和罗清桢起初清新朴实的画风，他给予肯定，但对他们后来渐显套路的状况，又批评说不应陷在“一种型”里面。他既肯定精神趣味的丰富与创造的活力，又警惕着“倾向唯美”而“会入颓废一流”的危险，警觉“变相与堕落”。^[36]这些在具体状况中不断调整的观察与引导，特别能够显示鲁迅对于文艺的理解原则与把握的分寸。

不要把目光局限于革命题材而鼓励描绘地方风俗、风景、静物的想法，在鲁迅那里有着

深意。描画风俗、风景不仅为着“引起一般读书界的注意”、扩宽木刻的路，也为了使画者从中发现新鲜的生活，获得精神的滋养。^[37]提到描画风俗，不禁令人联想到鲁迅从日本返乡后的抄书生涯。他那时抄录了专谈广东风土物产、花鸟草虫的《岭表异录》，孙郁评价此书“毫无文人的酸气”，读来“每每可觉作者童贞之心，于自然之中，求索万物真理……”^[38]持续十年抄录古碑、古书的行为，是否表明鲁迅在现实的困厄中有魄力拉出一个新的层次，在其中展开自我的持存与生长呢？无论如何，这曲折的行为包含着个人与革命、与现实之间深沉的“角力”。木刻实践也被期待在不断地调整与矫正中，与革命、现实保持张力状态。

文艺必须通过文艺者才可能完成。对木刻行为的理解与行为本身也构成精神的滋养。鲁迅所理解的“艺术”是和身体相连的。所谓“捏刀向木”“放笔直干”，正需要行为者以身体作为触角与武器。鲁迅享受艺术品与身体的接触经验，重视材料与媒介对于感官的作用。他对书刊的装帧、印刷效果、质感、剪裁各个环节都有极高的要求。^[39]这位行家的手上功夫也很了得。木刻展览和木刻作品的出版，从设计封面、版面、选材，乃至装订、装框，鲁迅也多亲力亲为。许广平回忆，珂勒惠支展览作品是在鲁迅大病后上海七月间“近百度的暑热中”，他俩“一同在地席上一页页地排次序，衬夹层”

准备起来的。^[40]这些事情不令他感到麻烦和受苦，因为艺术本就包含着“技艺”，动手的行为也是细细体会作品、使自我获得沉浸的过程。

广州青年手印木刻集的经历，令李桦多年后还非常感动。鲁迅看到《现代版画》第一期后复信说“创作木刻虽是版画，仍须作者自印，佳处这才全备，一经机器的处理，和原作会大不同的……”在犹豫之后，这群年轻人终于

合力搞起来。……去佛山选购了一批书籍装帧用的纸张材料。……又买了线装书用的传统磁青纸和朱红纸。这些材料是准备作为封面和衬页使用的。又买了一批广州称作“玉扣纸”的质坚而厚、带土黄色的土制竹纸，准备作书页，用以贴画。我们不用洋纸是因为要避免鲁迅所批评的“光滑”的毛病。我们又决定每集更换装帧设计，务求《现代版画》的形式新颖美观而多样化，并具有版画的特色。

鲁迅表扬画集的“内容以至装订，无不优美，欣赏之后，真是感谢得很”。这使得大家“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劲头更足了。每集印数从50、60、80，最高达到100本。”^[41]在文字间，我们体会着手印过程带来的享受，参与者的感受力与体贴、珍惜的心情。而这“沉浸”正是一种平常而亲切的陶养。这经历也带着青春的活泼的力、同道间温暖的情意与连带感：“忘我

地苦干，这是很动人的。”“我那时才26岁，我的学生最大不过20岁，……我的房子很小，广州的夏天特别闷热，他们就是汗流浹背地挤在一起，边贴画，边谈笑，边唱歌。我至今想起这种情形，还历历在目。”^[42]

作为特殊的媒介，木刻行为本身契合着青年的需要。当连着身体的刻刀一下、一下刻下去，苦闷、寂寞者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那些狭小的房间，闷热或者寒冷的天气中，机动或隐秘的状态下，伴随着身体的震动，刻的声音被木刻者所倾听、获取。在这样的寂寞、甜蜜中，刻刀显现出令人倾心的魔力。在这个意义上，被木刻作者反复强调的“木味、刀味”不仅仅是对语言的要求，还意味着身体与精神的需要，要发出“声音”！^[43]在革命岁月里，木刻作品大多仅能发表在地下刊物，印刷条件普遍低下，效果多粗劣得难以想象。因为声音散播的艰难，木刻原拓就更加被作者所珍惜。抗战期间，木刻组织曾在多个地方举办移动展览。展览的移动，全赖木刻作者冒着纷飞的战火，以生命来护送作品。作品在战火中难免浩劫，但传递者的精神却凝结为生命的能量。^[44]

木刻也成为分散各地的作者建立联结、获取情感与战斗能量的途径。鲁迅和青年的交往方式被青年们所珍视。这样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使木刻行为从一开始就同人格、相互的情意、体贴、连带意识相联结。李桦等在

1930年代初期开始的藏书票设计可以视为充满温暖与活力的精神传递。(抗战期间中断后,他在50年代重新开始藏书票的“行动”。)在漫长年月缺乏保护与引导,长期分散各地,防备或逃避着压迫的困苦中,木刻成为青年超越空间阻隔,互通声气、获取慰藉与激励的连带方式。木刻作者长期以通信和寄赠作品的方式保持联络。在抗战期间,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建立包含众多地区的组织网络,传递带着体温的作品与通信。^[45]李桦是其中具凝聚力的组织者。^[46]

自30年代发端直至抗战结束,新兴木刻运动所达到的深度和成熟度相当有限。但其中包孕的坚韧而勇猛的生命能量却不应被忽视。仅从表现的质量来理解、判断这些作者们十数年的木刻经历,就无法真正抵达他们。在这样漫长、艰苦的过程中,更有意义的不是最终呈现的作品,而是使木刻行为得以持续的那些人、那些身体、那些寻不到方法却始终坚持的行动者。尽管意识模糊、表现稚嫩,但有一群人借助木刻构筑起一个隐秘、甚至甜蜜的世界,展开情意的联结,并在坚持中不断培育着对于革命的冲动与想象。与同时代人相较(如江丰、野夫、黄新波),以摹仿“巴黎画派”为创作起点的李桦经历的道路跌跌撞撞,曾摹仿实验十数种画风,尝试自我更新却难以突破。在挫折与困顿中,作为基底的生命能量依然被保有。起手阶段即显示出来的,对某种激荡的精神状

态和形式的特别敏感也被保存。如果没有这基底的能量与意志,没有养成过程的培植和木刻行为的馈赠,即便遭遇新的契机,或许也无法呈现这样震惊的爆发。木刻行为留在木刻作者体内的印迹,在建国之后持续作用。上海时期之后,李桦没能获得更高的突破。他本人和木刻界长期陷于各种掣肘之中。在高潮过后长达四十多年的平淡中,正如在高潮之前的十余年间一样,他始终在倾力奉献热力。建国后,李桦将最主要精力投注在与各地院校青年和业余木刻作者的联络与指导中。他还是以那样个人、温暖的方式联结着各地青年,其中多为业余作者。1990年代中期,汇集各地作者追忆的《李桦纪念集》令人感动地呈现出具内在凝聚力的木刻者群像。在这个意义上,他始终作为革命的木刻作者存在着。

四

李桦上海时期的创作不仅凝聚新兴木刻长久的酝酿、培植过程与经验,还发生在南、北方不同创作取向与风格交汇、交锋的背景之下。“北方”“南方”是内战阶段文艺界的一种指称,意指解放区(也包含根据地时期)与国统区。根据地木刻在抗战中期传向敌占区和大后方的文化界。对于南方作者,北方木刻并非单纯的艺术资源。在摆脱对西方资源的简单摹

仿、表现中国现实、创造民族形式、开创文艺大众化道路、艺术深入配合社会革命进程等一系列30年代末期开始备受瞩目的社会文化目标下，来自革命“核心”地带的北方木刻被认为具示范意义，也对南方作者构成压力。李桦大约在1940年左右看到北方木刻，努力学习以求转变。但抗战阶段的认识相当外在：无法获得深入革命进程的契机，也无由领会根据地木刻与革命发生联结的种种“关节”，只能陷入“现实主义”“写实”“民族化”等概念的空洞表白。结果，对北方的学习不仅无助于突破自身困境，反而一定程度“磨损”了主体宝贵的精神特质与表现活力。李桦上海时期（1946—1947）的创作发生在解放区木刻取得群体性成绩，被作为文艺创作取向，同时党开始努力规训不同文艺观的历史语境。在这相互参照和对南方作者而言的潜在“对峙”格局中，画家却能够突破北方的导向压力，经由新的现实理解路径来探求不同的表达与表现风格。

发表于1947年5月的《北方木刻与南方木刻》反映出李桦的认识状况。这是对郭沫若同年4月新作《论中国新木刻——〈北方木刻〉序》的回应。郭文指出南北木刻风格的差异缘于所处社会环境、制度的不同，称北方作品表现“被解放了的人民群众的乐天生活”“富于喜剧情调”，所具有的“特殊的魅力”“是南方的作家们所不能够产生的”。在价值评判和取向

上，作者显然倾向于北方，称道其发挥的政治功能：“对于人民的教育意义也来得更为直捷，人民的生活受着艺术的影响而逐渐地合理化，美化了。”^[47]郭文反映出根据地/解放区文艺在内战阶段被逐步视为“榜样”的评价导向。

李桦的回应肯定“作为人民艺术”的北方木刻的明朗作风与乐观情绪，但强调南方木刻发生于“逆境”，所描写的是“在苦痛下挣扎的生活，是偏重于‘黑暗面’的刻画的，所以充满悲郁，苦痛的情绪，黯淡的气氛，粗野的线条，不屈的力量”。画家肯定这些正是南方木刻“富战斗性的”特质，直言虽需学习北方、增强作品的启示作用，但南方木刻如“丧失其战斗性，便没有其存在的意义，也即是失去它的生命的光彩”。面对以北方作风为新时期文艺导向的“规训”意图，李桦的结论显示出抵抗意味：“南北木刻可以并存，而且必须并存，因为各有特色，除非两个环境的差别有一天消灭了；他们的特质是应该保持而且发展的。”画家认定南方木刻也是“人民的艺术”，并暗示面对他所在国统区的社会现实，“战斗性”比启示作用更为重要。^[48]这回应显示，李桦上海时期不回避现实黑暗与龌龊的态度、带着血污的现实感与表现风格，具有意识上的自觉。在新的现实体认与意识引导下，画家抛弃抗战阶段的做法，在表现手法、画面构造、语言形态、人物塑造、情节捕捉各个方面努力开拓新的路径。在文章

结尾，李桦肯定了自己和同伴的新表现，预言一种更加明朗的“新的风格”已经出现，并“可能做成为南方木刻底健全发展的路向了”。^[49]

而在其后的阶段，被满怀信心肯定的“南方”新风格没有继续发展。为逃避政治迫害，他在1947年9月赴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北平时期（1947.9—1949.9）的新状况是，反内战主题沿用上海阶段粗犷、“黑暗”的作风，但创造活力削弱；劳动阶层的日常生活成为新的表现题材，此类作品转向运用明显的北方作风但实际陷于困境——二类题材间表达的割裂状态十分明显。相较抗战时期，新阶段日常劳动题材（如《朝阳门》《卸煤》和国画写生天桥人物系列）的表现水准明显更加稳健、扎实，实质却同样失去内在的表现视角。现实语境和题材的变化导致的对北方作风更为明确的倾向本在情理之中。但平顺繁琐的描绘所显示的被动感，显然远离高潮阶段展现的表现活力与创造性，这短期内的迅速变化令人吃惊。（图10）对于西方艺术经典的借鉴还在持续，但丧失了此前以木刻媒介对油画语言进行转化、将具血肉感的写实手法与高度表现性的语汇融为一体的创造魄力（见《从铁蹄下站起来》，1948）。^[50]变化的原因难以简单讨论清楚。有别于上海的社会状态和民主斗争状况，徐悲鸿、艾中信、董希文等汇聚40年代革命美术脉络之外探索经验的画家群体的影响，这些都可能促使画家调整已有的表达手

法并在新资源的激发下萌发新的抱负。^[51]在这一阶段，古元、彦涵、董希文、艾中信、吴作人这些不同脉络的画家各自携带着抗战阶段积累的经验展开着新的追求。探寻新的历史感与更为明确的历史表述成为群体性的取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变化理所当然。但李桦的变化却显示出创作路径与精神状况的危机：上海时期充满血污的现实感与深厚的历史意识似乎消失了。

北平阶段的状况在建国初期继续“恶化”。难以内在继承革命文艺创作经验、对“现实主义”的僵化理解、无法有效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与在此语境下种种在实际层面导向负面压制效果的文艺措施，使画家集体陷入“失措”状态。李桦此阶段一度致力借鉴西方历史画资源尝试“宏大”主题创作，但多数时间或被其时迅速概念化的油画历史画表现手法、或被（伴随着新年画运动凸显的具压倒性势力的）“单线平涂”法牵制而无所适从，几近丧失对木刻语言特性的把握能力（参见1949到1951年间《学习》《抢修发电机》《二万五千里长征过草地》、套色木板《斗争地主》诸作）。其中，一度借鉴伦勃朗的铜板画手法而闪现新鲜创造活力的尝试因缺乏伸展的空间氛围而稍纵即逝（《没收小组的会师》与《划阶级》）。不仅李桦，代表革命时期最高创造能量的版画界在建国初期几近全军覆没。古元、彦涵、力群等都陷入失语状态。版

画界面临认为木刻可被绘画替代和木刻作者“寥寥无几”的状况。^[52]1953年秋第二次文代会后，在对建国初期文艺状况集体反思的声浪下，木刻作者们呼吁重新追溯革命文艺经验与战斗传统，版画得以复兴。此后的版画创作始终有意在不同阶段的创作趋向间发挥矫正作用和“战斗”姿态，占据了美术领域的核心位置。但整体而言，新中国版画在创作路径和审美取向上局限于单一、窄化的状态，根据地和内战阶段的创造性经验与能量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没有获得延续与伸展。

20世纪30年代早期投注全部热忱至木刻，经历抗战阶段冗长而困苦的精神低潮，之后在上海获得“重生”，继而遭遇北平时期和建国后长期的挫折——李桦惊艳而短暂的创作高潮，是存在于这样的过程里面。其中，北平阶段和建国初期状况不同，不应被笼统认识；但上海到北平的变化具关键性的意义，并成为建国后历程的作用因素。李桦个人的起伏与新兴木刻自1929年发端到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不完全同步，但又具有深层的交叠关系。如此，高潮之后迅速回落的状况更需探究。需要回头检视画家上海时期的认识状况。

李桦在上海时对北方木刻的认识就存在着问题。首先，将北方风格的“政治性”与“新鲜的生活，健康的气息，……生动的人民，和浓厚的农民色彩”联系起来论述，流露出将北

方木刻的“政治性”局限于特定表现面貌的倾向。“除非两个环境的差别有一天消灭了”才无需坚持南、北风格差异性的说法，也隐含将南方“战斗性”作风对应于“逆境”，则如果“逆境”消失，这作风自然可以抛弃的推理。^[53]在形式方面，认为北方木刻“着意于旧形式的复活，运用许多黑线条以做成一个与民间艺术最接近的形式”的理解，也显然没有把握住北方风格的关键。^[54]根据地木刻的核心在表现革命与社会改造过程中人的变化、社会关系的变化性，不该被限制在农民、农村、劳作题材。在内战阶段对北方风格的评价中，北方的美学取向多被联系到所达致的社会教育、引导功能。这种思路无法看到北方风格的产生是由内在于社会革命进程的理解而来、包孕着丰富的现实内容，是对现实进行的转化与升华，显示出将之视为抽象的审美/政治评价标准的倾向。如此，在丧失正视现实、深入现实路径的状况下，北方健康明快的风格将很容易变为对现实的虚假粉饰与空洞歌颂。如何理解根据地木刻的语言、形式，是关键性的问题。古元、彦涵等根据地时期的创作综合运用了西方现代、中国民间、西方古典等多种因素，并在深入探究现实的欲求下以高度的创造性对它们进行融汇、转化。所谓“民族作风”的探求根本不是通过对中国民间与传统资源的静态摹仿，而是以社会政治改造的过程、以主体对革命和政治的理解为中介，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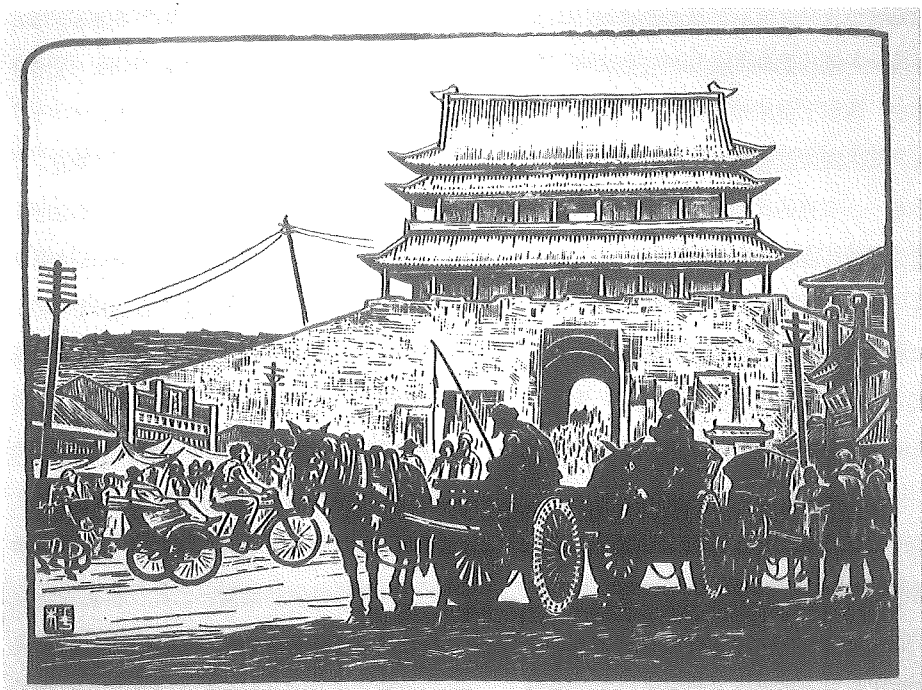


图 10 李桦《朝阳门》，1948 年，木刻



图 11 李桦《同志爱》，1947 年，木刻

开放、大胆的姿态与高度的创造能量。在此，形式的构造与创造的过程、方法是共同生发出来的。

对北方木刻形式的总结：“旧形式的复活”“线条”“与民间艺术最接近的形式”，显示李桦没有真正体认到北方形式创造的“奥秘”所在。南方木刻已经发展出一种“新的半线条半明暗的风格”的表述，也无法准确表达他自己上海时期的探索。这一方面可以被理解为受到当时主导思路的影响与限制（忽略北方风格中由革命理解而引发的富于活力的现实理解路径，视之为固定化的风格，以“线条”、民间传统、“民族形式”等加以描述），但也的确反映出他有关认识的薄弱与模糊。在实践层面，李桦上海时期已经出现针对不同主题、对象采取不同做法的迹象。1947年所作《同志爱》（图11）为配合主题运用了均质而带装饰性的线描手法，追求风格、手法的明朗感，但人物形象和语言形态都变得概念与平面化，失去了同时期抗争主题的具体性与现实感觉。这样的处理思路在北平时期的日常劳动题材更为明确：北方作风成为毋庸置疑的准则并变为简单的颂扬姿态，语言也丧失表现活力而成呆板的描摹。

这些表明，高潮时期的现实观、艺术观本就不彻底，画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主体性。^[55]他那时就已经认定根据地木刻风格在表现“顺境”时的权威性。一旦现实状况发生变化，意

识形态的导向与压力加强，主体的意识和状态就很容易随之变化。北平阶段的“平顺”感显示画家放弃了“深视现实”“与现实肉搏”的态度，放弃了以艺术的方式发现现实的抱负，回复到思想的“庸碌”“因循”状态。现实感和战斗姿态消失的同时，精神面貌和语言也丧失了曾经充满生气、热情与意志力的状态。

李桦北平时期的困境凸显出有关现实主义道路和现实观的理解问题。

作为南方作者，李桦对南方木刻的特殊作风与“战斗性”的坚持，让人联想到胡风、冯雪峰对于毛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和现实主义精神、道路的理解，以及40年代中后期有关讲话精神和文艺观念的争论。事实表明，冯雪峰、胡风等一再与之斗争的、以概念化和轻巧态度反映“现实”的“市侩主义”，有着很深的现实根基。在建国初期重新确立文艺正统道路的规范行为下，南方木刻作风被归结为对应于“国民党统治下黑暗现实”而遭“抛弃”；本来被视为“榜样”的解放区创作经验也没有获得认真对待和有效继承（虽然表面位置很高）。李桦的变化与建国前后文艺界对现实主义逐步狭窄、僵化的理解状态则揭示了一系列具挑战性的问题：如何理解根据地木刻风格及“民族作风”“大众化”道路？在国统区“逆境”中充满血污的现实感和艺术的战斗姿态，在“和缓”的语境或革命胜利之后就该被抛弃么？如何理解文艺

本该持有的探究现实真理的任务、其内在的政治性和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及这探究过程中主体所必经的锻造？在艰苦的革命进程中获得的有关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性、艺术的根本责任等问题的认识与实践经验，在变化的政治语境中又该如何被继承、坚持？

李桦以全身心追求的带着血污与精神创伤的沉痛的现实感，体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正是经由这样的现实感与主观认识路径，表现和语言上的创造力才被激发出来。在这些作品里，画家逼近历史时赤身肉搏的战斗状态——“艺术”突破一切冲进历史深处的意志，比表达本身更为动人。在这革命与艺术相互激发的深处，我们看到的是充满伟大热情与意志的精神力量。这力量在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进程中被怎样调动、培育出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困厄与挫折，给予今天以怎样的启发，是后来者所不应放过的思想课题。

注释

- [1] 1941年,李桦检讨说:“十年前的木刻作者,多是刚从美术学校出来的热情艺徒,……缺乏精密的观察能力”,把握不住“万花筒般的现实”,只有“空洞的理想”而缺乏“充实的内容,其结果,雷同附会,差错百出,所谓‘差不多’的毛病于是形成了。”李桦《抗战四年来中国新兴木刻的检讨》,《新建设》1941年2卷6、7期合刊,78页。
- [2] 李桦:《在抗战中建立起新艺术的基础》,《战时艺术》,1939年第3卷第2期,5页。
- [3] “1938年10月,参加南浔战役,画了不少战地速写。”李抗主编《李桦年表》,《李桦的艺术历程:滴泉集 下册》,279页。安徽美术出版社,2012年。
- [4] 如速写作品《房子又重新建起来》《小心地检查你的枪呀》。
- [5] 艾青在抗战初期即撰文对李桦的战地写生作品表示赞赏。(艾青《记“李桦个人战地素描展”》《广西日报》1939年6月28日。)胡风观看1941年重庆木刻展后认为“在刻画人物形象上,南方的木刻家还没有人超过李桦的水平。”(王琦《德高望重的版画家李桦》,王莲芬、王锡荣主编《李桦纪念集》,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30页。)徐悲鸿1942年观看第一届全国木刻展后,赞扬“古元之外,若李桦已是老前辈,作风日趋沈练,渐有古典形式,有几幅近于Durer”。(徐悲鸿《全国木刻展》,重庆《新民报》1942年10月18日。)
- [6] 参见《李桦日记之一》《李桦日记之二》《李桦日记之三》,《美术向导》2014年第4、5、6期。
- [7] 1946年9月上海《抗战八年木刻展》后,周恩来接见木刻、漫画家,指出“人集中在一起,力量大,可以形成一个文艺运动的高潮”。王琦《从“中华木刻研究会”到“中国全国木刻协会”》,李桦、李树声、马克编《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年》,辽宁美术出版社,1982年,399、402页。
- [8] 协会强调木刻比其他艺术更“接近人民”,在战斗中“表现着非常的‘韧性’”,需要在民主斗争中发挥先导作用,并“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木刻工作者在今天的任务》,《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年》,404—410页。
- [9] 毛泽东《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78页。胡素珊《中国的内战》,69页。
- [10] 毛泽东在1947年5月指出“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学生运动的高潮,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潮。”胡素珊《中国的内战》,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69、70页。
- [11] 朱良《亲历1946年上海反内战学运高潮》,《档案春秋》,2013年第3期,40页。
- [12] 《演讲稿》,上海学生“和平联”街头宣传材料四则(1946年6月21日)。另一张宣传快报写到:“一位大四毕业同学从他心中所发出的呼声——……这是毕业典礼吗?不!这是毕业生的送死典礼。工厂的门开着,家里的米缸空着!难道去参加内战?不!我不相信我们会一个一个走上这条死路的,我们要生活,我们要显出我们的力量!”(《快报》:写在毕业前夜。上海学生“和平联”《快报》二则,1946年6月20日、21日。)均录自杨雅伦《1946年上海学生反内战宣传史料选》,《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
- [13]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365页。

[14] 1944年11月上旬,《木刻联展》闭幕后不久,周恩来在重庆接见了部分木刻、漫画工作者,鼓励国统区与延安美术界之间进行交流,指出当前文艺运动需要在城市市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之外扩大到工农群众中。王琦《从“中华木刻研究会”到“中国全国木刻协会”》,《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年》,399页。

[15] 李桦《记第一届全国木刻展览会的展出》,《文讯》1947年第7卷第1期,64、65页。

[16] 见注释6。

[17] 邵克萍记述,李桦来到上海不久,木刻界为“突破当时文艺界的沉寂气氛”,举办了“李桦作品欣赏会”,郭沫若、茅盾、胡风、冯雪峰、冯乃超等受邀参加。郭沫若、胡风等都给予肯定。其中,邵克萍单独、重点讲述了冯雪峰的指导意见。(邵克萍《紧握木刻刀 奋战在上海》,《李桦纪念集》,77—78页。)王琦还指出冯雪峰对李桦的欣赏:“一向对新兴木刻十分关心的冯雪峰先生一次在对我和野夫两人的谈话中说:‘你们三人的工作可以各有侧重,可让李桦多搞点创作,王琦多写点文章,野夫多担些行政工作……’雪峰对版画创作要求十分严格,可是对李桦的作品仍持肯定态度。”王琦:《德高望重的版画家李桦》,《李桦纪念集》,30页。

[18] 冯雪峰《我的印象——看木刻展之后》,原载1946年9月22日上海《文汇报》,《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439—441页。

[19] “例如文艺,自然就是增加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力的东西,尤其是增加我们和现实肉搏的魄力的东西……就只有深入现实的斗争,既能看见光明,尤其不放松黑暗,才能做得到。

文艺不能不是肉身的东西。……是一个思想斗争问题,需要在个人的内心的斗争和成长中,以自己的灵魂和血肉,拿出理想力来。”冯雪峰《有进无退》,1944年7月至1945年7月作于重庆。冯雪峰著《雪峰文集》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03—204页。

[20] 邵克萍《紧握木刻刀 奋战在上海》,《李桦纪念集》77—78页。冯雪峰《我的印象——看木刻展之后》,原载1946年9月22日上海《文汇报》,《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439—441页。

[21] 冯雪峰《论形象》(1940.4.20),文章被作者在1946年5月收入文集《过来的时代》,录自《雪峰文集》2,53—56页。

[22] 如冯雪峰发表于1943年《论文集》第一卷中的杂文,以及作于1945年11月到1946年7月的杂文集《跨的日子》。

[23] 力群、彦涵和四十年代的青年人对《怒潮》等作的观感均为“惊心动魄”。

[24] “五二〇的前夕,在一个很小的亭子间,集合了七八个同志,……大家……靠着点灯光,分据桌上、床上、地板上默默地构图和刻作。为了避免窗外的警察和屋内的房东的注意,我们把一切可以透光的地方都用毯子、席子遮蔽起来,又因为刻作的时候少不了声音,于是连门缝都密封了,而且时常彼此警惕着不要用锤子敲凿子。我们就是这样……用一晚上的功夫刻出了12块版子”。李桦:《国民党统治区学运中的木刻运动》,原载《进步日报》1949年7月4日,转录自《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414页。

[25] 李桦强调木刻是“革命时期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由于工作简单,容易隐蔽,配合着一般突击性的行动,可以发挥出惊人的力量来”,成为“反内战怒潮的尖兵”。他还指出,“五二〇”运动后上海学生开始学习并很快能

自制木刻传单。到北平后,李桦运用这一经验培养了不少学生作木刻宣传。李桦:《国民党统治区学运中的木刻运动》,《进步日报》1949年7月4日,转载自《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

[26] “在大上海的漂亮洋房外面,围着许多人在看刚贴在壁上的木刻传单,他们开始议论这种新鲜而有力的武器。”李桦:《国民党统治区学运中的木刻运动》,原载《进步日报》1949年7月4日,转载自《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415页。

[27] 爱人梁益坚难产去世,促使他最终“放下了油画笔而拿起木刻刀”。李桦将女儿抚养至四岁,1937年抗战投军时交给岳母。见《滴泉集 李桦的艺术历程(上)》,9、11页。力群也特别为李桦这段经历所打动,其纪念文章几乎完整引用张作明《李桦传》的描述。

[28] 二年级时,李桦被从一百多名学生中选拔出来,作为唯一代表参加了广东省“赴日文化考察团”。李桦在广州最先尝试木刻,他摸索半年后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展览,由此吸引他任班主任的油画班过半数学生尝试木刻。他们组织了一个创作小群体:现代版画研究会,摸索创作与印制方法、搜索材料、自制工具,每周集中讨论各自创作,约定每两周举办周展,每月举办月展,办刊物。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这群年轻人创作了几百幅作品,举办了数次展览,出版了18期刊物。李桦是这个群体的核心组织者,他的家便是现代版画研究会。参见刘仑《我去莲花井找李桦》,《李桦纪念集》。李桦在《记〈现代版画〉出版事》中也有动情的追述。见1980年6月《版画艺术》第一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9] “新兴木刻历史很短,人数不多而又很分散,很早的几个木刻团体人少活动面窄,抗战以来虽然前后有过两个全国性的版画团体,存在时间都不长,很松散,基本上长期都是各自为‘战’,难于团结”。鄧中铁《贵在真诚》,《李桦纪念集》。

[30] 鲁迅《文艺与革命》,作于1928年4月4日,后收入《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1] 李桦在广州市立美校的学生、也是新兴木刻的重要作者唐英伟《木刻生活十年(1930-1940)》,对此状态有生动的剖析。见唐英伟著《中国现代木刻史》,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江西武夷山赤石),1944年。

[32] 池重文《李桦与“现代版画会”》,李桦《我与木刻艺术》,分别见《滴泉集 李桦的艺术历程(上)》,45页,16页。鲁迅对李桦的信中说,如果没有革命理解与革命经验却硬要表现,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倘不在什么漩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鲁迅1935年2月4日致李桦信。《鲁迅全集》第13卷(书信),372页。

[33] 陈烟桥记述他与鲁迅一同观看“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1933年12月,上海),“鲁迅带着感动的心情说道:‘法复尔斯基,谁一提到这个名字,就会联想到他的作品中具有丰富多样的主题和灿烂绚丽的技巧。他的特殊的、严谨的风格,对于我们的青年木刻家,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他在苏联艺术界中是有独创性的作者之一。’”“克拉甫兼珂,则是一位有天才的装饰画家,他的所有作品,都呈现出老练、具有度量和趣味的感觉;他那异常神妙的技巧,足以成全了他在苏联艺术界中应该占有的地位。在他即使是小幅的版画中,也如纪念碑式的艺术一样,充满魔力。他具有强烈的画家性格,他从绘画里给木刻带来了颜色和空间的感觉。我们对着美丽的画页《幻想的故事》,惊叹这位出色的装饰画家,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插图画家的出众的创造才能。”陈烟桥《缅怀鲁迅先生对我们的教诲》,

《回忆鲁迅的美术活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81、83、84页。

[34] 许广平《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回忆鲁迅的美术活动》，10页。

[35] 参见陈广《记鲁迅先生的一次讲话》，《回忆鲁迅的美术活动》。

[36] “李桦诸君，是能刻的，但自己们形成了一种型，陷在那里面。罗清桢细致，也颇自负，但我看他的构图有时处于拼凑，人物也很少生动的。”见鲁迅1936年8月7日给曹白的信。“倾向唯美”而“会入颓废一流”，是鲁迅对张慧的担心。许广平《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回忆鲁迅的美术活动》17页。

[37] 许广平《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回忆鲁迅的美术活动》，15页。

[38] 孙郁《录异者》，孙郁著《鲁迅藏画录》，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21页。

[39] 鲁迅投入很多精力推动《北平贱谱》的印制，多封通信显示他对于印刷的技术细节、纸质、墨、色各方面的精通与讲究。

[40] 许广平《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回忆鲁迅的美术活动》，9页。

[41] 李桦《回忆“现代版画会”》，《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235-237页。

[42] 李桦《记〈现代版画〉出版事》，《版画艺术》1980年6月第一期。

[43] 李桦先后几次撰文提及木刻不是简单的宣传或复制，是独立的艺术，需要展现木味与刀味。对于艺术性和语言的强调显示了精神和身体的内在需要。如李桦《中国固有木刻画之新估价》（《创进》1937年新1卷第10期37页）、《木刻问题杂写》（《读书生活》1942年第1卷第3—4期，74—79页）。

[44] 有亲历者记述了三厅木刻工作者冒着纷飞的战火，用生命护送木刻作品转移的经历。这些作品被放在“自武汉起就从未离身”的一个皮质军用公文包（“警报袋”）。一次，长途跋涉后极度疲惫的携带者（卢鸿基）被疾驰而过的火车气浪冲倒昏迷，“警报袋”“却仍背在肩上”。在一路的艰险中，“警报袋”始终被用身体保护。作品抵达桂林，却在展出时“被敌机炸弹命中”，最终无存于世间。见丁正献执笔《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回忆片段》，《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356页。江丰也作过这样的“移动者”。

[45] 有关抗战阶段木刻作者相互间的沟通和组织状况，参见李桦《抗战四年來中國新興木刻的檢討》，《新建设》1941年第2卷第6-7期。

[46] 参见鄧中铤《贵在真诚》，《李桦纪念集》。作为1940年代四川地区木刻实践的核心组织者，鄧中铤说在散漫的局势中，李桦“运筹调和”的工作及他“为人的真诚、没有成见、不存半点私心、顾全大局、处事耐心”的品质发挥了关键作用。

[47] 作者还夸赞北方木刻对民间艺术的成功借鉴使“艺术真好像年轻了一二十个世纪”。郭沫若《论中国新木刻——〈北方木刻〉序》，1947年4月4日作于上海。《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436页。

[48] 北方木刻处于顺境，表现着人民“亲切的笑脸，新鲜的生活，健康的气息，有明朗的画面，活泼的线条，生动的人民，和浓厚的农民色彩，所以北方木刻的特质是重政治性而带乐观的。”李桦《北方木刻与南方木刻》，1947

年5月21日作于上海。《现代新闻（上海1947）》，1947年第1卷第3期，79页。

[49] “就技巧上说，画面渐趋明朗化，也是一个新的发展，它们……另创出了一个新的半线条半明暗的风格。这种新的风格，今日已经开始，可能做成为南方木刻底健全发展的路向了。”李桦《记第一届全国木刻展览会的展出》，《文讯》，1947年第7卷第1期。

[50] 《从铁蹄下站起来》（1948）显示了鲁本斯《吕西普斯女儿的被劫》（约1618）与德拉克洛瓦《希阿岛的屠杀》两幅西方经典的启发。画家竭力构造饱满的冲突感与戏剧性场景，构思宏大精细，但力求谨细的写实性描绘与脱离木刻特性的“语言”使表达陷于琐碎与贫弱。

[51] 李桦在北平接触到新的群体与资源。他被聘请教授北平国立艺专的西洋美术史、水墨画与素描课程，与徐悲鸿为首的画家群体共事，包括吴作人、冯法祀、艾中信、蒋兆和、董希文、叶浅予等。经历抗战阶段的探索与积累，这些画家逐渐走向创作爆发期，带来40年代油画、国画领域众多探索经验。冯法祀在抗战期间摸索着具前卫性和表现性的“写实”手法；艾中信在40年代中期借鉴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历史画创作经验颇有所得；以《流民图》为代表，蒋兆和充满着史诗性的水墨创新颇为震撼；经过西部的经历，吴作人拓展着新的现实感与精神取向；叶浅予从犀利的漫画转向以速写为突破路径的国画探索；潜入敦煌捕捉传统艺术精髓并使自身西画教养得以激活的董希文，在北平的语境中被激发表达新的历史感。董希文的学生钟涵曾指出这些资源与经验的碰撞激发了老师的创作灵感。

[52] 江丰在1954年指出建国后木刻创作“极不景气，作品很少，在一般造型艺术中几乎成了最冷落的部门”。“全国原有四五十个从事木刻的作家”，现在还继续的则“寥寥无几”。其时还出现以省力，表现自由、充分，色彩丰富，可利用现代化印刷条件等理由，认为绘画可以替代木刻的言论。江丰《对于发展和提高木刻创作的意见》，《美术》1954年1期，35—36页。

[53] 北方木刻表现着“亲切的笑脸，新鲜的生活，健康的气息，有明朗的画面，活泼的线条，生动的人民，和浓厚的农民色彩，所以北方木刻的特质是重政治性而带乐观的。”李桦《北方木刻与南方木刻》，1947年5月21日作于上海。《现代新闻》（上海），1947年第1卷第3期，79页。

[54] 李桦《记第一届全国木刻展览会的展出》，《文讯》，1947年第7卷第1期。

[55] 李桦作于1947年的《艺术的社会效用问题》（《文艺春秋》1947年第4卷第5期）也反映出认识的不成熟。文章主要谈格罗塞（Ernst Grosse）的艺术科学，强调艺术需要表现社会性内容。

我的一份 辩难自 的『蓝图 初稿』

1948年『新路』群 体的建国思考

姜涛

一

《新路》周刊1948年5月15日创刊于北平，由“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主办，集合了当时清华、北大的一批学院知识分子，与政界、实业界也有颇深的关联。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则是主要的幕后推手：1947年4月，宋子文辞行政院长后，国民政府内阁改组，钱昌照连带去职，与“蒋政府”也渐行渐远，开始谋求一条个人的“新路”“社经会”与《新路》都出自他的策划，全部经费也是由他筹措。^[1]当时，内战形势逐渐明朗，“历史的路”显现为“只有一条”，《新路》似乎代表了一批自由主义教授“最后的挣扎”，^[2]它“一面骂蒋介石和国民党，一面对共产主义抱怀疑态度”，因而不免给人以“第三条道路”的印象。因不断激烈地抨击“蒋政府”，1948年底《新路》

被勒令停刊，而中共方面也组织力量进行了专门批判。周刊出版之前，香港的左翼人士已将“社经会”定位为“新第三方面”的代表、“和平阴谋”的一部分：这“阴谋”是由“美国国务院‘设计’，司徒雷登、魏德迈等‘导演’，宋子文、邵力子、钱昌照等‘帮助导演’，而‘演员’则是胡适到《大公报》的一般大大小小的‘自由主义者’”。^[3]

事实上，与过去所谓“第三方面”“中间道路”有所不同的是，《新路》群体言论的重点，并不在国共两大之间的平衡、斡旋，以及相关“和平、自由、民主”的呼吁，他们更多是基于自身的专业背景，以“研究”的方式，尝试在冷战即将形成的全球背景下，在“社会主义”已成历史必然的判断下，甚至超越具体的内战情境，探讨一条的“新路”。^[4]钱昌照在“社经会”成立会上的致辞中这样说道：

中国距现代化的阶段还很远很远，若干现代化的先决问题还得彻底研讨。谁能准确的说出中国有多少人口，多少土地，多少矿藏，多少森林？谁曾精细的计算过中国的国民所得？然而这些事实都是有朝一日建设真正开始时必须知道的基本资料。此类研究工作迟早必做，而且是早应该做。

……

这新路不拘于国内已经有人走过的途径，也绝不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而轻易转移。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并与外界合作，根据全民需要，试画一幅建设新中国的蓝图。此后本会的刊物、丛书、研究报告等等，都可算做那幅蓝图的初稿。^[5]

看得出，这段话出于一个“资源”专家的立场，相较于国共之间的政治构想，他更为关注的是国家的“现代化”前途，“有朝一日”“迟早必做”“蓝图”“初稿”等提法，则与一种超越性、前瞻性的视角相关。在钱昌照看来，虽然内战尚未结束，但如何勾画一幅“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已是十分迫切的问题，“社经会”及《新路》周刊的工作，应该以此为中心展开。

作为这份蓝图的“初稿”，“社经会”成立之初也曾提出三十二条《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在《新路》创刊号上公布，囊括了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诸方面问题，

核心要点包括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实现军队国家化；采取国家计划的经济政策，防止独占性企业，限制私人土地，推进现代化与工业化；保证公平分配，教育机会均等，注重劳工福利和社会保险等。大体上看，这三十二条“初步主张”不乏“费边社会主义”色彩，类似一个独立提出的“建国”草案。但，既然是“初稿”，《新路》同仁也申明这“三十二条”的暂时性、权宜性，发行刊物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容纳不同的“探索的方法、角度”，“并且可以不同到一个程度，可以和我们三十二条的初步主张抵触；我们自己中间也一样的可以彼此质难、互相辩驳”。^[6]

简言之，自觉置身历史剧变之中，《新路》在所申张的同时，又主动采取一种灵活、开放、乃至自我辩难的态度。这直接反映在栏目设置上，除了“短评”“时事报道”“专论”等一般性栏目，“辩论”与“论坛”是《新路》上两个最重要的阵地，特别是“辩论”一栏，以正反驳论的方式，“把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一齐都排列出来，让读者可以根据两方面的意见，下他自己的结论”。有意味的是，“作者所发表的意见，不一定代表他个人的意见”，故均使用笔名，甚至正反双方有时以抽签方式决定。^[7]这种“角色”扮演的方式，目的在于刻意将不同的观点对立化、极端化，并在往返辩驳中，不断撑开“正反”之间的问题

空间，卷入更多的层次和环节。同样，“论坛”一栏的方式，也是先由一人撰写正文，然后请多人参与讨论，反驳、补充、深化，由此取得“辩论”的效果。在这样一个被不断撑开的论辩空间中，具体立场的选择变得相对次要了，对不同方案之条件、限度、可能、路径之辨析反而成了重点，这或许构成了《新路》杂志的一种特别“方法”，“蓝图的初稿”是以自我辩难的形式来呈现的。

从中共方面看，对《新路》的批判主要着眼于“新第三方面”的政治效果以及与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潜在关系。对于这份“蓝图的初稿”或许并未认真对待，对于其中的若干主张也未必全然反对。钱昌照1949年与周恩来会面时，周恩来甚至表示：“那时《新路》这个刊物的论调冲淡了共产党的宣传，所以要组织力量去批判。如果是早三年办这样一个刊物，应该算是进步的，到现在办也还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办不适宜。”^[8]尽管如此，参与《新路》的经历，后来还是成为相关作者非常严重的历史污点，在一系列“运动”中作为旧案被不断翻出，萧乾就曾感叹：“足足30年（1949—1979），我一直背着《新路》的黑锅，也仅止1956年解下过几个月。”^[9]与此相关的是，对于这个北方自由主义教授群体，近年来的知识分子研究也多有论及，但受制于某种“平反式”的言说惯性，论者多关注该群体成员在建国

前夕的进退、选择乃至“最后的挣扎”，以及在随后“知识分子改造”“反右”运动中的遭遇。而且，类似讨论多少会隐含对所谓自由立场之挖掘、褒扬，但也恰好因此，如当年中共或左翼人士的批判一样，往往忽略他们围绕“蓝图的初稿”所展开的问题面向、思考路径，以及背后的历史脉络、参照视野。

依照钱理群老师的说法，1948是“天地玄黄”的时刻：一方面，面对历史的“巨变与转折”，每一个阶级、党派、集团、每一个家庭、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开放的时刻，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除了被动的选择、顺应、拒绝，还有可能以主动的姿态，带着不同的方案，遵循各自的逻辑，投入到这个玄黄巨变、敞开向未来的进程当中。因而，在“转折与选择”之外，“开放与参与”也是把握这一时刻不可获缺的认识框架。如何在“历史的路只有一条”的状况下，看待这些“新路”或“歧路”“岔路”，乃至个人的“小路”？如何把握其内在的问题意识和历史脉络？在即将开展的“建国大业”中，它们或被淹没，或被重构，或以不断复现的方式构成持续的张力，如何在建国的进程中理解“蓝图的初稿”内部不断撑开的论辩结构，这些似乎都是可以进一步考察的问题。

二

《新路》的基本作者，主要来自清华、北大两校，尤以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三个系科的教师为主体，如清华社会学系的吴景超、潘光旦、陈达、袁方，经济学系的戴世光、徐毓枏、刘大中，北大法学院的周炳琳，政治系的钱端升、王铁崖，经济学系的蒋硕杰等，其中周炳琳、吴景超等还有入阁参政的经历。^[10]与一般自由主义知识群体不尽相同，《新路》的主力是一批社会与政经领域的专家，甚至具有某种“技术官僚”的色彩，从他们各自的专业立场出发，着手进行时政的评论或制度的筹划，相对于经典的自由主义议题，如政权开放、民主选举、个体言论自由等，他们更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金融政策的实施、土地与人口及资源的关系等更为具体的经济与行政问题。在“统一”、建国的前提下，他们更希望在未来的政治结构中，发挥某种“专家治国”的作用，即如《新路》发刊词所言：“并不附属于任何政党，那一个政党的办法，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表同情于那一个政党”。而这一姿态的选择也并非偶然，自有渊源。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文化界知识分子普遍“左”转，另一部分选择独立的自由立场，对推行“训政”的南京政府也多持不信任的、批评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1930

年代初，在外敌入侵、国内冲突不断、世界范围内民主政治衰微、以及苏联与法西斯政权崛起的大背景中，有相当一批专家型知识分子，逐渐放弃对“蒋政权”的批评，转而选择与其合作，希望能打造某种“社会重心”，以结束内乱，在统一“建国”后强力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应对不断加剧的“国难”危机，“革命”“建国”与“现代化”的关系也成为当时知识界最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11]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之后，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认为中国只有“内乱”而没有“革命”，要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当务之急是要补上“专制”这一课。一场围绕“民主与独裁”“专制与建国”的著名论战，由此发生于胡适、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等人之间。吴景超在后续的回答中，通过对“内乱”的历史考察，将“革命”分为“打到旧政权”“创立新政权”以及“建国”三个时期，认为当时中国正处于“群雄割据的时期”，首先要完成第二期的“政权统一”。^[12]法学家钱端升则在分析国内外政经局势的基础上，提出“一盘散沙，民智落后”的中国急需“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在“最短时期内成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在一二年内造成沿海各省“高度的工业化”，这样才能于下次世界大战时“给敌人以相当的抵抗力”。^[13]

面对“内乱”与“外敌”，以武力统一建

国、借“专制”推进现代化，这些主张的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危机感之中，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的独立，这是一个基本的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无论“独裁”与“专制”，还是“革命”与“建国”，都具有很强的策略性、目的性，其多层次的政治内涵也可能被大大简化。作为论战的另一方，胡适反对“武力统一”，反对“独裁”，但在“建国”这一大前提上，他与蒋、吴、钱等并无分歧。在论战的总结性回顾中，胡适还依照自己的理解，将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描述为“一种研究院的政治”：

这种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弘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这种政治是人类历史上的新鲜局面……^[14]

所谓“研究院的政治”，即是一种“专家政治”，区别于民主政治这一“幼稚园的政治制度”，胡适认为这种新型的政治需要大量人才，中国今日还做不到。但事实上，在政权稳定后，“蒋政府”也积极延揽各方面专业人才，尤其在30年代中期曾有一股“学人从政”的浪潮，《独立评论》群体中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地质

学家翁文灏、社会学家吴景超都曾入阁参政。^[15]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幕僚，钱昌照的作用不容小觑。“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向蒋介石提出创办国防设计机构的构想（即“资源委员会”的前身），而延揽国内“各界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及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到政府里来”，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项。^[16]

1948年聚合的《新路》群体，不仅得到了“资源委员会”的支持，与1930年代的《独立评论》群体也有相当的延续性，像出入政学两界的周炳琳、吴景超，在《新路》创办及言论的展开中，都是核心性的人物，甚至胡适的影响，也若隐若现地存在。^[17]更为重要的是，在“统一建国”的框架下，实行“专家治国”的精英理念，似乎仍被延续。虽然曾被寄予希望的“蒋政权”已岌岌可危，“行宪”之后翁文灏主持的“内阁”更无力回天，但“两个中国”的决战，并没有外在于“革命与建国”的逻辑。在未来的“新政权”之下，专家知识分子仍可以“诤友”“客卿”“幕僚”自处，即“那一个政党的办法，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表同情于那一个政党”，暂时“无枝可依”的状态，恰好便于探索一条新路。^[18]

三

或许可以说，只要“建国”的使命能够

完成，具体由哪一种政权形式来完成，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即便“现在国际风云谲诡，谁也不能作很远的透视”，^[19]但“顺乎天而应乎人”，《新路》群体大体持一种现实主义态度，似乎意识到在天地玄黄的1948年，一次新的“建国”机遇，有可能即将来临。与此相关的是，钱昌照提到的“蓝图”一词，也反复出现《新路》作者的笔下。谈及研究中国经济的问题，谷春帆就称：“我们要想研究中国问题，要想草拟一幅建设新中国的蓝图”，需要系统的整体眼光与各个专家之间的合作等。^[20]在讨论“计划”与“混合”两种经济制度的选择时，陈振汉则坦言“本文只是一种可以说是蓝图逻辑（blueprint logic）上讨论，作者仅是根据这两种制度（在与事实相距不远的假定环境下，）在达到上述目的的效率差别考虑取舍。因此文中的结论，只是根据目标与蓝图的一种推论”。^[21]在这里，所谓“蓝图逻辑”（blueprint logic）指向了一种假定性的推论，在某种意义上，上文提及的《新路》的特别“方法”，也可以在这个向度上理解。

一方面，《新路》上的“短评”“辩论”“专论”紧扣内政外交方面的现实问题，“现政府是否有改善的希望”“用和平方法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已不是经济措施所能解除的了”等标题，也强化了焦灼与紧迫感；另一方面，更多的篇幅还是集中于“蓝

图逻辑”的探讨，现实问题每每被置换为原理性的问题，被纳入学院化的知识框架之下，或世界政治经济走向的宏观参照之中。以吴景超为例，他是《新路》上最为活跃的作者，撰写的重头文章也最多，这些文章大多在美苏比较、述评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制度的种种构想。1940年代后期，“冷战”态势逐渐形成，对于美、苏及欧洲各国政经社会状况的关注，是当时知识界的普遍潮流。在抗战爆发前，吴景超和翁文灏就曾赴欧洲长途旅行，考察各国经济制度，他们对于英国的体制兴趣不大，认为太过偏重“经常经济之标准”，不注意“紧急进行之方法”，但随后在考察德国、苏联期间大为兴奋，意识到在关注工业化与人民生活程度的关系之外，国防力量的增进更为重要，有关工业化目标的认识发生了极大转变。1943—1944年间在美国考察之后，吴景超的思路又有所变化，从计划或统制经济转向关注美国式的自由经济。^[22]不同经济制度的宏观比较，尤其以美苏为参照的思考，也反映在他在《新路》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如《私有制与公有制：美苏经济述评》（1卷15期）、《资本形成的途径——美苏述评之一》（2卷2期）、《美苏的对外经济》（2卷6期）等。在吴景超周边，经常加入相关讨论的还有刘大中、蒋硕杰、徐毓柵、陈振汉、楼邦彦等，这批“较年轻的人”毕业

于英美名校，更擅长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中，提出自身的理论假设，借助复杂的概念、公式，甚至以形式逻辑的方式，来提出社会经济制度的种种分析，“边际效应”“价格指数”等经济学概念以及复杂的计量公式，也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论文中，形成一种相当繁复、艰涩的专业风格。

从某个角度看，无论立足于宏观的比较视野，还是受制于学院式的专业分析，《新路》上诸般“蓝图”设计，似乎多为纸面上的概念推演，^[23]甚至严重地缺乏在地感和现实性。像吴景超在美苏比较中提出的某些区分性判断，就往往在二元之间失之抽象，^[24]有些提法又因过于武断、笼统而缺少了有效性。^[25]在战事频仍，经济崩溃的现实面前，这种“不在地”的论说方式，总体上让人感觉陈义过高，或书生气太重。相比之下，反倒是负责文艺的萧乾，偶尔作为一个“外行”介入讨论，发言之中表现出的现实感，构成了“蓝图逻辑”的某种矫正、以至解构。1卷13期上刘大中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双重民主”近似于《新路》群体的一种理想。在文中，刘大中完全甩脱具体的政治现实，仅从概念入手，列出两种民主互相依存的基本条件，经细致的排除、归纳，列出“双重民主”的十三条设计。萧乾在回应中坦言：“我

认为这两种‘民主’不只是纸上的两个象征符号，也不能藉方程式把它们发掘或联系起来。它们不会从天掉下来的”。在两种民主不可兼得的今日，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一碗饭”比“一张选票”实惠多了，从“旧路”到“新路”人们不是“走”上去的，而是因逼迫而“冲”上去的。有意味的是，对于类似基于现实直感的反拨，这批学院专家们好像并不以为意。刘大中在回应萧乾时称：“萧乾先生的文字，充满了热情，不失文艺作家的本色，但是从他这篇短短的讨论中，我们看不出他对于他自己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和对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有什么具体的意见。”^[26]当萧乾指出一个独立的公务员阶层，在中国不可能存在时，在欧陆法学脉络中高谈超然的公务员阶层之权利与义务的楼邦彦，则认为这种质疑“显然已超越了我所预先划定的仅仅关于行政原则的讨论范围”。^[27]该怎样理解这种“回避现实”的发言姿态？《新路》同仁是否没有意识到“蓝图”的抽象性？

事实上，专家们并非缺少基本的现实感，深知“一条‘新路’在蓝图上是不难设计的，问题在如何能挣脱现存旧路的桎梏，走到新路上去”（刘大中），那种宏观比较的方法和观念演绎的作风，一定程度上可能源于各项统计资料的匮乏，以及面对现实状况的无力感。但不能忽略的是，发生于纸面上的蓝图设计，

脱节于内战时期激烈的现实冲突，这种“不在地”特征，又带来一种特殊的开放性：即使这份“蓝图”超脱当下现实，而一旦内战结束，“建国”进程启动，“蓝图”所涉及的经济、工业、土地、人口等方面的问题，就需要提上议事日程。对此，《新路》编者也明确的觉悟：“假如有一天我国真能走上民主的大路，人民对于经济问题认识的深浅和正确与否，将是我们民主政体能否成功的一个大关键。”^[28]另外，在更宏阔的视野中，“新路”的摸索不仅是一国一地的问题，在“热战”与“冷战”的交替中，更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换言之，在天地玄黄的时刻，“新路”也是对整个世界而言的。在“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讨论中，刘大中开篇就对当时美苏比较的流行方法提出质疑（近来讨论制度问题“都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和选择入手，并且大半以美国和苏俄来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认为“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并不能与美国资本主义或苏俄共产主义混为一谈（二者都不理想），“其实，我们要研讨‘双重民主’的制度，本无须借重现有的主义或公式”。^[29]完全从“民主”的概念和条件入手，而甩脱已有社会模板的限制，这一极端的“蓝图”设计，显然就是萧乾所批评的纸面上的“方程式”演绎，但又是出于一种方法和意图上的自觉。

如果联系“辩论”“论坛”栏目之中角色扮演，“一类策略，不难看出，《新路》作者们与其说忽视了“蓝图”的抽象性，不如说正是利用了“蓝图”的抽象，所以才暂且放开现实，以宏观比较、概念推演的方式，加以正反驳论，侧面补充、细部勾画，不仅提出经济、社会、政治的种种构想，先在“蓝图逻辑”的层面，撑开各种问题层次。其中，与“建国”关联最为紧密的，或许是未来经济制度的选择问题，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在《新路》上所占篇幅最多，正反观点的展开也最为系统。

四

19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和统制，苏联两个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统制经济”乃至“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经济总体的趋势。“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为了国防的需要，也着手发展重工业，试图对于国民经济实施全面统制。国防设计委员会及资源委员会，就是一个从调查、统计到总体设计、实施的专门机构，功能在于“国家资本”的集中运作。^[30]“二战”之后，英国工党在选举中获胜，推行企业国有化与社会福利化政策，其他各国也积极跟进，加上苏联的强大影响，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社会主义已成为人类共同的必然“新路”。1948年

3月6日，钱昌照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发表演讲，回顾自己15年来在“重工业建设”方面的工作，曾不无感慨地说：

谈起这十五年的感想来，我认为首先要建立思想基础。前途只有社会主义的路。纽约时报调查22个国家，只有两个国家仍走资本主义的路，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加拿大。^[31]

钱昌照所谓“思想基础”，大致为不少《新路》同仁所分享。在有关经济制度选择的讨论中，姓“社”还是姓“资”早已不是重点，将“社会主义之路”看成是一种历史必然，这已构成了某种讨论的出发点。^[32]1954年3月5日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社欢迎茶会上的发表演说，提及他的一位“公务员朋友”对于知识界左倾潮流的评价：

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

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33]

借这位朋友的话，胡适梳理了钱昌照等人转向社会主义的思想线索，而他的感慨是由《自由中国》连载殷海光所译海耶克（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到奴役之路》引起的，无意中点破了“中国士大夫阶级”思想争议的国际背景。20世纪上半叶，当社会主义成为一股潮流，包括以投资刺激就业的凯恩斯主义在内的国家干预或统制政策被普遍采纳，理论界的反拨也自然出现，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就对计划与统制经济展开持续批评，构成了后来“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先声。最著名的当然是哈耶克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就是“为了对英国的社会主义文人提出忠告而逐渐形成的”，其矛头指向了一场“旨在让国家拥有主要生产资料，并对经济生活进行严格管制的有组织的运动”。^[34]《新路》上有关经济制度的讨论，与西方经济学内部的异动直接相关，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哈耶克、米塞斯、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米德（James Edward Meade）也是被不断引述的资源，吴景超、刘大中、蒋硕杰、陈振汉、徐毓柵、赵守愚等，

在讨论中表现得最为积极，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由1卷16期“辩论”的标题来概括：“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否需要计划”？在“社会主义之路”已成必然的“思想基础”上，《新路》同仁讨论的重点，落在了是否选择计划经济以及计划的范围、“计划”与“自由”的关系等方面。辩论中持反方立场的“春生”就明确表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并无必然联系，“所以海耶克曾说过：我们可以有很少的计划，与很多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很多的计划，与很少的社会主义”。^[35]

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相剥离，检讨“计划”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希望保留自由经济的因素，以达成所谓“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是讨论中多数论者的主张。^[36]具体而言，这一主张又集中显现于两个方面。其一，强调“价格机构”在合理分配“生产原素”方面不可替代的优越性，^[37]其二，在计划体制之下，个体的经济自由（消费自由、择业自由）势必受到侵害。如果第一方面涉及生产原素、价格、工资、劳动力等一系列因素的复杂联动，属于纯粹市场经济的问题，第二方面则在经济学的原理之外，同时涉及到了政治立场和价值判断。吴景超在论坛《论经济自由》中，在比较美苏经济自由状况之后，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也许有人觉得世间还有别的价值，在经济自由之上，为实现此种价值，牺牲经济自由，亦所不惜。在战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为着祖国的独立与安全，经济自由应当牺牲。但在太平的时候，经济自由是否应当牺牲呢？苏联与美国，对于这个问题，显然有了两个不同的答案。^[38]

在经济自由与民主政治之间建立联系，对于“计划”内部可能的极权倾向保持警惕，上述言论暗含了哈耶克式的逻辑。可以留意的是，当价值问题侵入经济原理的讨论，讨论本身也就不可能再封闭于“原理”之中了，“自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标准，与不同的现实压力和政治选择相关，这也为特定时刻的立场“权变”留下了机会。

当然，依照《新路》特别的方法论，计划与价格、自由之间的矛盾，只是展开讨论的框架，由看似简单的二元对立出发，上述讨论其实深入到更为细腻的层次和具体的问题当中。譬如在计划体制与经济自由之间，多数论者持辩证的态度，明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下，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经济自由，自由的程度也要受资源储备、生产力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而计划经济之中，“价格机构”仍能发挥一种合理配置的作用。陈振汉就提出“在理论上计划当局仍能够根据所谓价格的变数作用

(parametric function) 把生产资源派分到各种生产事业里去,而且也能达到与理想的价格制度媲美的效率”。针对这一说法,蒋硕杰明确点出“价格的变数作用”出自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并交代了具体内涵:“中央计划当局应该应一切收归国有的各种生产因素订出一假定的价格来,使各国营生产单位遵守‘使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原则来争购”,然后再根据供需关系来调整价格。^[39]兰格的理论模式,产生于西方经济学中有关计划经济能否合理配置资源的论战中,直接回应了米塞斯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他提出中央计划当局可以通过不断的“试错法”,以建立一个人为的“准市场”,来调整供需关系,确定理想的价格体系。^[40]对于这种计划经济内的“准市场”机制,蒋硕杰的提问是:“这和保留自由价格机构有什么差别呢?”

另外,有关消费自由、择业自由的维护上,这是自由主义者强调的重点所在,但“自由”也并未被笼统当作一个神话。吴景超比较美苏两国经济自由的有无,在赵守愚看来,这种比较并不合适,因为美国制度稳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苏联的制度一直在变动中,而且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对于美国体制下消费与择业是否真有自由,他也表示疑问,以消费而论,“有计划的推销技术如广告播音等”恰恰能强力操控需要,“待消费人自行入瓮”

而已,可口可乐的推销策略就是一个实例。^[41]再有,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分工”无疑会越来越细密,在机械化的流水线上工人难免会丧失完整的劳动感受,造成生产率降低,如何解决“分部制度”与工人的主体性与生产率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都要面对的问题。谈及这个问题,也有论者注意到相对于资本主义“计件工资”的激励,社会主义工人心理上无比的满足感更为重要——“他们明白工作的意义,是在为连自己也包括在内的全体人民谋福利”,苏联的“史塔诺夫运动”在提供生产率方面的成功,就是可以参考的经验。^[42]

总之,社会主义公有制与“非计划”的经济模式是否兼容?在中央计划制度之下,可否保持某种程度价格机制的作用和消费自由、以此形成内在的民主可能性?如何在自上而下的“计划”中也能形成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也杜绝官僚化、低效率的弊病?在分工细密的大生产中如何发挥主人翁意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如何在生存平等之外,通过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来实现机会的平等?如何解决高速的资本积累与工业化建设与社会公平分配之间的矛盾?《新路》上的相关讨论,已不同程度地触及到了这些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多层次问题。在探讨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的关系时,刘大中坦言生产工具的公有是达

到平等的必要条件，但这势必限制经济上的自由，而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条件之一，“也是我们所不能放弃的”“政治和经济学者的主要使命之一，是在这些矛盾之中，求得一个最好的折中办法”。^[43]在诸多矛盾之中寻求“折中”，这其实暗示“蓝图逻辑”只能以层层展开的矛盾的方式呈现，这些矛盾不能在经济理论的内部得到圆满化解，只能看作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空间，在历史的展开之中不断被遭逢、不断被回应，而当具体的情势与关系发生扭转、重塑，“折中”的要求也往往会让位于价值的“决断”。

五

在经济制度选择的问题上，《新路》2卷5期上的“论坛”《混合制度与计划制度中间的选择》具有某种总结性的意味，作为论坛的“主讲人”，陈振汉的态度与蒋硕杰、刘大中、吴景超等“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同，他坚持“计划”对于“建国”进程的必要性，认为“我们今日的问题，只是维持混合的现状，还是增加混合的程度以至于接近计划经济”。在讨论中，他反复提出一旦“建国”就要面对的两项紧迫工作——“高速度的真实资本建设”与“社会主义公平理想的实现”，二者应“双管齐下”，务必同时实现。但事实上，在国力衰微、资本匮乏，在战争的阴云下又不得不进行国防建设

的年代，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恰恰是“蓝图逻辑”之诸多矛盾之中最为紧迫、最难以化解的一个（徐毓枏就认为“恐怕我们终究必在两个目标之中，侧重一项”），而且牵涉土地、人口、资本、消费、城乡关系等诸多环节。《新路》作者也试图在“蓝图的逻辑”的层面，将这一矛盾及连带的问题充分推演，而《新路》主笔之一吴景超的思考，最值得重视。^[44]

毋庸赘言，对于后发现代国家而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土地、人口、城乡关系等问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如果解决不好其中的矛盾，即便工业化能够展开，也难免落入“发展陷阱”之中。自1930年代开始，吴景超对此就有持续的关注，在1937年出版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中，他提出中国是一个地少人多、农业人口比重很高的“第四类国家”，由于人均土地面积太少，加上技术、交通的落后，以及土地分配不均、苛捐杂税等原因，造成中国农村普遍破产。这个问题并非各地“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农村运动可以解决，必须有一种全局的眼光：首先完成统一“建国”，然后将农民的生计问题，“放在经济建设的大问题之下，同时再把经济建设这个大问题，看作最近的将来，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45]在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曾发生“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争论，但由于土地资源稀少、人口稠密造成的“糊口”经济以及

所谓乡村“内卷化”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共识”，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理论的提出，也就针对了这种土地与人口的困局。在书中，吴景超设计了一个相当完备的改良方案，包括以减少地租、土地赎买的方式，平均地权，使佃农变为自耕农；效仿英国的“圈地”运动和苏俄的集体化农场，将小农场合成大农场，推广农业机械化，并将剩余人口转移至新兴工业，以发展工业、发展都市的方式救济农村。

《新路》时期，吴景超的这些思路得到进一步的整合，在1卷2期的论坛《论耕者有其田》中，“第四种国家”的道路构想，得到了更为具体、细致的展开，比如在生产关系的改变外（地权）又强调生产力的变动（使用大型农机械）。鉴于形势的紧迫，他调整了以前设想的需33年完成的“从佃户到自耕农”的方案，规划了一张以七年为限的时间表：将地价定为年租金的七倍，在七年之内，政府贷款给农民，赎买土地，消灭地主和佃农；然后兴办合作农场，一部分人口转移至新兴工业，同样在七年之内，又使自耕农交地权于国家。这一完整的土地改革与工业化方案，明确是以苏联“五年计划”期间的实践为参照的。虽然参加讨论的陈振汉等人，基于苏中两国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中国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对于这套方案的可行性表示怀疑，吴景超在“总答复”中还是兴奋地写道：

我在没有写这篇文章以前，脑海中原来另有一个题目，名为《三管齐下的经济建设》，说明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及节制人口，应当同时办理，才可以收到提高生活程度之效。后来觉得人口问题牵涉太广，有另外写文章说明之必要，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便没有提。^[46]

在吴景超的总体构想中，农业改造（地权与机械化），工业化的推挤，和节制人口政策的实施，必须同步进行、“三管齐下”。

这篇文章虽未写出，但这“三管齐下”的说法，显然比刘大中提到的“双管齐下”更进了一步，通过土地改革，获取“工业化”的劳动力和资源支持，又通过工业反哺乡村、节制人口来化解乡村困局，这一较为完整的方案，又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乡村建设、乡土重建的思路处于论辩之中。在后者看来，现代中国不应走城市领导乡村、将人口向城市输送的道路，而恰恰要恢复城乡之间的有机循环，从而达到“乡土复员”的目的，相较于发展大规模的重工业，一种合作性的乡土工业（手工业）的可能性更值得重视。但在基本的分歧之外，双方的思路也不乏相近之处，比如所谓“第四类国家”的现实——地少人多导致的“匮乏经济”，在农场不能扩大和地权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不足以维持“不饥不寒”的生活水准——同样也是“乡土重建”

的思路起点。为了消灭寄生的地主阶级，双方也都倾向于和平的赎买方式，希望给这个没落的阶级一条出路，这自然迥异于中共发动的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但换个角度看，在吴景超等“三管齐下”的方案中，以苏联工业化、合作化的历史为参照，通过土地改革、农业机械化来提高土地生产率，从乡村不断汲取资源、人力以支持现代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构想，又和“建国”后不久实施的“总路线”高度吻合（包括地权平均后又收归国有的两步走政策）。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状态，恰恰说明了建国“蓝图”背后不同历史脉络的相互碰撞、交错。

实际上，以“三管齐下”来概括吴景超的“工业化”方案，或许并不完整，说成“四管齐下”或“多管齐下”会更为准确。因为在土地制度、人口政策之外，吴景超还非常关注“工业化”一个不可获缺的条件——资本问题。在1930年代，他就提出缺少资本是中国工业化面临的一大困难，而可能的资本来源包括：现有工业积累资金的再投入，政府取缔投机事业、引导游资投入生产事业，鼓励华侨投资，利用外资。1940年代末，在“和平统一”即将到来的预估下，如果要抓住机遇，在不长的时间内快速推进“工业化”，所需资本的数量以及来源的问题，也不得不首先面对。《新路》1卷7期“论坛”《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

题》，就是一场相当重要的讨论。讨论的正文由吴景超撰写，他参照美国及战前中国的经济数据、以及一些学者的估算，筛选各种方法，大致估算了中国工业化每年所需的资本数量，以及在改良税制、改进生产、增加储蓄的前提下，中国每年可以供应的资本总量。^[47]

上文已提及，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 and 具体“工业化”目标的确认，这种资本需求、供应的估计，只能是一种纸面上的假定。参与讨论的刘大中的就指出“估计我国过去每年的资本形成数值，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且这个数值必定很小，甚至“可以假定人民可能自动供给的资本数值是零”。那么，怎样获得工业化所需资本呢？他给出了两个方法：其一，“我们就不能不用强迫的法子”；其二，“或是利用外资”。所谓“强迫的法子”，是指“除去采用极高的累进所得税以外，我们恐怕还必须直接限制消费（如定量分配等）”，而通货膨胀的方法必要时也可采用。

刘大中给出的两个方法中，“利用外资”显然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也曾谈及这个问题：

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

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48]

可以参照的是，在钱昌照主持的资源委员会所推进的重工业计划中，利用外资也是关键一项内容。1948年，钱昌照还将“抗战结束后的两三个月”视为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中国在美苏之间暂时求得了一个和睦局面，美国、加拿大、英国也先后答应借款，可惜这个“黄金时代”被错过了，对此钱昌照痛惜不已。^[49]这意味着，能否利用外资，要取决于中国及世界的政治格局，取决于能否“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50]后来新中国在苏联援助中断后不得不自力更生的历史，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至于刘大中提到的第一个方法“强迫的法子”，吴景超并未忽略，他也以苏联的经验为例，谈及穷国在“强迫储蓄的压力下”，也可达到较高的储蓄率，但同时又认为“假如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则已在饥饿线上徘徊的中国民众，非要再降低生活程度不可，这不是讲人道主义的人所愿意提出的主张”。^[51]这多少反映了

态度的犹疑：一方面，在比较美苏经济制度、特别讨论苏联工业化建设的成就时，《新路》作者对于苏联在“五年计划”期间不依靠外资，通过配给制度，来强迫储蓄、压低消费，从而集中资本进行工业建设的方式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认为对于落后国家而言，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52]另一方面，又对这一路径的曲折、困难以及付出的极高的社会成本，有充分的估计。如陈振汉就指出苏联工业化的成功与资源丰富、可开垦土地的广大，原有经济水平低下有关，但类似“红利”会逐渐流失，“五年计划”的高速增长不一定能持续。对于中国而言，采用同样的方式，面临的挑战会更大，因为“除了计划以外，还没有同样肥沃广袤的大地，我们只有更繁密的人口与更低的生活水准”。^[53]要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建设，采用“压低人民的生活程度”的方式，他的担忧也与吴景超类似：“中国大多数人民原来的生活程度，不必用数字证明，大家都晓得已濒于饥饿线上，如我们还希望增加剩余物力人力，只有逼迫全国人民枵腹以事生产。”^[54]

与上述忧惧相关的是，在资本短缺的情况下，“工业化”的路径该朝何种方向展开？是发展消费性的轻工业，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还是为了巩固国防的需要，大力发展重工业？是努力成为一个“强国”，还是先休养生息、解决温饱，并向“富国”迈进？类似的选项

也包含在资本问题的讨论中，徐毓柵就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还需四五十年，他提出的又是一个“不可兼得”的问题：“如此说来，在最近四五十年内，即使没有内部纠纷，中国处境也是很艰难的。我们在军事设备以及生产设备方面都不如人家，都得要赶，而二者又不可得兼，我们将怎么办呢？”^[55]

无论“双管”“三管”“四管”还是“多管齐下”，以“工业化”为核心主脉，土地与人口、资本与分配、城市与乡村等，则是一系列围绕主脉展开的问题面向，《新路》作者强调上述问题必须在连带中思考，但不同目标、路径之间的冲突，也造成了所谓“不可兼得”的问题一再被提出，这无疑也是“蓝图逻辑”之内在论辩结构的显现。吴景超等深知原理性的探讨即使再周密，但紧迫现实问题的回应，往往需要一种更宏观的视野、一种“超经济”的政治决断，在评述苏联计划经济的得失时，吴景超的表示意味深长：苏联计划经济具有一个超经济的目标——“便是不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为其主要工作的目标，是否可取，那是属于政治的或道德的范围，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了”。^[56]类似暧昧又开放的表态，不止一次出现在《新路》上，暗示无论经济自由的保全，还是社会人道的考虑，在这批专家的心中，都并非抽象自明的立场，他们承认在特定的历史状况中，这些价值可以让渡于更

紧迫的现实要求。“蓝图逻辑”可以充分考虑各种可能以及相应的矛盾，但正因是纸上的“蓝图”，它又保持了内在开放性，可因政治选择、内外形势的变动而调整方向和重心。

六

1948年4月，针对自由主义者的“第三条道路”论述，郭沫若发表《历史的路只有一条》一文，指出“照着进化的箭头所指示，整个历史只有一条路线”，而所谓“左中右”不过是“前中后”“急中缓”的别名，“它们是在带有箭头的一条直线上，而不是在一个发足点的横线上的三个带箭头的平行线”。^[57]在这样的历史理解中，“新路”肯定是一条不合时宜的路，更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方向，注定要淹没于沿“一条直线”向前的总体进程中。^[58]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天地玄黄”的时刻，也是一个开放的时刻，那需要由“理性”强力辨认、把握的“只有一条”的路，本身也不是固化的，正是在多种路径碰撞、汇合中才得以显现的。如果将“建国”理解为一个持续不断的思想与实践进程，那么这个开放的时刻，又可以理解为一个收拢的时刻，会将此前不同的思路和经验卷入其中。事实上，《新路》同仁等有关经济制度和现代化道路的探讨、有关土地、人口与工业化关系的分析，早在1930年代已

经展开,《新路》的创办也为这些思想资源提供了一个整合、辩难的平台。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说明“新中国”的建立既是全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打造,同时奠基于20世纪中国一些基本的问题脉络之中,其中所包含的紧张、矛盾的不断反折、复现,同样可能需要审慎的对待。

当然,《新路》同仁在经济制度和工业化建设方面,用心较多,但对“建国”所包含的社会全面“改造”的意涵,还缺乏内在的体知,他们草拟的“蓝图的初稿”后来并没有发生预想的作用。但1949年之后,这批专家大多选择留在国内,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对“蓝图”之主脉问题的思考也并未中断,而中共提出的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总体战略,在相当程度上也吻合于他们对“建国”路径的期待。钱昌照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就代表资源委员会表示“此次二十余万职工比较完整的投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怀抱,其愉快难以言语形容”,并对中国重工业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59]后来,他曾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中央财政计划局副局长,并参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吴景超在建国初期仍持续关注工业化、土地、人口及资本的联动关系,比如1950年初,他就撰文强调“工农联盟”的经济意义,认为该联盟“最重要的收获”是“农

民帮助工人发展重工业,创立国家工业的基础”,方式包括增加粮食生产、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向后者不断输送人口等;然后,“工人又转过来帮助农民来改良生产工具,奠定农业机械化的基础”。^[60]1950年2月,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一系列协定,其中“中苏贷款协定”承诺,苏联五年之内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得知这一消息,一直忧心工业化资本来源的他十分兴奋,比照苏联建国时期内外交困的处境,在文章中感叹:“在开国的时期,在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时期,我们就得到这样大的协助,这是我们的幸运。”^[61]应当说,在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中,吴景超是思想转变较快的一个,他在1950年代一系列著述,无不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推进,且多以苏联为样板,给人处处紧跟形势的感觉,但一以贯之的还是“重工业”优先的思路。大概是建国初期百事待兴的局面,让他感到过去“多管齐下”的工业化构想,有了落实的可能。稍有不同的是,原有思考中不断反顾犹疑的内在张力,或许由于政治选择的明确,而看似被取消了。

有关《新路》群体建国后的走向、思考及多舛的命运,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但不能忽略的是,在过去与未来的衔接时刻,《新路》之“蓝图逻辑”内部包含的一系列“问题结构”,

都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高度相关,而且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不断复现。仅就1950年代而言,1953年确立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为了增进国防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但“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盈利较少较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轻工业与重工业、积累与消费之间所谓“不可兼得”的矛盾也由此产生。^[62]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其中“小仁政”与“大仁政”之别,一个考虑“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个考虑“人民的长远利益”,“所以在工业化时期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但这些困难是必须克服,也是可以克服的。”^[63]然而,政治的决断不能消除矛盾性的“问题结构”的存在,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动,“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关系也要随之变化,比如重新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例,避免苏联及东欧发展中不平衡的问题,就成为毛泽东1956年所论“十大关系”之首。^[64]其他如社会主义前提之下“计划”与“自由”的关系、社会主义体制中价值规律(价格机制)的作用,以及控制人口增长等问题,也曾在1956—1957年间曾集中引发了讨论和争议。^[65]

再有,上文提及,在“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讨论中,刘大中曾提出中国获取资本的途径不外“用强迫的法子”与“利用外资”

两种。如果说“新中国”最初在苏联的支持下,获得了工业化起步的资本,但在外资旋即中辍之后,之所以没有陷入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逃脱的“发展陷阱”,恰恰又是因为采用“强迫的法子”,以“大规模劳动投入替代零资本”和“内向型积累”来维持工业的进程,从而走出了独特的道路,“打破了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对宗主国/投资国的经济和政治依附”;而危机得以平稳渡过,也源于危机的成本可以依托城乡二元体制向农村转嫁。^[66]这样的危机化解方式以及巨大的社会成本,吴景超、刘大中、陈振汉、徐毓柵等在《新路》上的讨论已经有所触及。从这个角度看,1948年那份以自我辩难方式展开的“蓝图逻辑”,似乎已将上述“不可兼得”的矛盾,进行了某种纸上的“推演”。如何在外来的模式之外成功解决这些层层展开的矛盾和关系,“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则意味了一条“新路”能否被创造性地走出,也预示了它可能的前途。^[67]

注释

- [1]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组建于1948年2月，最初的理事为王崇植、吴景超、周炳琳、孙越崎、陶孟和、楼邦彦、刘大中、潘光旦、钱昌照、钱端升、萧乾等，成员则多达50人。关于“社经会”与《新路》创办的经过，参见《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00—102页。
- [2]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7—78页。
- [3] 参见裴仁《“新第三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时与文》2卷23期，1948年3月19日；胡光《自由主义运动的批判在香港》（香港通讯），《国讯》456期，1948年4月2日。两文后收入《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1958年。
- [4] 一位读者曾致信《新路》，认为所谓“第三方面”和“中间路线”口号的提出，“只是意味笼统目的的暧昧的名词，它好像是两个正在斗争集团之外的另一个准备参加斗争的集团，又像是仅仅想和缓两斗争集团的一种主张”；但《新路》提出了一个具体的“适合时代的中心思想，一种符合人民要求的坚决的共同主张”。参见《一个青年的共鸣》，《新路》1卷2期。
- [5] 转引自裴仁：《“新第三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第54页。
- [6] 《发刊词》，《新路》1卷1期。
- [7] 《辩论栏目》，《新路》1卷1期。《新路》上刊发的“论辩”话题，包括《苏联是否是真正的民主国家》（1卷3期）、《用和平方法能否实现社会主义》（1卷6期）、《目前国际局面美苏应负的责任》（1卷14期）、《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否需要计划》（1卷16期）、《美苏和平共处是否可能》（1卷18期）、《中国、交通、农民三行的商股是否应行收归国有》（1卷19期）、《美国前途之展望》（2卷2期）等。
- [8] 《钱昌照回忆录》，第101—102页。
- [9]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第219页。
- [10] 曾被认为是《新路》主编的萧乾，主要负责“文艺”部分，在实际的讨论中参与并不很多；“文艺”栏中偶一露面的冯至、沈从文、杨振声、袁可嘉、汪曾祺等，则更只是“敲下边鼓”而已。
- [11] 1930年，成为知识界讨论热点的“现代化”与“建国”这两个命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1933年7月，《申报月刊》集中发表20多篇文章讨论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罗荣渠看来，这是“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科学词汇在报刊上被广泛使用的开端。（罗荣渠：《从“西华”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胡适在《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中回应了这场讨论，指出：“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

[12] 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吴景超《革命与建国》，《独立评论》第84号，1934年1月7日。

[13]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1934年第1期。

[14] 胡适：《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1935年第1期。

[15] 1935年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后，邀翁文灏由北平地质调查所南下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从清华大学历史系调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任行政院秘书。胡适在1936年1月26日致信三人，表达欣喜之情，希望他们能成为“‘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以宾师自处”，将行政院变成一个“幕府”。（《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89页。）

[16] 钱昌照还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包括军事、外交、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各方面的专家，最后又安排王世杰、周览、徐淑希、胡适、张其昀、吴鼎昌、徐新六、杨端六、丁文江、翁文灏等人与蒋介石会面。参见《钱昌照回忆录》，第36—38页。

[17] 1948年1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吴景超来谈。他说，钱昌照拿出钱来，请他们办一个刊物。要吴半农主编，景超任社会，刘大中任经济，钱端升任政治，萧乾任文艺。”（《胡适全集》第33卷，第680页。）

[18] 当然，并非所有《新路》成员，都对“蒋政府”采取彻底弃绝态度，一些“年轻人”还是跃跃欲试，希图在金融、经济领域有所作为。1948年8月，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国民党政府启动“币值改革”，最终改革的失败，也彻底压垮了“蒋政府”。对于这项改革，《新路》保持了高度关注，前后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币值政策的种种失误。其中，蒋硕杰的《金圆券的善后》一文，胡适读后很是赞许，并将蒋硕杰、刘大中两位“青年经济学家”引荐给翁文灏和蒋介石，帮助应对经济崩溃、物价飞涨的乱局。在蒋介石的首肯下，吴景超、蒋硕杰、刘大中三人差一点随翁文灏南下，但因翁文灏态度的消极，最终不了了之。参见蒋硕杰：《刘大中战亚昭伉俪逝世周年之追忆》，《刘大中先生伉俪追思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84—86页。

[19] 《经济危机已不是经济措施所能解除的了》（短评），《新路》2卷5期。

[20] 谷春帆：《如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新路》1卷2期。

[21] 陈振亚：《混合制度与计划制度中间的选择》，《新路》2卷5期。

[22] 参见闫书钦：《国家与经济：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晚年的费孝通比较过自己与吴景超治学路径的差异：“他的研究是宏观的，用全世界各国的材料来做比较，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我走的路子，表面上讲是一条相反的路子。我是微观的，从中国内部实际情况去理解中国社会”。参见《在纪念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第2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9—211页。

[23] 比如《新路》1卷4期“经济学常识浅谈”栏目发表刘大中《社会主义下的生产政策》一文。虽名为常识，该文的专业色彩相当浓郁，首先采用某种“理想型”的研究方法，构造了一个“有二十亩田。另外有五十个国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小模型”。以这个“小模型”为个案，文章借用各类数学公式，分析了各种社会主义生产、分

配原则的实施。

[24] 在《新路》1卷21期“论坛”《论经济自由》中，徐毓柄的《论美苏制度下经济自由》就指出吴景超关于“计划经济”与“消费自由”的区分过于抽象，美苏比较应考虑两国实际的经济条件。

[25] 吴景超在《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新路》1卷7期）讨论中，提出可以每年需从农业转入工业的人口数来计算每年工业化所需资本，而对于“每一转业的人所需的资本”做出两种假定：“一为四千六百美元，一为四十七美元”，前者是美国资源委员会1935年计算每个就业人口所能利用资本的平均数，后者为汪馥荪估计中国目前就业人口平均资本数，两者相差近百倍，变动的范围如此宽阔，也使得这种估算最终失去了意义。

[26] 刘大中等：《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新路》1卷13期。

[27] 楼邦彦等：《论公务员的法律地位与政治权利》，《新路》1卷17期。

[28] “经济学识浅谈”栏目说明，《新路》1卷4期。

[29] 刘大中：《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新路》1卷13期

[30] 郭红娟：《资源委员会经济管理研究：以抗战时期为核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31] 钱昌照：《一个黄金时代的错过——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讲演》，《纪念钱昌照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309页。

[32] 1卷6期的“辩论”的标题“用和平方法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双方观点的差异只是在实现的“方法”上，而“对于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基本假定，总算没有歧义”。参见炳章：《答负生》，《用和平方法能否实现社会主义》（辩论），《新路》1卷6期。

[33] 《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33页。

[34]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十二年之后》，《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3—285页。

[35] 《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否需要计划》，《新路》1卷16期。

[36] 蒋硕杰在《社会主义与价格机构》（《新路》2卷5期）称他提出的所谓“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出自弥德教授（J. B. Meade）最近问世之《计划经济与价格机构》，而“本刊上卷中吴景超，刘大中，‘春生’及笔者亦先后执同样见解”。

[37] 吴景超在《私有制与公有制——美苏经济述评》（《新路》1卷15期）中提出：“我个人的私见，以为苏联的经济制度中，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原素的合理分配”，“我们相信在社会主义之下，假如每一个生产原素，都有一个根据需求状况而产生的价格，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将为一种极重要的贡献”。

[38] 吴景超：《论经济自由》，《新路》1卷21期。

[39] 陈振汉：《混合制度与价格制度中间的选择》，蒋硕杰：《社会主义与价格机构》，《新路》2卷5期。

[40] 对于米塞斯与兰格之间有关经济计算问题的争论，参见黄雄：《经济学中的自由骑士：米塞斯及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110—116页。

[41] 赵守愚：《经济自由的名与实》，《新路》1卷21期。

[42] 马逢华：《社会主义下的生产效率》，《新路》1卷11期。

[43] 刘大中：《经济自由、社会主义和新投资的计划》，《新路》1卷21期。

[44] 在1930年代《独立评论》上，吴景超就是一个极为活跃的作者，作为“工业化派”的代表人物，他后来不仅入阁，曾任经济部部长秘书，参与政府的经济决策，在抗战之后还创办并主编《新经济》半月刊，集中探讨工业化的具体方案。他在《新路》上发表的多篇文章，延续此前一系列思路的同时，也结合40年代后期的现实状况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有关吴景超经济思想的述评，参见闫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第六章《出山作得许多声》，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45] 在此书中，吴景超区分了四类国家：第一类人口密度高，农业人口百分数低，以英、德两国为代表；第二类人口密度低，农业人口百分数也低，可以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为例；第三类人口密度低，农业人口百分数高，以俄国最为典型；第四类人口稠密，农业的比重又占到70%以上，辛苦劳作也只能挣扎于温饱和饥馑之间，“人口密度和职业分派两点都需改良”，这类国家以印度、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为例，中国当然更是属于这个类型。参见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6—17页。

[46] 吴景超：《论耕者有其田》（论坛），《新路》1卷2期；参加讨论的有徐毓柵、戴世光、陈振汉、韩德章。

[47] 在资本需求方面，吴景超选取的估算方法为：先估计每年“拟在农业中，抽出多少人来，使其转业。同时再看每一个转业的人，社会应该替他安排多少工作所需的资本。有了这两个数目以后，每年所需要的资金，便容易算得出来了”。这种计算方法的前提，还是将农业人口转移至新兴工业的构想（当时75%集中于农业，应降至25%），而转业人数两个假定：一为每年60万人，一为每年一百二十五万人，对于每人所需资本，分别参照美国与中国的经济数据，也做出两个假定，一为4600美元，一为47美元。由此他得出了相差极为悬殊的四种参考数据。

[48] 《论联合政府》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这段文字被删去了，“删去这段话，与建国初期我们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毛主席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变化有关”。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6—377页。

[49] 钱昌照这样感慨：“假定东北机器不被拆走，假定国内没有战事，假定22亿美元都借到，假定币值稳定，经济繁荣，那是怎样一个情形呀，无奈国内打起来，因此一切都完了。”参见《一个黄金时代的错过——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讲演》，《纪念钱昌照专辑》，第306—307页。

[50] 1949年7月，钱昌照曾与毛泽东有过一次谈话，毛泽东询问了欧洲各国对新中国的看法以及马歇尔计划的执行情况，同时也谈到1945年钱昌照与宋子文的苏美之行以及借款未果的经过，“主席说：建设国家不能依靠外援，方向不对头。中国完全可以用自己力量进行建设，这是我们建设国家的唯一途径”。参见《钱昌照回忆录》，第104—105页。

[51] 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新路》1卷7期。

[52] 如陈振汉所言：“在一个工业落后需要急速工业化的国家，能够比较有效的动员人力物力，到了充分就业以后，还能压低人民的生活水准，争取人民的储蓄或转移这些储蓄的投资方向，这种作用，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尤其需要”，而对于推进工业建设，最大的功用还在“尽量转移农民收入与节约农民的消费以为工业建设的资本，或

是以农业来培植工业”。陈振汉：《苏联的工业建设与计划制度》，《新路》2卷4期“苏联经济特辑”。另外，可参见吴景超：《私有制与公有制——美苏经济述评》，《新路》1卷15期；徐毓柵：《论美苏制度下经济自由》，《新路》1卷21期；吴景超：《资本形成的途径——美苏经济制度述评之一》，《新路》2卷2期。

[53] 陈振汉：《苏联的工业建设与计划制度》，《新路》2卷4期“苏联经济特辑”。

[54] 陈振汉：《混合制度与计划制度中间的选择》，《新路》2卷5期。

[55] 徐毓柵：《强国与富国》，《新路》1卷7期。

[56] 吴景超：《私有制与公有制——美苏经济述评》，《新路》1卷15期。

[57] 郭沫若：《历史的路只有一条》，《国讯》第456期，1948年4月20日。

[58] 这种“不合时宜”性，不仅表现在“新第三条路”，还应注意的，是《新路》同仁基于“蓝图逻辑”的讨论，较多集中于政治经济制度和工业化进程的方面，对于“革命与建国”所包含政治结构、社会关系及伦理生活的整体改造内涵，当时还缺乏全面的了解与体认。

[59] 《特邀代表钱昌照在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第473—47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

[60] 吴景超：《工农联盟与经济建设》，《新建设》1卷10期，1950年1月15日。

[61] 吴景超：《中苏贷款协定加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信心》，《新建设》2卷1期，1950年2月26日。

[62] 在1951年春的“春藕斋讲话”中，刘少奇曾提出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好安排生活，积累资金”，然后在集中资金和力量建设重工业。但依照薄一波的说法，“他的这个主张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没有一定的重工业作基础，没有工业原料和机器、能源等重工业的发展，农业，轻工业就很难发展起来”。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63]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11—712页。

[64]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8—269页。

[6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后来被称为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的顾准，也是在1957年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第496—497页。

[66] 对于建国后因引入“外资”导致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参见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

[67] 苏共“二十大”之后，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为代表，中国共产党自觉以苏为鉴，总结经验，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建设路线，应对在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以及经济与其他事业的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十大关系”也类似于由一系列矛盾关系组合而成的总体“问题结构”。

一、引论

讨论新中国成功建国的原因，学界有不少相关论述。比如认为建国主要是一场军事胜利，中共革命也被认为主要是军事（主角是农民）革命。新中国建国当然与军事胜利密切相关，可如果新中国主要是由军事胜利直接转换而来，而建国初期的各方面成就又有目共睹，那问题是，建国初期大量的各层级治国干部从何而来？是沿袭国民党社会运作系统中的精英吗？如果是直接沿袭这些精英，新中国为何能凭借单纯的军事胜利就能在抗美援朝、镇反、土改、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等连续不断的运动中保持社会稳定，并获得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巨大成就？国民党为何不能充分运用这些精英挽救多年的政治经济颓势以

支援军事战争？如果不是，这些干部从何而来？建国初期中共的这些干部精英如何能突然具备治国所需的政治责任感、敏锐的现实感、积极进取的心态？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依赖于一些显见的历史成因，得突破既定历史叙述，进入当时社会结构的历史构造当中，重新讨论建国的历史前提和经验。由此，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也要放到一个社会结构大重组中来观察，这一军事变化是在一个怎样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又是如何被转化为有效的政治能量的。它需要我们突破诸多命题被论述时所依赖的那部分历史现实，从更为实在和开阔的社会历史层面打开被封闭的结构性经验，而不是简单从思想或理论高度上抽象把握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意涵。

接管天下之二 来？ 部从哪里 建国的干

何浩

二、谈建国为什么要谈根据地？

如何内在把握新中国建国的历史构造、历史感觉和历史前提，如何突破、打开建国史的结构性的实践经验，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挑战性的问题。我们不妨先观察中共自身是如何意识和把握建国前那一历史时刻的现实，又是如何通过他们对现实的这种意识、把握和整理，再去调动革命实践中的已有经验，去构想建国的规模、方向、途径和形态。

1948年10月28日，中央组织部的一份《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全部干部的决议》中指出，解放战争发展太快，夺取全国政权所需干部问题变得非常急迫。军事的快速推进必须有相应的政治组织配合，才能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胜利。当时估计，

到1950年6月，中共将在两年中从现有的1亿6千8百万人口和586个县市发展到3亿3千万左右的人口和1000个左右的县市。而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每一个新开辟县，至少需要县级及区级干部75人（在老解放区，平均每县脱离生产的干部，包括村级干部在内，约有2、300人，最大的县有多至400人）。500个县就需要干部3万7千5百多人左右。平均5个县设一个地委，每一地委至少需要干部60人左右。500个县有100个地委，地委级干部则需要6000人左右。平均30个县设一区党委，每一区党委至少需要干部80人左右，500个县有17个区党委，需干部1360人左右。500个县左右的地区需要成立4个中央局，每一个中央局至少需要干部300人左右，共需干部1200左右。此外还需要准备7000人左右的

干部在大城市工作。这些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和大城市的各项干部，总共约5万3千人左右。而这些干部中，华北出1万7千人，华东出1万5千人，东北出1万5千人，西北出3千，中原出3千。

而且这些抽调出来的干部不能全都是基层干部，比如华东和东北的各1万5千人中，必须包括中央局一级干部48人，区党委一级75人，地委一级300人，县级1050人。而华北还要相应增加。^[2]

正是大量培养和储存的这些干部成为新中国建国的基本条件之一。面对解放全国的历史一刻，中共或许吸取了国民党北伐时推进太快、只能大量吸纳留用北洋政府政治系统人员而快速溃败的教训，未雨绸缪，运筹帷幄。可问题是，中共为何能在短短两年中生产出如此大量的各级干部？他们产生于怎样的特定社会状况和生产机制？生产这些干部的运作机制、经验传承方式、意识重塑途径、积极向上的心态等等本身又是被何种历史结构、意识氛围生产出来？为什么国民党多次想做而没有做到？这些人进入新中国的社会各环节之后，面对的是同样的现代中国社会基体和中国人群众，为何没有被（至少建国初期没有）这一基体的既定逻辑和势态所消耗，反而能够突破、翻转和重组人群结构？换句话说，为何中共治理下的新中国，没有发生易劳逸

所说的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的迅速溃烂？

从这样的问题出发，使得我们对根据地实践经验的讨论成为讨论建国历史经验的前提。干部决议中所谓的华北华东东北西北等地，主要指的就是各根据地解放区。拓展新解放区所需的干部，也正是由各根据地提供。那这些抗战和内战期间的根据地是如何产生和开展工作的？中共在这一时期的地方实践重新构造出了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形态，使得这种革命开展出来的根据地结构能大量生产具有政治治理能力的干部并得以担当建国重任？

本文无意将根据地处理为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我们讨论根据地，重点是讨论在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革命力量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和历史条件下与中国地方社会结构遭遇、碰撞、磨合，并在遭遇的过程中通过创造性的实践使自身和地方社会均再结构化。讨论根据地建设中革命力量如何面对特定的实际历史处境，从实际处境中转化和生成新的革命力量，或对革命有利的局面，并在新的结构关系中进行革命关系的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根据地”是帮助我们打开历史的一个媒介对象。它一开始就是动态关系的特定时刻。本文尝试以中共革命力量的历史努力为基本视野，考察它在根据地实践方面的方式和经验，并对这些方式和经验展开再反思，检讨它所开放出来的历史信息和意涵。

本文之所以选择太行根据地(而不是延安)作为考察中心则在于,其一,新中国建国的历史前提之一是,大批年轻人得到了长时间的重建社会组织结构的能力训练,其政治实践能力、知识结构和意识方式都发生了巨大转变。而中共各根据地的这一历史实践过程,是延安整风运动等层面的实践经验所无法直接提供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各根据地实践既特殊又重要。(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强调根据地经验与延安经验的断裂和差异。抗战后期根据地实践经验的调整和转变,跟延安整风运动、组织起来等思路有密切关系。)

其二,抗战时期的延安聚集了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大批精英,而各根据地却只能依赖少数有经验的革命者在新状况新条件下重建革命队伍。这反而对我们理解新中国快速建国过程中的实践经验有帮助。其三,太行根据地的地理范围是正太路南,平汉路西,白晋路东,黄河以北的太行山区(包括冀西及豫北)。属于山地根据地。抗战时期,在这一地理范围内的主要力量有:阎锡山晋绥军及其政治力量、日军、国民党军、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太行区党委、牺盟会,以及各种社会力量。错综复杂。山地虽易守,但根据地如何扩大发展;社会政治力量过于复杂,根据地又如何能合纵连横杀出重围,这诸种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复杂因素,都使得太行根据地的实践经验可以

成为我们观察中共建国经验的一个较好基点。

三、抗战时期晋东南周边各力量部署及129师进太行

抗战初期,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虽快速退败,但仍有部队留守敌后。国民党军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部队,主要部署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省。

这些国民党游击部队,一部分是在日军进攻时未及时撤退而滞留敌后的正规军,其编制、装备较为齐全,但缺乏游击战争训练,大多不善于进行游击性的分散作战,不会做群众工作,其后勤补给也仍属正规军系统,在敌后生存能力也差。另一部分游击部队多由地方民团和豪绅的私人武装组成,这种部队不但缺乏民族精神,而且纪律涣散,大多不能在敌后恶劣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

太行根据地属于晋冀鲁豫军区,是由建于1937年底的一系列小根据地发展起来的。早期,它的活动中心是平定县(在正太铁路南)、赞皇和邢台(在冀西南)、涉县(在豫北紧靠着冀西南的磁县)、晋城(晋东南的最南部),也有冀豫晋省委的分支机构在沁县,它是太岳根据地的发源地。在1938年和1939年间,太行根据地的活动范围第一次扩展,主要集中在邯郸和长治一线的北部地区,沿太行山脉,

在平定、昔阳、邢台、赞皇、和顺、榆社、武乡、辽县、黎城和涉县，这是它的主要活动地区，一直到战争结束。抗战期间，除 129 师、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中共太行区党委、太行军区外，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党政军领导机关，也驻节太行区。^[3]

有历史学者指出，抗战期间，敌后战场国民党军留下的正规军建立的游击队，是中共游击队的 2.6 倍，枪支数为 4 倍，作战次数为 402 倍。^[4]即便这是事实，但历史研究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敌后战场并不只是军事行动。问题是，同样是在敌后游击战与中国华北社会的碰撞、磨合中，为何在这些敌后战场只有中共发展并扩大了根据地，最终站稳脚跟？而国民党大多不是退出就是投敌？

当然，中共根据地的稳定扩展也并非一帆风顺。1937 年底，129 师进入太行地区。据时任 129 师政训处副主任的宋任穷回忆：

当时，我们 129 师在晋东南只有 3 个团。根据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我提了一个建议：把部队中副职抽出来，搭成团的架子，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分别带队，下去搞扩兵。同时也搞点枪、搞点钱。当时是个好机会，机不可失。因为那时群众抗战热情极高，许多热血青年请缨杀敌，报国疆场。另一方面，国民党军

队纷纷溃败南撤，散兵游勇很多，散落的枪支也很多。搞钱也不难，有利条件不少，可以同当时的政府一起筹款。因为，抗战开始后，阎锡山将山西全省划为七个行政区，晋东南地区主要属于第三、第五行政区，第三行政区主任是薄一波同志，第五行政区主任是戎子和同志。薄一波同志还担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又称新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还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沁县中心区负责人。戎子和同志是决死队第三纵队司令，牺盟会长治中心区负责人。此外，还有廖鲁言、周仲英、杨献珍、韩均、徐子荣等十多位同志在那里任政治委员。师首长采纳了我的建议，派我和师政治部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志坚，分别率领从部队中抽调一些骨干组成的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到沁县、武乡、沁源、襄垣、安泽、屯留、长治、平顺、陵川、高平、晋城等地，配合地方党开展工作，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和地方抗日民主政权，扩大部队。^[5]

抗战初期，八路军缩编，129 师只有 3 个团进入太行地区，势单力薄。而且当时整个山西省的中共党组织只有十几个党员。豫北的有些县连一个党支部都没有，后来成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 129 师司令部驻地的涉县甚至一个党员都没有。^[6]宋任穷所谈到的 129 师工

作团扩军建政，除了地方党的协助外，山西牺盟会和新军的支持变得特别重要。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牺盟会和新军的组成成员大多源自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社会，或京津高校，这些各路青年的状态是否配合从延安来的革命队伍 129 师？129 师及后来的北方局、太行区党委等如何在新的历史状况下重新打造革命形态，则是在考察建设太行根据地的历史实践经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四、牺盟会及其在山西政局中的结构性位置

牺盟会是抗战期间中共进入山西建设和发展根据地时特别倚重的一支政治力量，但牺盟会最初却是阎锡山一手推动发展的。

阎锡山主政山西 38 年（1911-1949），他在山西所面临的中国社会局面与国民党虽有不同，但主要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仍然有相同之处，不过他应对现实状况的整个方向和方式相当不同。

阎锡山留学日本时，对德日军国主义模式颇为寄予厚望。这其中有德日军国主义表现出的凝聚力、忠诚、道义、秩序感等等因素对阎的感召。主政山西后，他直接掌控和建设军队和军工事业，以立足于当时中国军阀割据的局势。同时又不取革命党直接召唤大众的方式，

而是强化传统社会运作的结构性因素，强调重用和转化士绅集团（他多年重用几个核心成员，赵戴文、梁化之、崔廷献、贾景德、杨兆泰、徐一清等，其中贾景德等都是山西世家大族）。山西军队建设的确颇有起色（后来晋绥军中傅作义、张荫梧等治军都颇有特色），但掌握军队本身却没有达到德日军国主义的效果（严格治军并不必然带来同样的社会效果，这与军队治理方式和社会状态等近现代中国特定历史状况有关），除了作为政治势力的支撑和各军阀间的抗衡力量外，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政治结果（尤其与中共的军队建设相比），反而成为一项负担颇重的支出，并逐渐与地方力量相谋和，使得后来山西社会变革更加困难（慕湘的《晋阳秋》《满山红》等小说对此有反映）。

在国民党的北伐经验中，阎锡山看到，工农力量被唤醒后，并没有自然汇入到革命精英所期待的政治社会组织轨道，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的运转被解体了，甚至不能维持。尤其是到 1930 年代，乡村动员之后难以掌控使得阎锡山更加退回到强化村庄秩序稳定，更加依赖村庄既定士绅组织。但贸易线路的改变（由于近代海上贸易的发展和俄国直接插手贸易，使得原本山西出内蒙的贸易线迅速衰落），大清灭亡对山西金融以及依赖金融的诸多行业造成的毁灭性冲击，发展军事的高额费用，各种赋税的增加，使得良绅的生存环境恶化，

要么家庭衰败退出秩序中心,要么蜕变为劣绅,基层秩序逐渐被劣绅、地痞把持。比如晋东南,租佃关系虽然不严重,但基层政权的运作形态仍然恶化(赵树理不少小说描写的正是这一状况)。阎锡山也看到,全国抗日形势日益紧张,山西除了自身的结构性困局,还面对日军、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夹攻威胁,大量难民、游民、知识青年的涌入,使得山西城乡的经济社会状况都在发生变化,需要更加具有现代意识和灵活能力的人才对山西所面临的局势做出突破性转换。依靠既有的士绅集团很难突破和翻转日益紧迫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情境。阎锡山开始大力推动各种团体组织,打算调动这部分力量,并与之合作。“中国青年救国会”“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等团体纷纷成立。对于这些文化领域,阎锡山提出“学术自由、真理战胜”。

阎锡山一面主张积极与抗日的进步人士以及和共产党有联系的人士和社会团体联络,一面又将他的几个御用团体“中国青年救国会”“建设救国社”“文山读书会”“民众监政会”“植社”,以及一些其他社会团体合并,于1936年4月统一组成了“自强救国同志会”,由他亲自领导,力图组织和团结各种社会“力量”。这种合作使得山西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全国抗日的模范省;另一方面可以转化和吸纳近现代中国民间社会中泛起的各种力量,比如据

李雪峰说,晋东南地区会门比较少,这就与阎锡山统治较严有关。^[7]但民间游离出来的组织力量弱,地方结构中的秩序运作则会更稳固,而战争所需的经济物资和民众政治参与就更加依赖地主乡绅。这就需要各团体高度切入地方秩序之中。它们若要获得现实活力,就更需要直接调动和改造地方秩序。可在实际的运作状况中,阎锡山的乡制并没有走国民党北伐时的动员之路,而是依赖和强化乡绅治理(村长候选人甚至必须有1-3千元资产),且这些团体本身的构成又是在这样一个既定社会状态中的再组合,他们在这一社会氛围和状态中发展出来的意识和能力并没有得到改造,也就不可能突破山西的社会结构困局,阎锡山所希望的应对新局势的目标也不可能通过这些团体来实现。比如后来牺盟会成员下乡村后,动员合理负担的结果,多是强行把负担落在地主富农头上,并大量改选村长,以为除恶就会扬善,对村庄实际的运作结构完全没有了解。实际上“衙门里的办事人”并没有变动,也缺乏相应的诸种对应和配合方法,只会激化乡村结构的矛盾,使得乡村日常运作更加混乱。如果这一结构关系不能突破,即便被组织起来,也很难发展出特别有突破性的能力回应和激活山西社会结构以应对当下碰到的问题。

阎锡山寄希望于“更有才华更有能力”的人。他看到了共产党在突破中国社会某些层

面困境的令人心生期待的进展，也对共产党员在实践中的突出能力抱有期望。他决定尝试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他在1936年8月20号左右，派郭挺一到北平去请太原师范学院毕业的薄一波回山西。他知道薄一波是共产党员，但他希望薄一波回来加强山西新派力量，成为新派领袖，改造刚由“自强救国同志会”转变而来的成分复杂的牺盟会。

经由中共中央同意后，薄一波与阎锡山的成功会谈，实则突破了中共多年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防御、退却的必要性等等）的束缚，实际上也是对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具体落实，并在山西取得巨大进展。阎锡山把牺盟会交给薄一波负责，在事实上就等于把山西当局的官办团体，一下子变成了由中共领导下的一个民族大联盟性质的统战组织。这对于中共在山西发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和为抗战开始后的建党、建军、建政都影响很大。这与国民党后来排斥学生，让学生回到课堂的无力也形成对照。阎锡山恰恰看到要吸收青年学生进入政治力量之中。这些学生和知识分子是中国现代的历史社会政治结构当中唯一现成的具有很强的政治冲动、具有高度的现代民族意识责任感、充满朝气的这样一个群体，因此对他们的吸收和

转换就对山西政治社会结构的推进和扭转变得非常重要。由阎锡山的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也首先在山西取得了合法地位，山西也成为当时除延安之外全国一切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向往的抗日救亡的中心。

中共在山西的抗日根据地，最初的确是在和山西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没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地打击旧派，那么，中共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就要大得多。不过，虽然有研究者提到薄一波主持的牺盟会在晋东南地区的活动对中共太行根据地的积极支持。^[9]但具体历史情境远远比这曲折复杂。

比如，抗战近4年之后，1941年4月28日，邓小平在《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的讲话提纲中谈到了抗战以来太行根据地建设中所面临的一些结构性困境。从邓小平的总结来看，根据地是以支持游击队与敌作战而存在和发展的。在这一前提下，129师才得以被允许从延安辗转进入山西太行发展。军队快速扩建的一个方式便是放手吸纳地方武装，但正规军吸纳地方武装后，军队的建设和作战必须得到地方党和政府的高度配合，才能获得充足的后方人员物资休养。这就要求地方党和政府的干部能够快速处理变化多端的战局要求，提供政治经济医疗卫生等多方面的支援。而地方政府要做到这一点，尤其是作为外来

的中共，就必须动员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高度配合作战。但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地方武装被正规军吸纳后，地方政府没能很好配合军队建设（为什么有大量牺盟会成员帮助的地方政府不能很好动员群众来配合军队？）；且被抽空兵力的地方又得不到军队的支持（军队作战领域往往是跨地域的，大于地方），地方政府对武装的再生产也就失去基本的积极性，阶梯性层次性的武装力量也就更是难以形成。一旦地方缺乏足够武装，难以抵挡敌人入侵，根据地就会缩小，群众对地方政府和八路军会失望，在经济上的支持力度也会随之下降，党政军民之间也很难形成信任和良好的配合，而缺乏根据地有力配合的军队即便在军事上有推进也难以持久停留。

太行根据地的各地区本应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团结合作，但由于难以突破结构性困境，反而容易首先考虑自保，从而导致各自为战，甚至各自为敌或与敌为友。比如经济方面，当时的报告称，政治活跃的晋中经济工作就相当糟糕。“晋中区没有贸易，市场完全是停止状态。”百团大战前，“在对内一方面说，各地互相调剂非常之差，过去甚至是互相统制，今天也还没有打开局面。因为内部的调剂不够，所以对敌统制也就困难，因为它无论如何要调剂，不能自己调剂，便和敌人调剂。所以，形成不断入超，资金外流，所以伪币就越伸越

远，深入内地，我们在经济上处于极端的劣势，实际上殖民地的经济状态。”

与晋察冀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几乎白手起家不同，太行根据地某种程度上说得到了牺盟会的呼应和配合。按理说，能够得到阎锡山想得而得不到的牺盟会的大力支持，中共自身在土地革命实践中又发展出丰富的革命经验，太行根据地应该能比阎锡山更好地转化和运作这批干部，也应该比同样只有3000人、且无人援助的晋察冀根据地建设得更快更好。那得到配合的太行根据地为何在抗战后近五年的时间里却陷入了结构性的困境？而晋察冀根据地却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就获得了“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中共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主席团致晋察冀边区电》，1938年10月5日）的称号？但是，实际上我们却又看到太行根据地最后建设得相当有成效。那这一结构性的困局是如何被突破的？太行根据地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牺盟会的干部去了哪里？中共遭遇了什么？

五、太行党委初建实践中碰到的结构性问题

如果我们进入太行根据地建设的历史实践过程，就能看到我们前文所谈到的中共与

牺盟会之间的种种不同意识、观念如何造成实践上的差异，并导致根据地在建设过程中的曲折低徊。

首先我们考察太行区党委的成员，他们相当特殊。

1936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李宝森来太原主持山西省工委的工作。牺盟会成立后，11月，张友清任省工委书记，李宝森改任副书记，李宝森和徐子荣专门做牺盟会和军政训练班地下党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太行区党委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李菁玉、李雪峰、徐子荣，之前全是白区工作者。这些白区工作者的经验中对于“群众”的理解，主要是工人、学生，很少或从来没有关于农民的经验，没有如何建立根据地的经验。在白区险恶的环境（且30年代的白区工作左倾严重）中，更没有如何在新的情况下开展统一战线的经验。

苏区与白区干部的经验差异颇大。刘少奇曾总结白区工作经验，他说，从大革命失败以后，经过了九年的反动时期，现在又有了新的民族革命浪潮，我们的党在白区保存下来的还有什么呢？我们不能不悲痛地回答：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以外，党的组织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一批中下级干部，而且这些组织和干部还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统治着。如果说在内战时期左倾机会

主义路线统治苏区和红军党的时间并不算很长，在遵义会议以后已经基本上纠正过来了的话，那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白区党组织的时间是很长的。比如广东地下党组织松弛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训练，入党、离异都很随便；中央的意旨难以贯彻到党组织的末梢，经济困窘，交通和情报传递迟缓，农民入党随意等等。虽然在“六大”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以及在四中全会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白区党组织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纠正过，但这种纠正是极不彻底的，特别是在思想体系及群众斗争策略、组织形式、斗争形式等方面，没有被彻底纠正过来。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组织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防御、退却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9]

在白区干部普遍长期工作在城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李雪峰所说的，我们初到太行时，省委的几位领导都不懂什么是根据地，更不懂怎样建立根据地。张浩带的师部到了平定时，刘少奇把从石家庄搬到平定的平汉线省委改为冀豫晋省委，要我们在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建立根据地。省委书记是李菁玉，李雪峰是组织部长，山西

省委派来的徐子荣是宣传部长。……周恩来和少奇让省委委托太行山建立根据地。我们省委几位领导都是长期在北方搞白区工作的，完全没有建立根据地的经验，感到无从下手。^[10]

无从下手的不只是区党委自身经验的问题。在阎锡山的统治下，中共在山西的发展一直受限，农村地区对共产党也非常隔膜。抗战前夕，华北地区很多农村中都曾将共产党称为“均产党”^[11]“混产党”^[12]。大量白区干部组成的太行区委要像土地革命时期那样打开农村局面，并非易事。比如如何对待农民的“流氓”，白区干部的第一反应也有意思。1937年10月，刘少奇曾起草过一份山西农会章程，等到这份章程交到时任牺盟会领导人之一、曾为白区党员的牛荫冠手中时，牛荫冠在该章程的原稿上添加了“防止流氓混入农会”。刘少奇问牛荫冠，你知道什么叫流氓？你这里说的流氓，是一种勇敢分子。农民运动在开始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要观望。就是勇敢分子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你不可把他们拦在外头啊。^[13]

太行区委面对的不仅是党员人数少，党组织影响力小，党员缺乏农村经验，而且，与牺盟会的合作一开始也遇到困难。

在中共内部、山西省委，对与牺盟会合作

的统一战线方针不理解、有分歧的，大有人在。李雪峰就谈到，“对阎锡山的联合，对薄一波领导的第三专署的工作，对牺盟会的活动，一些同志不能正确认识，囿于一隅的观点支配了这些同志，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注重防范和打击。”^[14]

比如晋中开辟根据地时，是中共和八路军开展工作最早的地区，也是129师在太原失守后进入太行山区最早开辟的根据地。晋中主要是指正太路以南、平辽公路以西、同蒲路以东。晋中工作开展得早，也开展得比较顺利，但也因此有自大倾向，同省委之间也发生矛盾。比较突出的是对统一战线的理解与贯彻上的偏差，特别是对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缺乏深入的理解，“左”倾关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已有表现。当时山西各县都有牺盟会组织，各县牺盟特派员大部分为共产党员。新军中的决死一纵队、决死三纵队在太行、太岳山活动。而党内一些人对戴阎锡山帽子开展抗日斗争的牺盟会、决死队不理解，有的甚至排斥。在晋中，这种不理解、排斥现象就较为严重。有人还把这种搞特殊形式统一战线叫做“一波路线”（薄一波路线）。

李雪峰1938年7月14日写了《对晋中工作检查总结报告大纲》，就指出晋中工作在统一战线没有深刻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左”倾关门主义已对工作造成不少损害，一些同志

对统一战线了解不够，有错误，政治及党的基本知识水平低下；党与群众工作不够深入与不够巩固；政权忽视下层与抗战建设；工作开展了，干部能力的提高则很慢，主观客观之间不能相适应。

而中共中央当时对统一战线的强调和解释有很强的隐忍性。比如1937年12月24日，毛泽东、肖劲光和谭政就在电报中谈到山西当时的统一战线问题，“为了达到扩大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与各统一战线的地方工作当局协商，群众工作的进行，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一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在统一战线内，立即停止募捐筹粮的行动，已经借用的仓库存粮，须即归还。没收汉奸财产及处理、捉汉奸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最好是交给他们处理。”^[15]

对统一战线的这种解释很容易被大多党员理解为与其他政治社会力量简单合作，甚至退让。可一旦统一战线被这样简单理解，在实际工作中若牺盟会本身无所作为，而地方党委又能够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即便是以粗暴的方式），那就会造成晋中特委否定统一战线这一工作方向的情况。

除了直接抵触，党内愿意合作的，也未必

就能相处甚欢。

就晋东南地区来说，牺盟会成员遍布各个领域和各个组织。比如辽县的共产党，最初就是以辽县第一中学的师生为基础。而辽县一中的许多师生以及当时的许多毕业生都加入了牺盟会和中国共产党。李修仁就是这一新的党组织的第一个宣传组织者，后来他成了中共辽西县委书记。他记得最初的新成员都被认为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立即就成为革命者，后来由于日本的入侵他们都变得更加激进。在辽县，中共一开始几乎只从牺盟会、妇女救国会和辽县教师联合会中吸纳党员，因此它最初的成员包括教师、学生和县城的青年妇女。第一次委员会只有4人参加，平均年龄只有22岁，他们或是刚毕业的学生，或是战争一爆发就回到辽县的在校生。这些最初被吸纳进来的一批党员成了中共地方组织的核心。他们决定了战争期间地方领导的作风。^[16]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大部分县长甚至都已由牺盟会特派员（都是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担任。大量吸纳阎锡山推动成立的牺盟会成员进入党组织，成了山西党委统一战线的显著特征。中共也由此从地下变为半地下。刘少奇1938年8月18日给朱瑞转省委的信里特别谈到了山西工作中统一战线的特殊形式问题。刘少奇指出，山西工作环境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我们在山西已经有

了自己的武装，参加了一些地方政府，参加了统一的救亡运动。中共在山西已经不是完全的在野党。^[17]

可中共在山西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合作中，这些进步人士或已被吸收为党员的牺盟会特派员也都有着特定而复杂的思想意识来源和由此所决定的工作方式。就其复杂的人员构成来说，比如，当时由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转化而来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的人员构成非常多样，组织成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也有一部分受共产党影响较深的进步人士，还有一部分是社会上的青红帮以及一些政治流氓、打手之类，还有一部分社会失业青年、妇女、工人。^[18]而且，牺盟会自1936年底就举办了特派员训练班、村政协助员训练班，主要都是从太原各学校中招收学员。这些在五四新文化系统中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在认知意识上普遍有脱中国脱现实化的问题。这使得他们并不能完全配合中共北方局的斗争构想（快速有效地介入地方社会结构），以达成一个中共所希望的抗战局面。而且当时牺盟会的口号偏左，不能完全适应山西的现实，也没有中共党组织的有力领导（当时只有个别党员的活动，还没有有组织的领导），工作无法得到很好的开展。

1936年底以后，虽然牺盟会也举办了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并派出大批村政协助员，深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建立牺盟组。但这些

村政协助员在介入阎锡山多年治理下的村庄的程度和方法却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他们首先要遭遇的仍然是阎锡山乡制中极为依赖的地主乡绅。通过山西本省“官办”组织牺盟会进入农村，的确会给太行区委的根据地建设带来便利，所以当时中共从迫切的形势出发，也愿意大量吸收牺盟会员；但引发的问题却是，这种便利在遭遇山西既定社会结构时，未必像当初想的那样便利。至少在1939年12月事变之前，地主乡绅维持的乡村秩序结构很难动摇，租佃矛盾、贫富矛盾、土匪恶霸等问题，虽然有，并不激化，日军也尚未到来，太行区委不可能像其他根据地那样直接以武力打掉地主乡绅。但中共和牺盟会又要开展工作，就容易出现粗暴或强行合理负担等等，激化了结构关系中的贫富矛盾。当时的报告中说，“富人上告事件不断发生。”

而且大量白区干部本身的工作方式也有问题。太行区组织部长赖若愚1943年的总结中谈到这一时期的工作状况，“政策混乱，到处拉夫，用落后口号号召，比如参加共产党不当兵，参加共产党不出负担不支差，参加共产党发口粮……在头几年动员工作中，从工作效果上看，往往很能完成动员任务，看起来很积极。但对于党与群众的关系，却给予严重的伤害，而且给党内遗留下一个恶劣的传统。”^[19]到处拉夫虽然在初期的确吸纳了不少

贫雇农党员，但当山西乡村社会的秩序结构仍然依靠地主乡绅，这些贫雇农即便成为党员，也不敢真正成为勇于检举揭发的积极分子。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太行区委与牺盟会的合作效果在工作上，在真正介入山西社会结构和当下迫切现实的能力和效果上，暂时也找不到突破口。而牺盟会强行介入乡村，不但没能调动乡村各阶层的活力，反而使得压力虽重但秩序尚稳的乡村冲突不断，运作失调，这也使得牺盟会本身在山西整个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开始变成了一种威胁和危险，并逐渐失去阎锡山的信任。

一旦合作并没能突破太行地区之前的社会结构，没能开展出相当有效的实践成就，反过来会扩大党内原本存在着的对牺盟会的裂痕，新的力量（牺盟会、统一战线）就更容易在太行区委的党内结构中被轻视，或被看做是对以往既有阶级论的实践方式的妨碍。但实际上，中共并不是要简单在阶级论和统一战线、既定党员与牺盟会员之间划出界限。中共自身在抗战新格局中也需要发展新方式应对新的复杂严峻局势，需要大量吸纳新的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山西牺盟会成员的构成和数量以及左翼倾向都正是中共力争的吸纳对象。而要吸纳牺盟会，就必须考虑牺盟会得以产生的历史结构关系和由这些关系所决定的思想意识状态，并考虑如何才能能在太行地区这

一特定的社会结构状况中有针对性地将之转化，而不能直接延续以往强调贫农雇农和工人的工作思想和工作方式。党员们必须重新认识和理解新的现实力量的结构状态，重新构造认识框架和意识结构，重新构造自我和吸纳青年的工作方式和途径。正是在这一点上，刘少奇严厉批评了中共晋中特委反对统一战线、反对“一波路线”的激进做法。

但实际上，在否定晋中特委的做法和重组晋中特委的过程中，太行区委自身却又并没有开展出一种在工作、思想上有突破性的方式，既能够不以之前的阶级论路线介入实践，同时又能将存在各种问题的牺盟会成员转化和吸纳到自己的工作方向和实践之内，从而将他们的政治爱国热情、责任感使命感等有效疏导到对当地紧迫社会状况的处理之中，在新的工作实践空间中打破“单纯联合”的统一战线认识。这导致抗战初期对晋中特委的批评和重组实际上变成了过于在政治上要求保持与阎锡山统一战线的稳定，这又反过来加剧了地方党内部认识和工作上的分歧和矛盾。

由于没能突破这一阶段统一战线与阶级论的对立，连带性的后果之一是，过于强调统一战线时，太行区委常常会以牺盟会的名义发展党组织，一起活动，在很多地方就造成了中共党组织与牺盟会之间界限不清晰，那

些以牺盟会的“合法”名义发展起来的党员对于中共党和组织的性质的认识就会相当模糊。与此相关的是，党与牺盟会关系不清晰，太行根据地政府中的县长不少则既是党员又是牺盟会成员；但在1940年中共与阎锡山分裂后，统一战线破裂，阶级论在新的局势下一度重新被肯定，那些有牺盟会背景同时又是党员的县长也连带遭到不信任。在党与政府、县委书记与县长的关系处理上，原本是想在治理层面调整党政关系问题，也被裹挟在历史结构的扭结之中，党/政关系被嫁接在阶级论/统一战线的关系之上，政府更加不被信任。比如，虽然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党不得干涉行政），但思想意识的分歧使得实践上政府和县长（多为牺盟会员）在不少地方不再被信任，县委直接过问一切。（区党委组织部长徐子荣曾说，有的县委书记办公室门口甚至挂牌，上写着“我管村长”。）而那些清洗成份之后的县及其区、村，则更容易出现引发党政一体化的结构。

另一个连带性后果是，由于与阎锡山分裂，1940年初太行根据地党委进行了整风运动和党员重新登记。到1940年8月百团大战前夕，根据地党员减少了1万人左右。而新吸纳的党员，则开始要求以阶级论标准从产业工人和贫雇农中发展，对乡村士绅、富农、中农、知识分子则相当严厉。由于没有打破统一战线

与阶级论的拉锯战，在太行地区，工作方式和组织考虑开始偏向阶级论和工农。但太行区委寄予厚望的产业工人和贫雇农干部并不一定具备政治热情和民族救亡责任感，而且大多基层农村干部并不愿意离开家乡到别的村工作，或独自在其他县、区工作。在1942年的一次党支部建设会议上，组织部长徐子荣就说，“和顺县干部一半都跑了，元氏县干部空缺一直在补充，但是无济于事，许多当地干部离职回家了。”

可见，中共进入晋东南与牺盟会接触和融合的这一过程在初始阶段并不顺利，甚至是抵牾的。中共进入晋东南开辟太行根据地时与牺盟会的糅合与接洽，并不是一个无障碍的承接过程，这与晋察冀根据地的经验非常不同。

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实践所召唤出来的革命者已然形成一套辨认敌我、现实关系和构建革命者自我的认知和意识结构，白区干部在险恶环境中的左倾工作方式更与根据地建设的需要相隔，但如今要面对更紧迫、更复杂的现实状况，这对革命者应对现状的组织能力领悟能力提出了更高更灵活的要求。历史的突然转向和加速，需要中共更加高效的吸纳精英分子。可从既定的敌对状态突然转换为这样退让与妥协，需要重建敌我关系、国内局势的认识，这并不是任何一个干部都能够顺利自我说服和自我重构，并能在工作中顺

畅沟通。一旦发生理解和认知障碍，工作的深入程度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在压力之下使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同时，那些新加入革命队伍中的牺盟会积极分子，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转化自己以更配合中共需要。当这些状况配合不够，工作的积极热情和深入程度往往就会松懈。

白区干部是否能重构自我，开展并扩大根据地建设，牺盟会是否能成为中共开展革命工作的积极因素，都还不清楚。在某些条件下，牺盟会甚至会转化为革命需要克服的障碍。太行区党委在建设根据地时，在应对太行地区错综复杂的新的历史情境时，必须对中国革命重新形式化和结构化，必须重新构造革命者的成员和内在意识结构，以创造性的突破历史既定格局。

六、太行根据地实践的调整

党委对建设根据地的陌生，党员对统一战线的分歧，牺盟会成员的各种状态，再加上抗战初期局势瞬息万变，使得整个工作都很难有突破性进展。

在1939年3月，李雪峰在《17个月以来的晋冀豫区委工作——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3月晋冀豫全区工作发展概况及基本总结》报告中说到了抗战以来太行根据地多方面的问题：

在1938年春节辽县活动分子会议前，省委刚刚组建，工作上还不懂得怎样创造抗日根据地，不懂得建立基点的作用，存在着把工作重点放在接敌区域，便于敌进我退时能够趁乱“抓一把在手”的被动观念。

工作没有紧贴地方社会结构的重心，只图一时之利“抓一把”，层出不穷的问题对应着当时太行区党委在根据地建设中的茫无头绪和混乱。尤其是李雪峰所强调的，群众运动没有发动起来。不过实际上不能简单说群众运动没有发展起来，抗战初期，庞大的牺盟会曾在各地宣传组织群众抗日。但这种群众运动往往只是单纯和孤立的，并没有触及群众的经济社会生活，也没有设计一旦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如何引导，所以群众运动也往往流于短暂，看似热情似火，大刀阔斧，但不能扎根。“以前只是动员群众，要求群众，利用群众，没有深入群众，站在群众里边。一旦没有发动群众，合作社也会变成垄断和剥削。”

没能真正发动群众，也并不是由于缺少足够党员。恰恰相反，抗战后党员人数急剧扩大，当时的统计数据中表明，省委成立时，直接依靠的共产党员仅有30多人。1938年6月，晋冀豫区的党员已发展到8600多人。1938年年底，党员超过了2万。1939年9月，登记党员人数有30150。两个月后，太行全区党员已达到36111名。正是党员的快速发展，引发了

新的问题。当初发展时只图加多党员的数目，没有从群众斗争中去发现积极分子，个别吸收入党。

129师初到太行时势单力薄，而此时党员已经大量增加，工作推进却难见成效。无论是中央，还是太行区，都意识到这时建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必须是整党。在1938年9-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面对各根据地党员快速增长，中共中央就提出发展党的原则应该是：在工作的开展中去发展党，在斗争中去发展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一个时期的清理、整顿与巩固，然后再发展。所以在1940年4月的黎城会议前，中央根据掌握的各地情况和太行区根据本区实际情况，都提出了整党要求。

整党之后，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在党员中的比重大幅下降，贫农大幅上升，中农的比重仍然很大。个中缘由当然有与阎锡山决裂后对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牺盟会成员的警惕，不过整党所依据的党中央指示也助长了成份上对工农的强调。党中央的整党指示是以王明的意见占主导，六届六中全会的整党原则也强化了党员中的工农成份，弱化了统一战线。“要保证全党内工人、雇农、手工业者、劳动农民占优势。”这显然弱化了1936年瓦窑堡会议中毛泽东所强调的注重统一战线的思想，尤其看不到毛泽东、肖劲光、谭政等人在1937年12月电报中讲的在统一战线中甚至要退让

的原则。

不过要注意的是，中共一方面要反顽，另一方面却又在1940年3月向各根据地下达指示，要求在各地实行“三三制”政权（杨尚昆在黎城会议上详细解释了三三制，并明确提出“绝不可以拒绝进步士绅、名流、学者中间力量参加”根据地政权），扩大根据地的政治基础。这实际上是要剥离阎锡山与地方社会秩序的实权者地主乡绅，反对阎锡山，团结地方地主乡绅。外部对阎锡山强势，内部反而对地主等更妥协。党员中扩大了中农、贫雇农成份，而实际的政治政策却又要加强与地主乡绅的统一战线。这其实就对中农、贫雇农党员的应对和处理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党员结构调整前后都占重要比例的中农，由于有一定文化程度（党组织上下级之间散发、阅读文件非常需要这种中农），之前一直被重用（中农在这一意义上被重用，本身就是问题）。可他们之前是在工作功能上重要，从而上升到此时结构中的重要位置，他们的认识、意识并不直接配合中共希望的更加具有积极性的展开工作。如果得不到支部和上级机关的调动和转化，他们的工作态度、方式和方向会被他们身处的现实权力关系裹挟着走。

比如在太行区的现实结构中，中农在抗战初期的合理负担中一直占优势。当时太行区合理负担面一般只占全村户口的30%（晋察

冀根据地一般比例为50%)，甚至更少。^[20]如黎城县一个100多户的村子中，出公粮的只有4户；辽县桐峪的几户地主，负担了全村公粮总数的66%；榆社县东清秀的一户地主的负担，占全家收入的130%；没有地主的村子，富农就会成为主要的负担者。而中农贫雇农在这种运动中就会表现活跃。一旦到1940年转变时期，为了团结地主富农，负担面扩大，群众运动不能过激，而教育动员工作不深入，加上政策上的唯成分论，那些中农（新上升的中农同样会由于负担面落到自己身上而叫苦，不关心贫农困难，不热心减租）占优势的支部执行政策时要么变得消极，要么就会在既定结构里“只利近亲”，而不会考虑突破利益关系，重构乡村秩序结构，并在这一重构中建立党与群众的紧密联系。

负担面的扩大伤及到中农利益，贫雇农的利益同样被触动。而劣化了的地主乡绅趁势抬头。强调联合，弱化斗争。这使得群众运动反而在黎城会议后停顿了。支部得不到上级的支持，也变得消沉。这种状态下的支部要运作三三制，结果可想而知。各地各种消极对待或应付的方式层出不穷。

如果工农党员能够经过培养而转化为得力干部，也可以缓解这一问题。但情况并非如此。工农党员缺乏责任感、政治热情所连带的问题是，根据地面临的各种局面都难以

在这种调整中有突破性进展；再加上干部对于现实状况缺乏深入理解和把握，也就很难抓住历史变动中的各种时机，引导或化解困局。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等等都谈不上。1940年初，晋冀豫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变。1939年7月，日军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打通了纵贯晋东南的白晋公路（祁县白圭到晋城），开始修筑白晋铁路，在沿途驻重兵，把晋东南分割成东西两部分。同时，日军占领了邯长公路（邯郸到长治），太行区又被分割为太北、太南两部分。这样，晋冀豫区实际被日军以“十”字分为4部分：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的太北区；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南的太南区；白晋路以西、中条山以北的太岳区；中条山及以南的晋豫区。总的来说，1939-1942年间，日本多次围剿和扫荡之后，敌占区扩大，根据地缩小。结果，根据地变成游击区和敌占区的群众却从“一面负担”变成了“两面负担”。要同时承担中共党政军和日伪政权的给养。而且，太行根据地70%都是山地，30%是平原，而70%人口却在平原。相应，财政收入的70%都依赖于敌占区。如果不争夺敌占区，根据地本身也很难维持。

八路军为了打破日本铁笼战略，发动百团大战，打通各根据地。但百团大战对根据地消耗极大，尤其是后期。我们可以举弹药消耗为例。刘伯承曾说到百团大战一些补充部

队的弹药消耗，“一般说来，我们要求射击准确，刺杀熟练，投弹命中，但都没有达到要求，而有相当落后的距离。如某部队是很有战绩的，但是这次射击成绩的统计是，花费了190多颗子弹，才打倒一个敌人，其他也可想见了。”陆定一也回忆说：“百团大战，我亲身经历。军队十分疲劳，损失大，老百姓很苦，对我军不满。”而且，百团大战规模太大，各地的游击队几乎全部补充进正规军，而正规军要集中整训，行踪不定，日军趁虚而入，大量增设据点，根据地急剧缩小，党政机关与群众失去联系，群众畏敌情绪严重，对根据地悲观失望。留守干部的工作更加难以展开。

太行区当然也试图收复失地。邓小平后来对这一时期的工作总结说：过去，我们某些部门也曾做了一些尝试，个别的是收到效果的，但大多数是失败的。我们曾抽调一部分干部派到敌占区，企图打入伪军伪组织中去，但因为派出的干部多与当地的工作对象缺乏一定的联系，始终得不出一个结果来。我们一般不善于从广大的敌占区或伪军伪组织内部去物色打入人才，不善于争取敌占区的知识分子、开明进步人士去实现打入工作，不善于争取伪军伪组织内部的两面派成为革命两面派，变为我们的打入干部，不了解只有他们才与敌占区或伪军伪组织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有他们才具备打入工作的现实条件。……反观国民党，

从抗战开始，它就着眼于在敌占区积蓄力量，着眼于战后优势，努力争取伪军伪组织，派人打入、长期埋伏，在敌占区建立它的党和特务组织，依靠封建势力为基础，以掌握各种封建组织乃至帮会、土匪，其成绩是不可轻视的。我们对此，能不警惕！^[21]

之所以要不断援引中共各级干部的总结，是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些各级干部面对现实状况的整理和总结中，看他们是如何快速整理和把握现实，又是如何在通过他们这种对现实意识和把握，怎么来构想新的实践和调整方案。那在这个构想实践的过程当中，他要把握现实中对太行根据地建设有利的那些可能性，并克服现实中给革命造成的不利与挑战，构造新的革命方式。

邓小平的报告侧重于敌占区的工作。但我们可以看到，敌占区工作的难以展开，是根据地工作陷于困局的延伸，敌占区的有些工作方式问题，甚至是当年白区工作方式的延续。就敌占区工作而言，缺乏得力干部，也就没有组织工作，就不能在敌占区、伪军伪组织的内部去积蓄力量，去起发酵作用，去打下中共的组织基础。过去，中共曾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上，中共不但远远不及国民党做的努力，严格说来，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从邓小平的报告里看来是这样）。

原本在实践上就难以取得突破的根据地

建设，现在是雪上加霜。黎城会议虽然结束了与阎锡山的纠缠，但会议本身并没有解决太行区委由上自下面临的种种难题。邓小平的总结谈到了1940年4月黎城会议对结束太行区自抗战以来的混乱，和它没有处理的问题。黎城会议“克服了混乱，强调了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方针，有其明显的成绩，基本上是成功的、正确的。但在部分问题上亦有其片面性的缺点和错误，如对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及敌占区工作重视不够，对游击战争的分量估计不够，过分强调了正规军，编并地方武装，结果更便利了敌人的前进和造成了我们的退却。”^[22]但认识到问题方向是一回事，具体实践上，怎样才能突破呢？

针对太行根据地建设的这些情况，其实早在1939年春，太行区委就提出要“深入工作”，要求各级领导把大刀阔斧与点滴作风结合起来。但到1940年春，工作仍没有深入，潦草从事，匆忙急躁，只图迅速，一味行政命令等恶习仍普遍存在。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提出，点滴作风，是深入工作、巩固组织的基本做法，是有计划、经常、具体、切实，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是自下而上、脚踏实地、最富于组织性、富于事业精神的作风。点滴作风关键在于干部能够具体领导。具体就在于明确，在于恰当——恰如其时、恰如其地、恰如其分，一切决定于条件、地点和时间。不同对象、不同地点、

不同时机与不同的工作方法和方式，这就是具体。具体领导，包括具体分析、具体办法、具体兑现、深入动员、恰当方式、严格检查、及时帮助。工作中，对每一个工作地区，每一件事，每一个问题，都要求考察各个不同特点，给以不同解决。

李雪峰试图推进陷入低徊停滞状况的根据地建设，极力强调“具体”化，希望进入一种与现实更深纠缠的缠斗状态，以此重新构造工作实践方式，突破之前越游离于地方社会状况便越受挫的根据地建设状态。李雪峰的这一构想原本是针对党员空泛的政治热情，缺乏具体介入现实状况政治能力，以求突破（作为白区干部的李雪峰为何能逐渐具有如此既有现实感又有方向性的穿透性洞察？）。但怎样才算具体呢？如此强调具体、具体、不同、不同，会不会反而造成各级党员的无所适从和混乱？

七、深入，再深入

李雪峰所提出的“深入”“具体”，是针对党员在推进群众工作时的不够重视，浮泛和低效率。如何理解邓小平和李雪峰所说的群众工作重视不够？实际上，从129师进入太行，以及牺盟会创建后的主要工作来说，都是在大力动员群众抗日。那邓李所说的“重视不够”指的是什么？

我们在1939年3月16日晋冀豫区民运部向区委提交的《晋冀豫区群运工作总结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民运部认为，“根据地群众运动的发展还没有做到普遍、统一、平衡和深入，群众工作方法方式一般化，对本区的历史传统和地区性特点估计不足，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做得不够，群众团体有些官办性，从群众斗争中培养群众领袖与地方干部不够。（着重号由本文作者加）”

民运部所指的“对本区的历史传统和地区性特点估计不足”，其实恰恰是牺盟会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及缺少根据地建设经验的白区干部在认知层面的结构性缺陷。革命的推进需要大量有责任感、有朝气的干部，但所需干部却恰恰是脱中国化脱现实化的。彭德怀1945年在七大会议上发言时也回顾说，各解放区建设党的任务，实质上是在农村中建设党的问题，因为广大的党员群众都是农民，而这种农村环境又有别于和平时期，今天的农村是战争中的农村，有敌人的封锁分割，战斗频繁，情况复杂，变化无常。因此，党的工作（其他工作也如此）就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去灵活领导，把和平时期地下党在城市中的一套办法，机械搬运到战时的农村，自然在许多方面是错误的（如过分强调集体领导和科学分工）。^[23]

这种结构性缺陷导致在实践上无法真正触及社会基体。比如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到

1940年10月百团大战结束为止，很多地方就仍然局限于县政权。“县区组织整顿基本上完成，……村基本上没有做（政权建设）”。至于村政权，赖若愚说，“只有和顺做了一些，还不充实，其他地方未做。”他说：“今后的政权建设的重心，必须是村政建设。”^[24]

即便是县政权，其改造的程度也非常有限。虽然中共关于改造旧政权的口号提得很早，1937年7、8月间牺盟会特派员和决死队到达各县和各战略要地之后，就开始抓了，但這些干部“在一些地区做得并不怎么彻底，有些县、区，至多只注意到了县、区长以及其他主要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更换和改造，而对其他方面的不稳分子和一些具体办事人，几乎大都没有更动，绝大多数部门的具体办事人，大多数仍然还是那些吃衙门饭的人。”^[25]到1938年底，县一级政权基本上掌握在中共抗日积极分子手中，而区、村两级政权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重建和改造。日本进攻太行区时，大部分地主豪绅和农民可以一起支援抗日；可打退敌人进攻后，把持区、村政权的地主豪绅照旧盘剥农民。^[26]

如果对地方社会的运作结构只触及到县，而对县以下的社会基体没有认识，对其运作机制中的人员仍保留“吃衙门饭的人”，其实也就在认识结构上缺乏对地方社会内在构造的盲点。所有的群众动员和社会改造其实也

没有落到现实社会结构的实处，也会被地方社会实际的结构运作所架空。

缺乏对本区历史传统和地区性特点的深入了解，也就难以深入太行地区社会结构的内在构成脉络和运作机制，同时也就难以真正紧贴地区社会在历史进程中此刻的特定政治经济结构，创造性地发展出有效方式方法，既能调动群众的民族情感又能使得这种情感是从他们的生活状态中自然勃发的。只有发展出这种动员，群众运动才可能是深入且持久的，才可能打破官办化群众运动，才能“从群众斗争中发现、培养群众领袖和地方干部”。这些领袖和干部也才可能是从自己生活结构中自然被提拔，而不是依托于某种情势下的突击化政治事件。

如果如民运部所说，群众团体有些官办性，从群众斗争中培养群众领袖与地方干部不够。那大量吸纳当地干部是否能解决问题？

但正如赖若愚 1943 年的总结中所述，“当时对成份问题抓得很紧（这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最日常的问题），而对于政策上、作风上的问题，却没有在党内彻底展开讨论、斗争，从思想上彻底的清除，联系实际情况，进行长期的思想教育，致使很多地方把成份问题孤立起来，形成单纯的清洗（当然当时许多地方没有开展群众运动，也是原因之一，这是去年支部研究会已经总结了的）。所以 1940 年转变之

后，产生大批支部消沉了，大批党员被收买，大批干部依然脱离群众，各种政策都遭受严重的抵抗，因为思想没有打通，新的积极分子并未生长。”^[27]前文所分析的中农问题即是如此。

直接重组党员构成，并不能解决思想意识问题。由于强行切割党员构成，反而使得整个结构运作中的政治干预过强，各支部的实践活力并没有被调动起来，而新的积极分子也无从产生。

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和陕甘宁边区的建设经验，以及各根据地的建设经验的交流和推广，应该对李雪峰等人颇有启发。如何才能改造干部，使得干部既具备敏锐的现实感介入现实深入群众，同时又不过分挫伤群众自身的积极性、调动群众？要深入群众。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对此经验都有颇多整理和总结。1934 年 1 月 27 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结论报告中说，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

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28]

李雪峰之前所说的这一工作方式，尤其针对根据地开辟时期牺盟会的众多“工作团”“工作队”大而空泛的工作方式，力图以“深入”批判和改造“空谈”。1940年7月，李雪峰在《论深入群众和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中，再次强调，“深入”要“依靠群众”，这意味着要深入群众，进行下层工作，从群众里面展开工作，检查、批评与改造过去开辟时期的工作团、工作队的工作方式。工作队本身可以存在，但工作方式要改。不能只有群众运动，没有群众组织，看不见群众自己的斗争力量。身在农村，心在县城。机关主义作风必须要改。要了解群众的困难和要求。

但问题是，下基层就能解决问题吗？按照这样的整理和思考推进的实践，虽然群众运动搞起来了，但这种群众运动，是不是群众自己的组织力量？比如农会组织起来后，它的号召虽然有力量，但农会本身的组织工作并不强。许多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也看不见群众自己的斗争力量。党的有些地方干部，下去之后，仍然依赖政权的行政力量，或一味依赖枪杆子的武装力量，但不真正相信群众。党的组织工作要么站在群众外面空喊、操纵、抑制，或者就发动起来后控制不住，领导不了，甚至被群众运动本身裹挟，随之浮沉，进而群众运动也容易被破坏分子、流氓地痞操纵利用。

以前为了“深入”，太行区委也提过不能空泛提干部要下到农村。要集中力量，建设模范基点，要实际深入，要从一点一滴做。但当干部没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地方社会的政治文化、物资贸易、地理交通等等具体历史条件之前，这些思想认识上的“深入”其实也无从下手。比如，徐子荣就说，很多地方干部把创造工作“基点”，理解为“深入”山沟，放弃了大村镇和交通要道。对整个根据地性质、形态，以及对于如何领导地方政权的偏差，导致对创建模范基点的理解也有偏差。比如有的干部只集中在基点上，不管或放弃了小村工作，全部集中到一起，也不分头接近群众、了解群众。

一旦不知道怎样有效介入农民的生活结构之中，干部自己在处理事务时的状态，不自觉就会沿袭当时官场上的方式，比如自己端坐办公室，却在农忙的时候强迫群众晚上到民革室。当干部自己跟群众不熟悉时，他的讲话方式和内容也容易以“摆官架子”的方式进行，而群众对此也会相应的反弹，产生反感。干部的眼中也只会看到构成了“势力范围”的群众（比如一些“积极分子”，最积极的地主等），而看不到那些没有组织的“落后”群众（比如很多在革命一开始时采取观望态度的大量农民），并且也不会去通过辛苦的了解、认识、熟悉、团结这些无组织的群众。一旦这些群

众并不真正配合革命，革命即便能在一定条件和一定程度上运转（比如借助于抗战的特殊历史情境），但它自身也很难维持（比如当抗战形势不断变化，运转就出现困难）。

1940年4月15日，徐子荣为了纠偏，在《整党与建党是目前的严重任务》一文中再次强调，基点要建在大村镇。他说，基点与非基点（大村与小村）之间，一般都有一种自然关系，由于大村镇一般是周围小村的政治经济中心，自然有很大的影响与联系。选大村作为基点，是从政治组织上加强它的影响与联系，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到，与抗战初期太行区党委白区干部完全缺乏根据地建设经验相比，在徐子荣此时的观察中，太行区委核心领导对当地社会结构内在构成的把握已经非常具有突破性。这不是空泛的“具体”，而是结构性的“具体”，这个结构性的具体又紧贴着太行地区的历史构成的内在性，而不是散乱混杂的具体和差异。

太行区委所把握到的还不止于此。在当时的文件中，他们要求那些一般在乡村或在基点村工作，脱离生产、不能参加到生产中去的干部必须更加注意多与群众接近，多个别谈话，研究群众习惯，农民生活空间，了解其生活要求，寻找问题所在，研究农村土地关系、阶级关系，以至各种封建关系——姓、族、户下、亲友、习惯等人事关系。

1941年2月15日，区党委作出《关于加强群众工作的决定》，决定成立区党委直接领导的群众工作委员会，李雪峰任该委员会的书记，直接领导群众工作。决定规定，要研究减租减息，研究农民与地主的关系，研究雇工与雇主的关系，研究改善雇工生活问题以及青年、妇女、生产、武装等问题。此后，李雪峰等又组织农救会干部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和进行减租减息的实验。对于派下去参加调查的干部如农救总会主任池必卿，以及陈大东、左奎元、王梦周、任瑞廷、王仪亭等，李雪峰召集他们开会，要他们下去调查农村阶级关系、剥削关系、租佃关系、债务关系、减租减息实行中的问题等等。1941年3月24日，晋冀豫区党委的《关于调查研究工作指示》中所列的问题包括：土地问题；各地区负担能力；生产贸易与金融问题；人民思想进步面及落后面；各种帮、会、道、教及友党问题；敌人政策、敌占区的社会变化、婚姻、劳动、优抗；三三制与宗派主义；根据地的历史变化与市镇问题。

再加上这个阶段，筹备成立边区政府和进行村选、选举临参会参议员的工作刚刚开始。调查的干部们结合村选，接触了很多农民群众，了解到许多根据地干部过去不了解或不太了解的问题。例如，李雪峰他们也发现，减租减息发动时比较困难，农民一方面想减租减息，

另一方面又不愿积极参加。调查干部在调查中发现，关键问题是永佃权没有解决。一些开展过减租减息的地方，地主采取收回佃农土地，转租给别人或交给亲友耕种，或自耕，或典出，甚至卖掉土地。把佃农租佃的土地收回，使佃农无地可种，给农民造成很大压力和威胁。减息后债主不向外借钱，贫苦农民告贷无门，急用钱时无处可借。

太行区委有了自己的摸索之后，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4日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太行区委再结合自己的经验对照检查校正，“触动很大”。李雪峰说，经过反复“扫荡”“反扫荡”之后，区党委开始学习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并听取农救会和实验县关于减租减息和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结合太行区的实际，学习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对我们触动很大。他作为区党委书记，经过学习对照检查，确实感到自抗战以来，虽然一直讲减租减息，讲教育发动农民，但是并没有深刻了解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和教育发动农民的深刻意义。

区委虽然认识深刻，大力号召，可1941-1942年正是日军扫荡力度最大的时期，根据地内部几乎各自为政，力求自保，区委的号召在各县实际上难以执行，或借口形势紧迫而拒不执行。根据地整体建设的推进仍然缓慢。

即便到1941年秋冬，太行区的减租减息宣传有一定规模，可区党委对减租减息问题的认识还比较低，没有把这项工作作为区党委直接抓的大事要事，还停留在主要依靠农会去做的阶段，各县则更加不会重视。

刘少奇的出现大力推动了太行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他1942年9月从华中回延安，路过山西，严厉批评了太行地区的双减运动，“再不发动群众（搞减租），我们就死无立锥之地”。^[29]北方局的邓小平等也力促太行区赶紧行动，减租减息运动才在1942年后开始在太行根据地全面展开。太行根据地把辽县作为重点调查基地。在调查过程中，根据地干部才逐渐区分了各农村中大地主的不同类型，并由此将辽县村庄分为三类：由商业地主统治、由当地世袭地主统治、由外来地主统治。由商业地主统治的村庄距离交通主干道比较近，在20年代，一些金融企业曾在这类地方出资栽种经济作物。这些受到商业化影响的村庄就是减租减息运动的主要目标，因为这里的阶级冲突尤为激烈。而在那些由当地地主统治的村庄，发动农民参加减租减息就不容易。而据说受到外来地主统治的村庄，发动减租减息则容易得多。^[30]对于这些“具体”的“不同”情况，太行根据地的各级政府，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重视。对地方社会的大量调查使得太行干部的意识结构发生巨大改变，对革命对象的

内部构造有了重新认识。太行区委干部在意识认知层面不断调整和扩大自己与外界的结构关系,同时也就是逐渐拓展了自己的内在自我。现在,他们必须在一个结构性的具体情境(而非空泛抽象的情境)当中磨炼和学习,慢慢地发展出足以贯通各种情境的灵活应对能力。这些结构性认识不一定在每时每刻都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有直接帮助,但对于他们构想新的革命实践,理解太行、理解山西、理解中国社会构造的具体性和复杂性,无疑不可估量。但这些意识、感觉、经验的摸索和形成过程,重建现实感对于重构革命形式的关键性,在后来的整理中,却基本上看不到。

就“减租减息”的政治意义,晋冀豫党委当时有如下认识:“减租减息是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党的基本政策之一。可是我们过去对这一点是认识不够的,不知道减租减息牵连到复杂的农村习惯的统治关系与土地关系,会引起阶级关系的转动。因此,常常只企图‘运动’一下,或‘挨门挨户’‘调查’。……今天我们还必须肯定,减租减息做得好,就等于农会工作做好了一半。”^[31]“减租减息”运动在太行根据地领导者的历史叙述中也获得了高度认可。赖若愚在1944年8月关于《太行区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中,多次把“减租减息”看作是太行区生产运动的第一次革命(第二次是“组织起来”)。^[32]李

雪峰也同样把“减租减息”看作是太行区生产运动的一个重要节点,^[33]并认为凡是没经历过减租减息的地区,在1942、1943年的生产自救中的组织工作就要困难得多。

从重构干部的认知结构这一点来说,李雪峰、徐子荣他们把握到的,其实是中国地方社会自身的构成、运作在特定历史时刻所具有的一些结构性要素,而这些结构性要素在漫长历史变迁之中受各种力量的冲击碰撞会不断调适、变形,在适当的经济、政治、伦理、组织因素的配合下,它能达到高度良好状态。但一旦某些因素发生变化,就会牵连出结构性失衡,从而在每个阶段都会逐渐形成一些结构性困境,构成每个时代的人们所面对的不一样的现实。比如抗战时期的山西,就既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山西,也不同于阎锡山治理之前的山西。这是一个经过近现代巨变、经过阎锡山几十年治理之后的山西。太行地区群众是在这样特定的现实中不断形成特定的人际关系、主体意识、情感结构、认识方式。那太行区委对这些现实状况作出知识构架上的准确整理,才会对当地的社会结构状况准确把握,他们对当地现实的这些整理状况,又会影响到他们推动根据地建设这一历史实践行为的着力点、方向、程度轻重、进度缓急等方面(与抗战初期的白区干部身份相比,此刻的他们变化是多么巨大)。

认知结构虽然有了突破性进展，但问题仍然存在。

李雪峰一直强调要“进一步依靠群众”。“依靠群众”是中共的长期政治思路和方针，但如何有效依靠，在太行根据地则一直没有获得思想和实践层面的突破。之前干部对依靠群众的理解，往往是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农村中去，但去了之后的具体实践活动，却大多变成站在群众外面空谈，宣传口号。行政上也往往流于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我们看到，太行区委对群众工作的推进其实一直难以有突破性进展。这种到群众中去的实践并没有穿透整个中国现实社会结构状况和关系，既无法在实践上进入农村社会结构关系的细微脉络，也无法在干部的认识意识上对干群关系获得突破性的经验和理解。

李雪峰提出，要研究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研究在群众里面进行工作的方式方法。他强调，干部要尽量不脱离生产，参加生产，强调“只有在生产中才更容易了解群众和使群众了解自己，才能了解群众的各方面，创造群众化的工作方式和群众打成一片，便于在群众中提高群众领到群众”。“工作的转变首先决定于干部的转变，决定于干部意识的转变”。“到村乡去，到生产中去，从群众最多的地方，从最易与群众接触打成一片的地方去深入群众”。“从群众里面，自下而上地艰苦工作，创造新

的工作方法方式，这才能真正深入工作，才能发挥基点作用，才能取得深厚的群众基础，才能使群众动起来。”

这直接针对的是农村支部干部的工作方式。作为神经末梢的支部，如果自身没能获得具体的实践经验，往往就会根据上级提供的工作模式，推演到自己工作的村庄。

1942年4月，李雪峰在《过去农民斗争几个主要经验教训》中就再次指出“深入”问题，第一，在“深入工作”方面，大多数干部对深入工作的基本特征与要求——发动农民土地斗争，削弱封建势力认识不深。缺乏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实际的组织工作。比如农会，4年前就提出，这是最基本的、首要的群众工作，但至今仍无大进展。第二，在指导上机械运用“先进区推动落后区”这一规律，把工作局限在先进地区与停留在基点上，把基点上的先进经验没有具体运用到落后山庄，没有根据落后地区的具体条件及干部自身的经验，有机的吸收先进地区的经验，而是生硬直接的推动落后地区。

我们看到，虽然区委干部已经在对地方社会结构的认知意识上有了突破性进展，可整个根据地的革命实践还很难说获得了突破，党员成份内部构成的重组并没有获得之前所预想的实践效果。即便有了实验县、有了基点，在某些局部形成先进区、找到突破，但

大多数干部的意识结构仍然没能破除依赖某种经验模式的工作方式，无法“根据落后地区的具体条件及干部自身的经验”来推进工作，无法应对和调节不同历史状况下不断发展与转化的各种现实。任何试图利用基点经验从杂乱的变动世界中萃取出固定的存有，以及不同存有之间的恒常关连，以形成清晰的概念来把握和推演其他现实的方式，都无法真正将根据地建设拓展并扎根于地方社会的内在脉络之中。

八、支部如何发动群众

1943年，后来的太行区委宣传部长彭涛在报告中谈到，在没有发动群众之前，太行区即建立了官办式的群众组织，在群众初步发动时，就建立了庞大的党，把所有积极分子（不是阶级觉悟的分子），都吸收进了党，根本忽视群众组织。这样就使得党降低了自己的水平，成为群众团体，群众团体则由官办到党办，根本无独立性。后来实施三三制，则成为凑数，成为党员拉拢中间势力。这样就使得各个组织的性质模糊起来了。党不能成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在不健全的阶级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群众团体农会不能成为劳苦农民的阶级组织，三三制政权，不能成为各阶级联合的组织。^[34]

群众工作没有有效展开，首要问题在干部，但干部问题并不能单纯靠整顿干部本身来解决。干部的工作状态、能力必须通过突破现实状况，有创造性地在应对现实问题中开辟新的实践空间，在应对现实困境中来分析、培养、理解和解决。这一时期的太行区委已经对干部与现实的关系有了切实的体验和经验。1945年3月，中共太南地委组织部部长王谦在平顺县区扩大干部会议上讲到太行根据地平顺县的党支部建设经验时说，在12月政变前，从党员的数量来看，虽然平顺县也吸收了不少党员，但也正因为1942年以前没有开展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所以党的发展也就不是在运动中吸收积极的觉悟了的优秀农民，因而在12月政变的恶劣环境震动下，党的组织也就缩小了很多。而支部干部存在着行政命令、压制群众、欺压群众、贪污、腐化或是对上级两面态度或是党内不民主、党员不敢说话、支书（或是支部其他干部）家长式的领导、或是闹宗派斗争等不团结现象。但归纳起来，的确大多是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问题。可平顺县支部改造的经验，尤其是在减租减息中的经验是，不能单纯思想整顿，必须把支部建设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去进行。支部建设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支部问题的解决不是党员群众的思想运动（思想斗争）的结果，就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

而进行支部建设最重要的一环，是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但这种思想教育必须是从实际出发，从支部存在的现实问题发动，离开了支部现实的具体的问题是错误的。经验证明，进行思想教育，最根本的方法是反省。这种反省又必须是群众性的，而且在反省中不应该只是消极的，应该是启发其积极因素和阶级觉悟的前提下去进行。^[35]

虽然王谦强调的“最根本的方法”还是“反省”，但这种“反省”是被重构了的，并不是宋明理学以来的主体构造方式。这个反省是必须放置在现实的具体现实问题处理上，放置在群众性的具体现实中来打造。实际上，这意味着主体论、认识论、修养论都需要重新理解和阐释。比如在大生产运动时期，党员的思想教育应该与生产动员结合起来。“在领导生产中不能把思想教育停留在翻身教育的阶段，应该是以解决生产中的现实问题为主，使党群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

太行区的支部建设并不是在抽象的基础上展开建设。前文谈到，太行根据地各县中的“中农干部”问题，后来就成了整个建党建政的棘手问题。有的县，如武安，中农党员比例达到88%，中农干部比例则达到91%。^[36]黎城4个支部，94个党员，52个中农，5个富农，32个贫农，4个工人；还有一个支部17人中

全部是中农；辽县3个支部60个党员，中农18个，富农2个，地主1个，游民4个，商人3个，贫农12个，雇工15个，手工工人4个，店员1个；还有一个支部23人，中农14人。平顺两个支部48人，中农21个。^[37]1942年减租减息深入开展之后，中农党员对于没收、分配汉奸地主的财产比较关心，但对跟自身利益无关的退租保佃就不积极。新旧中农都问题重重。中农是否会成为群众运动深入开展的障碍？是否会成为支部建设的不利因素？他们能妥善处理减租停租、丈地屯粮、支差不公、干部逼婚等等太行农村的主要问题吗？能积极处理救灾互助、参军优抗、春耕夏锄、修渠种树吗？

太行区委一方面要求干部地方化和培养地方干部，但这些中农难道不是地方干部吗？他们对于当地的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构成和运作机制即便说不出来，但经验和感觉中会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理解和把握。这使得他们中的某些人可以在某些运动中抓住历史势能与村庄的某些契合点，而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动和动员；但他们很难在滚滚向前的历史势能中紧贴村庄的运作肌理，激发自身的创造性。比如武乡某支书是个教过私塾的先生，也曾领导反××党（报告原文如此）的斗争，后来春耕分地，成了新中农，却把贫雇农佃农的地都给分了。自己得益容易，又不知如

何进一步调整，人也变得越来越懒，开始赌博。不是中农的干部也有问题。如赞皇的某支部支书最初是游民，在运动中借势而起，领导借粮借钱支援抗日，将中农借了，而借粮分配的大多数是党员，群众极少。借了钱之后又计划买地做生意，自己也开始贪污，成了流氓。支部与群众的渐不信任，也导致支部工作为了完成上级任务而逐渐行政命令化和形式化。但有的支部建立时期打击毒品，实行戒烟（地主债主往往就是用引诱吸毒使农民破产），对全村人的巨大影响的记忆仍然在。

问题是贫雇农在抗战初期反摊派反贪污的斗争中，贫雇农受益少，响应不积极。因为这本来不是他们日常生活结构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很多研究中强调中共发动农民，尤其是强调发动贫雇农时，往往从阶级论、诉苦等角度出发来理解。但阶级论和挖穷根解释不了诉完苦的贫雇农为什么会进一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为什么不在斗完地主之后变成各自为战的自耕农？太行地区贫雇农的真正深入发动，为什么恰恰是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发动起来之后的农村，为什么在实际权力结构中被削弱的大量中农却没有对中共心生怨恨？

1941、1942、1943年间，日军扫荡，根据地紧缩，农民分摊负担，任务重，再加上这两年严重旱灾蝗灾，农业产量大减。整个

太行地区最紧迫的是要帮助农民增加产量。农村在这一历史变化中的结构关系发生变化。而这个时候太行区委能够快速反应，大力推动生产互助，政府贷款帮助农民组织互助小组^[38]，树立各种劳动模范（陕甘宁的吴满友、冀中平原的耿长锁、平顺县的李顺达），切实的面对和应对中农、贫雇农的生活困境，搁置各种旧有论争，将旧矛盾放置在新的实践空间中重新组装、构造、磨合。支部也逐渐重新活跃起来。这不能不说是太行根据地建设实践中具有突破性的一步。

但我们必须注意，支部重新活跃，区委能跨出这一突破性的一步的历史前提，是太行区委各级干部在减租减息运动前后认知意识结构的大重构，对太行地区及其周边地带基于特定历史地理条件下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社会结构关系的深入调查、整理和把握。没有这一点（往往被讨论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者忽视）作为基础，构造革命的新形态和新方向将难以想象，生产运动、互助组、合作社的贸易交流、金融往来运作等，也不可能如此卓有成效（在这个意义上，冀南银行的历史经验、山东根据地金融工作的历史经验都值得重视，值得重新讨论）。没有这一点，我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太行区委能够在这个历史时刻抓住机会展开大翻转？按理说，从抗战以来，各种情况层出不穷。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日军转

攻华中，华北相对压力减小，太行地区更是相对平静，获得4-5个月的时间，为何太行区委在这一时期的工作无法找到突破口？12月事变后的黎城会议整党则又是一次失去的契机。不但没能扭转局面，反而有所恶化。

不过，支部活跃，解决农民的经济生产问题，并不一定能连带出转化中农的“自私”、调动贫雇农的积极性。即便各种合作社、互助组的生产效率提高，农民完全可能变得更加关注经济生产，群众运动仍然可能限于片面。

太行区委对支部的指示是，生产运动一定要及时与政治启发、教育相配合。互助组并不单纯是一个生产组织，要能够形成并维持互助组，一定要处理好平时有着各种矛盾的农民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先打破农民所身处的、过于久远的、纠缠不清的村庄结构关系，将之重新放置在一个新的、却又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人际关系（互助组）之中。在这个新的空间中，人们历经反复、曲折（如果我们熟悉《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与互助合作有关的描写，就知道这其中道不尽的磨砺），逐渐重新开始感觉互以为重的伦理感情，开始重新体会公平和正义，重新在熟悉的土地上体会亲情、友爱、忠诚、互相鼓励。委屈和不公重新能够得到申述（有了“说理”的地方）。不只是贫雇农，中农、小商人、手工业者、游民流氓也都在这一新的空间中感

受到了他们实际上也需要、且感觉温暖而激励人心的秩序（韩丁的《翻身》在一定层面上描述了这一点）。而这一切，都通过支部能够得到更大政权力量的支持和鼓励。支部与群众的联系，正是在这样一种既打破特定历史时刻的农村生活结构又使农民重温旧梦（其实也可能更好）的新世界中，才可能旧梦重圆。在这样的实践中，上级党委、支部、积极分子、群众都能在各自的层面体会到充实而饱满的精神和情感状态，以及说不清却又能在彼此脸上看到的无比信心。这正是太行区委在认知意识感觉方式已经有所突破和积累的基础上，抓住农村结构在特定历史时刻的新变化作为切入点，通过大量有创造性的工作（其中当然包括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延安经验和各根据地经验的推广），将中国农村社会组织方式（如人际关系、伦理理解方式、正义感等）的深层结构从诸多叠加交错的混杂状态中重新构造呈现出来的新局面新面貌。

这就是太行区委所总结的：一方面，从群众本身来说，在长期斗争中经过党的教育，逐渐认识党政策的正确，党的政策为群众掌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出路，才能与党一起前进。另一方面，党在斗争中吸收许多优秀的活动分子到党里来，这些人与群众血肉联系着。群众动员的越深入，党的活动分子越多，党与群众关系愈好。经过重重磨难，所建立

的相济相生的党群新关系，才会自然而密切，才会深切的融合在当地社会状态之中。重建中国的革命理想才会深深扎根于每一个村庄，每一个村民之中。这时候党群关系也可以表述为上下(如果基于地方)、内外(如果基于村庄)，但这种上下内外是互相渗透包容的——当然，这种关系的出现和冉冉升起，是以各种要素(一开始是新构造的革命方式主导)结构性的良好配合为前提。

按理说，农村支部和群众关系既然来之不易，非常难整理顺恰，中共应该更多介入和更严紧的干预，但实际上，太行区委对农村支部的要求却反而是要少干预。赖若愚在1944年指出，支部的日常工作，就在于帮助每个党员，成为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提高每个党员在群众中独立活动的能力。支部生活应该围绕这个基本目的。^[39]当中共经过减租减息、土改等运动，打掉村庄的传统秩序结构(地主、士绅为主持核心)后，村庄的整个运转又要能够配合中共的战时所需，实际上就要依赖于村庄自身结构关系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由这些村庄内部结构所从出的积极分子来承担生产动员和生产组织。如果这个村庄的积极分子禀赋能力出众，他将承担村庄结构功能中的更多任务，而一旦这个积极分子由于出色而被提拔或调出，新的积极分子承担不了过多的功能，村庄就会把运转的机能转移到

支部小组来共同承担。

虽然支部不能过多干预村庄，但上级党组织却需要严格督查各级干部。因为各级干部并不是一劳永逸地与群众建立起上通下达的关联。赖若愚谈到了这一时期的干部问题仍然存在教条化宗派化，不只是各级干部自身，特别是表现在组织部本身对于干部的认识方法上，“我们对于干部的认识，往往是偏重于干部的汇报，会议上的发言，而缺乏从思想作风及实际工作中的系统的了解。”而组织部在考察干部时要注意的，除了长期观察干部的“对革命的信念”，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干部多侧重干部地方化和地方干部之外，各种考察制度也是必须的。“首先是干部的考核制度和定期的反省和鉴定制度。考核制度是把干部在每个时期每个工作中的具体表现，系统的登记起来，每年做三四次定期的反省和鉴定，作为每个时期考核的总结。这样，才能系统的具体的了解干部。”赖若愚1944年8月的这份报告中对制度的强调，与其说是强化了行政化管理，不如说是在制度层面配合根据地实践渐有起色的信心。

可支部与群众关系一旦出现问题时，怎么办？在太行区委机关刊物《战斗》第90期(1945年2月)，一篇关于村支部如何整风的文章整理了村支部的整风经验，尤其是关于党群关系的整风经验。“支部党员干部反省与

群众的关系，可先从党员群众的历史关系（着重号本文作者加）来入手。如本村的工作发展、党员的翻身（举当地党员的具体例子）到抗日革命，一切的一切都离不了群众。同样也要从党员支部只有在和群众一起发对旧的统治，为群众兴利除弊的时候，群众才拥护咱们，工作才会轰轰烈烈顺利的开展。但当我们脱离群众，思想作风不好，不能公私兼顾，自私自利，或受坏分子引诱欺骗做了坏事的时候，群众对我们就不满、反对，进行工作就非常的困难（都用本支部具体事实做动员）。“只有采取历史联系群众的翻身反省的方法，才能打通干部党员的思想到群众中去愉快反省，同样也只有诱导群众做历史翻身回顾，启发群众对干部的阶级同情，群众才能真正原谅干部党员的错误，而加以爱护。如王曲支部，群众对干部很不满，经群众做翻身反省后，群众说：不是干部，咱们生活可不行，干部虽有些毛病，总和咱们是一家人，给穷人办了很大的事。也只有如此，才能使群众从历史全面来区别现在干部与过去统治者有着本质的不同。”^[40]

太行区党委办公室 1945 年 12 月在《1944 年冬季几个支部整风的经验》里以平顺王曲村、平顺黄花支部、黎城路堡支部为例，总结了一些地区结合减租运动进行的支部整风。这三个案例的共同点都是强调对抗战以来历史实践经验的重新整理和叙述，而不是简单诉诸于

新旧社会的好坏对比。这一时期的支部整风中，新旧社会的差异在政治、伦理层面被认同是建立在抗战以来往复曲折的根据地建设实践经验之上的，而不是抽空了具体历史实践过程中的、抽空了在具体社会结构关系中的身心转变。这与后来的忆苦思甜和以阶级论为基础孤立化和抽象化重塑新旧社会的对比不同。如果我们还想到在延安，七大召开之前，毛泽东为整理党史花费巨大心血收集编辑《六大以来》文件^[41]，通过中共自身历史经验的整理来整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共的实践经验中，详细、具体的整理历史经验，对于他们重构自身、构想新实践的重要性。

这样的历史前提和历史状况下，我们才会理解太行区委组织部长赖若愚所谈到的“要大量培养干部”，他的眼光所及，所眺望的那个大局，以及他的信心和视野对应的经验基础和历史来源。“我们现在各系统的干部都有很大缺额，在将来局面变化的时候，干部的需要将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提拔一批干部。”^[42]

九、结语

新中国建国的历史前提之一是，大批年轻人得到了长时间的重建社会组织结构训练，整个政治实践能力、知识结构和意识方式都发

生了巨大转变。而中共各根据地的这一历史实践过程，是延安整风运动等层面的实践经验所无法直接移植、传达和提供的。现代中国的问题是，各阶层人员结构的相对完整并不能满足社会困境对于政治精英的要求。本应承担建国重任的中年人在政治视野、现实感知等方面都不充分具备应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困境的政治视野、认知意识和实践翻转能力，这一任务也就转移到更下层、更年轻的一代（为什么他们能承接这一任务，这本身是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但这一代年轻人却大多是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感知都受制于特定的知识方式和理解方式，这就形成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特定的把握方式和实践方式，并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现实状况的脱节。^[43]抗战时期，中共面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这一状况，必须做出有创造性的构造，并以此重构中国革命的形态。

在太行根据地建设的历史实践经验中，我们看到了这一复杂曲折的过程。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区委等各级党员干部需要逐层面对地方社会结构在特定历史时刻的特殊形态，日军侵入，会引发各阶层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变化，但要理解这些变化，需要穿透这些变化看到其内里基础，则是阎锡山统治38年后的山西社会秩序，这一秩序在牺盟会、地主商人乡绅、中农、贫雇农的政治经济贸易

伦理等纠缠关系中又有着特殊表达。而要拆解、重构这些关系，将之引导向一个互以为重归正义的抒发性结构，则需要进一步对中国社会基体的运作方式具有更加穿透性的理解和把握，既要求这些干部具备高度方向感、同时又必须能随物赋形高度灵活。我们正是试图在这样一个结构性视野中，考察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区委、县委、支部在具体实践中如何构造自身、构造革命的新形态、构想新实践方向，从而构造出新的历史。他们翻转了哪些？翻转到什么程度（比如对地主阶层的处理在不同时期真的就都恰当吗，其后果是什么）？哪些经验具有怎样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思想史意涵？哪些层面隐含着怎样的危机？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不仅突破当下的诸种叙述模式，而且需要我们突破中共自身的诸多整理和总结。

就中共各级干部而言，他们在各根据地实践中不断构造和转变各种社会生活的秩序状态，不断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行动构造不同情境中的人不断转换向更有活力更饱满的状态。这需要对地方历史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风俗习惯人情有着丰厚积累和高度敏感。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参与构造的过程中，他们自身也在不断扩展调节和转变群体的规模中构造新的自我，以此（而不是空泛的仁义之心）“达之天下”。所谓“修己以安百姓”，

在中共的实践中,有了主体论、认识论、政治学、社会理论的新意涵。

也正是有这样的实践经验,我们甚至可以在中共一些军事领导人那里,看到他们对完全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军事领袖应该关心的问题却有深入的论述。

1944年,晋察冀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奔赴冀中任冀中军区司令员之前,曾反复分析过冀中的形势。重点是要重建冀中军区、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利用青纱帐,利用各种地道。但他到冀中后,发现情况更为复杂。

杨成武在白洋淀端村发现,这个盛产土靛的地方,竟然几乎见不着土靛,满街卖的都是洋靛;街上行人打扮入时,还有不少满身脂粉气的妇女。当地同志介绍说,

这里虽是鱼米之乡,可是日军和汉奸刚被赶走,人民的生活还是很苦。渔民们在冰天雪地打捞的鱼送到市场,被鱼商垄断,渔民所得无几。农民精耕细作,也难谋生。所种的苇子多系大地主、大军阀所有。洋靛倾销,土靛无出路,稻田地又被洪水淹没。加之风俗不纯,一些人好奢侈,在他们看来,“保定太土,北平太俗,还是天津的好”,因此一个劲追求天津的生活方式,以致镇上一些妇女斗华竞丽之风十分盛行。^[43]

杨成武回忆道:

听到这些情况,我感到肩上担子更重了。因为,我们来到冀中要进行的不仅仅是个军事斗争,还要注重改变民风,对敌开展经济、金融的斗争,取缔奸商,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依靠基本群众使减租减息工作象在北岳区一样逐年深入,等等。这里的统战工作、群众工作、敌军工作都很复杂,需要认真地去做,否则是难以开创冀中的新局面的。^[45]

从这些军事干部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抗战至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在政治、经济、军事、土地、社会领域革命实践的深入和交互影响,互为支撑。军事得以胜利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军队干部对中国社会结构运转的高度理解和领悟。中国现实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局部胜利而变得一劳永逸,相反,状况层出不穷,前进中的每一步都既是突破,又连带出新问题。这变化多端的现实结构状况反过来又对干部提出了极高的挑战。正是在这些具体实践中干部们不断构造自身、构造革命的新形态、构想新实践方向,从而构造出新的历史结构状况。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构造方式,恰是我们理解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前提之一。

注释

- [1] 本文的写作仍然要感谢贺照田先生，本文的关键思路得益于他的多次谈话和多篇文章。还要感谢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的朋友们四年多来无数次关于中国现当代史的讨论。
-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194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371-373页。
- [3] 太行根据地的辖区和名称多次变更情况，请参见《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 [4] 刘凤翰：《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分析》（香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
- [5] 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109页。
- [6] 李秉奎：《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 [7]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 [8] 大卫·古德曼：《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页。
- [9] 《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10] 田西如：《李雪峰与太行根据地史研究》，《李雪峰纪念文集》，2007年，第425-426页。
- [11] 苏博光：《冀南春雷——冀南暴动片断回忆》，载《河北革命回忆录》第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 [12]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 [13] 参见牛荫冠：《抗战初期周恩来、刘少奇对牺盟会工作的指导》，载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中共山西历史忆事》第2卷，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
- [14] 李雪峰，第43页。
-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二，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30-131页。
- [16] 大卫·古德曼：《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7页。
- [17] 李雪峰，第53页。
- [18] 王生甫 任惠媛著：《牺盟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7页。
- [19] 赖若愚：《目前时期的支部建设问题》（1943年9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二——党的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9页。
- [20] 魏宏远：《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38页；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108、109页。
- [21] 《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报告第三部分，《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 [22] 同上，第36页。

- [2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96-197页。
- [24] 《赖若愚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 [25] 王生甫 任惠媛，同上书，第748页。
- [26] 李雪峰，第69页。
- [27] 赖若愚：《目前时期的支部建设问题——在第二次支部研究会的总结之一部》（1943年9月），同上，第300页。
- [28]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345-346页。
- [29] 李雪峰，第140页。
- [30] 1983年，曾任太行区委宣传部部长的张磐石等回到太行地区，召集抗战期间的支部书记、区、县委书记、农会主席等座谈，这些人对当年的农村阶级状况仍然历历在目。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群众运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5页。
- [31] 《关于农会工作的指示（1941年1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群众运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9页。
- [32] 赖若愚：《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与党的领导作风问题》，《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中册，史敬棠等编，三联书店，1957年，第462、465页。
- [33] 李雪峰：《李雪峰同志在招待劳动英雄会上的讲话》，《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中册，史敬棠等编，三联书店，1957年，第479、481、482页。
- [34] 《彭涛讲群众运动的发展与阶级关系的变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9页。
- [35] 王谦：《关于农村支部建设问题》（1945年3月25），《平顺资料汇集 上册》，内部资料，1961年，第97页。
- [36] 转引自李秉奎：《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09页。
- [37] 徐子荣：《关于八个县的支部工作》，《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二——党的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8页。
- [38] 李新的回忆录中就讲到他时任县委书记时，如何贷款推动白洋淀地区的人民搞副业生产和销售。
- [39] 赖若愚：《几个问题的初步研究——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8月），第324页。
- [40] 《在一个村如何进行支部整风》，同上书，第332、333页。
- [41]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5-187页。
- [42] 赖若愚：《几个问题的初步研究——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8月），第328页。
- [43] 更详细和深入的分析，请参考贺照田的相关演讲和研究：《从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层主题看中国现代三次革命的发生与演变》，在台湾关于《讲话》的六次讲课。
- [44] 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 上》，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771-772页。
- [45] 同上，第772页。

『群众创 造的经 验与问题 』 以『穷人乐』方向 为案例

程凯

1944年12月，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会上，阜平县高街村剧团演出了以本村史为素材的十四场话剧《穷人乐》，引起轰动。针对此成功案例，晋察冀中央局随后发布《关于阜平高街村剧团创作的〈穷人乐〉的决定》，指出该剧反映了边区群众的翻身过程，“歌颂了群众的英雄主义”，是“我们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成就”^[1]。决定中概括《穷人乐》创作经验的要点在于：真人演真事，把创造过程和演出过程相结合；表现本村群众斗争生活，为本村群众服务。这些要素构成了“我们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新方向和新方法”。决定进一步要求：“各个乡村、连队、工厂、机关、学校，都应沿着这个方向，采用这种方法，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开展本单位的文艺运动。”该决定刊发于《晋察冀日报》时还配以长篇社论《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

艺运动》。“《穷人乐》方向”的提出随即引发根据地农村剧团自编自演“翻身戏”的热潮^[2]，进而扩大为一系列“兵演兵，工演工”的实践。可以说，经由“《穷人乐》方向”的提出，鼓励、发动群众自编自演成为四十年代中后期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的一个基本模式。

不过，还原《穷人乐》的创作过程和产生机制会发现《穷人乐》的成功并非群众自己演自己那么单纯。从选择典型到几度加工创作的过程中，区委和区宣传部人员，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的编导均有深度介入。然而这层层“帮助”并未成为专业剧团帮助业余剧团的正面例证，在经验总结中被刻意突出的反而是群众自发的“政治觉悟”与专业编导“形式主义”倾向的“斗争”。这样一种刻意张扬群众自发创造性以及要求专业人员无条件向群众学习的倾向须置于“整风运

动”后大力推行“群众路线”造成的某种特殊状态中理解。事实上，在《穷人乐》之前，新闻报道剧《李殿冰》因其“群众内容，群众参加写作，群众参加导演”被树立为“为工农兵服务”的样板^[3]。在《穷人乐》之后，护持寺翻身剧团的创作因“突破了《穷人乐》真人演真事的框子”，发展到编演外村群众生活与斗争，构成“《穷人乐》方向”的发展^[4]。这样看，从群众参加编演，到群众真人演真事，再到群众独立创作——《穷人乐》实际是处于一个强调群众自身创造性的递进链条中。

对群众创作的推崇带有这一历史阶段特有的激进性。《穷人乐》创作、演出的成功也综合了多种因素。因此，仅仅将该剧放置在文艺整风的后果中加以把握，突出这一“样板”的构造性和虚构性其实不足以理解这一创作成立的历史条件和问题指向^[5]。如要还原、重构其“事件性”则需将一系列历史性因素纳入进来，包括：对“群众英雄主义”“群众路线”的理解与运用；“劳动英雄制度”；高街村群众“翻身”的过程，合作社的枢纽作用；根据地戏剧运动的特质与文艺整风后的新变；《穷人乐》创编中的矛盾和对矛盾的理解；“群众创作”的可能性与限度等。

何为“方向”？

“《穷人乐》方向”中的“方向”一词是这一时期经常使用的说法。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赵树理方向”亦属于这一系列。所谓“方向”代表了一种从群众、基层产生的有效经验。“某某方向”“某某道路”“某某运动”此阶段常见诸文件、报端，诸如延安的“吴满有道路”“赵占魁方向”，晋察冀地区的“戎冠秀运动”“李国瑞运动”“葛存运动”“康福山的道路”等。被冠之以“方向”“道路”头衔者均来自基层，或为生产能手、劳动模范，或为战斗英雄、拥军楷模。晋察冀边区于第二次群英会（1945年2月）上曾推选出九十个典型，《晋察冀日报》三个月内连续刊发“英模录”75篇。高街村剧团的团长陈福全就以“阜平合作英雄”位列这批表彰名单。

对这些英雄的表彰不单是种鼓励，其目的更在于以之为楷模推动一种工作的展开。因此，英模的选择与这一时期要推动的一系列“中心工作”密切相关。因为有大生产运动的号召，而树立吴满有为榜样；因为敌人“扫荡”造成大量伤亡，而宣传救助伤员的“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子弟兵的大哥”崔洛唐；因为加强自卫战而嘉奖民兵爆破英雄李勇、神枪手李殿冰；因为急需推动合作社经济而表彰刘建章的南街合作社、张瑞合作社、陈福全合作社。

这种以推举英模带动一方的工作方式构成这一阶段的特点，也是经由整风运动确立的新的工作方法。

近年关于整风运动的理解中相对突出其统一思想、路线斗争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整风的目标亦在于检讨干部习焉不察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淮北区党委书记刘子久，写了一封《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经由毛泽东、刘少奇首肯发表于《解放日报》上。从中能较为清晰地看出整风学习给一线工作者带来哪些冲击和启示。

刘子久的信从自己工作中遭遇的一件具体事例开始。1942年，泗南县的一名转业军人夏陶然被安排到峰山区中潼村小学当校长。这个小学是个办“滑了”（坏了）的小学，由于村庄太穷，家里缺劳力而不愿送小孩上学。夏陶然发明了一套解决办法，把一二十个小学生编成几个生产小组——放牛小组、割草小组、挖菜小组，编筐小组等——实行学习与生产结合。家长纷纷把孩子重新送回学校。他还以群众批评、劝告落后的一套方法教育调皮孩子，取代了习以为常的打骂；同时利用自己老师的身份为村子里排忧解难^[6]。其经验在二分区的小学教员训练班上备受欢迎。为此，主持会议者写了一篇社论，题为《走夏陶然的路》。但社论拿到区党委审查时，有人认为

中央或华中局无此类指示，下级不能这样提，就没有采用“道路”的提法。

但刘子久到延安后，发现《解放日报》上刊载的毛泽东讲话，教育问题社论，模范小学的经验介绍“与夏陶然所作者，竟不谋而合”，证明当初“走夏陶然的路”的提法是正确的，仅因为上级的固步自封而抹杀了这一经验。这本是件小事，但经过整风学习，刘子久意识到它“以今天整风的眼光看来，则非同小可”。因为它“反映了我们的不大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是反映了我们的眼睛向上，不肯向下，不肯向群众学习；是反映了我们不大懂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的问题”^[7]。

一经转变观念就令干部意识到，类似夏陶然这样的人物很多，他们是“群众中的天才、圣人、状元、领袖、诸葛亮”。其使用的方法往往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如果上级领导不予以挖掘、整理、发扬则易被湮没；反之，如领导善于发现这样的创造，使之由不自觉提高为自觉，则这类有效而灵活的做法就会发扬光大、集腋成裘。因此，“发现群众中的“天才”“领袖”“诸葛亮”成为建立“群众路线”工作方式的一个枢纽。

值得注意的是，“群众路线”固然包含对“群众”这一主体的设定，但“从群众中来”的那个“群众”并非直接对应于群众的集合

体，而首先是群众中的“天才”“领袖”“诸葛亮”。换句话说，这些群众中的能人、带头人、有感召力的人在政府、政策与群众之间起到一种中介作用。恰如夏陶然这个个案所能看到的，这些群众带头人起作用的出发点不单是某种政策的执行者，而是基层工作在遭遇难点时有办法、有带动力的人。他们植根、面向老百姓的一面多于对上级负责的一面，能更多想老百姓所想、急老百姓所急。相对于地方行政系统，他们对工作更能调动自身的多种资源。像夏陶然组织生产合作的方法、批评教育的方法均来自于部队经验，但这种运用脱离了原环境中当然而然的“执行”色彩，多了为解决问题而调动资源的主动性。所谓“群众英雄主义”的创造性并非天纵之才，更多是各种经验在脱离了惯常轨迹后，在现实挑战前的一种重新调动、组合。

当群众的创造性被重新定位、认识的情况下，干部工作的创造性也被再造。发掘、培养群众的创造性成为激发干部工作创造性不可或缺的途径。这样一个过程，并非单向的“群众崇拜”，而是通过强化群众的主体位置反向塑造干部的主体状态，再以其被改造了的主体状态去引导群众。在此往复的过程中，群众既是主体，又是媒介。事实上，对于革命要求而言，群众不是自然而然具备与之配合的主体状态。以革命的主动性衡量，群众具有一种“被动

的主体性”。但如果不将群众的被动性转化为积极性、主动性，则革命的主动性也有沦为狭隘、无效的功利主义的危险，所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正是基于此。

主观上讲，革命工作是为群众的。但由于没有调动出群众的主动性，无论是征收公粮、扩军破路打仗这些本来就需群众付出的工作，还是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种棉植树、挖河筑堤这些直接有益于群众的工作，群众都认为是“为了那些工作同志，去完成上级所给予的任务，而不得不做似的”，不把它们看成自己的事^[6]。这是刘子久等一线干部一直遭遇的状况。与之相关，许多工农出身的基层干部“对于工作愈努力，愈积极，就常常愈脱离群众”，许多在党认为是“模范”的干部与党员，群众中大多对他们有“反映”^[9]。这种单向的“积极性”反而造成创造性的窒息。而挖掘群众的创造性，提倡“群众英雄主义”意在突破这种恶性循环，使干部和群众借助相互生成的积极性结合成目标一致的政治有机体。

这样一种过程中，介于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英雄”“模范”发挥作用的方式和位置颇值得讨论。刘子久提出的将模范人物直接提拔为干部着眼于以此充实干部后备力量。但如果从一开始发现英雄、模范时就以后备干部的眼光衡量，则对群众创造的理解就会窄化和错位。从各根据地推选的英雄、模范看，既有那些做

了大量组织工作和创造出某种工作方法的“群众生产组织”负责人，也有个人劳动、生产突出或起拥军表率作用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事迹都是在“动手动脚”的工作中创造出来的。尤其是劳动英雄，他们起带动作用的方式首先体现为在“做”的过程中让身边群众感到佩服而产生“见贤思齐”的效果。

在根据地广受欢迎的一出戏《王秀鸾》中，懒婆婆被儿媳的勤劳感化，其转变的心理机制在于“这人是打不服骂不服，敬服喽哇”。所谓英模往往是群众中被“敬服”的对象。“敬服”意味着英模作用于群众的方式，同时，“敬服”本身亦构成对被“敬”对象的要求与限定：一方面，群众“服”他、听他的，但这种威望又建立在“敬”的基础上，一旦丧失“敬”的前提，威望就会被抽空。“敬”是一种不诉诸压迫感而相互促生的关系：被敬的一方需更加克己、自律和自我提升，而“敬”之所以产生感召性又诉诸敬人一方向善、向好的本心。因此，相对于“竞赛”等现代机制，“敬服”更能达成一种“人挤着人，向好处走”的效用。

不过，从政府角度看，干部并不满足劳模停留于原有状态中发挥作用，而要求他们发挥更广泛、更综合的作用，使其成长为群众领袖和政府帮手。各层级“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召开即为推动此类工作，并由此产生出一种“劳动英雄制度”。政府所推行的社会、经

济、文化政策——办义仓，办合作社，办学校，办识字班，办黑板报，发动妇纺，学新法接生等——都要通过劳动英雄来组织、推广。“只要劳动英雄做什么，周围的人就跟着做什么，……只要劳动英雄号召得好，马上就会得到大众的拥护，事情就有了八九成把握”^[10]。在此过程中，劳动英雄逐渐成为“一揽子英雄”，其影响也超出身边可及之处。另一方面，能否有效使用、帮助、培养劳模则成为衡量政府是否履行“群众路线”的标杆。乃至有这样的说法：“个别的地区许多工作有毛病，追问下去，一定是劳动英雄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再追问下去，一定是党和政府对他们帮助和培养得不够，或者完全没有去培养。追到最后，便发现这是那里的党组织和政府负责人员还存在着官僚主义的毛病，还存在着不民主的作风之故。”^[11]

“群众英雄主义”与演戏

这一时期，“方向”“道路”的推出将之前指挥式的工作方式转化为经验带动式的工作方法。在宣传推广诸种基层经验的过程中，演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不识字的老百姓而言，讲一遍不明白的事演一遍就会明白很多。王林在其《为冀中村剧团进一言》中提到：

我们的广大农民群众，认字有限，原理的思辨力更不发达。非他们亲自见到亲自“体验”到的他们不大深信。报纸、传单、小册子、教材是非常好的教材材料，但是我们的农民群众，可能有多少人看懂了报；看懂了小册子呢？文章多么通俗，但是认字不多，你还创造出什么通俗办法？除非是形象化——画成画，或者用人表演出来，这就又成了戏、成了歌、成了大鼓、成了电影，……^[12]

事实上，演戏不单是某种政策、经验的图解，戏的创作过程往往构成经验的重构和发展。原有经验中与政策配合的部分固然要紧，但戏之成戏恰好在于捕捉能使这些工作经验成立的思想、情感、伦理、道德基础。好的、成功的戏往往是将一般经验整理中传达不出来的那些层面展现出来，而这些层面恰为“群众创造性”之为“群众”创造性的来源与机制。像之前提到的《王秀鸾》对于“敬服”作用的捕捉，非在戏剧所还原、创造的人物关系中难以准确传达。

抗战后期，根据地的专业剧团经过多年磨练，一方面对于服务现实、对于“赶任务”、对于从现实取材迅速加工演出、对于下村演戏已形成一套熟练的工作方式，在此过程中对于无论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农村观众的欣赏习惯、直接要求与反映均积累了丰富

经验。另一方面，对于现实主义戏剧方法的钻研又使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注重观察、还原植根于生活的行为、思想、感情状态。因此，这一时期产生的一系列宣传英模的创作，如《戎冠秀》《李国瑞》等虽有真人真事的限定，但在反映现实的深厚性和丰富性上并不单薄，具有某种现实主义式的认识力。

再有就是，经过1943年到1944年的文艺整风，一套如何在文艺创作中贯彻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方式在边区确立起来。其要点在于“群众内容，群众参加写作，群众参加导演”^[13]。所谓“群众内容”进一步的规定是“把战争与生产和群众的英雄主义当作文艺创作（首先是新闻通讯与戏剧创作）的头等的內容”。因此，写反扫荡和大生产运动中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写真人真事成为这一时期创作上普遍采用的主题^[14]。在创作方法上，则采用一种专业人员与英模、群众三结合式的“集体创作”模式：由专业人员下乡深入生活，在写作对象身边蹲点儿、采编，编导过程中要征求本人和周边群众的意见。

其实，这种写群众带头人的主题对于根据地剧团来说并不陌生。只是，以往对主题的把握多由编导人员在创作中自行掌握。而在围绕“群众英雄主义”展开的创作中，发生的微妙变化在于，对于很多英模人物、事迹，政府在表彰的同时也加以总结、阐释、提

升,使之与政府要推行的政策结合起来。同时,在搜集素材的层面又要求更加“深入”生活,要对群众领袖和周边群众的方方面面有更准确的把握,最终成果还要接受群众检验。于是,写“真人真事”变成一个在指导方向、经验厚度和“真实”检验几个向度间反复打磨的过程^[15]。正是这种打磨,使得以往较为“单纯”、“直接”的创作变得更富紧张感。

同时,文艺整风提出的文艺群众路线的另一条道路是发展村剧团等业余文艺团体,变“写群众”为群众自己创作。各专业剧团的任務则是以大力气帮助村剧团发展。本来,冀中、太行等地是农村演剧传统兴盛的地区,1940年、1941年曾出现发展村剧团的热潮,1942、1943年的大扫荡一度造成村剧团的沉寂。但随着1944年“反扫荡”在各地取得成效以及生产运动的恢复,农村剧团又开始活跃起来。

在新一轮的村剧团演剧热潮中,不仅专业剧团的助力更深入,各级宣传部门也被要求“分散帮助工作”^[16]。它们不仅协助建立业余文艺团体,也承担发现、培养、宣传英模的任务。于是,“写英模”与发现、培养英模成为一个连续过程。由领导干部发现、确定典型,宣传人员与创作人员帮助整理经验,总结成通讯报道或加工成戏。这些报道和戏随即成为经验交流的基础。

与此同时,大生产运动的一个突出特征也

是重视对群众自发生产经验的挖掘。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倡导:“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17]这种以“向群众学习”为前提的工作程序,注重因地制宜的有效性。比如组织变工互助时,特别强调:“变工队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必也不能采用千篇一律的组织形式,这就需要根据各家各户的具体要求和各种条件来决定,不要凭空臆造,也不要采取某种固定形式,只要在实际起着互助作用就行。”^[18]因此,深入调查、整理、研究那些在现实条件中已经存在的、自发的互助经验成为推动互助生产的基本方式。

在这一阶段“群众路线”的贯彻中,经验的多样性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保留。而经验的多样性恰好基于群众自身的差异、复杂与不一致。在有效的“群众路线”视野下,群众不单是抽象整体,而是被还原到其差异性条件中加以把握。“群众路线”能够对复杂、多样的群众起作用,其前提即在于准确认识、研究、照顾群众的接受、创造条件、程度与机制。所谓“向群众学习”并不意味着群众能够提供一个现成样板,而恰好是要在群众不那么标准、完善的经验中把握推动工作的现实基础和动力。然而,研究差异性经验的目的又不囿于

确认多样性，而是在目标一致的视野下通过兼容差异性而获取更坚实的现实感与有效性。因此，经验更需要经常、充分地交流。干部领导生产的要害措施之一就是组织经验交流，将各地整理上来的有效经验进行交换，在这种交流中推动经验的提升和拓展。创造经验，发掘经验，研究经验，介绍、交流、推广经验成为领导工作的主要内容。

基于这种大背景，此阶段的演戏运动，无论是职业剧团的写劳模、写生产，还是群众创作都构成了这种新工作方式的一个有机环节。换句话说，如果说这一时期戏剧创作和演剧与革命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的话，其关键还不在于演戏被要求更密切地配合政治，而是革命政治自身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整风、大生产运动之后一整套领导方法的调整、“劳动英雄制度”、以发展生产为枢纽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等。文艺创作上“群众路线”的深化是在一种双向改造的机制中起作用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在于革命政治的“为工农兵服务”。《讲话》标举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要害不在于加强领域化了的“政治”与“文学”之间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是设定了“政治”必须面对现实状况不断突破、改造自身，以此为前提，“文学”要结合进这个随时处于改造、调整状态的“政治”中以实现自己的突破、改造和“去领域化”。因此，这一阶段文艺的

“为工农兵服务”不是仅在“文艺”与“工农兵”点对点的单向维度中起作用，而是结合进一环套一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中起作用。其创作机制和影响效力均需结合这个整体性背景来看。

从这样一个背景看，1944年底到1945年初出现的“《穷人乐》方向”其实介于大生产等群众运动产生效果，到有必要将此种效果向纵深转化，产生进一步“翻身”动力的关节点上。作为文艺创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新经验、新方法，它本身是整理生产经验、宣传劳动英雄的产物，但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表现“劳动英雄制度”的框架，将生产翻身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认识框架中，开启一种历史叙述模式。

村剧团与“演真人真事”

产生了《穷人乐》的高街村是一个和阜平县城隔河相望的编村，有四个副村，全村105户，除五户外，全为佃农，抗战前绝大多数佃户租种五台山喇嘛的土地^[19]。抗战军兴后，1937年9月，一一五师政治部进驻阜平县，之后阜平先后成为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和晋察冀边区首府。可以说，阜平长期处于晋察冀根据地中心地位。“许多机关、部队、学校、医院、工厂、新闻单位、文艺团体等，曾长期分驻在各个村庄”。^[20]就此而言，

高街村所处的位置是很特殊的,由于地邻中心,不断受到边区各种工作的直接影响,也容易受到政府关注。

高街村剧团始建于1936年,前期情况缺乏详细资料。剧团重建据说在1940或1941年,其特点在于:

配合中心任务自编自演经常活动,专业剧社曾陆续帮助过,但外来剧本演出并不多。团长陈付全,副团长抗联组织部王朝金(女),正式团员三十余人。村各部门干部参加者约一半以上,青妇、青壮年、儿童比例差不多,不识字的很少,平均初二二年级的程度。……新加入的老年、壮年、青年约十余人,如工作需要尚可聘请本村任何人参加编剧或演出。实际上变成全村老百姓的文娱组织。在艺术上,团员中没有一个会搞旧玩意儿,也没有演过旧东西,对演出活报剧、小调剧、秧歌舞形式很喜欢,并能自己搞,就是缺乏编剧与乐器人才。现因与冬运结合,学习氛围很浓,每次排戏之前都有人在学算盘,或识字读报。此外,在各方面,可经常得到区宣教委员会的帮助。^[21]

以上这段描述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成员对高街村剧团情况的调查。高街村剧团是他们选择的一个典型。相对于一般村剧团,其值得培养在于具备一些条件。比如,

“村各部门干部参加者约一半以上”说明剧团得到村领导支持、不闹独立。因为排戏、演戏耽误生产、支差,需要经费,且容易造成纠纷(男女关系等),许多地方的村干部并不愿意支持剧团,剧团也容易形成独立倾向,造成与村政权的对立。另一方面,一般乡民观念中,演戏是“闹”、是“玩儿”,多由青年、儿童参加。“青妇、青壮年、儿童比例差不多”说明这一剧团的基础好。进一步发展到全村老百姓都愿意参加则意味着它已摆脱纯娱乐团体性质而成为有凝聚力的群众组织。“配合中心任务自编自演经常活动”,少演外来剧本,则意味着他们的演出主要服务本村,而不具有发展为职业、半职业剧团的倾向——这一时期,对“模范”村剧团的要求就是保持业余性,与生产结合,勤俭节约,不以盈利为目的,不向职业剧团发展。相应的,“团员中没有一个会搞旧玩意儿,也没有演过旧东西”也与此有关,因为能够跑台口赚钱的往往是旧戏班子,演新戏属于“宣传任务”,很难挣钱。同时,这也体现这一阶段强调的新、旧戏对立,认为搞旧戏的有旧趣味、旧习气,表演上喜欢滑稽、出洋相,会把新戏演坏,不会旧戏反而成为有利条件。而“对演出活报剧、小调剧、秧歌舞形式很喜欢”则意味着他们有创造综合性新形式的底子。这一时期,所谓“新戏”并不单指话剧之类,而是内容上“新”,形式上突破某种固定格式

具有综合性的戏。旧戏中无论“大戏”“小戏”，凡够“戏”者仍有固定格套，因此被鼓励应用的是小调、秧歌舞等尚够不上“戏”的民间表演形式。

总之，抗敌剧社对高街村剧团的整体评价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剧团。没有旧艺术形式的传统习气，容易接受新的东西，有坚强的领导，团员政治认识很好，有许多工作经验，应尽量发动他们自己搞，演出他们自己的事。”^[22]

“演真人真事”“演自己的事”是文艺整风后确立的群众创作方向。本来，农村演戏的出发点是“自娱自乐”“闹红火”。旧戏因其固有程式、格套，自然有一种“戏”的样子。而将身边的事、现实的事转化为艺术表现、转化为戏则特别需要一种转化的能力、方式，否则，仅将生活中的事、言、行无转换地搬演，易散漫、平板，观众看着无趣。但另一方面，群众对戏的要求、对娱乐的要求又并不那么单纯。传统中，大戏演忠孝节义，小戏演儿女情长也是涵盖了不同需求。而新戏则试图将“开脑筋”“讲道理”与移情、移人结合起来。尤其置身战争的紧张环境中，群众需要的调剂已不是“有趣”“热闹”所能完全承担的，“娱乐”也被挤压得具有相当的严肃性。

“大扫荡”前后，“抗敌剧社”等曾组织过几次“政治攻势”，即以小组形式深入游击区、敌占区，冒着生命危险以游击战的方式巡回

演出^[23]。在总结“政治攻势”的文章中，作者就指出：

老百姓在危险之下看我们的戏，他们来，不但是因为苦难压抑着，为了来找点快乐，更要紧的，是为了来听点什么看点什么，让“八路军和共产党告诉我们，这日子怎样过”。这是一件极不简单的事情，我们只要身临其境，站立在这些甚至很久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很久不知道鼓掌的同胞面前，就会感觉到一种极大的责任。^[24]

因此，在创作上“写的东西就不能无的放矢”，要首先“反映出敌占区、游击区的生活”，要“说他们心里的话，替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这样一种直接诉诸宣传效果的创作要不流于抽象、口号尚需特别熟悉当地生活：“事先要把工作地区的斗争做尽可能详细的了解，甚至把演出对象都调查好”。^[25]而“站在人群中”的演出经验也使他们发现：“观众们对戏里最关心的是与他们自己有关的人”，“妇女们最关心台上的妇女，老头儿们最关心台上的老头儿”。^[26]内容的真实性 and 表演的真实性在这样一种极端环境中成为达成更高层次戏剧效果的先决条件。作者在总结中曾举例说明表演真实的必要：

曾在一个戏里,我们的日本人上台的时候,坐在前面一些的老太婆突然把身子往后一闪,像是马上就要躲避一下的样子。而在这个日本人动手摔倒一个老太婆的时候,这些台下的老太婆都用低颤的声音叫着“啊呀”,而且湿了他们的眼睛。如果演日本人,但形态、动作、直到服装都不太像,那么观众马上就感觉到不像,感情会慢慢地远离,觉得这不过是“戏”了。^[27]

这里,“戏”的距离感成为影响观众产生带入性的障碍。而这时所要求于戏剧的正是消除所有产生形式距离的因素,激发更直接的带入性。这种极端条件下的演出通常是一种“无距离演出”。“街道、打谷场、院落……常常是我们的舞台,而其实并没有‘台’。观众座位逼紧着你,那样近,叫你几乎像是站在这群人中间讲话一样。”观众具有一种直接的压迫感而使得“演”与“看”的过程成为一个紧密结合为一个整体的过程。而它所具有的政治效能和隐喻性正是革命宣传所设定的理想状态。因此,这样一种直接性、压迫感、带入性成为后来努力要在演出中再造的。后来关于戏剧演出的回忆中反复出现的战士、民兵开枪打“恶霸”的桥段,刻意突出某种混淆性——忘记是在演戏——都意在强调内容、表演的“真实”与观众带入感的对接,成功超越了“戏”

的虚构性。

随着“演真人”“演英雄”方式的出现,“真实性”成为创作、表演中一个主要追求的目标。实际上,对于创作、表演而言,“演真人”中的“真实性”是一个更直观、便利,又更被限定的状况。曾在《戎冠秀》中扮演戎冠秀的胡朋在其创作日记中写到:

扮演一个真实人物和创造一个典型是各有所难的。平常创造一个型,只是依据着剧本和平日生活的经验,这一方面来说是难的。然而在创造典型上来说,范围就更大些,受的限制就比较少些。然而扮演一个英雄就不然了,虽然英雄本身就是一个典型。同样的感情,在各个英雄表现的行动就不一定是一样的,她有她一定的特征。因此,还要受真人的限制,但是另一方面说来,真人在,又是很便利的条件。^[28]

于是,演员对原型的观察、揣摩既需掌握其动作、语调,又需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单要模仿外形、琐事,更需把握其“思想感情”。这种再创作出来的“真实”是复合式的,既有表象的逼真,又有对“真实”背后“本质”的赋予与呈现。由于这种真实要放到“真人”、熟人面前检验,它的创作、呈现不能一次性完成,而需不断放回经验打磨。像《李国瑞》

的创作过程中，李国瑞本人就对剧本细节提出意见：“我受处罚后，从未流过泪的，那一句话应该改成报复性地说：对！咱们走着瞧，你们他们咧皮就别犯错误。我受了处罚后，常常是这样想的。”^[29]这使得“写真人”“演真人”成为一个不断加深对经验、人物理解的过程。

另一方面，对观众而言，看熟悉的人被搬上舞台，本身就能激起很大的好奇心。民兵英雄李殿冰的事迹被改成报道剧在其家乡附近演出时，“几十里以内的老乡都轰动了，看戏的人数之多，打破了过去任何一次晚会的记录”。李殿冰和他的伙伴们都跑到后台去看扮演自己的演员，看他们化妆。观演过程更充满新鲜和投入感：

李殿冰是尖地角一带老乡们所熟悉的，人们天天看见他在山上打野兔，平平凡凡，没有什么可注意的。可是舞台上的李殿冰，却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新鲜。开幕的时候，人们一面注视着台上，一面低声和自己身边的人说：“殿冰！殿冰！”有的情不自禁，就大声喊了起来：“董四、董长庆上来了！”看戏的人们，不但看到了李殿冰，而且也听到了自己在紧急情况下喊叫和惊惶。有些人发现了自己的家属在舞台上行动很逼真，便报以热烈的掌声。^[30]

这样一种“演真人”一方面将平凡、熟悉转化为不平凡和新鲜，另一方面，它的“熟悉性”又将观众进行了一次再组织。

此外，创作者也意识到“演真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戏的宣传、教育内容与“戏”效果不足的矛盾，可以进一步弥补群众创作时缺乏内容把握和技巧不足的痼疾。之前演“新戏”的实践中，村剧团能演新戏者大都受到专业剧团的帮助、辅导，其趣味、技巧也有向专业剧团靠拢的倾向。而随着群众演戏的范围扩大，不可能所有村剧团都接受专业剧团指导，大部分村剧团的编演能力有限，演专业剧团提供的剧本则往往有困难，常“闹剧本荒”。本来群众演新戏的兴趣就不如演旧戏大，如果不能创造出的一套易于操作的编演模式则新戏很难占领阵地。“演真人真事”的成功开辟出一条兼顾两者的新路。

不过，专业剧团的演“真人真事”是一个颇为耗时耗力的创作方式，其难度甚至大于以往的编演。无论从强调群众创造性的角度，还是从群众演戏的现实条件出发，发动群众自编自演都是一条有必要探索的路。抗敌剧社选择高街村剧团辅导就是要创造出的一套村剧团自编自演的样板。

高街村合作社

抗敌剧社派去帮助高街村剧团排戏的汪洋（抗敌剧社副社长）、张非（抗敌剧社音乐组组长）为总结这次创作经验曾写过一份很详细的材料（《〈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31]。根据这份材料，最初排戏的动机是为了配合区宣教会议，是一个“赶任务”的戏，要五天后演出。一起商量主题的剧团编导、区干部和村剧团成员开始想法不一致，最后，本村的周福德提出演个“穷人乐”。至于怎么叫个“穷人乐”，周福德的解释是：

抗战前咱们受喇嘛的苛打，卖人口，掏典钱……八路军一来，二五减租，“下打典”，佃户们有了永佃权，种地保了险，1939年教导团帮咱们修滩，咱们又有了滩地，去年鬼子大扫荡弄得咱们什么吃的都没有，今年春天政府贷粮、贷款、贷籽种救济咱们，要不凭什么活到现在？！今年除了稻子不强以外，什么也是丰收。从前挨饿受冻，现在有吃有喝，这不叫穷人乐吗？^[32]

这里所说几乎就是后来演出本的场次框架，因此是否当初原话或可怀疑，但里面传达出一些关键的自觉意识：就是把七八年来的变化看成一段由“苦”到“乐”的过程，

而这种由苦到乐又是与新政权一次次的帮助、介入密切相关。经由新政权的介入，村子有了自己的“历史”，这段历史的内容是新政权赋予的，这个历史的方向是让穷人“翻身”。老百姓虽尚未发明、掌握这个词，但一经意识到“由苦变乐”，就初步取得了与这个历史方向的一致。

事实上，所谓“苦”不单是抗战前受喇嘛压迫时有，抗战七年对村庄来说意味着连续不断的“苦”——大水、饥荒、扫荡、蝗灾，其“苦”的程度甚于交租、苛打。所谓新政权的介入并非消灭这些“苦”，而是把被动的“苦”整合进一个个克服“苦”的主动过程中。因此，讲述中留下的痕迹不是再现一轮轮“苦”而是怎样一次次克服了“苦”。所谓“乐”不单是物质上有吃有喝，更是从精神上超越苦的压迫，从“苦”的循环、绝望、无可超脱中挣脱出来，获得可以战胜它的信心。^[33]

所以，“穷人乐”的说法一经提出，大家都眼前一亮，一致赞成。不过，对于其内容究竟有哪些，从何入手，村干、区干、剧社编导一时都说不清。周福德等人也觉得如果写整个过程“事太多太长，闹不了”。剧社的创作人员从而决定把主题集中于陈福全合作社如何组织群众生产：

“穷人”、真的“乐”还是由于今年的大生

产运动。这戏应该反映证实毛主席“组织起来”这个伟大思想，搞“组织起来”是通过合作社完成的，而高街合作社又有这样多的创造，陈付全的威信又很好，有可能当选英雄，这个戏应该着重表现这些东西，……^[34]

这显然是对高街村历史一种缩短了时效的理解，以及紧密配合当下“中心”的意图。毕竟，当时高街村最引人瞩目的是其改造合作社的成功经验。

高街村合作社自1940年就已成立，一直半死不活，到1944年初，只有股金四百元，“干部不负责，没给群众办事，威信很低”。1944年2月，陈福全被选为主任后着手整顿账目，分了红利，初步取得大家信任。彼时村子最急迫的任务是渡春荒。1943年冬，这里遭到日本军队扫荡，春节过后，很多家已揭不开锅，商量着去逃荒或借高利贷。为此，陈福全到区社借了五千块钱，买下粮食、红薯分给灾户，“接着扶持八户灾民卖豆腐，每户供给豆子二斗作本，七户作运销，维持了生活”^[35]。随后的春耕中，农具、粮种缺乏，合作社收买群众碎铁八百多斤，到城里打出农具60多件，原价卖给贫苦户，又解决粮种问题，使得全村土地得以按期播种。“从此，合作社才得到群众的拥护，看成是自己的经济组织”。

高街村地处大沙河沿岸，水地较多，要想

种好庄稼有必要组织起来，精耕细作。而陈福全的创造特别体现于在拨工互助过程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组织拨工和灵活的记工、换工方法。最初，村里是将一个自然村组成一个大拨工队，共三队，因由干部指定，不起作用，大家反映：“组这么大，闹不过来，感情不好的在一起，组是白闹，强的弱的一起拨工，不公平”。因此改为自由组合，组成了23个组。不到一个月又有四组垮台，原因是：“贫的给富的拨了很多工，富的返工，贫的用不开，长期欠下来，贫的感觉还不如当短工，能立时得工钱”。于是，在组里民主规定工资，“小组里记工，十天清工一次，用实物或款清工，贫户清不起，社里垫付”。这样才使拨工进行下去。

大生产运动中组织劳动互助的基本原则一是自愿结合，二是“严格的等价交换和精确的记工折工，保证做到互利等价交换”，三是灵活地组织拨工、换工和调剂劳动力。这都是互助能够达成、持续的条件。“早期的许多互助组，就因为过分强调‘涵厚’，不计较吃亏占便宜，而弄垮了台”^[36]。然而，由于分散的农村劳动特有的琐碎，不容易有精确的计算和衡量标准，土地远近好坏和生产条件不同，劳动力强弱、技术的差别，增加了计算的复杂程度。因此，发明因地制宜的计算工分方式和分配、调动劳动力的方法至关重要。陈福全正是在这些方面不断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比如，“化整工为零工”，将一天的工细化为五小工，有事可随时退工入工。这样解决了干部有事或组员支差送信误工的问题。在调动劳力上则发明“零拨整还”：“在一道山沟里或‘成地’里作活，不分谁的赶着作，本组的地作完了，天要不黑，就给别的组作，按地块大小，草多少评工记工”。以此解决来回跑道浪费工夫的问题。此外，到收获季节，他结合反扫荡经验，把拨工队变成抢收队：“在战斗的情况下，按群众逃散的地点，组织临时的拨工组，收割庄稼，一人拨一天，轮过一遍就算拨工，如果后收割的被敌人抢了，先收割下的粮食变工分”^[37]。

除了拨工互助，合作社另一项突出工作是组织妇女做鞋。高街村以往副业不发达，只少数几户到城里卖零食。“在农闲时妇女们作过了饭，拿着针线活，支支应应，聚在一起东长西短闲聊”。而大生产运动要求将所有劳力都调动起来，因此，合作社想到组织妇女做鞋卖，先找来一个积极分子（赵国凤）做样板，由合作社供给原料、推销成品，半月工夫做成七双，赚了673元，“当下买了一疋布，缝了一件新衣裳”，到处宣传，把妇女们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合作社为推动做鞋，不惜亏本，原料减价。他们还改良样式，造出标准鞋，让大家互相比赛，提高质量。同时，鼓励妇女变工，纳鞋底的纳鞋底，配帮的配帮，提高生产率。

鞋价则民主评定，谁认为价低可拿到集上另卖，卖不了合作社再收买。一年下来共做鞋770双，得利六万多元，“光赵国凤今年靠做鞋买了二疋布、一个小猪，解决了一年的油盐，还入了200元的社股。”^[38]

高街村合作社的历史可说是根据地合作运动发展的一个缩影。从1939年起，晋察冀边区就大力提倡发展合作社。但早期合作社常依政府命令组成，多消费合作社，很多合作社目的在赚钱，资金常靠政府贷款，管理上则为少数人把持。因此到抗战形势紧张时大部分垮台。但战争破坏、经济封锁又使得生产救助、自给自足、化零为整更为急需。于是，到1942、1943年，随“生产自救”的提出，合作社运动重新得到开展。其指导原则转向“民办公助，发展生产”。组织上完全采取自愿原则，入社退社、入股退股不受约束，社主任民主选举产生，不拘一格，以能经营、有服务心者为善。降低入社门槛，股份不限、股额降低，且允许实物入股、劳力入股，以利吸引大部分老百姓参加。合作社侧重生产、运销、副业，不鼓励消费、金融，以服务生产为目的，不以赚钱为目的，有合作社因为让利社员而亏本还得到表扬^[39]。同时，提倡合作社“兼营”而非“单营”以适应战争环境下的农村条件，更鼓励在生产业务中发展副业。

总之，新合作社运动的目标是在抗战最

艰苦的状况下发展生产、救助民生，并在实践中发展出灵活机动的组织生产的方式。并且，其效用渐渐超出劳动生产而发挥出综合性能。李普在《我们的民主传统》一书中曾记录了一个合作社主任的讲演，报告他一年中利用合作社在村里办的几件事：办接生训练班、办民办小学、办义仓^[40]。事实上，许多合作社发展起来后都不再是单纯的生产、经营机构，而是承担起多方面的公共服务功能。之前，战争状况与多年村政积弊使许多村政权沦为支应、派差、征粮、纳税的工具，而原有乡村“会”“社”所能起到的组织生产、救济贫困、公共服务等功能则付阙如，由此造成乡村自我修复功能的破坏。合作社的兴起，使其在村政权之外打开一个空间，一定程度上接续了“会”“社”传统，不仅发挥经济功能，更助力文化复兴，使乡村逐渐恢复活气。

高街村合作社从松松垮垮到经由贷款救灾发展起来，进而为群众生产提供支持、组织变工互助、启动副业生产、推动文化卫生工作、发展村剧团，每一步均与边区新合作社的要求若合符节。而合作社发展中饱受困扰的难题是称职干部难找——“政治上强的，行为上好的，大都不喜欢经商计数，喜欢经商计数的人，政治又未必强”^[41]。在环境转恶的情况下，所谓“成分”不好者，只要经营得法，也被认为是合适的合作社管理者^[42]。

因此，如陈福全这种出身贫农^[43]，又有一定管理、组织、经营能力，短时间内把一个可有可无的合作社搞得风生水起的能人，自然难能可贵。因此，推广其生产、管理经验就成为宣传陈福全合作社的主要目的。

排演经验与“群众创造”

既然所有的焦点集中于陈福全和合作社身上，那么，抗战剧社编导最早构思的剧本就以陈福全办合作社为主题，题目一度就叫《高街合作社》。第一稿剧本共十二场。第一场是个帽子，以快板方式介绍村子抗战前的苦与抗战初期变化。采取这种形式基于编导们的创作经验：既照顾群众意见（要写过去的苦），又形式完整、节省时间。不愿直接演第一场的原因多顾及演出效果——后来被检讨为“形式主义”——如演抗战前，还得加抗战后一段，太抻，而且“需要演员换装，时间太长，冬天观众受不了”。于是，整个剧的主体从1944年春合作社发放春荒贷款起头，先后表现贷粮、贷款、贷农具；陈福全拨工中创造“整拨零算，零拨整算”“实物清工”；组织男女光棍拨工；成立儿童拨工组；成立妇女做鞋组，民主定价，拨工做鞋；集体打蝗虫；生产与战斗结合，创造“包拨合一”武装保卫麦收；挑稻蚕；还贷粮，交救国公粮；最后，快板总结大生产，

秧歌舞结束。整个剧的内容基本是合作社各项经验的形象化表现。

如此看来，整个剧还是专业编导结构、设计的，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编剧只拉出了一个结构大纲，每部分的内容尚待细化，台词一句没写，很多场次如何表演也想不出来。时间紧迫，大家商量的结果是不写台词，按以前演“幕表戏”的经验，把角色一分配，故事一说，台词由每个人自己想。这样，就使得“编”“排”融合为一个过程。这只有演自己的事，演熟悉的人才能做得到。

接下来，整个排演只用了两天，第一天晚上排了八场，第二天晚上排了四场，速度可谓惊人。按常规，以导演给演员“说戏”的单向传授办法是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的。这里关键在于把排演变成一个相互启发的过程：一方面，导演要启发群众如何还原、表现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群众的办法一经激发出来又会启发导演，“一面排、一面编、一面记”，排演一轮，剧本就基本形成了。

这个过程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中还需具体办法。对于没有表演经验，甚至观看经验都很少的老百姓要上台演戏须克服一系列障碍。比如，记不住台词；在台上手足无措、很僵，没有动作；忘记“过程”，不能还原到规定状态中，或者直接搬用生活中自然状态而缺乏舞台上的空间感和调度性。这些都要找到办法来

解决。像一开始没打算让本人演，还是让剧团团员报名出演。可戏里需要的人多，很多没上过台的团员也得演，加之没剧本，得现编，大家的信心很差。演真人则更难，演陈福全的演员在台上不仅没有他的动作样子，连他该说什么也不知道，只好陈福全在旁边编一句，他说一句，但说了一次就忘了。这个戏里陈是主角，如果这个样子，戏就排演不下去了。于是，大家鼓动陈福全自己上台演：

陈本来是个不怕任何困难的人，见到这种情形，加上大家的鼓励，就亲自参加排演，马上使整个排戏场空气为之一变。陈左右逢源，滔滔不绝，并能提醒别的演员，特别在气质上，动作上使人觉得自然、亲切，一点也不故作夸张，就是说话啰嗦一点。经周福德提醒之后就简练得多了。大家对亲自上台很有兴趣，说：“这可真是比谁演得都像！”^[44]

经由这番尝试，确定了自己演自己的原则。这样一来，在“真人”与“真事”之间需由编剧转化的过程被整合为一个更直接的过程，“排”“编”“演”三者结合起来，极大加快了排演进程。

当然，找到“真人演真事”的捷径，不等于一步到位，各个环节上仍有许多待克服的状况。像台词方面：

聪明的演员自己可以编，随排随编。有的
一时说不上来，要求先排过去，想好了第二
次排时再说。一般的是先说一次，问对不对
才敢说。妇女们要问得清清楚楚，心里先琢
磨一下才说。一开始大家说得很不自然，说
了这忘了那，旁边周福德与陈付全口编，大
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补充，我在一旁记录要点。
第一次不要把话记下来，因为不成熟也没有时
间，但一定要把说的几个问题记下来，演员
往往在第二次排时忘记一部分，记住一部分
最重要的话。在排过一两遍以后，最生动活泼，
而又丰富正确的语言就产生了。^[45]

这是一种经验谈，在此过程里，原先不知
如何在台上讲话的，也渐渐领悟到舞台语言的
原则。他们自己的概括是：“平常怎么说的上
台就怎么说吧，反正都是庄户话，就是怕啰里
啰嗦，该捡那‘吃劲’的话先说，不吃劲的少说，
再配上点杂八话添枝添叶的，……”同样，身体、
动作表现也靠导演启发：

群众表现自己做过的事情的时候，一般
忽略了戏剧里最需要的东西——“过程”，春
天饿肚子没有力气，说话动作都应该没有劲，
可是群众表演这一段的时候，很愉快地说着
合作社如何好，如何解决困难的话，忘记了
当时当地的情形，这时就须在一旁提醒他们，

特别在排第一二遍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必须把
群众引到过去的生活里，并使群众从过去生
活的实际出发，否则，因为事实上现在吃饱了，
他不愿再回到过去的样子，又因为对演戏看
作是闹红火，像不像也不太注意，这时需要
很耐心地向群众解释，提醒演员注意，说：“你
现在俄得要命呢！”“天气热得很啦！”“说话
要慢，一面想一面说。”^[46]

与说话一样，群众在台上，一开始很不自
然，僵的很没有动作。过去给群众排戏，是
给他们“拉架式”，“拿个架式”，让群众照着做。
群众怎么也做不自然，认为“拉架式”很难，
所以也就怕演戏。这一回因为是演自己的事，
我不大了解劳动过程，根本“拉不出架子”，
所以就请他们自己拉。老乡说：“拉咱们平常
的架子就行了，”“该怎么个架，就拉怎么个架。”
但是演戏终究不是平常过日子，要注意舞台
上的限制。例如锄苗的一场，一上场，大家
你挤我，我挤你，横着一排从台左锄到台右，
只顾说话了，我就提醒他们：“你们在地里也
是这么干活吗？”他们马上就想到，用“雁
别翅”好，于是改过来。他们坐在地里休息
啦，可是谁也不动，等着说话。又提醒他们：
“你们休息的时候不吸烟呀？”他们很快地每
个人想起一种动作，有的修小锄，有的吸烟，
有的擦汗……想起了“生活”，后来就创造了

一句术语“不要忘记生活”。^[47]

“在舞台上生活”本是现实主义戏剧的原则，“真人演真事”直观上似乎可顺利地对接这一原则。可现实主义式的“再现”又是一种构造，不是真的“在舞台上生活”。因此，排演中的磨合恰是让演员摆脱一种自然状态而靠近“现实”的规定性。在此过程中，导演固然有什么样的表演才成立的规范认识，但他诉诸的手段却非规定式的，而是启发式的。他有耐心去理解、照顾群众的习惯、心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引导。对于毫无表演经验的老百姓如何使他们不但不畏惧、不排斥表演且能创造性地发挥，这本身就需要一种创造性尝试。如果说群众在表演中能有所创造，其前提在于指导者排演实践中对“群众”的创造性把握。导演在排演过程中对于诸种不利条件不是靠纠正动作、传授技巧解决，而是要大家一起“想办法”，不断试、不断找，随时甩掉、突破一些限定。这使得整个剧的创作空间是开放的。一旦表演者有了创造、办法时导演又需及时加以肯定、吸收。像剧中儿童拨工时的无实物动作、收麦时近于舞蹈的劳动场景、打蝗虫和挑稻蚕两场的表现方式都是由演员在排练时发明出来而得到导演高度肯定：

在排战斗与生产结合这一场时，他们自动

地在台上转场，只拿一把镰刀作收割，用动作表示“扎麦个”，扛到场里，一个人铡麦穗，两个人“擣麦个”，一个人摊开，三个人把臂膀互相拐起来，就在台上拉起碾子了，用动作表示“扬场”等……动作既准确场面又美丽，接近舞蹈，但完全有真实感。这一场的动作在全剧里是最突出的，给人以紧张战斗快收、快打、快藏的感觉。这一点完全是在排戏时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我只是提出不用道具，而他们竟能那样真实地表现出来。^[48]

诸如此类创造反过来带给导演兴奋和启发。对于剧社编导来说，他们要在这个剧的排演中摸索的创造性不单是剧本本身的成功，更是一套帮助群众进行“群众创作”的经验和方法。这种经验特别要在排演中打磨、积累起来，所以，对他们而言，定主题、拉结构固然重要，但真正贯彻“创作中的群众路线”的要求需集中通过排演过程体现出来：

排戏过程是发挥群众创造力的最重要的过程，要善于启发群众“表现生活”，有时候只要说一句话动一动，都会把群众引入自己的生活，……发动群众搞起来了，就时时刻刻注意不要用自己的趣味、感情、动作去代替群众的趣味、感情与动作，要保存群众艺术的萌芽状态，不要马上就否定或急于提高，

要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创造，不要把自己的一套搬出来乱用一阵。……^[49]

“群众路线”要求所产生的效力是将专业人员“帮助”群众排戏的意识扭转为“向群众学习”。首演后三专区的座谈会上特别提出：“我们下乡不要再摆领导人的架子，不要再说是帮助人家，而是向人家学习，是提升自己，锻炼自己和充实自己。”^[50]这样一种以自我改造为前提的意识有夸大其词的嫌疑，但在创作过程中实际的效用是给群众留下了更大的表现空间。这不仅体现在较为明显的动作、语言创造上，更进一步体现为在内容上尽量揣摩、体会群众的感情、表达方式，保持其原初性和生动状态，不刻意抬高。

最后一场的结束快板中，对“穷人乐”的“点题”很重要，编导为此问周福德，老百姓眼中“乐的标准是什么呢？”周的回答是：“吃要吃黄干粮、小米捞饭、杂面汤、豆腐白菜、煎饼”“穿要穿结实的灵寿布，新里新面”。于是，这些内容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台词中：

大秋里头忙又忙，谷子稻子堆满场，你看那绿豆绿，黑豆黑，白豆白来黄豆黄，我老汉，吃的是，饅饅，煎饼，杂面汤，磨豆腐，烧菜汤，小米捞饭黄干粮，我老汉穿的是结结实实的灵寿布，新里新表新衣裳，脚上穿的高街鞋，

底大梆小样子强，底子拈了五十行，……^[51]

这样一种看起来有点儿“低”的“乐”的标准恰好基于老百姓的生活理解，是其精神思想的现实基础。而这种物质满足、实利主义又是“大生产运动”诉诸的调动机制。因此，这种“乐”的形态并不因其原始而被筛除，反而在剧中被置于突出位置。相应的，在表现饥荒时，也是借助乡亲的列举：

简直不是人吃的东西，俺们也就全吃啦，你想什么大麻叶、黄菜挺子，这还是那好的哩，像那老榆叶、老柳叶、杨叶、臭椿叶、香椿叶、桑叶、槐叶、秋叶、杏叶，什么榆皮挠子、荞麦皮、薯棒楷子、长生果皮，全吃啦，你看村外头那榆树全都剥的光光哩，净跟那“红齿格年雀”（才孵出的小雀，没有毛）啊是的，一个个净吃黄黄的，险就不是人色，像黄菜啊是的，碗里端着那饭，一阵风就刮上跑了。^[52]

这看上去有点儿啰嗦的列举正是乡亲记忆的“内容”，他们的生活感受大多不是借助概念和叙述来保留、呈现，而是通过这些“物”的记忆来传达。编导对此有充分的理解。全剧结尾的快板中有“棒子长了这么大，谷穗长的这么长”的句子，他就想到让五六个儿童，拿着大棒子（玉米）、大谷穗、大北瓜、大山药、

大萝卜上场，扭起秧歌。演出时，看见孩子们举着代表丰收的庄稼上场，“观众禁不住大大地鼓了一次掌”。

在语言上，由于强调群众自己创作，几乎全部采用当地老百姓的土话。哪怕在后来加工成文字剧本的过程中，这些土话也都保留下来。今天所能看到的印刷出版的剧本中存在大量拉丁字母的注音字，有的是没有汉字对应，更多的是通过注音标注方言发音。因为是本村人演给本村看，采用土语理所当然，但在整理出版中也保存土语状态和标注发言则与这一阶段对“群众创作”较为激进、彻底的理解相关。

经过几天紧张排练，第一次在村里的公演从专业角度讲暴露出不少问题：

村剧团从来没有排演过这样长、人这样多的戏，许多演员都是第一次上台，并不清楚舞台位置，妇女不愿化妆，特别不愿化妆老娘娘，因为是真人演真事，大家都说“就这样吧，不用化妆了”，所以只有几个老头化妆了。第一场本来该穿破衣服饥饿的样子，大多数都没有带破衣服……这说明了当第一次演出时，演员在认识上还存在着“闹红火”“玩一玩”的观念，对于如何更真实的表现生活认识不足。因此有的在台上笑场、忘词，跟排戏一样，但大部分特别是几个真人

与儿童、老汉演得很好。^[53]

但这样一个有点儿随意的演出却给看戏的本乡观众和二区村干部带来很大的兴奋。本地老百姓没有想到自己做过的事会这样一场一场地被搬上舞台，更没想到几个干部都亲自上台，“一看这么多人上台，演到自己的事的时候，就不由得笑起来了”，演出变成了“全村乐”。一种特别的“直接性”使得“台上台下情绪完全一致，观众回到了过去的生活中了”，由此造成一个共同回忆的空间，激发起观众强烈的带入感。不少观众一边看，一边评，判断演员的动作对不对。而对看戏的二区其它村干部而言，这戏相当于做了一场生产总结报告，且激发了各村自己动手演戏的兴趣。至于高街村本村，演出则大大推进了村剧团与村民的关系，原先不太关心村剧团的村长也对演戏发生了兴趣。妇女做鞋变得更有劲儿，早早到合作社门口等着开集买东西。这都意味着演《穷人乐》不仅达到了“乐”的目的，还推动了具体工作。

更重要的是，《穷人乐》不纯是合作社工作的图解。由于它将工作过程还原到人的关系性中表现，因此，它带出的是蕴含在这些工作方法、措施中人的关系的转换与再组织。换句话说，陈福全做合作社工作贯穿的要点不限于所谓经营、管理，而是如何“做群众工

作”。比如，发放粮贷是合作社第一件重要工作。剧中详细呈现了村中各色人物来贷粮的情况。对有直接要求的，对有要求说出口的，对有困难的，对有想法又不知具体怎么办的，陈福全一一帮他们解决。村里一个二流子“万年穷”来申请粮贷，其他人都不同意，因为这批粮贷分生产贷粮、籽种贷粮，籽种贷粮是为播种预备的，大家怕他贷回去吃了，又不劳动，变成养懒汉。陈福全则借机教育他：“你是有着劲儿不愿意使，我不信山水好改性难移，不怕你这生铁旦，我有炼钢炉，明天你就参加拨工组，庄稼种上了割柴火，不准你闲着不干活，只要你生产成绩好，合作社贷给你贱价布，换换这身破衣服。”^[54]大家都不愿意和他拨工，陈福全就主动和他拨，“你没家吃饭，明早上到我那吃饭”。有人提出不要给当过特务的人贷粮，陈福全则讲了一番自己的道理：

按说特务们破坏抗日，本不该贷给他们，现在政府实行宽大政策，只要他坦白了就是好老百姓，咱们是说服教育，咱们不拿贷粮逼迫谁，只要是合作社的一员，咱们就贷给他，咱们拿这部份粮食来教育他，叫他吃了，黑下躺在炕上啰，拍着他那心肺想想，究竟是咱们抗日政府待他好哇，还是他那日本老子待他好，这是我自家的意见，你们说呢？^[55]

这样的做法见缝插针地把合作社工作促生为一个个促使村中各色人物向好里“转变”的契机。其调动的是一种照顾各方、相互扶助的乡里传统。基于此，他不愿意诉诸“逼迫”，更愿意启发“良心”。同时，让拨工组给卧病在床的人赶工，支持妇女养猪，都体现合作社扶贫济困的功能。剧本在呈现贷粮过程时可谓不厌其烦，先后上场申请粮贷的不下二十人，各家有各家的困难，有简有繁。这样一种罗列，因为有真人真事做依托而并不显得重复，反倒比说明性的表演更能表现出合作社如何在村里做生产的工作的同时也做“人”的工作，并造成一种特别的舞台效果。

事实上，这样一个戏中，很少有人能称得上是现代戏剧意义上的“人物”或“角色”，即便“主角”陈福全也不具有一个戏剧人物必要的概括力和典型性。上场的形形色色的乡亲中更没有哪个人可以从群体关系中抽象出来而具有所谓“性格”，并由此构成“矛盾”“冲突”，发展出一般戏剧必要的“情节”。戏台上人的关系就是生活中人的关系，他们和乡村生活中的人一样置于一种群体的关系性中，尚未分离出“个人”的状态——从演出记录本中可以看出，戏中演员通常是一群一群地上场，很多场次有一二十人同时在场。他们的言行、他们演的“事”也是现实中劳动、工作、“事”的再现。但这种看上去未经充分加工的搬演恰

好保留下乡村生活原有的关系性，诸种与老百姓生活、生计息息相关的工作正依托于这样的关系性发挥着作用。同时，这种演出中，“表演”的演员与“观看”的观众也未真正区分开，其一致性正是此种“演”与“看”得以成立的基础。这种不像“戏”的戏不自觉地构成了对已领域化的“戏剧”与“戏剧性”的挑战，或者说将现代戏剧拉回某种戏剧发生的原初状态，重现那种“戏”和“事”、“角色”和“人”、“演员”和“观众”尚未完全分离状况下的“演戏”。这种“返璞归真”置于现代戏剧的背景中甚至显露出某种艺术上的“实验性”。

重排与“提高”

虽然首演有种种不足，但编导在总结中称自己非常珍爱这个戏的“萌芽状态”：“我觉得这是真正的群众艺术，而过去我简直没有看到过”。^[56] 感触尤深的是他在许多群众的朴素创作中体会到了艺术创造的原初性。像群众根据打蝗和挑稻蚕两种劳动发明的动作表演：“劳动人民用他自己熟悉的方法把自己的劳动变成了舞蹈，过去我只在书本上看到，听别人说过。艺术就是这样开始了自己的道路，而今天在这个工作中，我亲身看到了，虽然这只是一种‘萌芽状态’的东西，但这个奇迹。”^[57]

首演获得好评之后，为了参加边区群英会，

剧社编导们决定对《穷人乐》进行补充和“提高”。而重排最初确定的原则是要“正规化”：

看村剧团演剧总给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没有固定的台词，舞台上说的话常常易于混乱，甚至有些很重要的话都被那些不重要的对话弄得叫人听不清楚，有时还破坏了整个戏的感情和效果。又因为没有固定的位置，随意走来走去也容易使场面零乱，破坏了舞台画面的构图。……因此在开始排戏之前，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按剧本排演，上台不许多说一句，也不许少说一句，更不许乱说。这次要用布景演出，不许乱走，叫你在那里你就在那里，叫你到那里你就到哪里，不可以随便。^[58]

但这样一来，把演员们彻底限制住了，“有的是光为记词忘记了动作，有的是光记住位置忘记台词”，讲台词也开始“撇起京腔来了”。重排的不顺利使得剧社编导起了自己来搞的意念，想把《穷人乐》改编成《白毛女》式的歌剧，由剧社自己来演。不过，这种想法很快被放弃了，因为这被认为违背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沿着群众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的原则。明确了这一点使大家又回到帮助群众排演的轨道上，不再用剧本限制演员台词，取消了布景，不再试图编歌剧，而是将根据地流行的歌曲、

小调插进剧里,由演员自己选用。重排过的《穷人乐》在边区第二届群英会上一炮打响,连演四天,盛况空前,效果比排演好很多。

不过,相对表演,重排后最要害的补充、“提高”是加进了抗战前喇嘛逼租的一场和抗战后新政府减租、军民合作拉荒滩、民主选举、反扫荡等几场戏,使得整个剧扩充为十四场,从一个小时变为三个小时,主题也从“高街合作社”发展为表现高街村几年间的历史变迁。时为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的宋劭文对它的评价——“穷人翻身的一幅活图画”“边区历史发展的简明而又生动的报告”^[59]——可以概括改编后的《穷人乐》给人的整体印象。

如前所述,最初《穷人乐》的动机就来自群众“由苦到乐”的对比意识,历史部分被弱化主要出于演出实际的考虑。但这一删除在第一次演出之后即被批评为不尊重群众意见。高街村出身,在排演中起重要作用的区宣传干事李又章,根据三专区文艺座谈会上的意见将其提升至群众观点与阶级立场不足的高度。就此,这一“失误”成为创作者在每次总结中反复检讨的问题。同时,第一场“喇嘛逼租”也成为重排时的重点,整整抠了一天一夜。原因在于年轻人并不熟悉这段生活。从演出记录本中也可以看出,这场戏的构造、立意很像《白毛女》《血泪仇》《赤叶河》一类有诉苦成分的戏。“新旧对比”本来是解放区戏剧

的一个基本模式,似乎没有“旧”就显不出“新”。此种对比确实易于造成较为强烈的戏剧效果。尤其“旧”的那部分往往接近苦情戏,与传统戏剧中“悲”“苦”因素可以衔接起来,演出效果好。《穷人乐》中加了这场后也取得了很好的现场反映:结尾处,李凤祥要卖女还租,解下腰里的绳子,硬抱着女儿下去,“满台的演员都失声痛哭了”,“感动了所有的观众”。

但《白毛女》《血泪仇》等剧新旧对比显得抽象的地方在于简省了由“旧”变“新”的过程。以此来看,《穷人乐》的改编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尚不在加了“喇嘛逼租”的头儿,而在于接下来把抗战之后新政权带动下村庄一步步的变化连续表现了出来。这特别展示出根据地民众的“翻身”不是一次运动的后果,它是随着整个根据地的历史起起伏伏,但又不断累积而成。

像,剧中第四场“军民合作拉荒滩”反映的是1939年到1940年晋察冀地区的大水灾。1939年7月的这场水灾曾淹没村庄一万多,造成灾民三百万。“尤以大沙河沿岸,更为严重,阜平从法华的苇子萋到王快的高崖,长七十余里,一百七十多顷良田,顿时变成了一条荒凉的沙滩。”^[60]为抗灾,政府组织所有劳力修滩,生产自救,动员全体子弟兵,“日夜帮助人民修滩,挖大渠,背石头”,总共修滩10000亩,帮助春耕181278亩,开渠150道,掘井160眼,

兴修了一系列水利工程，使得1940年一举取得丰收^[61]。阜平老百姓对此念念不忘。

其它一些场次表现的内容，如第三场“减租参军”，第五场“民主大选举”，也都是影响村民生活深远的事件。剧中对它们的表现不流于一般，而能抓住一些触动老百姓的侧面。在减租中，老百姓不只关心减租数目，更在意交租过程的变化：

祥：咱们以后交租子，还有庄头没啦。

周：没啦，没啦，别说没庄头啦，二东家也没啦。

马：那交租子咱们亲自去交。

周：亲自去交，不受庄头气啦，没庄头啦。

众：咱们还给喇嘛罚跪不？

周：不啦，咱们坐下，不比喇嘛 cuo（矮）他立起来比咱也不高，以后平起平坐，他比咱也不大，咱比他也不小。^[62]

“民主大选举”一场也用侧面写法，通过瞎子、拐子、放羊的和妇女几类人去投票路上的对话加以表现。较为别致的是，选举对妇女的直接影响是使得很多人第一次有了大名。对于素来只有小名的妇女来说得到一个大名既新鲜又兴奋，于是几个人在一起比较起自己的新名字来，有的得意，有的不满，有的把刚起的新名忘了^[63]。这些段落使得整场戏

显得活泼生动。

不难看出，这些场次的设计显然与剧社人员长期配合中心工作取得的编演经验有关。这一时期边区剧社的创作人员经由多年的磨练，无论在掌握政策还是理解群众方面已有相当积累；另一方面，边区的干部、群众经由抗战、减息、选举、救灾、互助、合作、劳武结合、大生产而被一步步结合进新政权的要求中，而生成与革命政权配合的“人民”状态^[64]。这两方面的结合才令“群众创作”获得充沛的现实条件，才会产生《穷人乐》这样的创作。其生成机制当放置在一个通过“大生产”和整风运动所调动出的新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组织形式与有机关系中加以把握。

“提升”的方式与“群众创作”的现实性

《穷人乐》的成功综合了诸多条件。但這些大背景能汇聚到一个实例中发挥作用又有其“得天独厚”之处。当这一事例扩大为“方向”时，许多特定条件却随之隐藏起来，一些“方向”所规定的要素则被不断加强。

其中，最突出的是对“群众创作”自发性和自足性的强调。在经验总结中，《穷人乐》被认为“从内容到形式都由群众自己讨论决定”，剧社人员固然起到帮助作用，但删掉“喇

嘛逼租”以及要改成歌剧自己演,则表现出“他们对群众的创造能力,有时仍是认识不足的甚至是盲目的”^[65]。这到后来更进一步发展为对立模式:“凡是群众集体创作的东西,偏向就少,知识分子个人编的东西偏向就多”:

凡是群众创作的东西,不管它们怎样粗糙,不合什么艺术原理或规则,但看了以后,总感到亲切妥帖,完完全全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感情、声音。而且,不管它怎样简陋粗糙,总具有一种活泼生动的气息。……相反,在我们一般知识分子所创造或演出的东西,尽管很细致很“艺术”,但看了总感到和老百姓隔着一层,觉得是“装扮”的。^[66]

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没有什么指导群众创作的资格了,只有无条件向群众学习。但群众创作的实际限制是客观存在的,并不足以支撑那个理想的“群众创作”^[67]。原先,专业指导与群众创造是一个双向学习过程,所谓“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老师”。从《穷人乐》的创作实践看,在往复性中激发出的经验才最具活力。一旦这种往复过程变成了单向改造,那些在相互性中存活的创造经验就无法充分整理和传达。这其实脱离了“群众创作”的现实性,构成对“群众创作”经验的窄化与窒息。缺乏有效指导和真正催生创造过程的“群

众创作”通常导致的结果是模式化。

《穷人乐》中“喇嘛逼租”一场成为焦点,在于它特别体现群众自发的“翻身”意识。《穷人乐》的创作主题因而被概括为穷人翻身后自然产生的表达欲望。于是,“翻身”成为“群众创作”的前提,“群众创作”又是“翻身”的必然后果:“凡是在翻身运动搞得好的地区,农村艺术活动就非常活跃与普遍,反之就显得消沉。”^[68]一时间,“写翻身”几乎成为学习、实践“《穷人乐》方向”的必由之路:

晋察冀自从党的领导机关提出“穷人乐”方向以后,产生了成百个反映农民翻身的戏,如《柴庄穷人翻身》、《杨家庵穷人翻身》、《抗战前后的冯林》、《卖儿女》,以及冀中的代表作《苓少爷变成三孙子》等,农民把这些戏统称为“翻身戏”。^[69]

“翻身戏”因为取材本村历史,又有前后对照,确实较适合村剧团自己编演。但千篇一律的“翻身戏”也会限制“群众创作”的拓展。秦兆阳在《实行〈穷人乐〉方向的几个具体问题》中就提出许多村剧团以为实践“《穷人乐》方向”就是演《穷人乐》式的翻身戏,是一种肤浅、机械的理解,应该让大家意识到,要害在于“为政治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70]。也就是说,配合政治任务需要的是机动灵活,

一旦变成千篇一律就失去了与政治流动性的互动机能。

此外,由于对群众自发创造性的夸大估计,原有乡村戏剧运动所借助的一些资源遭到了抑制。在边区乡村戏剧发展中,起支撑作用的有几股力量:一是部队、地方的专业剧团,它们是将“新戏”带入农村的主力。二是旧戏班子、自乐会,它们往往构成村剧团的基础,那些有旧戏编演经验的人可以在演新戏中发挥核心作用^[71]。三是乡村知识分子(尤其小学教员),他们有能力接受新政治的影响,又可以自己的“文化人”身份在村中发挥组织作用。成功的村剧团常常有这一类人带头。

而随着“群众创作”原则的绝对化,专业人员的“为群众创作”“写群众”都被指责为群众观点不够——“事实上还是只承认自己才能从事于文艺,而把群众关在文艺的大门外”。正确的方针变成:

大大提倡与尊重群众的创作,发扬群众的文艺创作才能,把新文艺的创造与发展,依托在群众身上,而不需要我们自己来包揽这个大任。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应该主要的是培养群众创作才能,和群众的文艺家。而不是只专心于自己来创作什么新文艺杰作,及把自己培养成什么伟大的文艺家。^[72]

这样看上去,专业文艺工作者完全服务了群众,但他们自身的提高、打磨则被忽视。而他们能够有效帮助村剧团与自身修养的提高本来有着密切关系。之后,随着内战、土改等工作的展开,许多专业剧团成员分散下放到部队、地方,难以再进行大规模创作;一些专业剧团受到冲击,甚至被解散,使其连“分散帮助”的功能也发挥不出来了。^[73]

同时,这一时期又是对“旧戏”采取“扫荡主义”的时候。虽然尚未禁止旧戏班活动或禁演旧戏,但却强调翻身老百姓只爱看新戏,不爱看旧戏,看了新戏就嫌弃旧戏。这种“规定认识”显然有些一厢情愿。因为随着边区老百姓生活提高,普遍出现的是旧戏班、自乐会复活。大部分老乡更喜欢看旧戏,不习惯看新戏,旧戏耐看,新戏不耐看,不带唱的不爱看,是一直存在的反映。为此,抗战时期,很多新剧团兼演旧戏,或“旧瓶装新酒”,或演新编传统戏,有的没条件演旧剧则以民歌调剂。随着“群众创作”热潮的出现,新戏被认为完全有条件取代旧戏。对待旧戏的方式则是进行从人到戏的改造,使之融汇到新戏中。改造旧艺人、旧戏班固然起到配合革命的效果,但村剧团那种常让观众摇头的“大杂烩”如不能进一步得到滋养则很难将旧戏的资源转化过来。新戏的优势不是主观决定的,没有过硬的艺术水平,竞争力从何而来?此外,

原来在乡村剧团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富农、中农、乡村知识分子很多亦在土改等过程中受冲击，影响削弱。

于是，一方面，村剧团发展的一些支撑性因素受到冲击，另一方面，村剧团却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使命。事实上，新的政治要求是试图让这个以“群众”为主体的村剧团来取代以往在基层发挥作用的、艺术、宣传、教育机构。典型的例子是被认为发展了“《穷人乐》方向”的护持寺村剧团（他们因“实践，发展了‘《穷人乐》方向’”在1946年受到冀中文协的表彰）。他们从演“翻身戏”起步，渐渐突破“真人演真事”和在本村发挥作用的限制，巡回演出，编演当地的典型事例，“把演戏当作一种严肃的宣传教育工作来作”。他们还没有专家帮助，完全是“自己土闹的”，是更标准的群众创作。^[74]于是，一个村剧团几乎取代了之前部队和地方文工团的作用。

此时，对于村剧团的“提高”强调从政治、思想上提高，要使“密切与斗争结合，迅速反映现实这个作风更大加发扬”^[75]。1947年《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太行专署关于农村剧团的指示》甚至提出如下要求：

一个剧的演出要争取跑在工作的前面。剧团干部应明确全年整个工作的方针与各时期

的中心工作，才能抓取关键及时反映，因此剧团应参加必要的工作布置，工作研究及总结会议，县区领导上应不断提供材料给他们，……剧团工作的结合上要有预见，要主动，要经常注意收集材料，密切和区县领导的关系。剧团领导干部本身抓住季节性，对问题要有敏感，要留心时事，掌握每个时期的形势变化，这样才能编演出更有普遍性、现实性的东西来。^[76]

这倒是把上级对村剧团的终极要求表达得很到位，但里面却看不到对村剧团现实条件、状况的分析与顾及。这种指令要求下的村剧团、“群众创作”与《穷人乐》中台词要默念两遍才说得出口的“群众”有多么本质的差距。

这一时期，许多关于村剧团的指导文章都充斥着绝对性表达。像朱穆之在《“群众翻身，自唱自乐”——在边区文化工作者座谈会上关于农村剧团的发言》中所讲：“翻身较好的地方，农村剧团也较好；翻身不好的地方，农村剧团也就不好”；“群众去看了翻身戏后，常常就再不愿看旧剧，反对演旧戏”；“如与中心工作不合时，就是他们最好的戏也不演”；“他们对编剧本不感困难，他们常常可以很快的编出一个剧本来”；“在导演上，他们也不感困难，既然演的是自己的事，一举一动，一言一笑，自己熟悉得很，几乎只要把自己原封原样的搬上台就行了”；“群众在审查关于他们自己的

剧本时，他们实在比我们一般同志立场坚定，观察敏锐”^[77]。

凡此种种，看上去是对群众创作的充分褒扬、信任，可这种表达里只有理想状态，只有无需论证的判断，没有难题，没有曲折，没有克服、想办法的对象与过程；句句不离“群众”却几乎没有关于群众现实性的考虑。用“整风运动”的概念来说，这才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其后果必然是丧失与群众现实互动的机能。本来，倡导“群众创作”是贯彻“群众路线”的路径之一，可是对“群众创作”的理论性认识却变成另一种主观主义。可以说，在“群众创作”的解读过程中，对什么是“群众创作”中的“群众”，怎样处理、转化这个群众的现实经验并未被认真对待，反而在提升为指导性原则的过程中流失了。

反观像赵树理等长期身处一线推动群众创作的人，其经验总结中时而表现出对“群众”的辩证性理解。他在《谈群众创作》一文中就提到，群众创作有他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不是现成之物。社会是复杂的，“群众正是这些复杂面的直接组成者”^[78]。专业作家不足以接触、把握社会复杂性的整体，而群众却可以感知复杂性的不同侧面。换句话说，群众的集合构成“整体”，但这个整体不是整全、抽象而是一种由具体构成的复杂性。“群众”的整体性与具体群众的不完整性构成一种辩证关系。

所以，处理群众问题，一定不是处理那个整体、抽象的“群众”而是那些表现为“不完整性”的具体群众。就现实的“群众创作”而言，绝大部分“群众创作”整体上看都是不合格的，但常有片段非常精彩，甚至这些新鲜的片段也不能求其十分饱满，往往一个剧本中有一场可取或一两段对话可取就是收获，就值得褒奖。一经发现这些闪光点还需根据其不同程度加以不同处理，才能真正成就一个“群众创作”的作品：

（一）不该或略改一下就可以发表的，直接发表了就算了，那是最便宜的事。（二）内容很饱满形式太不像样的稿件，可由负责的人改作一下，不过这种改作要忠于原作，万不可把原作中有用的任何材料改丢了。（三）内容太单纯的稿子，可以合数稿改作为一稿。（四）仅有点滴内容的稿件，可以从多数稿件中把这有用的点滴分类摘下来作为素材，由负责人把它组织为一个或几个作品。^[79]

从赵树理等人的经验可以看出，“群众”相当程度上体现为整体与片段、抽象与具体、主动与被动的矛盾体。因而，做群众工作既是认识性的又是技术性、经验性的。当群众仅被抽象看待时，“群众工作”“群众创造”也就会失去活力。

1949年建国后，解放区的文艺经验成为创造“新的人民文艺”的标杆。其创作经验被不断调动、运用，尤其是“群众创作”的经验更是得到大力推广，将其运用到工厂文艺等诸多领域。但是，如《穷人乐》这一案例显示的，解放区成功的“群众创作”其构成并不那么单纯，它是这一时期各种因素汇聚而成的产物，而这些因素、状态在随后几年中又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在对解放区文艺经验的阐释、整理过程中，许多发挥了关键作用的要素并未真正得到呈现和转化。以这样一种磨损的经验来指导更大、更复杂的文艺创作状况，某种力不从心的状态就显现出来。这种经验转化的不顺利或许并不是文艺界独有的状态，尚需放置在整个革命、革命队伍所遭遇的转化困境中把握。

注释

- [1] 张学新、刘宗武，编：《晋察冀文学史料》，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9月，313页。
- [2] 由于《穷人乐》的启发，1946年春节期间边区村剧团掀起演翻身剧的热潮：“灵寿县各剧团就创作了话剧355个，街头剧179个，平山县的不完全统计就创作各种剧本524个，……”（《晋察冀边区文化艺术工作大事记》，《晋察冀革命文化史料》，石家庄，1991年12月，355页）
- [3] 1944年5月4日《晋察冀日报》社论：《贯彻文化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478页。
- [4] 河北省文化厅文化志编辑办公室，编：《晋察冀、晋冀鲁豫乡村文艺运动史料》，石家庄，1991年，115页。
- [5] 见，周维东：《被“真人真事”改写的历史——论解放区文艺运动中的“真人真事”创作》，《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期。
- [6] 刘子久：《我是怎样写〈给淮北区党委的信〉的》，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二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9月，90页。
- [7] 同上书，91页。
- [8] 同上书，102页。
- [9] 同上书，96页。
- [10] 李普：《我们的民主传统——抗日时期解放区政治生活风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7月，144页。
- [11] 同上书，146页。
- [12] 王林：《为冀中村剧团进一言》，《晋察冀、晋冀鲁豫乡村文艺运动史料》，187页。
- [13] 《晋察冀日报》社论：《贯彻文化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晋察冀日报社论选》，476页。
- [14] 这一时期，在晋察冀创作的写真人真事的主要代表作有：《李殿冰》（冲锋剧社）、《戎冠秀》（抗敌剧社）、《崔洛堂》（战线剧社）、《李国瑞》（抗敌剧社）、《王秀鸾》（火线剧社）。
- [15] 参见，杜峰《“李国瑞”写作前后》，《〈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1945年卷）》（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
- [16] 《晋察冀日报》社论：《贯彻文化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晋察冀日报社论选》，477页。
- [17]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933页。
- [18] 《介绍陕甘宁边区组织集体劳动的经验》，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12月，259页。
- [19] 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其演出》，张非：《偏套集——张非诗文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9月，2页。
- [20] 舒老九：《追忆高街村剧团，缅怀〈穷人乐〉方向》，《晋察冀、晋冀鲁豫乡村文艺运动史料》，250页。

[21] 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其演出》,张非:《偏套集——张非诗文辑录》,三乐堂编印,2008年9月,3页。

[22] 同上书,3页。

[23] 对“抗敌剧社”等团体而言,“政治攻势”的经验奠定了之后接受《讲话》的认识基础。胡可在回忆中对此有所阐述:“一九四二年春,大部分同志两次到敌占区进行政治攻势。同年秋天,派了部分同志到四分区边缘地带参加了反蚕食斗争。尽管在敌后根据地的农村,我们本身就处在‘生活’当中,住得久的村庄,通过日常的群众工作,也观察到形形色色的农村人物;通过报纸上和上级的形势报告,也知道一些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消息;何况还有那几乎一年一度的反‘扫荡’呢。但是尽管如此,离开文艺工作者的圈子,到担负作战任务的部队里,到沟线外斗争激烈的艰险环境中,和拿枪的农民子弟生活在一起,和游击区风尘仆仆的基础干部生活在一起,和敌寇压榨下痛苦的乡亲们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起经历那动荡艰苦的日子,被他们信赖,被他们当作亲人,那感受究竟是不大一样的。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实际感受,所以当一九四三年秋季读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立刻被我们这些创作人员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下来。此后,我们就开始用‘深入生活’这个词儿来代替‘搜集资料’、‘体验生活’的简单提法。”胡可:《实践中的十年》,《抗敌剧社实录》,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7年11月,64页。

[24] 韩塞:《戏剧在政治攻势的前线上——叙述一些感想和经验》,《晋察冀文学史料》,249页。

[25] 同上书,250页。

[26] 同上书,253页。

[27] 同上书,253页。

[28] 胡朋:《扮演戎冠秀杂记》,张学新编:《晋察冀革命戏剧运动史料》,144页。

[29] 杜峰:《“李国瑞”写作前后》,《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1945年卷)(上),345页。

[30] 《舞台上的民兵英雄——记新闻报导剧〈李殿冰〉》,《晋察冀革命性戏剧运动史料》,174页。

[31] 据张非回忆,这份总结是1945年1月为了“要给延安来张家口的文艺界的‘大人物’介绍一下经验”由汪洋、张非、林苇合写。张非:《偏套集》,33页。这里所指应该是1946年1月8日,边区文化界在华北联大礼堂欢迎从延安来到张家口的周扬、丁玲、肖三、肖军、沙可夫、吕骥、张庚、古元、王朝闻、彦涵等人。会上由康濯、张非介绍了晋察冀文艺运动情况。《晋察冀革命文化史料》,354页。

[32] 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其演出》,张非:《偏套集——张非诗文辑录》,三乐堂编印,2008年9月,第4页。

[33] 根据地在总结“生产自救”经验时特别强调单纯靠救济不能完全战胜灾荒。“靠天吃饭”和宿命论的封建落后思想,最容易在依赖心理这块土壤上滋长和流传。一旦这种心理抬了头,那就必然导致懊丧和失望情绪的发展,斗争信心和勇气的消沉,以至越困难越不愿去想办法,越困难越不愿下田劳动。”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4月,170页。

[34] 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其演出》,张非:《偏套集——张非诗文辑录》,三乐堂编印,2008年9月,6页。

- [35] 周物：《阜平合作英雄陈福全》，《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1945年卷）（上），183页。
- [36] 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181页。
- [37] 同上书，184页。
- [38] 同上书，184页。
- [39] 程子华《关于冀中区合作事业》中曾举定南县合作社为例。大水后粮价高涨的情况下，它们敏捷周转，平抑粮价，又帮群众运棉、卖棉，使群众获利三万元，自己反倒赔了三百元。从此“群众毫不怀疑的信赖合作社，因之社员大增，业务飞跃发展。”魏宏运等：《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三编）》，天津：南开大学，1984年，825页。
- [40] 李普：《我们的民主传统——抗日时期解放区政治生活风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7月，40-46页。
- [41] 《关于发展边区合作事业的指示》，魏宏运等：《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三编）》，746页。
- [42] 程子华《关于冀中区合作事业》曾批评冀中某村合作社，称其过去发展很好，仅因经营者是个地主而改选，使合作社奄奄一息，认为这种倾向要不得。魏宏运等：《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三编）》，826页。
- [43] 据《阜平合作英雄陈福全》介绍，陈福全是高街村本村人，44岁，曾做长工13年，跑过“口外”，为度春荒卖过孩子。八路军到来后，他由长工变为农产，群众选他当工会干部，曾领导雇工向地主斗争，争取半实物工资制。大生产运动后，做家庭计划，超额完成，由贫农上升为中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1945年卷）（上），182页。
- [44] 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其演出》，张非：《偏套集——张非诗文辑录》，三乐堂编印，2008年9月，11页。
- [45] 同上书，11页。
- [46] 同上书，12页。
- [47] 同上书，12页。
- [48] 同上书，13页。
- [49] 同上书，15页。
- [50] 同上书，19页。
- [51] 高街村剧团集体创作，张非、汪洋记录：《穷人乐》，大连：大众书店，1946年6月。81页。
- [52] 同上书，25页。
- [53] 同上书，15页。
- [54] 同上书，42页。
- [55] 同上书，40页。
- [56] 同上书，17页。

[57] 同上书, 14 页。

[58] 同上书, 21 页。

[59] 同上书, 31 页。

[60] 《晋察冀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 306 页。

[61] 孙元范:《百炼成钢的晋察冀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介绍之一》,《晋察冀日报社论选》, 504 页。

[62] 同上书, 18 页。

[63] 同上书, 31 页。

[64] 1943 年 12 月 26 日的《解放日报》社论中曾指出, 劳动英雄不只是“公民”, 更是一种将自身利益、命运与新政权结合的起来的“人民”:“由于他们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得到了真实的利益, 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联系在一起了。上面所举的这种公民, 是在经过革命后从共产党所号召的生产运动中间(又是组织各种合作形式中间)所产生的, 这是一种新型的人民, 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 157 页。

[65] 《晋察冀日报》社论:《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晋察冀、晋冀鲁豫乡村文艺运动史料》, 221 页。

[66] 朱穆之:《谈创造新文艺》,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编:《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上)》,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7 月, 290 页。

[67] 太行文艺工作团的高介云曾谈到村剧团作品普遍存在的问题:“可惜在材料的处理上, 技术上, ……都是比较粗略的东西, 拿到舞台上, 不能得到它应有的效果, 也就是说有许多剧本, 有几场非常生动、紧张、明确, 但是大部分的场面却是平淡、无味、松懈, 甚至还有着相当的副作用的。”高介云:《农村剧团需要具体的帮助》,《晋察冀、晋冀鲁豫乡村文艺运动史料》, 210 页。

[68] 陈荒煤:《关于农村文艺运动》,《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上)》, 302 页。

[69] 沙可夫:《华北农村戏剧运动和民间艺术改造工作——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发言》,《晋察冀、晋冀鲁豫乡村文艺运动史料》, 99 页。

[70] 秦兆阳:《实行〈穷人乐〉方向的几个具体问题》,《晋察冀、晋冀鲁豫乡村文艺运动史料》, 245 页。

[71] 像, 康濯:《赵玉山和杨家庵的大秧歌》中介绍的“模范乡艺工作者”赵玉山就是村里大秧歌班的主角。1943 年到 1944 年,他一个人就编了 16 个剧本,并总结出一套编剧经验:“唱词要押韵脚,唱着‘处溜处溜’地没档头才好。只要不妨碍政治意义,可以多少编些俏皮话,不枯燥。编戏要讲究实事,好的坏的对照着写,进步的要战胜落后的,痛苦要走向快乐。演一出戏,一上手观众精神不集中,务必抓住他们的注意力;中间可以‘政治’多些,后尾‘技术’强些,末尾平板了,观众会溜走的。还有,演出的锣鼓细乐要配合的紧。”《晋察冀、晋冀鲁豫乡村文艺运动史料》, 281 页。

[72] 朱穆之：《谈创造新文艺》，《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上）》，291页。

[73] 亚马在《关于晋绥边区文化、文艺运动的若干问题》中提到，抗战胜利后，出现的不利倾向之一是认为“阶级斗争面前，新文艺没有用，部分青年文艺工作者当作阶级异己分子解散回家了，文艺团体被打散，一律到土改、整党中去锻炼、考验。”《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运动回忆录》，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19页。

[74] 参见，赤明、魏亚明：《翻身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护持寺村剧团》；郭维：《我看了护持寺村翻身剧团的演出》，《晋察冀、晋冀鲁豫乡村文艺运动史料》。

[75] 陈荒煤：《农村剧团的提高》，《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上）》，446页。

[76] 《太行三专署关于农村剧团的指示》，《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上）》，461页。

[77] 朱穆之：《“群众翻身，自唱自乐”》，《晋察冀、晋冀鲁豫乡村文艺运动史料》。

[78] 赵树理：《谈群众创作》，《晋察冀、晋冀鲁豫乡村文艺运动史料》，161页。

[79] 同上书，163页。

新的政治秩序意味需要形成新的政治认同，这是国家制度推进的必经之路。如何动员传统小农并将他们转化为新阶层，适应现代国家建构的需要，是新政权要面对的现实。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土地分配不均长期存在的问题，新国家可以通过“有计划的社会变迁”重新确定土地产权，进而达到动员效果，使农民得以塑造为新国民。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是整体性的社会改造运动，也是形成新社会、塑造新人的重要环节。学界对其正义性和合法性已有大量论述，总结为了政策——效果的“革命史范式”^[1]。毫无疑问，土地改革是国家政治权力对乡村的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具有蓝图性的新体制建设，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土改实践只能按照实验逻辑展开，因此总有历史阵痛夹杂其中，涤陈、异变、蜕化、重组交织在一起，

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与人际纠结也时时可见。近年来，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逐渐以事件——过程的分析路径，探究微观生活实践，分析权力运作、民众动员、话语体系、行为机制、集体记忆等内容，涉及了上层与下层、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众的多元互动关系，展示了广义土改所蕴含的减租减息、反奸诉苦、支前动员等环节，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2]

福建省龙岩县（现改为“新罗区”）是革命老区^[3]，又是一般侨乡^[4]，土地占情况复杂，也具有特殊性。由于华侨和侨眷的身份比较特殊，确定其剥削程度存在难度，具有一定模糊性，因此容易“成为阶级划分标准的技术性失误的牺牲品”。^[5]本文利用新罗区档案馆资料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侨区土改中的错划阶级及其弹性纠偏。意在追问：由于政治格局和战争事态的转变，新区土改设想与前

模糊身份 与弹性纠 偏

1950-1954年福建省
龙岩县的华侨土改

张侃
谢丹琳

此的土改有何不同？土地改革作为国家意志，政策措施是否具有顶层设计的特征？土地改革是否一场社会实验？各地情形具有多样性，是否存在实践行为的特殊性？如果特殊土改存在，表现形态如何？推进过程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华侨作为中国社会的特殊社会群体，其阶级身份如何确定？在复杂的社会运动中，阶级划分会出现怎样偏差，原因何在？是客观所致，还是主观所为？阶级划分出现偏差，有否出现纠错机制？如有，是在什么情形下展开？是全盘纠正，还是弹性而行？而这些反复性的行为，是否具有策略性？给华侨群体的身份识别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一、土地改革的实验逻辑

北方老区的土改是在国共内战环境中进

行的，没有按照一定程序稳步前进，有些错误还相当普遍和严重，出现了“过左”和“过火”的现象。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有所了解，也予以了纠正。不过，旧区土改的显著社会动员效果，使中国共产党对土改抱有乐观态度。在他们眼中，有限而短暂的暴力行为是革命过程的必然现象。政权的有效建立、暴力的稳步下降和平静的较快恢复，是他们希望实现的社会结果。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在新区继续推进土地改革摆在了历史日程上来。1950年2月12日，刘少奇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起草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

所有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的新解放区，由于准备工作及群众的觉悟和组织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决定在1950年秋收之

前，一律不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在1950年秋收以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陕西九省，甘肃、宁夏、青海三省之汉人地区，凡是准备工作已经充分，群众觉悟与组织已达应有水平之地区，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开始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在以上各省，届时如有某些地区准备工作仍不充足，群众的觉悟与组织仍不充分，或有土匪骚扰者，亦得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在1950年秋收以后仍不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待1951年秋收以后再实行。^[6]

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局面看，这个指示具有征收公粮的策略性含义，因此不急于进行土改而保证农业生产秩序，但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进行土地改革仍是建国蓝图中的基本内容。刘少奇将指示电告当时在莫斯科与苏联进行中苏友好协议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2月17日，即1950年的大年初一，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合回电：

关于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收到。一般甚好，而且亟待适时发出。惟第四部分因涉及分配土地问题本身，可否暂缓发表。因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及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

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再在法令上预作肯定。……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于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所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7]

回电认可了土地改革可以“从容”开展，确定新解放区政策有别于北方老解放区，应执行因地制宜的方针。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问题想得更为复杂。毛泽东与斯大林交换了意见，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还不发展，富农人数很少，不像苏联富农那样成为新政权的对立面，于是对地主和富农进行了区分，并认为可以实行先没收地主土地财产而暂时不动富农土地财产。富农并不是新问题，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党对富农认识就有争论，政策也不稳定。1949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先明确提出“暂时不动富农”，但会议未深入讨论，也未作相应决定。此时重新提出，则说明中央层对问题的反复思考。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3月12日，致电邓子恢等人“征询富农问题的意见”时提出：

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

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带到几年之后再去看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9]

制定新区的土改方案及划分阶级的文件时，中央意识到这是一个摸索过程，需要致电各中央局和分局以及省委征求意见。1950年3月，针对区域性和特殊性还提出了13个问题^[9]：

(1) 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间隔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在第一阶段内，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即是说只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牲畜、农具、粮食、房屋，而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2) 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这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之目的？照此办法，连同没收地主之土地，加以分配后，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3)

在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对向来不依靠农业为主的人，原则上一律不分给土地；不动富农时，雇工可否不分地，而只适当地改善其工资待遇？(4) 假如富农的财产全部不动，而地主一般又没有多少耕畜、农具和存粮，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资金的困难有无办法解决，又如何解决？(5) 高利贷问题究应如何处理？能否规定出一个一般性的标准作为高利和普通利息之间的界限，并规定出适当的处理办法，以便使农民既能免除过去高利贷的盘剥，而今后农村借贷关系又不致搞死；还是在新的土地法中不提倡高利贷问题，只废除地主的债权，而其它一律不废？(6) 对南方的鱼塘、桑田、竹园、茶山等特殊土地应注意哪些具体问题，你们的处理意见如何？还有哪些特殊土地问题应该在新的土地法中加以规定？(7) 江浙部分地区有所谓田底权与田面权（即永久使用权，但与永佃权又有不同，因为田面权还可以出租和买卖）问题。在分配土地时，对田面权特别是中贫农的田面权应如何处理？其他地区是否也有此问题？(8) 在分配土地时对典当应如何处理？(9) 分配土地的方法应如何规定？以乡（行政村）为单位分配土地有无困难，分配土地的单位应如何规定为宜？(10) 县政府内可否成立吸收开明绅士参加的土地委员会负责处理改革事宜，还是即由农协办理？(11) 南方富农的收入与剥削的情况比北方

均较为复杂,在划分阶级计算总收入与剥削时,是只按其在农业上的总收入与剥削收入计算为好,还是连同其在副业及其他方面的收入与剥削收入一起计算为好?这两种不同计算方法在实际上会产生何种不同的结果?(12) 佃富农是否可以参加农会?(13) 在分配土地时,有无留出一部“公共事业田”之必要?

这些问题涉及了土改进程中的方方面面,均为老区土改中不普遍或很少出现的现象,因此已有工作积累并无经验可供借鉴。由此可见,土地改革的实践具有社会革命和人类实验的性质。“实验”是一个试错和纠正的进程,政府或政党是一个有限理性的组织,面对着开放的复杂社会经济环境,它能处理的信息有限的,因此政治行为具有不确定性。政策是否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是以分散试错为基础。也就是说,土地改革存在人为的精心设计,具体到实践层面,作为存在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需要不断讨论与摸索。

二、龙岩县土改的历史进程

土地改革的政策与措施是层层推进的,龙岩位于福建省西部,福建省的政务归华东军政委员会所辖,为明了龙岩土改的历史进程,需要先交代相关华东局和福建省的一些土改

政策与措施。华东局于1950年3月14日到19日召开了华东各省(区)、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会议,讨论华东地区土地改革准备工作问题。饶漱石认为,中央提出的土地改革法只规定一些大的原则,各个地区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及其特点制定实施办法^[10]。张鼎丞作为创建闽西苏区的老干部,当时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他接到《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和华东局意见时,认为福建省是老根据地,具有特殊性,具备土改条件。1950年春节后,他组织干部讨论“提前土改”。福建干部以南下为主,有华北、华东两个群体,他们的实践经验存在差异,也形成两种不同看法。前者遵循“三年不减租,五年不土改”的指示,认为“提前土改”有悖于中央精神。后者认为解放战争中一边土改、一边作战,没有矛盾。张鼎丞、伍洪祥、江一真等出身于闽西老苏区的干部,他们认为福建群众基础该,和政治觉悟比较高,与华北新区不同,完全有条件进行土改。不过,张鼎丞虽然主张“提前土改”,但对如何执行是比较慎重的。他根据《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中土改前期准备工作的要求,选择了闽侯、龙岩两县作为试点。委派伍洪祥为龙岩地委书记,到龙岩开展土改典型调查。龙岩一共有三个点,即龙岩县的东肖区、上杭县的石王乡和永定的富岭乡^[11]。

社会变迁是开放性的结构，各种因素相互纠缠和牵扯。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作为社会变迁的重要环节，其展开过程不仅与各地革命斗争形势有关，而且与国际环境变动有关。1950年，国际形势极为紧张。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海局势骤然紧张。对于新政权而言，保证胜利果实是第一要务。福建尚有大量土匪未清剿，斗争形势尖锐。11月8日，福建省收到华东局转发的毛泽东《关于加强华东区领导做好剿匪的电报》：

闽浙两省剿匪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福建匪患必须使用四、五个主力师，全力穷追猛打，限期肃清，该省剿匪成绩较他省为差，必须检讨原因。我提议从现在起，和广泛开展土改工作相配合（福建必须迅速实行土改），限六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土匪，责成叶飞、鼎丞全力以赴，做出成绩，只要福建的土匪消灭，土改完成，即令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12]

在此政策指引下，福建省加速了土改步伐。11月22日，福建成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采取剿匪与土地改革相结合的办法分两步走。第一步，在剿匪时，先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其控制的公地给农民；第二步，在剿匪后视情况在没收地主应没收的其他财产，征收富农、

小土地出租者应征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龙岩属于老革命根据地并经过“自耕农运动”，土地占有并不悬殊。1950年，龙岩县每户或每人占有土地比较平均，“地主已不存在了，富农也很少。在东红（肖）区的三个自然村只有二户富农，但这二户占有的土地不及总数的1%，而且是兼营商业的。西陈区条围村连富农也没有，占有土地最有的是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其次为贫农。富裕中农、中农、贫农合计占总户数的67.18%，占总人数的64.75%，而占耕地79.66%。在东红区三个村中，中农、贫农合计占总户数89.51%，占总人数的88.27%，而占有耕地92.5%^[13]。基本情况是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主体，土地没有集中在地主手中。^[14]鉴于此，龙岩地委书记的伍洪祥起草了《关于保护苏维埃分配土地地区及国民党“扶植自耕农”地区施行土地调整的具体办法》（草案），其原则是：

在原耕基础上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实行土地调整，以确定地权，颁发土地证。但国民党“扶植自耕农”地区分地极不合理，不予承认，应尽可能保持原耕基础上必须划分阶级，实行重新分配，与保持苏维埃分配土地地区采取部保持原耕不动、小部抽补的原则有所区别。^[15]

福建省制订《关于开展老革命根据地地区工作指示》，认可“大部分不动，少数调整”。1951年1月8日，在上述原则之下，颁布《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龙岩专区经过土地革命地区有关土地改革若干具体实施办法的规定》，分类处理不同类型的土地关系：

第一、保持苏维埃土地革命果实的地区：

(一) 此类地区，应按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之规定，进行必要的土地调整，确定地权，结束土地改革，发展生产。(二) 保护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分得的以及土地革命后所得的土地财产，不得侵犯。(三) 富农在土地革命时依法保留的土地及其在土地革命后劳动所得之自耕或雇人耕种的土地，不受侵犯。(四) 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之反动分子的土地财产，应予没收分配，但对其未参加反动行为之家属，应留给一份。(五) 征收公田，包括族田、庙田、学田、教会田，没收在敌人重占期间反革命政权所留的乡保公田，除经专署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保留者外，均由农会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六) 在调整土地时应切实解决革命军人家属、烈士家属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第二、经过苏维埃时期的土地革命在红军

北上后封建势力复辟，封建土地制度恢复地区。

(一) 此类地区一般应视做新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实行土地改革。(二) 恶霸地主，及其他反革命首要分子，依仗反动势力，欺压人民，霸占革命家属、烈士家属和农民的土地财产，应经过人民法庭予以严厉惩治，并没收其土地财产，由农会分配，其中霸占部份，在分配时应照顾受害户。对反革命分子家属未参加反革命行为者，应分给一份土地财产。(三) 对这类地区的反动富农问题，应依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二章第四段关于反动富农的规定处理。

第三、解放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之前，农民自发分配土地地区：(一) 这类地区群众自发分配之土地，基本上予以承认，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精神向农民进行教育，并进行复查，继续没收尚未没收的地主土地财产，并征收尚未征收之公田，以彻底摧毁封建势力，端正政策，加强团结，确定地权；结束土地改革。(二) 自发分配土地时，个别多占果实者，必须予以适当处理，应说明退出其多得部份。(三) 中农利益被侵犯者，应以公田及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中进行补偿，并加强对中农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16]

龙岩地区实行了以“土地调整”为主的土改策略，没有大规模开展划阶级运动，重新核定1929年土地革命时期划定的地主和富农。不过，为了开展工作，也召开小型诉苦会，并采用“穷富财产展览会”、烈士追悼会等形式予以辅助。据伍洪祥回忆，情形比较温和：

老革命根据地的群众与新区群众的觉悟程度是截然不同，由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的深远影响，老区农民对土改已很熟悉，因此，一开始我们就不是从宣传土改的正义性、合理性入手，而是先从思想上解除“变天”的顾虑。因为老区农民在1929年曾经进行过“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北上后反革命势力复辟，对他们的血腥统治是残酷的，这些“变天”的惨痛事实深刻地教训了善良的农民，他们害怕再来一次“变天”。这个思想顾虑不先彻底解除，必将阻碍运动的胜利发展。为此，工作队进村第一阶段工作都大力开展形势教育，宣讲土改政策，使群众解除顾虑，

而后转入反霸诉苦斗争，这是打开局面发动群众的关键。老区农民在政治上要求翻身很迫切，尤其老区烈军属多，长期受迫害深，因此，烈军属一般都作为优先动员、访贫问苦的对象，然后通过他们逐步串联，以追忆反革命复辟中惨痛事实来启发一般农民的阶级觉悟。^[17]

在这种工作模式之下，龙岩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前期工作比较细致，进度略比稍慢于全省，后期就相对快一些。陈耀煌根据相关资料可以整理出福建土地改革的进度表，可以引用对比如表1^[18]。

龙岩县90个乡进行土地改革。其中64个乡已进行过土地革命，分别以不同类型进行“土地调整”^[19]，承认过去分田的土地所有权，补发土地证。土地调整后，龙岩雇农每人平均1.71亩，贫农每人平均1.74亩，中农每人平均2.13亩，地主每人平均1.45亩，富农每人平均2亩^[20]。

		完成乡数占总乡数的百分比										
年份	1950		1951									
月份	11	12	2	3	4	6	7	8	9	10	11	12
福建	1	8	20	27	51	67	72	85	89	92	92	97
龙岩	1	1	10	28	60	60	60	78	92	95	93	100

表1

三、华侨身份的模糊状态

建国后，辨别华侨身份与阶级属性，成为土改过程的一个重要问题。其财产与汇往国内的侨汇处理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新中国能否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如司徒美堂指出的，“华侨，其实是破了产的贫雇农，逃到海外，借辛苦工作赚了一点外汇，返回祖国买田养老，与封建地主的田租剥削大不相同。……华侨地主中与其他富有华侨中的自建洋房最好不要动。洋房之来，是来自他本人血汗所得，与靠封建剥削的地主洋房不同。华侨出外数十年，其与祖国的联系，就是他对国内的亲属与薄田数亩数十年，其与祖国的联系，就是他对国内的亲属与薄田数亩，或洋房一座的田园之乐怀恋。动了这些就斩断了他们与祖国的联系，断了联系也就是断了大笔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侨汇”^[21]。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即为侨胞题词，“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22]。为了合理处置华侨财产与切身利益，周恩来分别找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侨领和广东、福建两大侨省的领导人叶剑英、张鼎丞等交谈，倾听意见。司徒美堂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考虑国家大计，在1950年6月的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关于处理华侨土地房屋问题的建议书》的议案。会后又写成《关

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由中央侨委会转呈给毛主席，强调了身份定义的重要性：

什么叫华侨，什么是华侨地主，其定义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在划定何者是华侨土地、何者不是华侨土地的时候，技术上要非常精细准确，执行土改的下级干部，要认真对全部政策以及华侨情况作透彻的了解，如果不然，就会引起许多意外麻烦。侨眷有贫富之分，许多贫苦侨眷，侨汇少，生活难，十年八年也接不到多少次侨汇，租种一两亩瘦地过日子，在阶级成分言，他们倒是实际的贫雇农。……华侨捐款办学而置下的新式“学田”，有利于发展侨乡的教育事业，应予暂时保留。……如国内环境安定，华侨愿意回来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不知道这样的土地将来是否可能租得到？华侨能否收买土地来进行新的农业生产？土改条文中应加说明。^[23]

司徒美堂认为，土改首先要划分阶级，土改法令要对华侨、华侨地主等概念进行清晰界定，执行干部要认真对待全部政策，并对华侨情形要详细了解。于是1950年7月15日，周恩来责令广东、福建两省各起草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处理华侨土地房屋的条例草案。福建由龙岩、漳州、闽侯地区及厦门市组织调查，魏金水带队到侨乡晋江县第八区塘市

乡搞土改试点，江一真带一些干部到闽南重点侨乡摸底调查。通过调查后，1950年9月2日，福建省颁布《闽华侨土地房屋问题处理办法草案》^[24]，将华侨分为四种类型，即侨眷中的地主阶层；在农村不依靠经营土地的华侨工商业家；侨眷中的半地主式富农；侨眷中的小土地出租者。根据华侨类型提出了照

顾华侨、处理华侨土地财产的意见^[25]。1950年10月，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在《闽华侨土地房屋问题处理办法草案》的基础上讨论华侨土地财产处理办法。周恩来以“宽松”为主导方向对待华侨的财产处置和阶级划分，他指出：

		洋潭	溪圣	中民	龙泉	榴田	后田	合计	比例
在外从事职业情况	资本家（工商业）	8	86	13	3	10	4	121	26%
	小商贩	17	55	27	22	17	11	149	32%
	店员	29	44	32	5	17		127	28%
	教职员	4	2	1	1	1	1	10	2%
	工人	1	31	5	6	1	2	46	10%
	不洋	2	1	4		1		8	2%

表 2

（资料来源：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97）

	溪圣	西安	中民	后田	龙泉	洋潭
户数	149	76	71	9	36	52
人口	1374	887	658	71	232	444
在家	586	349	294	18	112	204
国外	788	538	364	53	120	240
国外/在家	1.3	1.5	1.2	2.9	1.07	1.2
家庭规模	9.2	11.8	9.3	7.8	6.4	8.5
全乡规模	6.1	5.2	4.2	3.8	5.6	

表 3

（资料来源：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68、29-1-97）

大多数华侨是由于在旧中国不堪忍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无法生活才背井离乡，出走异国的，或者被当作“猪仔”贩到国外的。大多数华侨眷属在土改中会得到好处，他们会拥护土改的。但估计还有百分之二至四的华侨地主，他们的土地要被没收分配，这些人是不会满意的。如果我们在华侨地主的房屋问题上给以照顾，就会波而不动。这对我们团结国外华侨有好处，而且他们的房子大都是用寄回的侨汇盖的，不是封建剥削来的，要把这些情况向干部和农民讲清楚。^[26]

在此精神指引下，1950年11月6日，政府颁布了《关于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以照顾为主，如保护华侨的房屋、财产、工商业，不征收原来是劳动人民的华侨的超过当地人均平分土地百分之二百的出租土地。华侨及侨眷如只占有小量土地，部分自耕式、雇人耕种、部分出租者，不应认为半地主式富农。^[27]可见，中央和省级政府也一直强调注意侨乡土地占有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划分阶级成分的复杂性，审慎处理容易划错的成分。例如提出，对出租土地但生活来源又不是靠地租剥削的华侨工商业家，要防止划成兼地主者。一些在国外是小职员或小商人，国内侨眷通过侨汇置办小量土地，将土地雇人耕种或由亲友代耕，更应小心谨慎，

防止错划为地主。

龙岩县华侨主要集中于印尼、马来亚、泰国、缅甸、新加坡等南洋各地，多以工商业资本家和小商贩、工人、店员为主，“四不像户”的现象比较突出。一方面，华侨家庭经济形态差别很大，有地华侨户基本靠土地出租或雇耕获取收入，侨汇是生活的补充部分，而无地华侨户基本依赖侨汇。现根据华侨分户情况^[28]，可知龙岩华侨收入有地租、雇工耕作、自耕劳动、海外侨汇、工商业经营、地租倒算、高利贷收入、担任乡职等，来源较为多元。其中最容易被划错的包括：1、华侨工商业家有一些土地出租的，容易划为兼地主成份。2、在国外劳动的华侨，家中有青壮年不参加劳动的，将小量土地出租或雇人耕种的，容易将此种小土地出租或者小土地经营者划为土地或半土地式富农。3、华侨小贩、店员因家中生活较好，容易错划为工商业者。^[29]东肖区下辖洋潭、榴田、龙泉、中民、溪圣、后田六乡华侨的职业具备了这种可能（表2）。

另一方面，龙岩县华侨家庭大多出国人口较多，大部分青壮年都在海外，华侨户的生计情况比数据显示的内容更为复杂。为了更为微观地观察华侨家庭，整理部分华侨家庭人口数据如表3。

龙岩华侨作为“新客”，在侨居地没有发展二代或三代家庭，家庭成员在侨居地和侨

乡两地流动。由于华侨家庭的出国人口比留在国内人口多,家庭经济成分核算的难度也大。西陈区大洋乡的“处理有关华侨问题分户材料”较为完整地登录了华侨的家庭组成和成员职业,可见一斑:^[30]

(1) 邱X兰,45岁,女,家务。夫,章X生,50岁,1927年往南洋教书,1932年回岩充任十九路军委员长,进行夺,1933年又往南洋(有四人)。女,章X瓶,26岁,福州大学读书。

(2) 刘X治,已死。妻谢X姑,57岁,家务。子,刘X厚,?岁,1935年往南洋经商,在外四人。子刘X洪,19岁,厦大读书。女,刘X惠,16岁,二中读书。

(3) 林泽X,52岁,1927年往南洋,槟城天成号店员。妻邱X红,51岁,有附带劳动。母,张X凤,76岁,家务。子,林X纪,13岁,读书。

(4) 林X彬,50岁,1927年往南洋(新加坡)做木头生意,在外七人。母,徐X地,71岁,家务。弟媳,郭X花,36岁,家务。侄女,林X仙,16岁。

(5) 王X花,35岁,家务(曾在南洋当保姆,因病回家)。子,刘X魁,3岁。夫,刘X淡,38岁,1937年往南洋阿齐,起初当店员,现在泗水做小生意,在外四人。

(6) 邱X鸿,已死。妻郭X地,74岁。子,

邱坤X,38岁,1937年往南洋做小生意。媳,章X仁35岁,有参加附带劳动。孙,邱XX,解放前读书,曾受华安特务训练班训,现在东肖教书。孙女,邱XX,11岁,读书。

(7) 林X凤,男,50岁,1933年往南洋代人做工(日里义和店店员)。妻郭X菊,47岁,家务。子X团,30岁,小学毕业后教书四年参加过三青团分队长、区分部组织委员、十八猛首要分子。在1946年假托收神祖、建神牌到南洋去收伪中35万元,解放后参加工作,去年清洗回家生产。子林X瑞,25岁,解放,在读书。林X南,19岁,读书。媳,段X琼,25岁,做家务。孙,林XX,5岁。孙,林XX,4岁。

(8) 林X金,男,41岁。1929年后往南洋经商。在家3人,在南洋20人。子,林X美,24岁,一中读书。媳,李X娥,?岁。孙,?岁。

(9) 黄X文,男,68岁,1946年起做小贩。母,郭X菊,94岁,家务。妻,魏X科,69岁,家务。子,黄X旺,41岁,在南洋做店员,每年有侨汇。子,黄X富,35岁,解放前在南洋,帮他亲戚店内,现在汉口企业部门。媳,陈X娇,31岁,跟随夫在外。孙和孙女二人,年小,在外。

(10) 林X和,男,58岁,解放前为大老板,在本城合股开瑞记布庄兼办华侨汇兑。妻,章X梅,56岁,家务。子,林X秋,33岁,

在南洋开木料店。子，林X仙，30岁，在上海高等法院任职。媳，翁X姣，30岁，在南洋家务。母，邱X秀，90岁。

(11) 廖X和，男，？岁，基督教负责人(1946年已死)。妻陈X姑，63岁，基督教徒。子，廖X山，63岁，在南洋做店员，现学修机器。媳，林X梅，41岁，在南洋助家务。孙女，廖X良，23岁，解放前读书，1951年参军于学校。子，廖X秀，38岁，教员。女，廖X贵，27岁，读书。女，廖X芝，23岁，读书。女，廖X芳，21岁，参军于学校。

上述资料中的家庭可分作三类。第一类为核心家庭，包括家庭(1)(2)(5)。这类家庭即两代人组成的家庭，其家庭成员是夫妻两人及孩子，孩子通常未婚；第二类为三代家庭，或称“主干家庭”，包括家庭(3)(6)(7)(8)，这类家庭指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父母及第三代等直系亲属组成的家庭；第三类为联合家庭，包括家庭(4)(9)(10)(11)，这类家庭通常由父母和两代或两代以上已婚子女组成，或是兄弟姐妹婚后不分家的家庭，这也是侨乡较为普遍存在的家庭模式，其中也包括上文曾出现的陈X姑式的两头家模式（即联合家庭与核心家庭混杂），这类家庭中的强劳力因生计问题而长居南洋，留在侨乡的普遍为缺乏劳动力的老人或妇孺，强劳力在南洋有稳

定家庭，但在侨乡仍被登记在华侨家庭名下。这种类型家庭是核心家庭同代横向扩展的结果，成员关系较为复杂。

四、错划阶级及其负面后果

龙岩地区开展土改时，制订《关于保护苏维埃分配土地地区及国民党“扶植自耕农”地区施行土地调整的具体办法》(草案)，参考了《关于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规定，“手工业工人、店员、华侨、商人、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依靠土地为其生活，其出租土地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百分之二百，且该项目土地又确实系其本人劳动所得购买者，均保留不动；超过此标准者，得征收其超过部分的土地，或在征得其本人之同意后，征收其全部出租土地。”^[31]土改政策以温和态度为主，诉苦也以反霸斗争为主，其目的在于阶级觉悟，以扭转自发分田和“和平分田”的思想，而非纯粹的阶级划分。

采取这些社会动员的技术手段运用后，以情感带动的行为容易超越界限^[32]。龙岩的土改政策原来想在地主、富农等层面进行微调，一旦“阶级”可以作为社会标签和象征而被运作时^[33]，农民的心态很容易处在兴奋又压抑的焦虑心态。如李金铮在研究华北土改时指出的：

中共从改造传统的民俗伦理入手,通过“挖穷根”“斗争大会”等方法,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被剥削感、阶级对立意识、革命斗争意识和拥护中共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一向温和、忍让的中国农民将整个地主阶级打翻在地的复仇情绪宣泄到极点。不仅如此,其传统的平均主义心态不再限于打倒地主阶级的“均贫富”,而是发展为部分贫苦农民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行为。在此贫富错位的社会裂变中,农民传统的发家致富心态转变为既渴望富裕、又惧怕富裕冒尖的矛盾心态,甚至不惜将现有的财产挥霍浪费……其中的复仇心态和绝对平均主义是以上改为媒介的农民传统心态的延续和放大。^[34]

政策执行者、广大乡村农民乃至被打倒的剥削者,他们面对的是新政权、新政策、新行为,没有惯性行为可作为参照系。在此状况下,“华侨”或“华侨地主”等具有模糊空间的身份概念,很容易在阶级划分中发生偏差。再加上土改干部对相关政策了解不透彻,如东肖区委李书记认为:“我们(基层干部)思想上没有深入形成‘华侨’的概念,不明确保护侨汇政策的意义和重要性。”于是,龙岩县土改在实践过程中,未把国内外人口与其实际经济情况联系起来,就出现了偏差。龙岩县十三个乡华侨家庭成份中,地主为48

户,占60%;土豪劣绅为5户,占6%;富农10户,占12.5%;中农11户,占12.5%;贫农3户,占3.5%;农民2户,占2.5%;工商1户,占1%^[35]。而龙岩地区土改后的阶级划分是:地主占3.32%。富农占2.44%,债利生活者占0.03%,工商业者占0.25%,中农34.18%,贫农54.33%,雇农1.22%,手工业者0.76%,小商贩0.39%,其他2.33%,小土地出租者占0.75%^[36]。从总体数据看,华侨有侨汇收入,生活比较富裕,被认为剥削阶级^[37]。华侨地主的比例过大,一些本不应划为地主的华侨被划入了地主行列。以潭漳乡侨属张X地为例,评成份时凭国内人口和经济情况来确定,结果评为地主。比如将主要劳动认为附带劳动,认为有劳动力无劳动,靠雇工剥削和侨汇收入维持生活,应为地主^[38]。还有一些在没有调查清楚部分华侨雇长工情况下,把家庭成员视为长工,结果也导致了偏差。

除了华侨经济的模糊增加政策执行难度外,“左”倾的工作惯性也在发挥作用。如福建省在“草案”就含有这一倾向,“对华侨中之封建剥削部分,不能因为照顾华侨利益,保留过高标准,使与土地改革的总原则产生抵触。对华侨土地问题的处理,不能应该动的不动,不应该动的分给,使对农业生产不利。作为对华侨本身而言,亦应充分认识土地改革与华侨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才不致单纯的、孤立的,

夸大华侨特殊性，提出不适当的过高要求。福州座谈会中，大家都认识到土地改革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购买力，发展工商业的根本道路。华侨工商业资本家，即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应首先拥护土地改革，不应首先争取保存封建土地剥削制度”^[39]。在此政策引导下，一些乡镇基层干部认为广大农民生活贫苦，无地少地，生活困难，相较而言一些侨眷不仅有较多的耕畜和农具，并有充足的粮食，生活比较富裕，本着“土改应该均贫富”的原则，基层干部在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下，自觉或不自觉提高华侨阶级成份和扩大没征收侨眷范围，作为满足贫雇农土地财产要求的办法。^[40]

土改运动开始后，在“斗争”情绪和平均主义思想的作用下，就容易出现阶级划分的偏差，如一些贫农或中农侨眷说，“他（村华侨地主）收租吃饭，不劳动，和非华侨地主都一样，他辛苦我们比他还辛苦。”“不分华侨地主土地，我们分什么？”“土地必须分，不分就对不起贫农，分了土地祖国强盛，华侨在外也有地位了”。^[41]

华侨错划阶级的直接后果是对华侨房屋和其他财产的没收和罚款。比如应没收的未没收，不应该没收的没收了。华侨工商业者、中民人陈 X 舜（全家都在国外），土改中其女陈 X 珠被评为地主，华侨分户材料中对其女

有如下描述^[42]：

陈 X 珠，其生父陈 X 舜在 1929 年被评为地主成份，暴动后前往印尼经商，在外七口人。陈 X 珠嫁张 X 洪为妻，自 1936 年起为生父家管理其生父产业，向农民进行收租倒算，每年都把已分配给农民的耕牛夺回耕田，直至 1942 年牛死，还分去三分之二的牛肉，并向农民张 X 发，张 X 旺等倒算厝租至 1953 年，共收租光洋 39 元，干谷 129 桶，解放前三年占有土地 4.84 亩，雇工耕种，陈 X 珠不参加农业劳动，丈夫经营小商业维持个人生活。

陈 X 舜在土改中被划为华侨工商业者，陈 X 珠因经营其土地被评为地主后，陈 X 舜的房屋四间，厕所一间，晒谷坊半个被没收。1952 年陈 X 舜曾寄回人民币 3600 万元，以整存整取形式存入人行白土营业所，委托华侨服务部代管，后由华侨服务部把存单交其女婿张 X 洪代管，存单上注明要由华侨服务部得其本人委托通知后才能领取。陈 X 珠继评为地主后，土改队在摸底中了解了上述存款，区委研究罚其利息 900 万元，因存款不付利息，又要经华侨服务部通知才能提取，陈 X 珠无法领取。后以其抗拒不缴，决定加罚三倍，计 3600 万元，经区委请示县委将报地委批准，通知银行解付。^[43]

罚款追到海外的现象。如后田乡归侨陈 X 奎，母亲五十五岁在家料理家务，其妻在家劳动生产，二个儿子年纪小，但有土地 2.42 亩。1929 年其祖父陈 X 英（一贯在外经商）被划为富农成份，没收了他的房屋。1940 年大家庭分家生活，共有三家：陈的伯父侄 X 春生为一家（X 生在江西南口经营口产店铺）；陈的叔父 X 坤一家人早年即往印尼棉兰，经营百货二盘商；陈 X 奎自己一家（往陈 X 奎从年轻就到南洋做店员、会计，后回家结婚又重新往南洋，于 1951 年归国，现为华侨补习班学员）。其祖母轮流在这三家吃饭，土改时评定其家庭为评为工商业。由于其祖母 1939-1952 年向农民倒算房租 140-160 桶，因摸底了解陈 X 奎只得存款 6000 万元（系其 1952 年由国外侨汇存入），罚款 3000 万元，结果由陈 X 奎提取缴交，X 奎以三家共负担，写信给印尼棉兰其叔父陈 X 坤，希望其汇款接济负担一部分。

在此情况之下，许多归侨、侨眷惶惶不安，认为罚款与侨汇有关，对政府保障侨汇政策与国家银行保密和取款制度表示怀疑。^[44] 华侨张 X 泉在侨联会欢迎新归侨座谈会上听取银行干部对保障侨汇的发言后，与张 X 庭等在私下交谈中说：“什么保障、不保障，事实摆在眼前，黄 X 杰家后罚款从 18.9 万元增至一亿七千万元，其妻郑 X 地说：‘银行存款，

群众都晓得，我有一亿七千万元，就罚一亿七千万元’。郑 X 地接其子海外来信中写道：‘印尼有倾向台湾和拥护新中国两派，我是站在拥护新中国的一派，支持祖国建设，像我这样爱国，家庭却受到这样对待，闻讯如晴天霹雳。’并说这事已传遍印尼。”有些侨眷怕多寄侨汇会提高成份或增加罚款，写信给海外亲人少寄侨汇。“有些侨眷怕多寄侨汇会提高成份或增加罚款，便写信给海外亲人少寄侨汇，海外亲人听闻家乡土改情况，也纷纷表示处于自身考虑，减少侨汇或是减少对家乡事业建设的投资。”^[45] 1954 年龙岩县第三季度和 1953 年侨汇汇入减少 32.5%。^[46]

五、侨汇政策下的弹性纠偏

中国华侨的侨汇对中国国民经济影响重大，1950 年 5 月 6 日的《人民日报》载文指出，“侨汇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是很显著的。……上千万的侨眷依靠它来维持生活与进行生产”^[47]。按建国初期中国银行的统计，赡家性侨汇比例高达侨汇总额的 97% 以上。政府可以通过侨汇结汇方式，将本币解派给侨眷用于日常生活，而外汇则可以用于国民经济建设发展需要，推进对外贸易，平衡国际收支。土改举措的不当导致旅外华侨产生不满，减少或停止向国内寄侨汇。侨汇

减少直接影响了对外经济活动，中央很快有所反应，他们意识到的：“个别地方县、区政府特别是乡村基层干部，处理上有严重的偏差，土改时期是看侨汇提高成份，看侨汇开数，对侨眷滥行罚款，清算无底。土改后看侨眷有侨汇，强迫贷款、捐献，农会扣押侨汇当农会基金等等。因此侨眷有所谓四怕：‘一怕汇款来了提高阶级成份；二怕取款时银行分期扣付；三怕暴露目标强迫捐献；四怕农会强迫贷款。’^[48] 华侨被错划阶级的原因还在于弄不清楚华侨在国外的情况，也无法计算其家庭劳动人口。中共中央在回复福建省上报处理土改遗留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对国外情况弄不清的侨眷，依其国内情况划分成份时，应暂时假定该家庭有人在国外从事劳动，并把这一因素计算在内，否则容易扩大打击面。”^[49]

为了纠正错误，中共中央在《对土改中华侨土地财产处理的九点办法》中规定：“过去划错成份应予纠正，某些农村在不纯分子操纵下乱划成份者，应宣布其原成份无效并进行重划。”明确规定，虽有出租土地，不能构成地主的侨眷有三种情况：一是因主要劳动力在国外而出租小土地者；二是出国后因在国外从事其他职业，积蓄钱汇回国内购置少量土地者；三是在国内眷属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靠地租生活，占有土地的数量在当地小土地出租者的

最高标准数以下者。因此家庭的确有人在海外从事其他职业，是符合小土地出租者的构成条件的。若不区别清楚此类情况，很可能把华侨工人或华侨工商业者都简单划为地主，毫无分别的当做消灭对象。占有土地稍高于当地小土地出租者的最高标准数，但超过不多者，在多数农民同意的条件下，亦可不定为地主，按小土地出租者对待。^[50]

在上述政策推动下，龙岩县从地委统战部、侨务科、发展科等单位抽调人选组成工作组，选择重点地区和对象，深入乡镇进行调查，通过多方渠道调查国外华侨的情况，结合侨户国内外家庭、经济情况，在政策范围内予以纠正。如侨户张X地，工作组认为该户解放前虽未分家，但经济上已各自独立多年。因而对张X地一家问题做出更改：张X地等居家人口，属于劳力从事其他职业，改划为小土地经营者；其五子X博外出渡洋，依靠工商业；至于长子X林一户，暴动后一贯靠救济度日，评为自由职业。土改时被没收的两间房屋，可说服农民予以退回。^[51] 阶级成分得到了纠正，原先被没收的财物也要得到相应处理，具体情况这样的：

1、侨汇问题。侨汇包括两种来源，一是华侨工人的薪资，一是华侨工商业者以资本主义剥削而来的利润。^[52] 中侨委对此明确指出，“土改以国内封建财产为限，不追至国外，侨

汇不是封建剥削。”^[53] 龙岩县华侨侨汇大部分属于前一种，因此工作组表示，土改工作任务是消灭封建剥削，不是资本主义剥削，若因侨汇收入多就将其划为地主，没有弄清楚剥削与被剥削的区别，也没有区分封建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有了这一政策认识，对前此错划被侵犯的侨汇全部退还。并且规定，侨眷对退回侨汇有自由处置权；严禁以侨汇收入多少作为提升或者确定侨眷阶级成份的标准；侨汇按银行原规章制度办理，禁止工作队干涉侨汇；对华侨地主的罚款，也由本人（或本人委托亲属）办理相关手续后，再由本人（或本人委托亲属）交由农会。

2、房子问题。华侨建房有两个目的：首先，他们是侨居在外的中国居民，海外侨居地并不是归宿，在故土建房作为归宿之地；其次，华侨的房屋作为固定财产，具有经济活动的信用担保意义。工作组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措施：对错划成份的给予退回，如已分配给农民居住，作为内部问题进行协商解决，可以借住，并在乡内调整。屋主可以降低房屋自愿折价卖给现居住者，并由政府贷款或在社会救济项下补助现居住者户偿还。1929年土地革命时期是地主，现是华侨资本家，其房屋向农民倒算来的，不予退回。房屋不是倒算获得，仅没收老房屋，本人新屋可不退。如新屋被没收，应设法让出退还。

1953年3月28日，周恩来与邓小平、李维汉、廖承志商谈闽粤侨务问题，特别指出了错划纠偏之事，“两省在侨区土改出现偏差后，提出的纠偏方针、办法是正确的，应予同意，即对错划阶级的应无条件地给予纠正，尽量赔偿损失，并做好争取团结工作”^[54]。当然对于阶级划分纠偏，政策总是希望能尽善尽美，但在具体工作中，还是有所侧重的。后来接任龙岩地委书记的李敏唐在给工作组成员的报告中说，做好华侨土改遗留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将进一步保护侨眷正当权益，争取团结国外华侨建设祖国；正确保护侨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也是进一步落实中央侨汇政策，解除侨胞顾虑的需要。^[55] 这一表述中，“争取侨汇”的政策意图相当清楚，“能否争取更多的侨汇用于投入祖国建设及促进投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出发点。事实确实如此，以《县土改办关于处理土改遗留问题时对各乡华侨的处理意见》中几个例子证明：

如龙岩县附城区大湖乡人王和X，解放前在家有六人，占有土地四亩，有劳力却不参加劳动，土地全部雇人耕种，被划分为地主。其三弟王振X给中侨委写信中反映：“（我）兄解放前生活主要是我寄款接济的，（我）对（土改中划分的）地主成份表示有意见，要求政府提前给予改变。”王氏兄弟均为龙岩华侨中的重要人物，工作组经过调查后，这样描

述其兄弟：二弟王锦 X，属新加坡归侨，为政协龙岩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侨联会委员，中国贸易公司龙岩分公司第三副主任，对家乡公益事业表现热情，投资省华侨投资公司贰万元。三弟王振 X，有名的华侨资产阶级，关系网很广，在国内外华侨上层中很有威望，推动华侨投资祖国建设起了一定作用，现任广州市华侨事务局副局长，中国□国华侨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因此产生的处理意见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工作组按《对土改中华侨土地财产处理的九点办法》的指示：“华侨国外经济状况及寄回的信件材料应作为划分成份的参考，一般往下划成份”的原则，将王和 X 从地主改为中农。

另如大洋乡人王 X 龙，“其子王 X 伦 1940 年往南洋做店员，19□□年即自己集资经营商业，于 1952 年返国。该户占有土地 3.28 亩，家有五人，土地全部雇工耕种，并雇有女佣一人，料理家庭琐事”，根据家庭人员不劳动的状况在土改中评为地主，没收土地 2.71 亩，房子 2 间，农具 1 件，罚款 6000 万元。工作组调查后了解，其子王 X 伦早年往南洋经商，在印尼棉兰楠榜等地华侨总会曾任理事及在华联小学任董事长等，对社会福利事业较为热心，思想较为进步，并心向祖国，投资与建水泥厂。王 X 伦在海外有一定的威望，被评为地主之后，不断向中央、省委提出申诉，

不断写信至海外侨联组织，向中央侨委提出申诉。工作组结合调查中华侨海外实际经济情况，认为该户应“摘去地主帽子，改评为工商业成份”，对其罚款的 6000 万元应退回，所征收的两间房子也应退回。

如龙岩县附城区西安乡翁 X 星，在华侨土改时被评为地主成份。工作组通过调查后了解其弟翁 X 林，“侨居印尼，是印尼最大的进步书店雅加达□星公司、印尼□头进出口商的□□□□、新中国影片在印尼总代理人，资力雄厚，对社会公益事业很热心，交际很广，在华侨社会中有威望，是上层社会代表人物”。工作者以团结华侨为重，争取侨汇为目的，认为翁 X 星在思想上有了改变，并参加劳动生产，改变地主成份，划为中农。

如林兆 X，工作组经过调查和了解发现，其兄林 X 芝，印尼归侨，曾任龙岩县龙门侨委会主任，龙岩省政协驻会常委，省侨委职员。又弟林达 X，侨居印尼，为巨港大新五金商店股东，先后投资省华侨投资公司 2 万元，曾携夫人自费归国观光，参加北京“五一”劳动节观礼。工作组认为其兄弟是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之一，于是改变林兆 X 地主成份，评为中农成份。^[56]

上述诸多例子可见，侨眷家庭在国外的华侨，经济条件较好或在侨居地有威望的，会成为政府团结的对象，侨眷家庭成份容易得

到调整，没收的房屋、土地较快被退回，缴纳罚款也被退回。若华侨能表现出对继续寄回侨汇并支持家乡公益及建设事业倾向，则会成为工作组对侨眷阶级成份下调的重要参考因素。这些情况说明，工作组在处理华侨错划纠偏问题时，具有弹性幅度。

六、结语

土地改革是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是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结果，既有经济内涵，也有政治意义，对国家形态和民众命运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从龙岩县土改中华侨的错划与纠偏入手，考察复杂历史进程中的多元土改实践。希望回到那个时代去考察当时的行动者与历史的关系，让各种历史要素可能或尽可能地回归本位，从而考察国家（政党）、地方和民众的历史选择和行为策略，并梳理这些因素最终是形塑了土改运动的运作和面貌。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性胜利，建立政权。从国家意志而论，土地改革是势在必行之举，这是制约着其他行动展开的前提。土地改革首先影响地主的利益，因此不可能以“民主的”“和平的”方式发生，只是以强力干预而实现。^[57]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新区土改与北方老区土改的差异，力图避免“过

火”“过左”的土改方式和“一刀切”的粗糙手法。在指导思想、政策和具体实施步骤也与以往有较大变化，以发挥地方个性、尊重特殊为重要特征。可见，这是一种“实验逻辑”思维。如果将龙岩土改放置于这样的土地改革框架中，可以更好理解其特殊做法。龙岩具有老根据地和一般侨乡的双重特殊性，土地占有关系也更为复杂，必须采取特殊土改方案。龙岩土改以“土地调整”的特殊形式出现，其实是中央与华东局，华东局与福建省，福建省与龙岩地区的多重互动或能动的结果，是一种摸索性的“社会实验”。后来主张“提前土改”的张鼎丞在针对邓子恢批评伍洪祥时说：

龙岩的土地调整，有缺点，有错误，但不能说完全没有开展阶级斗争。镇反、剿匪、反霸，龙岩工作并无原则错误，地委调整土地的细则也是对的。开始土改时省委强调政策，当时我就说，如果单纯强调政策，土改是不会胜利的，因为土改首先是消灭封建势力，土改的基本问题是革命。当初我认为老根据地的情况复杂，我担心群众和干部的报复情绪，对他们遭受的迫害要同情，但必须防止报复而引起混乱。在龙岩搞土改，如无一批干部和骨干是有困难的。^[58]

从这点上讲，张鼎丞是新解放区进行土地运动的省级主政者，他根据地方实情而推行政策。伍洪祥等更为基层的地方官员对于中央政策的灵活弹性落实，也反映了国家意志与地方运作的有效分合机制。对此，杜润生的认识是有道理的：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既作为一项经济制度变革，又作为推进政治变革的阶级斗争。在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动农民自求解放，实现“土地还家”的同时，彻底推翻乡村的旧秩序，使中国借以完成 20 世纪的历史任务：重组基层政权，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政令统一，获得巨大的动员能力。^[59]

不过，土地改革是社会动员也是“社会实践”，从中央层面一般只提供比较笼统、方向性的政策，附带简洁明了的动员口号。通常不会规定的过于具体，以免陷入死板，以预留回旋空间，也可以视为政治策略。地方土改得了操作空间，因地制宜，因具体情境而采取策略化手段，也难免会带有经验认识及主观随意性，容易造成划分以及处理方法上偏差。龙岩土改具有特殊性，也存在模糊地带。由于华侨阶级身份模糊，加之家庭的混杂性与经济形态的繁复，华侨土改的阶级划分变得困难。虽然中央以照顾华侨利益为原则，

为华侨群体制定了专门的特殊政策。龙岩县华侨土改也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和福建省委《闽华侨土地房屋问题处理办法草案》指导下开展。但在土改进程中，因对华侨户情况的掌握不够以及基层干部和群众对于华侨土改政策的认识不清，结果导致土改进程中华侨地主扩大化，以及罚款、没收房屋等的偏差。

黄宗智认为，由于执政党的表达性现实和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客观性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离，因此尽管许多村庄实际上并没有符合客观标准的阶级敌人，但国家通过土地改革，“把‘阶级’在马克思、列宁理论中的物质层面的意义，转化为在每一个村庄上演的善对恶的戏剧化斗争中的象征-道德意义”^[60]。具有一定启发性。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龙岩特殊土改所要表达的政治意志。新政权的建立和土地改革创造了“新人”，“新人”已成为了土地改革的主体，历史实践进程具有开放性，行动者往往无法控制事态演进，历史可能超越了他们能理解的范围，人被卷入其中，不自愿或不自觉地在历史中行进。如果出现的各种事态出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意料，问题就在于是否能够调整政策，是否具备自我纠错的功能，而不是放之任之。中共中央的土地改革政策制定者刘少奇对此有情形认识，他说：

农村中绝大部分人口的阶级成分是明朗的，容易划分的，也不会有太多的争论，应将这些人的阶级成分首先确定，另有一小部分人的阶级成分是不明朗的，难于划分的，有争论的，应该摆在后面，多加研究，并请示上级，然后去划分，不要急于去划分这些人的阶级，以至划错，引起他们不满。总之，各人的阶级成分不应该划错，划错了的，必须改正。

龙岩华侨土改的偏差冲击了海外华侨信心，导致了侨汇减少。侨汇对百废待兴与参与朝鲜战争的新政权极为重要，争取侨汇不仅可以实现经济恢复和稳定侨乡社会，而且涉及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因此，中央决定对华侨土改中的问题进行纠正，龙岩也即时予以落实。一方面召开侨眷座谈会，宣传和说明政府土改中的华侨政策，听取侨眷意见；另一方面，针对华侨实际状况及其在海外的具体情况，对土改遗留问题的纠偏。当然，侨汇成为纠偏的重要驱动力之后，选择纠错对象就具有一定的侧重，充分显示了政策的统战效用和弹性机制。总体而言，通过政策调整后，龙岩县华侨打击面减低，侨眷对华侨政策有了切身体会。^[61]

华侨作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处于跨国活动的境况之中，长期以来，族群意识和国家认同具有弹性，身份也具有多元性、流动性和模糊性。中国共产

党进行的土地改革，不仅改变和调整社会经济结构以确立新的土地产权归属，而且重新确定社会身份，以此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从错划到纠错的历史过程，华侨身份的模糊性一直在起作用。不过，相对于土地改革之前，国家制度的强有力介入，“华侨”身份及阶级属性也正处于逐渐“明晰”的过程之中，其形态如汤普森指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62]。因此，土地改革的纠偏工作结束之后，“华侨”具备了身份定位，并成为了新的社会阶层。值得注意的是，此历史结果又影响了中共的华侨政策，为了适应新的国家关系，他们逐渐出台确定华侨国籍的相关措施，这一个过程对亚洲的政治秩序和侨乡社会产生了其他的社会效应，有待另文讨论。

注释

- [1] 叶明勇：《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运动研究述评》，《北京党史》，2008年第5期；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土地改革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张学强：《1979年以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张佩国：《中国乡村革命研究中的叙事困境——以“土改”研究文本为中心》，《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张一平：《三十年来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期；卢惠：《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研究综述》，《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黎志辉：《建国初期原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等。总结涉及的问题：土地改革的准备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制订和贯彻情况、土改的偏差问题、土地改革的评价、土地改革中的民众心理、发动群众与和平土改的争论、中国共产党在土改中的阶级路线和政策、土地改革中的重要人物、大陆与台湾土地改革的比较等。
- [2] 郭于华、孙立平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6月号）；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李里峰：《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福建论坛》2006年第9期）等等。赵正桥在《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共土地改革研究的新进展》（《史林》，2015年第1期）将近年研究以革命史范式的新解读、国家-社会关系分析、从现代化视角分析、行为与心态分析进行归纳，有比较全面的介绍，可参见。
- [3] 1929年到1949年，龙岩地权经历了四次变化：第一次，1929年红四军入闽，发动土地革命。第二次，1930年，红军退出龙岩后，有的地主向农民收回土地，有的收回后私下退还，或名义上出租给农民耕种，听凭农民交租。第三次，1932年，十九路军开展“计口授田”，调整了部分土地属性。第四次，龙岩绥靖公署专员李汉冲推行“扶植自耕农”政策，将1929年以后农民从地主、富农分得土地全部折价，向政府交钱，地主、富农向政府领回地价。
- [4] 土改前，福建出国华侨约有350万人，福建省内有侨眷约150万人。以泉州人数为最多，约占60%，漳州和福州各占10%左右，厦门和莆田两市占5%左右。闽西、闽北、闽东北地区华侨及侨眷人数占10%。划分为重点侨乡、一般侨乡、第三类侨乡。华侨侨眷人数众多，侨汇多，与海外的联系十分密切，为重点侨乡。部分乡镇华侨侨眷较多，部分乡镇因华侨侨眷不多，侨乡特点不明显，为一般侨乡。与非侨乡无多大差别，仅有零星华侨，为三类侨乡。龙岩县属于一般侨区。
- [5]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2-83页。
- [6]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49-1952）》，第1卷，第25页。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第94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7页。

- [8] 《毛泽东关于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给邓子恢的电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16页。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3-145页。
- [10] 莫宏伟：《饶漱石与华东新区土地改革》，《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 [11] 《伍洪祥回忆录》，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17-418、438页。
- [12]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福建地方简史（1926-200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2页。
- [13]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福建省农村调查》，1952年，第203页。
- [14] 1950年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也说：“江南各省土地集中情形，经过土地革命之震动，八年抗战之破坏，及国民党长期压榨结果，已不像大革命以前那样集中……特别是老苏区及其周围，更加分散，地主富农土地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自己不劳动，单靠收租吃饭的地主很少……我们经过地方党委调查，及许多老干部回家，从亲友无意闲谈中调查都是如此。虽然苏维埃失败后，地主复辟向农民倒算，但地主对反革命无信心，对革命畏惧，许多地主抓一把钱后，多转到城市作投机资本；有许多地主则被杀或屈服，不敢再向农民进攻。因此，土地分散是很自然的，地主家属在破产后，多参加劳动，也是事理之常。”（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27页）。
- [15] 《伍洪祥回忆录》，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41页。
- [16]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06页。
- [17] 《伍洪祥回忆录》，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54页。
- [18] 福建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福建省土地改革进度说明表》，见《福建省土地改革文献汇编》，下册，1953年，第12页。
- [19] 《伍洪祥回忆录》，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17-418页。
- [20] 《龙岩县结束土改工作总结》，1952年7月16日，转见郑学秋：《龙岩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委员会文史与学习宣传委员会编：《龙岩文史资料》，2008年，第37辑，第53页。
- [21] 转见傅颐：《司徒美堂与侨乡土改》，《访史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页。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卷，第2页。
- [23] 转见傅颐：《司徒美堂与侨乡土改》，《访史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页。
-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20-321页。
- [25] 甲、对侨眷之属于地主阶层者，因有本人出国前原系地主与原系劳动阶层，出国后以其劳动所得购买土地，家庭构成地主之本人现尚为劳动阶层者两种情况。故对前者照顾，房屋不动，其他按土地改革法第二条处理，对

后者则除土地按土地改革法第二条处理,对后者则除土地按土地改革法第二条处理外,其他均一律不动,以分别两种不同的情况,给以不同照顾。乙、华侨工商业家在农村不依靠经营土地,故除房屋照顾不动外,土地则按土地改革法第四条处理,这样对农业生产有好处。丙、侨眷之属于半地主式的富农,一般按土地改革法第六条处理,并不影响其生活。而海外属于劳动成份者,则其全部土地超过全村每人平均百分之一百五十者,所有土地中除过依照上述标准保留的数量之后,只征收其出租土地之多余部分。丁、侨眷中的小土出租者,其出租土地超过当地每人平均百分之二百者,亦给以照顾,一般可不征收其多余土地,以给以较大的照顾。依以上照顾华侨之标准,则土改后华侨中之地主工商业家,均必非华侨地主工商业家在房屋问题上普遍照顾不动,有些还在牲口、农具、多余粮食上照顾不动。小土地出租者,基本上可不动,可保持高出全村平均土地的标准。半地主式的富农,则亦保持了高于全村平均土地百分之五十标准。这样,在雇农土改后亦达不到全村平均土地的情况下,半地主式的富农比土改后之贫雇农平均地仍更高。(见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320-322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第93页。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22-323页。

[28] 龙岩县委:《东肖区有关华侨土改前后各种情况调查》,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97;龙岩县委:《龙岩县关于土改中华侨分户情况统计》,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11;龙岩县土改办:《关于土改时各乡华侨分户调查材料》,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09。

[29] 陶奎璋:《福建省侨区土地改革情况》,1952年3月。

[30] 龙岩县土改办:《西城区大洋乡华侨问题分户调查材料》,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68。

[31] 《伍洪祥回忆录》,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41页。

[32] 郭于华、孙立平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

[33] 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34] 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5]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11。

[36] 龙岩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岩地区志》(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3页。

[37] 东肖区委:《对东肖区处理土改遗留问题中有关华侨问题重点调查报告》,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97。

[38] 东肖区委:《东肖区洋潭乡有关划分阶级成份情况统计》,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124。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21页。

- [40] 赵增延：《建国初期侨乡的土地改革》，《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
-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22页。
- [42] 东肖区委：《东肖区中民镇华侨评定分户资料》，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104。
- [43] 东肖区委：《对东肖区处理土改遗留问题中有关华侨问题重点调查报告》，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97。
- [44] 龙岩县委：《龙岩县委对有关华侨地主问分户处理初步意见》，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14。
- [45] 龙岩县委：《县土改办有关提前改变华侨成份的报告》，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23。
- [46] 东肖区委：《对东肖区处理土改遗留问题中有关华侨问题重点调查报告》，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97。
- [47] 《人民日报》，1950年5月6日。
- [48] 人民银行、侨委会党组：《关于三年来侨汇及华侨投资的报告》，1952年1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第843页。
- [49] 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456页，转引自《中共中央复华东局、福建省委对侨区华侨土改遗留问题处理意见》，1952年5月4日。
- [50] 中侨委党组：《对土改中华侨土地财产处理的九点办法》，1952年1月3日，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4页。
- [51] 东肖区委：《对东肖区处理土改遗留问题中有关华侨问题重点调查报告》，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97。
- [52] 莫宏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东土地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93-294页。
- [53] 赵增延：《建国初期侨乡的土地改革》，《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
- [5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92页。
- [55] 龙岩县委：《李敏唐同志关于处理退还侨汇问题给工作组同志的报告》，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97。
- [56] 龙岩县委：《县土改办关于处理土改遗留问题时对各县华侨的处理意见》，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09。
- [57] Ladejinsky, W. 1964. Agrarian Reform in Asia, Foreign Affairs, April, 445-460, 转见瞿宛文：《台湾战后农村土地改革的前因后果》，《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5年，第98期。
- [58] 《伍洪祥回忆录》，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60页。

[59] 杜润生：《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农村变革回忆之一》，《百年潮》，1999年第10期。

[60]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2-83页。

[61] 东肖区委：《对东肖区处理土改遗留问题中有关华侨问题重点调查报告》，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档案馆藏档，馆藏号29-1-97。

[62] E. P 汤普森：《前言》，《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

重整河山 待新生

天津解放初期工厂接管的历史实践与伦理意涵

符鹏

引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立了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对于工人阶级的这种地位，传统的革命史和党史研究围绕翻身叙事，形成了一套简明的规范化论述。当这套论述对应的社会现实发生转变之后，原有的叙事形式逐渐被抽空内涵，无法为人们提供把握过去时代社会实践和伦理生活的通道。这些年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以不同方式对建国后工人研究的推进，正是力图在学术层面对此做出反驳。然而，细察起来，这些讨论往往在无形中受制于后冷战思维，先在预设工人阶级地位的意识形态虚幻性，并通过西方流行的极权批判和治理分析，在国家/个人的二元对立结构中，论证工人阶级被国家控制和利用的种种状况。事实上，这种

讨论之所以获得优势地位，主要依赖于个案分析的选择。但研究者惯于从精心选择的个案中很快提炼出普遍性的历史判断，而对于个案本身所对应的特定历史环节，以及它在不同社会实践中的位置缺乏必要的认知。因此，最终过于简单地在个案分析和社会总体性之间建立表征关系，却无法真正触及建国后工人问题展开的历史脉络和思想内涵。

建国后工人阶级对自身主人地位的认识，并不是以阶级论简单对应的结果，而是依赖于建国这一历史实践对于工厂空间的重新组织和打造。因而，如果不理解这一实践的展开所要求的那些历史条件，所克服的结构性难题，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阶级论，都无法获得进入建国后工人问题的历史感。在这种意义上，如何把握建国前后中共接管工厂的历史实践，便成为思考工人阶级主人意识生成过程之前提

所在。本文将以天津解放前后工厂接管为中心，讨论中共以怎样的历史理解面对这一新的政治议题，调动了什么样的组织经验来处理工人—工厂—工会的三位一体关系，又如何克服新的历史情境中的结构性矛盾，从而将工厂打造为新的伦理空间。

工厂接管是解放前后中共城市接管工作的核心部分。“管理和建设城市中最中心的问题是管好工厂、发展生产的问题。”^[1]尽管在以往的城市接管研究中，工厂接管是研究者关注的论题之一，但并没有得到足够深入的讨论，而往往只是依据史实描述过程而已。概而言之，大多数研究侧重从整体上概述中共城市接管的政策依据和历史过程，而缺乏对于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究。^[2]近年来少数学者的关注点逐渐转向对于城市接管个案的考察，^[3]但对于工厂接管的描述往往只是书中篇幅不多的孤立部分，至于其中的关键性问题则鲜有追问，诸如：中共的工厂接管建立在怎样的历史前提之上？这项工作与其它接管工作构成了怎样的结构性关系？接管过程所遭遇的不同层次的矛盾关系，对中共的革命经验带来了怎样的实践挑战？中共又是如何不断调整实践方式，逐步推展工厂的民主化改革，重构工人在生产空间中的伦理经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构成了本文重新整理和思考这一历史实践的基本线索。

一、旧制度下的工厂与工人： 接管工作的历史前提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开始，中共着手计划接管平津两地。12月份，华北局城工部的工作人员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城工部部长刘仁带队到长辛店集中，准备接管北平工作，另一部分由城工部委员杨英带队到津西胜芳镇，筹划接管天津工作。^[4]在随后的建制规划中，出于对北平可能作为未来首都的考虑，人员配置有所倾斜。但与之相对，天津的工业基础和工厂数量都超过北平。当时天津的工业水平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5]华北局对于接管这样一座大规模的工业城市同样非常重视，尤其将工厂和工人问题视为工作中心。时任天津军管会副主任的黄敬在《关于军管时期天津职工运动的讲话》中，特别强调：

[……]进城后最根本的工作是工人运动，发展工业，恢复秩序，甚至对私人资本实行国家的领导，如果没有工人参加，则也很难领导。故政策的能否实行，秩序是否搞得不好，工商业是否能发展，其根本环节，就在于天津的工人运动。^[6]

他在此强调的工作原则，对于理解天津接

管非常重要。在此前对石家庄、济南等城市的接管中，中共对于工厂和工人的根本性地位，并没有这样明确的认识。石家庄的接管曾受到中共中央批评：“石家庄解放已经一年多，我们的干部还有这样的倾向，即知识分子干部愿意找资本家职员学生谈话，农民干部愿意接近农民贫民，而工人却少人理睬。”并由此强调：“工人阶级被遗忘，共产党忘了本队，在目前走向全国胜利连续地解放大城市当中是一个最严重的现象。”^[7]针对接管石家庄的这种教训，中共做出认真总结，并希望此后的接管工作能够引以为戒。^[8]

在解放天津前一个多月对济南的接管中，由于吸取了此前的教训，接管过程较为顺利，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混乱局面。但在很多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仍然处于谨慎摸索的状态，并没有明确工厂和工人问题的根本地位。在平津战役的准备阶段，党中央指示华北城工部选派干部去济南学习经验，经过十余天的短暂学习，便返回城工部汇报宣讲。^[9]上述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确立的。那么，对于缺乏工厂管理经验的城工部干部来说，这一原则能否应对即将到来的接管工作？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追问这一原则包含着中共怎样的历史理解？而这种历史理解对应的天津工业和工人状况的历史前提又是什么？

近代天津工业发端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

在这种处处受制的工业环境中，工人阶级的曲折成长，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抗争意识。1918—1926年，中国工人运动迎来第一个高潮时期。上海工人发动628次罢工运动，与这种激烈的抗争态度相比，天津工人的反应颇为冷淡，只有14次罢工的记录。^[10]天津工人抗争意识的匮乏，与这座城市由来已久重视商业，轻视政治的市民风气相关。^[11]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人的这种利益诉求被组织和联系起来的方式。贺萧的天津工人研究表明，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因素主要是籍贯、亲缘、庇护和阶级。阶级关系并没有成为他们组织自我的核心条件，而是这些因素共同形塑的生存策略。在这种生存策略中形成的依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工人的行动可能，并且不同组织因素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也带来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因此，只有大型工厂中的产业工人才有反抗的可能，而除此之外大多数的小工厂工人则缺乏反抗的意识条件。^[12]

1928年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赶走奉系联军，开始掌控天津。由于各军系之间矛盾重重，中央和地方之间貌合神离，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薄弱，风雨飘摇。事实上，从北伐开始到抗战爆发的十年，是国民党工运工作的黄金时代。北伐时期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13]，再加上蒋介石的监督和解散，感召力和影响力都大大受损。而与此同时，

国民党积极改组工会机构，从1928年开始相继发布《工会法》《工厂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条文，企图充分掌控工会和工人活动。国民党工会工作遵循的基本方针是：倡导劳资合作，鼓励民族抗争，反对阶级斗争。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国民党通过协调劳资冲突，的确为工人争取不少劳动权益。^[14]但是基于反对阶级斗争的原则，他们借助资本家和帮会势力控制工会和工人的企图时时扭曲这种诉求，终究未能消除与工人群体的隔膜，赢得他们的信任。

1937年7月，日军占领天津，整个城市的工业都受到日本的军事管制，国共两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都几乎销声匿迹。1945年抗战的胜利，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来得很突然。当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接管天津的敌伪军队、机关和产业等时，因为毫无准备而乱成一团。各种国民党派系势力都希望从中谋取利益，中饱私囊。^[15]结果导致工业生产一时全面瘫痪，直到1947年才得以大体恢复。

国民党在混乱的接管过程中，已经隐隐担忧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打入工人内部，甚至有草木皆兵之感。因而，他们很快通过重组工会，建立“防共小组”，推行保甲制，建立以“职工福利”为名的反共组织，与中共展开工运领导权的争夺。然而，事实上，此时中共在工人中间的组织影响力较为微弱，并不足以

与国民党的“黄色工会”抗衡。而当不同派系在工厂问题上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会栽赃共产党的指使，以便掩饰自己的利益诉求。

^[16] 国民党内部组织的这种溃败，使得接管后工人对其寄予的期待很快破灭。再加上连年粮食匮乏、通货膨胀，工人的不满情绪不断冲破“黄色工会”的掌控，发展成罢工抗议事件。从天津市社会局和总工会的档案资料来看，从1946年开始，劳资纠纷不断增加，工人的抗议活动也越来越频繁。鉴于这种状况，1947年7月1日，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视察天津，提出对工人的四点希望：扶助劳工组织；改善劳工生活；提高工作效率；爱护工厂，加强劳资协调。^[17]但这些一贯的劳工政策已经无法应对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重新挽回工人的信任。到了1948年前后，随着中共地下组织在工人中间影响力的提升，自发的抗议活动逐渐在局部转变为有组织的罢工游行，不少工厂倒闭，勉强存活的工厂也只能维持间歇生产。

正是在上述历史前提下，中共开始筹划接管天津的准备工作。而从1948年黄敬《关于军管时期天津职工运动的讲话》来看，华北局在明确以工厂和工人工作为中心的政策时，其历史理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敌使我们与本阶级脱离，这次我们进入大城市是归队。由于先锋队长期与本阶级脱离，因此，就使得，一、无产阶级失去先锋队的公开领导，国民党摧残镇压工人中的先进分子，故工人觉悟较低组织涣散。二、共产党长期地失掉了离开了本阶级，这就影响了党员的成分（农民、小资产阶级较多），使非无产阶级思想常常侵入，同时，无产阶级参加解放区建设的也就很少。^[19]

显然，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共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阶级认知，以及此前城市接管中温热而尚未定型的工作经验。在紧张的战争状态和短暂的筹备工作中，他们还不能充分地对上述历史前提进行深入的整理和总结。

在胜芳整训中，天津市军管会制定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纲要》《关于接管天津的任务与方针》《关于接管工作中几个原则问题的决定》《接交注意事项》等一系列的接管方针和注意事项。这些政策的核心原则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19]这个原则是陈云在接管沈阳时提出的，此后的接管工作大体照此而行。但经过接管石家庄和济南的经验教训之后，在接管天津的问题上，华北局围绕这个原则，更明确地指出：

对于国民党的行政和党团机构，采取彻底取而代之的办法，而对工厂企业的接管，则突出强调“原职、原薪、原制度”的“三原”准则。这项准则对于原有的国民党工厂体制和工人状况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中共干部来不及建立整全的历史理解的情况下，这项准则在具体工作中将会遇到怎样的现实问题？如何认识和应对这些问题，对于接管干部的实践能力提出巨大的挑战。

二、组织形式、革命经验与实践能力： 关于工厂接管干部问题

从1949年1月14日开始，经过29个小时的战斗，人民解放军迅速取得胜利，解放天津。战火硝烟散尽，许多市民都在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城，指望着能尽快安顿下来过日子，但同时也心怀疑虑：共产党能管好这座城市吗？与军事上的胜利相比，如何有领导有秩序地安排好接管工作，成为更为瞩目，也更具挑战的政治任务。对此，至关重要的是接管干部的工作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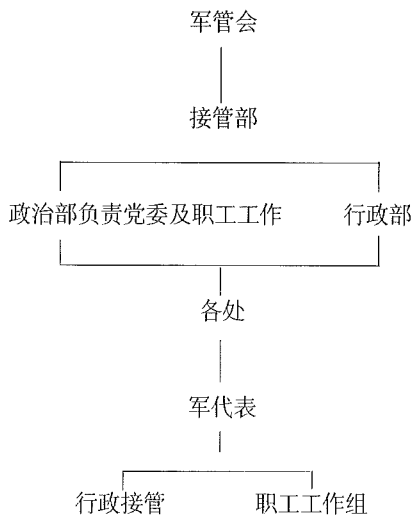
在华北局对平津两地的接管安排中，干部配备的质量对北平有所倾斜，但数量上的差别并不大，参加胜芳整训的干部有7400多人。“[……]所有干部都是来自不同部分、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工作岗位，思想情况极为复杂，

不同人反映了不同的想法。”^[20]如此庞大数量、思想复杂的干部,经过短短一个月时间的整训,便开始参与接管工作。可以相见,干部的工作状态势必难以达到中共预期的效果。事实上,从军管会及各工厂接管部门的总结来看,当时参加接管的干部数量虽多,但“质量又远不及数量”。^[21]而且“在胜芳学习时准备坏的方面多,好的方面准备很不足。”^[22]这意味着,接管干部的工作能力并不理想。因此,如何安排和调动这些干部,对于接管的组织形式提出很高要求。

如卢卡契所言:“[……]组织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正像在每一种辩证的关系中一样,这一辩证关系的两项只有在这一中介中和通过这一中介才能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23]换言之,理论的抽象观念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只有在组织形式中才能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转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行动。不过,理论与实践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之中。组织不是理论的投射形式,理论的对错与否都要经过组织形式的检验,才能获得介入现实的实践契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契特别强调组织的作为一种意识过程的主观能动性。不难明白,这对组织领导者的主体状态提出相应的要求。

中共在城市接管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军事管制委员会。^[24]接管天津同样

采用了军管会统一领导的方式,其组织架构大体如下:



从表面上看,这种党政合一的组织形式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事实并非如此。接管工作不同于中共一般的组织工作。军管会的任务包含接管两个方面。就工厂接收而言,这是一项临时工作,它所要求的组织形式是临时性的,而工厂管理则是长期工作,它要求相应的组织形式的稳定性。军管会作为例外状态下的组织形式,需要同时涵括这两种不同的工作要求,并完成两者之间的接合和转换。经过此前城市接管的历练,这种组织功能已经稳定下来,但并不能保证它与具体的工作任务和现实状况自动配合。

军管会作为临时性的组织,首先遇到的

问题是其与原有组织系统之间的冲突。参加接管工作的7400多位干部，不少是临时借调来参加接管工作，有人因此产生了严重的“临时思想”，认为“反正是要走的，因此不愿意多负责任，不解决问题，恐怕将来结账拖了自己。”^[25]这种心态导致被分派的工作停留在表面，游离于军管会的组织管理。而问题的根源在于组织形式的矛盾：

由各系统调来之干部，尚有个别部分以直属上级决定之名义抵制军管会各部分负责人之命令的，军管会各部门负责人也因来自不同地区，与干部联系有所顾虑，使某些问题不能完全贯彻。故今后城市接收干部从一个地区征调配备应完全割断原有建制为最好，以便内部互相牵制互相抵消。^[26]

这一矛盾不仅大大降低了接管工作的效率，而且加剧了借调干部不安心工作的状况。面对此种情况，中共及时调整接管干部的隶属关系，所有各地各系统派来的干部，在组织领导、政策、行政管理、工作计划、日常生活等各方面都必须暂时切断与原有系统的领导关系，确保军管会作为集中领导的组织形式的地位。除此之外，军管会与天津市地下党组织以及工作组之间领导地位的矛盾，也都经过多方磨合，才最终得以消除。

即便军管会化解了不同工作任务之间的冲突，其组织状况依然并不理想。当时接管干部从上到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参与接管城市。在短短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中，尽管军管会也安排人员对天津的工厂状况进行清查和统计，但对于实际的组织要求并没有相应的经验基础，只能依据政策大体分配。而一旦进入实际的接管工作，中共很快就发现情况与预期的差距：

由于在进城前我干部配备不够周密、分工不明确，只是进行了大体的组织与分工，同时对各被接管单位的情况估计不足，认识完整的情况较少，所以各接单位配备的干部力求人多。但进城后情况不是如此，我所组织的形式不太适合于实际情况，所以后来部分干部进行临时配备，尤其是在刚开始接收时，表现的极为混乱。同时，又缺乏一定的次序和制度，没有及时的建立，有的较完整的单位我之干部过多用不开，也没有及时想法安置，使他们感到没事做形成上忙下不忙，少数忙多数闲的现象，力量不能充分的发挥。^[27]

如前所论，类似的混乱状况在1945年国民党接管敌伪产业时也曾出现过，最终对接管工作造成巨大损失。而要避免这种后果，顺利开展工作，就必须应对组织和个人都不理想的状况，使两者的关系与现实需要充分配合。

一方面，个人实践状态的调整依赖于组织能动性的发挥。一个良好运转的组织能够通过不断校正工作方式，重新定位个人在组织中的位置，以及个人与现实的关系。每一个干部都不是赤手空拳进入军管会组织，而是带着过去革命实践中累积的工作经验。因此，组织在重新调整其与个人关系时，必然会碰到不同来源和形式的革命经验。当时参加接管的干部大部分来自农村。农村工作是中共创造革命经验的主要来源。划分阶级成分，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完成土改，由此再造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但这些革命经验并不能直接转为城市接管工作的方式，尤其是面对农村干部不熟悉的工厂接管。农村干部的生活习惯、工作作风和业务经验，都不容易很快调整到工厂环境所要求的状态。因此，当时军管会领导认为：

完全在农村工作的区乡农村干部，一般不适宜于接受城市工作。接手企业的干部，一方面要懂得政策，另一方面要有业务知识，否则起不了作用，反而闹出笑话，造成对党的不好影响。（这次天津接收中，有许多干部看不懂人家的会计账目，看不懂英文簿记，使旧人员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没有人才）。^[28]

基于这种判断，在干部调配上，军管会倾向于“多调政治上可靠，经验丰富，又在

根据地工作过的老工人、职员，少调纯农村生长的干部。”^[29]同时，“地下党员一般的都很好，他们对城市的工作能力比农村的干部强。”^[30]尽管有这些调整，军管会并非就此对农村干部的状态置之不顾。事实上，接管干部普遍遇到的状况是：“看不出问题不会主动地做工作”。^[31]这一方面是因为接管干部对具体情况不够熟悉，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找到介入现实的方式。所以当时“接管干部感到最大的问题是深入下去”。^[32]这种状况在农村干部身上尤为严重。针对这种问题，军管会并没有采取简单的政策教育的办法，而是强调：

对新从农村来到城市之干部应具体帮助，只单纯原则指示不能解决问题，不但具体的帮助，同时须对具体事情从思想上解决，使其能从一件事情扩大到其他事情的处理上去，使其有勇气敢负责工作。^[33]

换句话说，对于政策的掌握和领会，需要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进行深化。但对农村干部来说，如果不首先从思想上打通以往革命实践形塑的狭隘经验主义造成的认识障碍，便难以通过解决具体问题获得同新的现实打交道的能力。也正是通过这个过程，组织逐渐把握了不同干部的性格倾向、经验结构和工作

特长,从而有效地将之安顿在组织的适当位置,充分发挥个人的实践能力。

另一方面,一个组织的运转是否具有活力,不仅依赖于个人在组织中能否各安其位,而且取决于组织内部个人之间的关系状态。“大家来前,思想上认识不会太完整,来了碰到的是很完整,因而不知怎样下手工作了。”^[34]思想认识不完整,而现实是完整的。以局部的眼光来处理整体性的现实问题,自然难以看清每一个具体问题在整体中的结构性位置,无法把握不同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脉络:

军代表制度是正确的,但由于头绪多,如军代表、旧行政、职工组、职代会分四部分,因此相互工作配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配合不好,对工作就是很大的障碍。过去这种情形是很多的,工作各有重心,各部分布置各部分的工作,有时互不通知,互不满意、步调不一。^[35]

显然,只有组织能动地自我校正,实现内部团结,才能以整体性的方式与现实状况相配合。在接管初期,由于干部认识水平的差异,组织内部出现不少不团结的情况。譬如,工厂接管干部与地下党的联系问题。“由解放区进城干部对他们缺乏热情,不了解他们的处境和情绪,冷淡对待,有些还批评他们,又未能迅速按照他们能力分配工作,致使地

下人员大失所望,热情降低,后经教育解释,分配工作,始行纠正。”^[36]组织团结并不只在于组织成员建立起对于政策文件的共同认识,更重要是,他们能否意识到自我与他在组织内部的位置关系,并在日常工作中达成相互配合的伦理状态。

组织形式对于接管干部这种总体性意识的要求,不仅体现在工厂接管工作的内部,而且指向城市接管的整体。“入津后贸易、金融、管理、财政、工业、交通,许多挠头的问题,不好解决,工作上配合不起来。”^[37]工厂接管不是孤立的工作,尤其是由接到管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与财政、金融、贸易、交通等方面的工作密切相关。一旦无法形成恰当的配合关系,工厂的物资储备、财务管理、日常生产都会陷入停滞状态。如前所论,由于未能处理好这种整体关系,不管是国民党接管敌伪产业,还是中共此前的工厂接管,都出现过只接管、重接轻管的教训。在接管天津工厂初期的总结中,中共意识到:“这次的组织形式我们认为基本上是对的,但有的混合组织在工作上仍有问题,主要毛病是接与管不能很好连接。”^[38]因此,在接管后期,军管会特别强调:

在初期接收阶段已过,要求如何处理走向建设的时候,接收和管理就应分开建立领导的组织,接管部应该集中于如何完成接收,

逐步交给管理机关；而管理机关则应该如何按系统地分配到有关系统进行经营，并解决经营中的资本、原料、薪资等问题。同时，我们认为这个管理机构又必须是全区性的驻津办事机关，这样既便于解决问题，又便于今后长期的系统建设。^[39]

正是以这种相互配合的总体性要求为指导，在接收环节完成后，不少工厂很快投入生产。对于因为种种困难无法复工生产的部分工厂，刚刚接管的金融机构积极贷款助其度过资金难关；军管会全力组织全市国营工厂互通有无，调拨原料；贸易部门派出人员赴各地采购急需原材料；工厂内部也发动职工挖潜、献物，设法克服生产困难。通过多方面的互助和配合，到1949年2月底，绝大多数工厂已经恢复生产，截止3月底，全市工厂全面复工复业。在组织形式随着现实需要而磨合和推展的过程中，接管干部的状态也因此不断得到提升和锻炼。原有的具体工作越发与更大的整体性建立意义的连带感，并由此以充实饱满的态度克服过去革命经验的凝滞，不断调整与现实打交道的方式，创获新的工厂接管经验和实践能力。

从1月15日天津解放开始，不过是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共在组织形式和接管干部的状态都不理想的情况下，通过不断介入和回应不同层次的接管问题，及时调动和调整

组织形式的能动性，理解和把握不同干部身上累积的革命经验，逐步构造组织和个人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接管组织的形式和功能得到完善，干部能够各安其位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打开和扩充干部理解自身工作意义的整体性意识，使得不同方面的工作能够相互配合和共同推进。可以说，在天津工厂接收完成，管理工作开始的时候，中共的组织 and 干部状态已经大为改观，渐趋良好。

如前所论，天津城市接管的目标是，彻底替换原有的党政团体，而以“三原”原则（原职原薪原制度）保存工厂。然而，一旦接收工作完毕，中共开始组织生产活动，国民党工厂体制的矛盾便日益凸显出来。对于缺乏工厂管理经验的接管干部而言，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些矛盾的构成方式和内在因由，成为改造工厂生产空间的首要任务。

三、国家·资本家·职工： 劳资矛盾的新状况

国家、资本和工人是劳工研究，尤其是劳资关系问题的基本分析要素。以往对于建国后劳资问题的考察，往往是从这三种要素出发，以经济和阶级分析来直接对应中共组织工业生产的过程。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抽空了特定历史过程中人的精神处境和情感状态，另一方

面也忽视了这一关系在解放前后语境中展开的历史前提和问题脉络。因而，要理解接管天津后工厂劳资关系的矛盾形式和思想内涵，就必须首先进入中共触碰和把握这一问题的前提和脉络。

事实上，天津接管工厂的复工并非一帆风顺。中共试图延续的“三原”原则首先在资本家那里遇到了阻力。在最初的一个月里，失去国民党体制保护的资本家陷入巨大的惶恐。他们对共产党的到来满怀疑虑，解放前夕工人斗争的阴影更加深重。大多数厂主都害怕情绪激昂的工人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肆意报复过去自己的恶行。再加上原本的萧条状态下，原料采购和产品销路困难重重；又有反动宣传散布中共要实行“三三制”（即政府、工人和资本家利益均分），越发加重了他们的不安情绪。因此，不少资本家不愿继续经营，或是转移资金逃向港台，或是以各种理由拖延开工，迟迟不发欠薪和年终分红，并设法解雇工人，减少开支。因而，这一时期的劳资矛盾主要是欠薪、分红、解雇和要求复工。据天津市十个区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段的劳资争议有441件，其中上述问题就占了315件。^[40]

面对这种状况，接管干部反复对资本家宣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并申明中共团结资本家开展生产活动的愿望。但这些宣传并不能完全打动他们，而往往被理解为表

面的拉拢和迎合。为此，这些干部有针对性地了解资本家的生产困难，及时安排银行贷款放债，同时贸易部门疏通销售渠道，为复工复业提供经济条件。这些不辞劳苦的实际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资本家的惶恐情绪，促使其恢复对生产的信心。截止1949年2月底，大部分工厂都复工生产。

然而，接管干部不久便发现，恢复生产的工厂经营状况并不理想，不少工厂的产量和销量都在下滑，甚至赶不上解放前的水平。对于如何经营和管理工厂，干部普遍缺乏经验。而要应对这种状况，便必须直接介入工厂内部的生产空间。当他们开始进入内部，首先面对的不是生产要素和管理体制，而是每一个具体的人。而一旦与具体的人接触，他们很快察觉到，政权更替在国民党旧职员身上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情绪动荡：

在下级职员中，害怕因我入城干部代替工作，造成失业；在技术人员中，则均对我入城干部不懂业务而轻视；在高级职员中，部分初则畏惧，现在则企图麻痹诱惑，腐蚀我入城干部，假意殷勤，或组织职工刁难我入城干部。^[41]

不难明白，不同层次职员面对接管干部的反映，与其在原有工厂官僚体制中的不同

位置相关。比较而言，下层职员对中共多有期待倾向，技术人员采取观望态度，而高级职员充满对立情绪。这些不同层次的差异，要求接管干部能够采取不同的方式开展工作。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一旦介入具体事务，干部就发现这些不同层次差异所对应的旧体制生产关系的遗留：

如能深入下层就会发现不少工头领班生活较优，随着高级职员走。因此讲话时要格外留神。杂役人员多与高级职员有联系，表面上对我们很好，实际上并不好心，高级职员一般的爱摆臭架子，你不摆架子他会轻视你，为了工作必要时对他们摆一下也是必要的。^[42]

对上层职员要机智敏感地发现其思想活动及顾虑，及时予以解决。对下级职员与工人，则须深入团结教育，在复工之短期过程中，除必要的谈话外，一般的暂少进行个别谈话，以免在高级职员中，因不了解我们而起怀疑顾虑，甚至发生离职潜逃，影响恢复工作之进行。^[43]

显然，旧体制的生产关系滋长了复杂微妙的人情关系网络。这些旧的人情关系往往成为政治工作的首要障碍。接管干部体察和把握这些人情的能力，并非凭空而来，而是

得益于中共以往在农村养成的群众工作经验。这些经验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被重新调动并激活，成为开展新工作的基本着手点。接管干部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有效化解这些关系网络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顺势将之引向政治工作的有利方面。不仅如此，他们以此进一步打开工作局面，介入下层职员和工人日常生活的困境：

战争炮火中，有的个别职员受了伤，或是家里受了损失，我们及时进行了救济，对职工启发教育工作也很大，局内救济了一位工友，另一位工友父亲生病，经济困难，一位下级职员，死了老婆，无钱埋葬，分别借给了一些钱，在全体职工中，发生了很大影响，和国民党压迫职工，官僚主义成了鲜明的对比。^[44]

如此细致周到的扶助工作，有效消除了他们对接管干部的畏惧和隔阂，培养他们对中共政权的信心和进一步的期待。然而，“一般的稳定行政人事的情绪，但工人不满，说盼共产党来了又原职原薪啦”^[45]：

“工人反对职员”，职员怕斗争、怕失业、怕工人、又看不起工人，工人则有平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闹翻身，不服从指挥，要求提高待遇，把职员与工人待遇拉平，此外

职工间的矛盾还由于职员中有一批冗员和压迫工人太甚的。^[46]

职工矛盾的核心是工人对职员“原职原薪”的不满，这对中共实施的“三原”原则提出挑战：其一，职员在“原职原薪”的接管政策下，获得了稳定的生计来源，但在观念层面一时还不能破除脑力劳动者的优越感。其二，某些职员在国民党时期压迫工厂的行径，在“原制度”的原则下得到延续，从而引发工人的不满。其三，国民党时期的工资状况极为混乱。工厂职员中既有亲信关系，又有同乡关系，工资收入往往与能力不匹配。同时，不同系统的工厂各立标准，差距悬殊。工人们都对此深恶痛绝。

对于前两个方面的问题，接管干部通过说服教育，打掉脚行把头制、工厂工头制、棒子队等压迫组织，很快便气氛缓和，秩序渐稳。比较棘手的是第三个方面的工资问题。追究起来，“工人的大部分意见集中在经济利益”。^[47]可以说，工资问题构成职工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种意义上，职工矛盾的实质乃是劳资矛盾，尽管其表现形式并非工人对资本家的直接斗争。要缓和这种形式的劳资矛盾，就需要对工资结构做出调整。而调整工资结构，必然会触及职员的利益，进而波及资本家的收益，以及与之相关的体制关系。当时七届二中全

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尚未召开，中共还没有出台相关文件，因此，接管干部对于这种性质的劳资矛盾缺乏应对的依据，只有原则性的“劳资两利”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市政府的解决方式极为谨慎，采取了“保证工人实际工资”及“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方针。这种方针充分考虑了各方诉求，力求在不同利益关系中寻求平衡。但在实际落实的过程中，采取了以地区为单位，而不是以行业为单位的办法，结果导致有些厂方抵制工人的正当要求，矛盾再次激化，有的则无条件退让，要什么答应什么，致使生产再次陷入困顿。^[48]不仅如此，与政府干部相比，工会干部和区委干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往往在情绪和态度上更偏向工人的要求，这样在干部之间形成僵持局面，同样影响矛盾的最终解决。^[49]正是因为这些不同层次的矛盾关系，使得劳资双方依旧缺乏信任，生产状况徘徊不前。

时任华北局书记的薄一波很快注意到这种情况，并反馈给毛泽东。^[50]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马上安排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工作。1949年4月10日，刘少奇一行到达天津，在一周时间里，他亲自深入工厂，接触工人和私营业主，并邀请重要的工商资本家座谈。在座谈会上，他重点解释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与此前接管干部的解释不同，他在此直面劳资关系中最敏感的剥削问题。反对剥

削正是革命后工人分割工厂资本的理论依据，也正是因此，一些干部在劳资纠纷中踌躇不决，不愿纠正工人自发愿望，无形中成为群众意见的尾巴。刘少奇在解释时，特别强调工人在政治上的解放，并不等于马上不再受剥削。剥削关系不是资本家和工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决定。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也有其进步性。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只能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对于迫切需要恢复生产的工厂而言，不应该抛弃任何一个有用的人。“在人民民主新政权之下，既然‘不怕民族资本家造反’，怎么倒怕资本家办厂开店呢？”^[51]

换言之，对于剥削的理解，不能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应该充分意识到它在特定历史状况中的结构性位置。解决剥削问题并不是天津恢复工厂生产所面对的首要问题。作为城市工作的中心环节，工厂能否恢复生产，对于当时的财政、金融、贸易、交通以及农村的生产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工厂的良好运行依赖于生产空间中不同位置的人能否对彼此处境达成谅解，并形成相互支撑的配合关系。一旦脱开这种具体处境来反对剥削，便会导致生产停滞，工人失业，进而影响到整个城市经济和社会稳定。

刘少奇的这番解释，打动坐在一旁的公司经理宋棐卿，他感慨良多地说：“这回我可明

白了。”几天后，宋棐卿满怀激动的心情写信给刘少奇，表示全厂职工对新政府的政策“有了新的了解及新的希望与新生命”，并决定“麻厂于最近期内加开夜班，毛厂再添购原毛增加生产，化学厂计划即将开工。正筹划再开设麻袋第二厂，以增生产。”^[52]与他的这种变化相似，随后的几次资本家座谈也都收到了良好效果，破除了他们对政府的隔膜和偏见，振作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信心。

除了与资本家座谈外，刘少奇还对天津工厂的职员和工人分别发表两次重要讲话：《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的讲话》（1949年4月25日）、《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8日）。前一篇讲话的中心是调整职员与工人的关系，后一篇的主题是教育和纠正工人的激进态度。比较而言，后一篇更为直接地切入劳资矛盾的具体状况。在这次演讲中，他对这种自发的盲目激进倾向提出批评：

今天我负责任地肯定地向你们说：工人们一定要改正这些过左的、不合理的错误，如不这样，一定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就是工厂关门、倒闭、生产降低、工人失业，或者是工人孤立，农民和职员都说你们不对。到那个时期，你们很痛苦，到那时候要政府救济，政府是没有力量的，你把资本家捉起来，枪毙了，他更不能办工厂。有些人说：“资本家不开，我

们开，组织起来办合作工厂。”开了合作工厂没有呢？开了很多，但没有一个搞好的。这是过去的事实，这种错误过去犯了很多。如果我不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不真实和不负责。到后来后悔也没办法^[53]。

刘少奇这番批评情辞恳切，语重心长，这与他在过去工运实践中的沉痛教训密切相关。在1937年写给张闻天的信中，他特意谈到大革命中组织工运的教训。当时各地的工人运动都出现严重的“极左”问题：“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54]对此，中共未能采取有效办法，最终导致运动失败。在刘少奇看来，这并不是偶然的現象，他从组织安源煤矿工人开始，便深有感触：“工人要前进，但除组织苏维埃外，无法再前进。结果不能阻止工人，这是最困难的问题。”^[55]对于这个难题，他遍问国内外工运领袖和专家，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答复。当1927年的极端现象再次出现时，他在极度困恼中领悟，“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56]但如何引导“左”倾工人实现“高度的觉悟和高度的纪律”的结合，却始终没

有合适对策。因此，当刘少奇见到天津工人这种极“左”态势时，变得颇为忧虑和热切。即便在这次讲话中，他也未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其对职工关系和职工与资本家关系的调整，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

天津市政府很快组织学习刘少奇讲话，并发布《中共天津市委关于传达刘少奇同志指示的决定》。根据他的讲话精神，制定了以集体协商为中心的劳资纠纷处理办法的文件：《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草案）以及《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草案的几点说明》（1949年9月）。通过成立劳资协商会议，签订集体合同的形式，有效缓解了原来不同层次矛盾的单方面对峙的状况，形成“劳资两利”的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天津工厂的劳资纠纷大大减少，生产状况逐渐恢复，为城市的整体发展奠定基础。

在刘少奇天津讲话精神指导下，军管会提出并实施的劳资协商机制，后来成为许多城市处理劳资矛盾的示范经验。^[57]对此，不少研究都倾向于将这种经验简化为刘少奇讲话的直接产物，却忽视了劳资矛盾在工厂接管初期展开的历史前提和问题脉络，以及接管干部针对这种矛盾在不同阶段的呈现方式，推进问题解决的具体步骤。一旦脱开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整理，便很容易抽空劳资问题在特

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构性内涵。从这种理解出发，便不能明白，仅仅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或是当下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都不能帮助我们深入这一矛盾背后所对应的历史状况，尤其是当事人的精神处境和情感体验。真正重要的是，问题解决的过程是中共在充分掌握政策的前提下，通过理解和把握他们的自我感知和内心诉求，不断破除僵化的理论教条和经验惯性，从而逐步打开工作局面，推进每一环节问题的解决。

不过，以劳资协商来化解国家、资本家和职工之家的紧张关系，只是接管干部介入生产空间的第一步。尽管经济手段及其重塑的劳动关系，在革命后的危机时刻平衡了不同层次的矛盾，使得工厂生产得以有效运转，但这并不足以将之打造为充满活力的劳动空间。如果工厂生产中不同位置的人不能因此形成良好的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原有的矛盾结构将会以不同形式重新浮现。在这种意义上，只有进一步改变工厂的生产关系，才能实现这种改造诉求。而要改造生产关系，就需要创造一种新的工厂管理方式。

四、再造劳动的伦理空间： 民主建制与工会的再定位

如何管理接管后的工厂，对于缺乏经验

的接管干部构成巨大挑战。而处理中共思考和应对工厂管理的方式，首先要理解这一尝试在现代以来工厂管理实践中的位置。资本主义工业在近代中国发轫之处，为了适应分散的劳动力资源，工厂管理主要实行的是包机制或包工制。191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世界流行的“泰罗制”（又译“泰勒制”）由穆藕初传入中国，这种管理制度很快在工商界流行开来。“泰罗制”核心是所谓的“科学管理法”，即资方在有效降低损耗，增进效率的同时，对生产过程和工人实施严格的控制。尽管“泰罗制”强调劳资协调是推行科学管理的根本，但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由于对工人的严格掌控，不断遭遇工人的罢工抗议。^[50]中共在接管之初对于“三原”原则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基于对这种生产组织效能的基本理解。即便在管理工作的调整开始之后，也特别强调对这种体制的批判性学习：“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不仅有适应高度剥削需要的一个方面，也还有适应高度技术需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不仅不合理的方面，也有合理的一个方面。而我们是缺乏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工厂、企业知识的，在这里，必须向资本家和旧职员学习。”^[51]1948年中共对于资本主义管理的这种批判性设想，尽管在后来制度实践的不同历史条件下多有变化和调整，但并没有被彻底否定。

与此相对的是中共在革命根据地的国营企业管理实践。从1930年代开始，根据地的国营企业学习苏联企业管理经验，实行“三人团”制度。在此之前，中央苏区的工厂生产陷入困境，厂长无权，管理混乱，浪费严重。刘少奇了解这种情况后，亲自到工厂调查，并撰写《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提出通过以“三人团”及工厂管理委员会来应对困境。^[60]1934年4月10日，中央苏区签发由刘少奇主持制定的《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明确建立“三人团”及工厂管理委员会的体制：“在厂长之下，设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由厂长、党支部代表、工会代表、团支部代表、工厂其他负责人、工厂代表等五人至七人组织之，开会时以厂长为主席，以解决厂内的总大问题，管理委员会内组织‘三人团’，由厂长、党支部代表及工会支部代表组成，以协同处理厂内的日常问题。”但这种民主体制在实施的过程中，依然问题重重，三人对彼此工作不了解，往往意见不一，无法配合。在整风运动之后，“三人团”逐渐被厂长负责的一元化管理取代。可以说，根据地建设中工厂管理方面的教训多于经验。^[61]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共在城市接管后探索新的工厂管理体制。

尽管中共在根据地国营工厂实行的民主化管理改革并未真正成功，但这种探索方向没

有改变。在工厂实现民主建制，这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工厂经营要求的经济核算、科层管理和机器作业，都无法为工人民主意识的养成准备必要的环境条件。即便是当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苏联，在工业管理体制中仍然实行“一长制”。在这种意义上，中共重新开启的这项工厂民主建制议程是前所未有的。

在城市接管工作开始后，中共的基本设想是，在工厂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1948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这项决议最早将这两种民主建制视为工厂民主化管理的基本内容。^[62]对于这项制度具体讨论，先从东北老解放区开始。1949年3月，《东北日报》刊发社论《企业管理民主化是改进生产的重要保证》。这篇社论强调：“办好一个人民企业主要依靠两条：一条是企业化的经营，一条是民主化的管理，两者必须很好的接合。”^[63]这里的“企业化的经营”，主要指向中共在对于国民党原有资本主义经验的批判性继承。而关于“民主化的管理”，该社论具体解释了这两项制度的基本设计。大体而言，工厂管理委员会是企业统一领导的最高权力机关，成员除了厂长、工程师和主要生产负责人外，必须吸收相当于以上数量的职工代表参加。而职工代表会议则是在工厂管理委员

会的领导下，直接联系职工并传达和落实领导决定的组织形式。经过东北工厂的管理试验之后，1949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公布了《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实施条例》，明确了这两项制度的性质、职能和实施办法。^[64]次年2月，《人民日报》刊发由李立三起草的社论《学会管理企业》。这篇社论在强调这两项制度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在最后特别指出工会对于实施效果的关键作用。^[65]后来，刘少奇更明确地说：“职工代表会议，也就是工会的组织，哪个厂的职工代表会议，就是那个厂的工会的代表会。”^[66]从这些表述来看，工会建设是这两项制度实施效果的组织基础，它更直接地关系到工人的身心状态和伦理关系，成为工厂民主建制的主体根基所在。至于尚未能够落实这两项制度的私营工厂，更是完全依赖于工会来拓展有限范围的民主工作。

天津接管工厂的民主化运动，正是在上述制度和观念脉络中展开。如前所论，解放前天津工运并不兴盛，中共的阶级基础薄弱。黄敬在胜芳整训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中共接管城市是“归队”，是找回“本阶级”。在他最初的设想中，接管之后不应马上建立工会，而是成立临时工厂管理委员会。^[67]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是因为在接管初期，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势力尚未除尽，再加上投机分子、

流氓甚至特务分子都随时会混入工会组织，利用工人的不满情绪，煽动他们破坏工厂，造反闹事。在此前的城市接管中不乏这类惨痛教训。不过，这种管理制度对于不同层次人员和代表之间的配合关系提出很高要求，如前所论，这种要求在接管初期是难以企及的。实际上，与黄敬的设想不同，在解放后最初成立的是职工临时代表会。这个组织很快参与到领导职工复工复产，协助清点接收，以及职工学习和福利工作。不过，即便是这种易于操作的组织形式，也由于职工层次差异和组织过程仓促，导致一些不纯分子混入其中，大大延缓了组织完善的过程，直到1949年3月才改选成立职工代表会。^[68]

在职工临时代表会发展到代表会的过程中，工人的个人意识也逐渐发生变化。缺乏领导和运动历练的天津工人，最初基本上不了解中共，在情感上颇为疏离。对于接管干部来说，职工运动的首要工作便是拉近距离，消除隔膜。一方面通过各种职工的政治课的集中学习，另一方面，“我们的同志深入群众中去，采取个别聊天，拉家常，开座谈会等方式，听取工人们的呼声，解答工人们提出的问题。如为什么叫共产党？为什么叫解放军，又叫红军、八路军？[……]”正是通过这样有针对性的常识普及工作，“逐渐解除了工人群众的疑虑，对我党我军有了些了解，主动找我们

反映情况的人多了。”^[69]

经过这一层工作，军管会开始调整工厂管理的“三原”原则，实施民主改革运动。1949年3月，黄敬在《关于民主改革运动的讲话》中指出，进行民主改革，便是加强已有的职工代表会议，同时建立和完善工厂管理委员会。^[70]依照这种方针，在3月底4月初，大部分单位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已经逐步建立起来。然而，与此同时，工人在旧时代被压抑的个人诉求进一步释放出来，并显现为资本家、职员和工人之间多层次的复杂矛盾。显然，组织建构并没有及时回应工人的诉求，并潜在地助长了这种诉求的自发倾向。黄敬后来总结时说：“我们一进城不久，就提出民主改革。当时这个问题虽然是存在的，但党的力量不强，群众觉悟不够高，职员情绪不够稳定，所以提得过早了。”^[71]这种矛盾状况，在4月份刘少奇视察天津并发表讲话之后，经过劳资协商会议和集体劳动合作的调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但问题在于，经济关系调整还不能与民主建制形成良好的配合关系，工人的自我意识并没有因此得到充实和提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会的组织工作被提上日程。

1949年4月底，天津市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天津市总工会筹委会。在刘少奇和李立三的具体指导下，筹委

会开始按照系统组织工会。但如何具体开展组织工作，并没有先在的经验可供参考。^[72]因而，实际的组织过程并不顺利，当时工会干部普遍存在关门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倾向：

第一，也是主要的偏向，是把党的组织与工人组织混淆起来，用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衡量广大工人群众，对工人加入工会的条件定的太高，工会的组织成了少数先进分子的组织，不少工会领导者借口私营工厂工人“落后”，借口工人“复杂”，以及政治问题（即把自己的阶级兄弟与工厂中极少数特务分子混淆起来），而排斥广大的中间的以及落后的工人于大门之外，使工会丧失了阶级的群众性；[……]第二，也有许多地方在表面上是百分之百地把工人组织起来，但由于行政命令包办代替及形式主义作风，实际上工人群众并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工人缺乏内部的民主生活，缴纳会费、开会和文娱娱乐等都成了一套公式[……]^[73]

干部的“关门主义”态度，导致工会成立的最初5个月月内，天津市只有一半的工人加入工会，经过调整之后，直到1950年1月天津市总工会成立时，情况才有所好转。而另一种“官僚主义”作风，使得不少工人在加入工会之后不久，便对缴纳会费和频繁

开会产生抵制情绪，甚至有部分工人选择退会。^[74]事实上，这两种不良倾向的出现，为工会工作提出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如何理解和把握工人加入工会的自发愿望？如何在工会中开展民主生活实践？对此，刘少奇在不同场合都表达过他的理解。对于工人加入工会的动机，他曾有这样的判断：

普通的特别是政治上落后的工人，他们来加入工会，并积极参加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既不是要来建立共产党与工人群众之间的桥梁，也不是来参加共产主义的学校和建立人民政权的社会支柱，他们通常的出发点和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使工会成为保护他们日常切身利益的组织。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一般劳动者的利益而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75]

以此来看，工人是否对工会有认同感，工会能否留住工人，关键在于工会如何对待工人的个人利益诉求。

另一方面，对于工会如何在工厂开展民主实践，刘少奇在不同场合都特强调学习中共在军队进行民主运动的经验。1948年，在毛泽东起草的指示《军队中民主运动》中，将中共军队内部的民主概括为三个方面：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76]刘少奇所强调的经

验主要是指政治民主方面，即批评与自我批评：“本来军队是没有民主可言的，但我们几百万军队里都这样搞了，而且搞得很好，在军队里叫官兵关系，在国家工厂就叫职工关系。”“我们队伍里，进行自我批评时，有连长光说或者多说好处，下级便不满意，而相反地，有的连长、排长自己光说错误，不说好处，结果士兵就说，我们排长、连长，还有些什么什么好处，很公正地指出来，提高了他的威信。”^[77]刘少奇倡导这种民主实践方向，真正触及了工厂内部伦理关系调整的核心环节。天津市工厂很快将这种经验付诸工会工作。1949年11月，市长黄敬在写给毛泽东和华北局的报告中，首先提到工厂内部关系因此发生的变化：

以往的情形是自上而下层层强制、监督，自下到上层层欺骗、应付、磨洋工、偷懒、敷衍是极普遍的现象。解放以来这些现象大体上都没有了，到处是一种新的气象。劳动态度完全改变了，一般工人都自动地积极生产。过去靠上面监督强制者才能办的事情，现在以群众的自动或互相批评、互相督促就办到了。在工人地位的提高及民主的问题上，曾经一度引起职员们的不安的情绪，但在号召职工团结与发动职员主动的自我批评后，关系也就正常了。^[78]

随着工厂伦理空间的改变，天津工业生产也在逐步恢复和提高。1949年5、6月以后，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国民党时期，并且继续增加。然而，好景不长，从10月开始，工人的状态发生变化，增加速度开始延缓。当时除了积极分子之外，其他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下降。有工人提出：“生产长一寸，生活加一分行不行？”^[79] 很多人不再回应积极分子的号召，而且产生抵触心理。不仅于此，有的工人党员、团员领导采取类似监工的方式，更加招致工人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的生产氛围每况愈下。在黄敬的理解中，这种情况表明，仅靠政治教育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套新的领导生产的方法。^[80] 但在我看来，这种判断并不准确。真正的问题不在既有的民主建制突然失效，无法领导生产，而在于上述民主实践与工人的个人利益诉求之间的不配合。换句话说，工人不能从生产民主的实践过程中获得期待中的个人利益诉求。因此，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理解工人的个人利益诉求在工会民主实践中的位置，怎样弥合中共期待的工人主体高度与其自我理解之间的差距。这些问题关系到工会民主实践的方向，以及这种方向对工厂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配合关系提出的要求。

事实上，黄敬发现的问题并非局部的偶然现象。不久之后，中共高层对工会的认识出现分歧，并引发激烈论辩。追溯起来，论

辩由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而起。1949年6月，他与陈伯达对于公营企业的理解出现分歧。陈伯达认为，公营企业中公私之间的利益完全一致，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而李立三表示，尽管两者的利益完全一致，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矛盾，即“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日常利益之间的矛盾。”他强调，对于这种矛盾，应以毛泽东所提出的“公私兼顾”原则加以解决。^[81] 对此，李立三此后进一步解释，工会应以“公私兼顾”的原则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即行政与工会的矛盾。在这种矛盾出现时，工会应该站在工人的立场，保护他们的个人利益。在这种意义上，工会应该在党政关系中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工厂管理委员会是行政组织，工会是群众组织，共产党是党的组织，这三个组织都是独立的，谁也不能向下命令。工会不能命令党，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同样党也不能命令工会。[……]党对工会的领导，是通过党在工会中的党组和党员来领导工会，使党的意见变成群众的意见。”^[82]

在这场论争发生的同时，邓子恢和高岗之间也出现了同样性质的意见分歧。^[83] 李立三赞同邓子恢的观点，而高岗的态度和陈伯达非常相近。刘少奇对李立三和邓子恢的态度表示支持，并专门写出《读邓子恢和高岗同志两篇文章的笔记》，进一步延伸讨论其中

各种矛盾的性质。^[84]这场论争最后以1951年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上，李富春、陈伯达对李立三宣判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和“分配中心论”的错误而告终，各级工会必须完全服从党的领导的指示，也从此被明确下来。^[85]

后来的研究者对于这场论争的讨论，都无一例外地赞成李立三的观点，同情他受到不公正批判的遭遇。在我看来，这种处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以当下的理解，取代了对这一论争所包含的历史问题的深入分析。这并不是要重新简单肯定当年批判的正当性。毫无疑问，这种批判简单粗暴，并没有全面认识李立三的初衷。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以“公私兼顾”的原则来理解工会对于工人的个人利益保护的正当性，那么，工人很容易因此将个人劳动的价值理解为通过为国家利益做贡献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满足。而这正是天津工人希望实现“生产长一寸，生活加一分”愿望的思想逻辑所在。在这种意义上，“公私兼顾”的原则很容易在无形中被转化为“公私协商”的诉求。那么，一旦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私”的正当性，工会民主实践最终在工厂生产中打开的伦理空间，便只能是西方意义上的“契约共同体”，而非社会主义的价值共同体。卢卡契曾说过：“只有当一个共同体内部的行动成为每一个参加者最关心的个人事情时，才有可能消除权利

和义务的分裂这种人与他自己的社会化分离以及他被控制他的社会力量肢解的组织表现形式。”^[86]在西方现代政治传统中，契约共同体的思想建立在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二分的基础之上，无法克服个人与社会分裂带来的原子化境遇和价值虚无主义。就此而言，李立三对于工会独立性的强调，便可能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释放出价值的离心力，最终难以通过民主化管理将工人打造成高度自觉的主人翁。

尽管这场论争发生在中共高层方面，基层工会并没有参与到讨论之中。但是，在1949年天津的工会民主实践中，同样遇到如何处理党、政、工、团之间关系的问题。当时讨论的核心同样是党的领导地位问题。经过多次座谈讨论之后，最终明确了“工团组织除了接受上级组织的领导外，还要接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1950年底，天津市企业党委总结了《天津市国营工厂企业中党如何统一领导的意见》，由此在工厂管理的组织形式上明确了党委的统一领导地位。^[87]经过这次调整之后，工厂管理的组织形式大体实现了内在的配合和协调，工会民主实践的方向由此与工厂生产的要求达成统一。当然，工人的个体意识并没有因此达到中共期待的高度，但经过此前层层推进的工作方式，新的劳动主体将在工厂伦理空间的有效运转中焕然而生。

余论

天津的城市接管，更接近中共城市接管的一般状态。一方面它避免了沈阳、石家庄等城市接管的不理想状态，另一方面也未能在整体工作上达到接管北京的成效。因此，中共在接管这座城市工厂时所创造的新的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对于此后的接管工作具有某种示范性意义。通过理解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我们思考中共建国的实践议程如何在既有的历史基体之上打造出新的社会空间，显得十分重要。如前所述，在天津工厂接管工作的整个过程中，中共的历史理解、干部能力和组织准备都不理想。甚至最终开展的工会民主实践，也并没有马上达到预期的状态，“[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自觉程度不高，计划性不强，正是零敲碎打，带来很大自发性，步调也不一致，参差不齐，时间拖得长，‘三反’中来了一个民主补课才大体解决了这个问题。”^[88]即便如此困难重重，甚至还有以往革命经验的混杂与纠缠，但中共通过调整干部的工作状态，完善组织形式的不同部分，化解矛盾关系的各种层次，逐步开展出富有成效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不断遭遇不同实践情形中的现实困难，经由调整政策、经验、组织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最终顺利接收、转化和改造旧时代的工厂体制，初步实现新

的工厂民主建制。

本文通过重新返回天津工厂接管的历史现场，深进中共历史实践曲折复杂的路径和样貌，探讨了工人作为新的国家主人诞生的历史前提。以往对于工人的主人翁意识之生成的理解，往往略过接管这一阶段，而直接进入对1950年代开始的民主化改革、合理化建议、劳动竞赛、抗美援朝动员、三反五反运动等一系列后续历史过程的讨论。然而，一旦我们不去讨论这种主人意识诞生的历史前提，那么就不能理解它的历史构成和观念逻辑。事实上，通过对此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工人的主人意识的起源，包含着多种复杂的历史因素的纠缠和混杂，中共理解和改造这些因素的过程，不是简单的观念提纯工作，而是充分打开了个体理解自身与整体之间的相互构造关系。在此意义上，这种主人意识的观念逻辑，既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主体论，也不同于西方以契约论为基础的现代个人观。建基于对这种差异的理解，在处理建国以后工人意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变化形态和矛盾构成时，我们便不会轻易以阶级论或个人主义的视角做出或正或反的判断。

另一方面，以往对于工人阶级主人意识的理解，总是不由自主地陷入黑格尔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仿佛这种意识的生成仅仅通过不断的政治教育便可以实现。本

文的讨论同样试图凸显组织形式与这种自我意识的配合和互动。天津市市长黄敬在 1952 年的工作总结这样说过：“光说工人是主人翁还不行，必须实行上面这一系列重大的措施，工人经过人事、工资、制度、人与人关系等上的改革才能发动起来。通过这些改革，工人发动的越来越充分，觉悟越来越高，新的工作制度陆续在建立，就在这当中完成了民主改革。”^[69]事实上，天津接管干部所做的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乃是，不断调整组织形式与个人意识之间的关系，以便每个人在各自位置上充分调动主体的创造性，更加充实饱满地投入到共同体的事业之中。

时至今日，工人阶级经过 60 年代的历史演进和蜕变，早已不复昔日主人的模样。重新进行这项历史工作，不是为了无谓的怀旧，而是希望通过理解这段历史过程的动机机制、运转方式和内在诉求，在层层掩饰的时代风尘背后，寻绎历史脉动通向现实和未来的曲径幽路。

注释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1，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 [2] 这类研究以刘宋斌的《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接管（1945-19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和李玉荣的《中共接管城市的理论与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代表。
- [3] 这类研究李国芳的《初进大城市——中共在石家庄建政与管理的尝试（1947-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为代表。
- [4] 王左：《进城前的回忆》，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天津接管史录》（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 [5] 参见贺萧：《近代天津城市的形塑》，任吉东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城市史研究》，第28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页；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室：《解放前的天津工业概况》，《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 [6] 《黄敬同志关于军管时期天津职工运动的讲话》（1948年12月30日），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天津接管史录》（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 [7] 《中央关于纠正在新解放城市中忽视工运工作的偏向的指示》（194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15页。
- [8] 参见《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1948年2月19日）；《中央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1948年2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第17册），第54-59、69-70页。
- [9] 参见赵琪：《进程前后在市委机关工作的回忆》；陶正熠：《天津接管过程中我的经历》，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天津接管史录》（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3、395-396页。接管济南的经验，对于中共接管平津非常重要，详论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 [10] 参见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10.
- [11] 关于这种市民风气的讨论，参见王凜然：《革命与认同：1949年中共对天津的接管》，《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2期。
- [12] 参见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5*, pp210-211.
- [13] 对此的具体讨论，可参见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221页。
- [14] 参见李永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动保护研究（1927-1937）》，河南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赵洪顺：《国民党劳工政策研究（1927-1949）》，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 [15] 参见社建时：《从接收天津到垮台》；李绍谏：《国民党接收平津敌伪产业概况》；程海鸥：《天津敌伪产业处

理局纪实》，杨大辛、方兆麟编：《天津历史的转折——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回忆》，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 1988 年版，第 9-11、104、113-114 页。

[16] 参见胡梦华：《我任天津市社会局长三年》，杨大辛、方兆麟编：《天津历史的转折——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回忆》，第 82-91 页。

[17] 《谷部长对工人的四点希望》（1947 年 7 月 1 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25-2-3496-30。

[18] 《黄敬同志关于军管时期天津职工运动的讲话》，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天津接管史录》（上），第 60 页。

[19] 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1948 年 11 月 28 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69 页。

[20]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对外贸易接管处接管工作总结》（节录，1949 年 3 月 10 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 246 页。

[21]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接管城市工作初步总结》（1949 年 3 月），《天津接管史录》（上），第 109 页。

[22] 《天津市工商局接收社会局初步总结》（节录，1949 年 1 月 31 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 198 页。

[23] 卢卡契：《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1922），《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389 页。

[24] 对军管制政治属性的讨论，参见李格：《建国初期军管制度的建立及军管会的性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 年第 5 期。

[25]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摩托接管处接管工作总结》（1949 年 3 月 14 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 303 页。

[26]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 102 页。

[27] 《天津市军事管理委员会接管部对外贸易接管处接管工作总结》（节录，1949 年 3 月 10 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 258 页。

[28]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 102 页。

[29]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接管城市工作初步总结》（1949 年 3 月），《天津接管史录》（上），第 109 页。

[30]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 101 页。

[31]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摩托接管处接管工作总结》（1949 年 3 月 14 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 302 页。

[32]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电讯接管处电信局接管组接管工作总结报告》（节录，1949 年 6 月 3 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 350 页。

[33] 《天津市工商局接收社会局初步总结》（节录，1949 年 1 月 31 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 198 页。

[34] 同上。

[35]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电讯接管处电信局接管组接管工作总结报告》（节录，1949 年 6 月 3 日），《天

津接管史录》(上),第349页。

[36]《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1949年1月15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101页。

[37]《天津市军事管理委员会接管部对外贸易接管处接管工作总结》(节录,1949年3月10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244页。

[38]《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摩托接管处接管工作总结》(1949年3月14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301页。

[39]《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接管城市工作初步总结》(1949年3月),《天津接管史录》(上),第110-112页。

[40]参见《黄敬同志在各界代表会议上的书面报告》(1949年9月5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492页。

[41]《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接管城市工作初步总结》(1949年3月),《天津接管史录》(上),第109页。

[42]《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交通接管处接管工作总结》(1949年4月),《天津接管史录》(上),第295-296页。

[43]《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电讯处接管方案》(1949年12月30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75页。

[44]《天津接管工作的几点体会》(节录,1949年5月),《天津接管史录》(上),第208页。

[45]同上,第395页。

[46]《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工业接管处入津接管工厂工作总结》(节录,1949年1月30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232-233页。

[47]《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电讯接管处电信局接管组接管工作总结报告》(节录,1949年6月3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347页。

[48]参见《黄敬同志在各界代表会议上的书面报告》(1949年9月5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493页。

[49]参见吴明:《接管时期的区街工作》,《天津接管史录》(下),第74页。

[50]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36页。

[51]王光美:《1949年伴刘少奇天津之行》,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刘少奇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52]参见王化德:《刘少奇与宋斐卿》,《春秋》,1995年第6期。

[53]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52页。

[54]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213页。

[55]同上,第216页。

[56]同上,第217页。

[57]不久之后,《人民日报》连续刊文介绍天津工厂组织劳资协商的经验。参见《改进私营企业生产和劳资关系

的有效组织——天津私营工厂的劳资协商会议》，1950年4月28日；《天津私营北洋纱厂正确运用劳资协商会议解决劳资争议改进生产》，1950年5月22日；《天津市劳资协商会议的成绩与目前存在的问题》，1950年5月24日。

[58] 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冯筱才：《科学管理、劳资冲突与企业制度选择——以1930年代美亚织绸厂为个案》，《史林》，2013年第6期。

[59] 《关于修改“接收乱伪和蒋占企业后的改造管理与工运方针的决议”给东北的指示》（1948年8月23日），档号：Z44-1948-3。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工业卷》（1949-1952），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60] 刘少奇：《论国家工厂的管理》（1934年3月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176-184页。

[61] 详论参见周恩来：《对赴哈参加六次劳大代表的指示》（1949年4月28日），见李桂才主编：《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62] 《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1948年8月），李桂才主编：《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9-1988），第37-38页。

[63] 《企业管理民主化是改进生产的重要保证》（社论，1949年3月4日），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工业卷》（1949-1952），第245页。

[64] 参见《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实施条例》（1948年8月10日），李桂才主编：《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1988），第87-90页。

[65] 参见《学会管理企业》（社论，1950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执行人民日报〈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1949-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116页。

[66] 刘少奇：《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报告》（1949年5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369页。

[67] 《黄敬同志关于军管时期天津职工运动的讲话》，《天津接管史录》（上），第61页。

[68] 《天津市公用局企业接管工作中的几点体验》（节录，1949年5月），《天津接管史录》（上），第218页。

[69] 张振华：《关于接管天津中纺一厂的回顾》，《天津接管史录》（下），第183-184页。

[70] 《黄敬同志关于民主改革运动的讲话》（1949年3月10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430-431页。

[71] 《关于三年来工作总结与今后工作任务——黄敬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8月18日），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天津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页。

[72] 李立三曾转述刘少奇的说法：“现在工人运动到底如何搞法，虽在六次劳大有个方向，但具体的作法都没有，而且许多同志都是新归队的，在农村搞了二十几年，就是以前的经验也忘了。有些同志是新参加工人运动的，没

有经验，有些同志虽然有些经验，也是在国民党政权下工作的一套经验，至于在我们的政权下的工作经验也是完全没有的。”（李立三：《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闭幕词》（1949年8月16日），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73] 《检讨并克服工会工作中的偏向》（1949年9月19日），《人民日报》“短评”，转引自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5册，1945.9-1949.9），第413-414页。

[74] 参见梁丽辉：《新旧更迭中的巨变：建国初期天津工人研究（1949-1956）》，博士论文，南开大学，2012年，第54-56页。

[75] 刘少奇：《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1951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7-98页。

[76] 参见毛泽东：《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5-1276页。

[77] 刘少奇：《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工员的讲话》（194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339、340-341页。另外，他在《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中也同样提到军队民主经验的重要性。

[78] 《黄敬给毛主席及华北局的综合报告》（1949年11月22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584页。

[79] 这种疑问后来酝酿成著名的“生产长一寸，福利加一分”口号的风波。详论参见安力夫：《“生产长一寸，福利加一分”口号引起风波》，《百年潮》，2012年第12期。

[80] 参见《黄敬给毛主席及华北局的综合报告》（1949年11月22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584页。

[81] 参见李立三：《在公营企业中贯彻公私兼顾政策问题的几点意见》（1949年6月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4页。陈伯达的观点未见文章留存，只能从该文的引述中略窥一斑。

[82] 李立三：《关于工厂管理民主化与劳资纠纷问题》（1949年7月10日），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第27-28页。

[83] 参见邓子恢：《论工会工作》（1950年7月28日），《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287页；高岗：《论公营企业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1951年4月），《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1988），第178-184页。

[84] 刘少奇的这份笔记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并没有公开，直到后来编辑《刘少奇选集》时才得以发表，但删去其中引述邓子恢和高岗的相关段落，更名为《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2-99页。

[85] 参见李富春：《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1951年12月20日在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结论》；《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1951年12月22日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通过），见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1949年10月-1959年10月，上册），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96-116、84-95页；陈伯达：《陈伯达在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1年12月21日），见辽宁省工人运动学会、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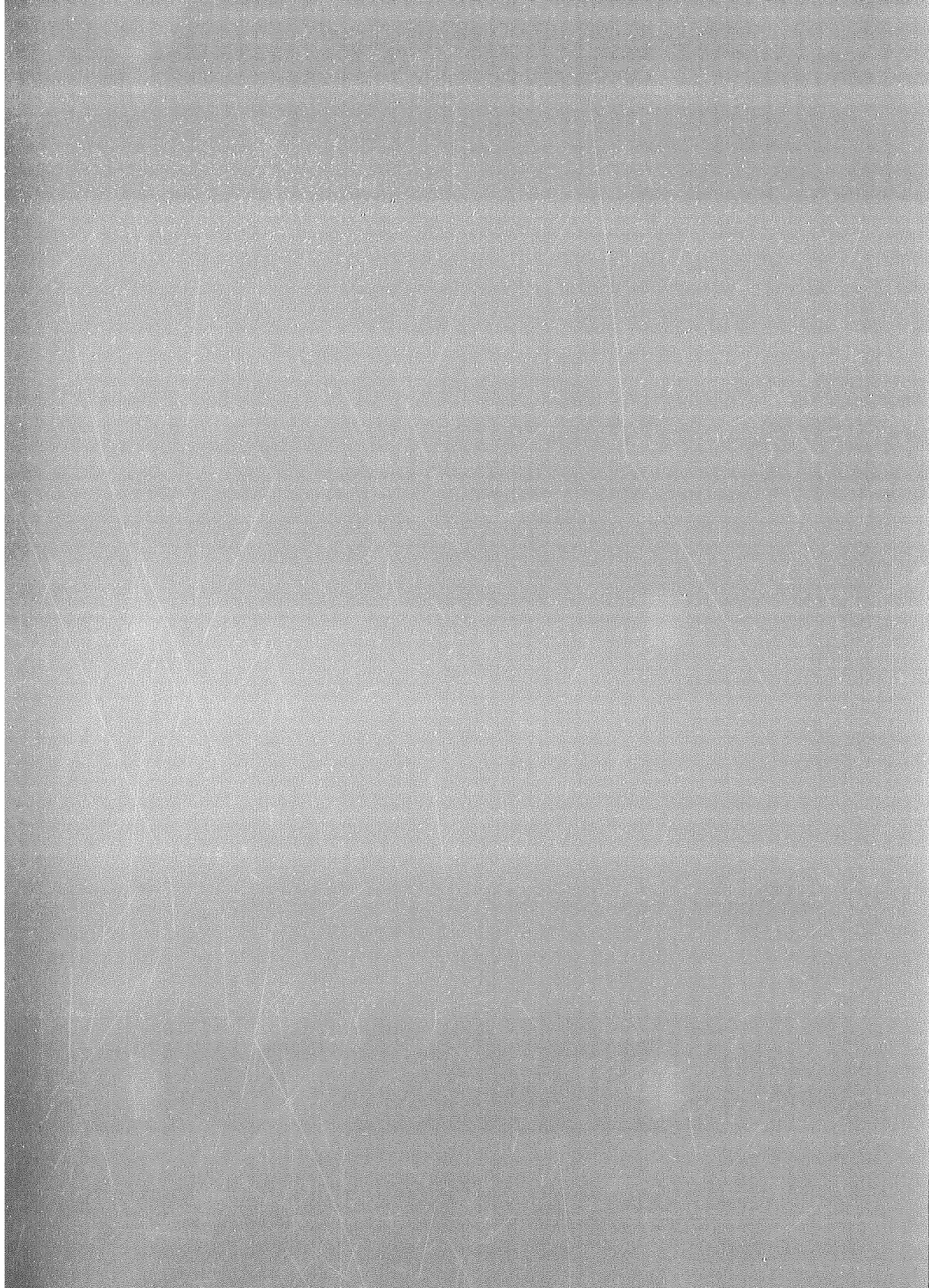
宁省工会工运研究室编：《工运理论、工运史研究文献资料选编》（2）（内部出版），1987年版，第111-118页。

[86] 卢卡契：《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1922），《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12页。

[87] 参见崔荣汉：《解放后天津市国营企业中的党组织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天津接管史录》（下），第389-390页。

[88] 《关于三年来工作总结与今后工作任务——黄敬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8月18日），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天津卷），第383页。

[89] 同上。



推动漫长革命得以进行的人类力量源自于这么一种信念，即坚信通过破除旧的社会形式所造成的各种压力和束缚，通过发现新的共同的制度，人能够主导自己的生活。

——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1]

英国文化研究者雷蒙·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强调，20世纪人类社会经历了三种不同但是相互关连的革命过程：民主革命、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威廉斯提醒我们，这复数却又彼此交错的革命之所以“漫长”，是因为“这些目标一旦被实现，就会被迅速地吞没，要么是频繁地定义新的期望，要么是因为没有新的期望而陷入到萎靡不振、躁动不安的情绪之中”。^[2]他尤其强调，作为一整体过程，这些革命为世界与个人带来深刻的转变；我们对之有许多的期待，亦有不少的抗拒，因为当前人

类社会所拥有的诸多价值、意义和制度——如民主、工业、文化，乃至消费——都蕴涵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之中。他们的出现与存在，或许是革命的成就，也往往暗含着革命的反挫。在这个意义上，打造20世纪的这个革命历程不仅是漫长的，亦是未完成的，因为“人能够主导自己的生活”的这个想望仍然没有完全实现。

威廉斯在书中以英国为例，讨论了教育体制的转化、读者大众的出现、大众报刊的发展，乃至戏剧和小说如何承载与呈现这个革命性的历史过程，但是他却忽略了，在我看来，对亚洲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极为重要的一个观念，即民族解放与反殖运动下的建国革命。因为不论在东亚、非洲还是拉丁美洲，“独立建国”都是“漫长的革命”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它也是这些前殖民地，或是受西方殖民主义迫害的国家与地区，参与“漫长的革命”的

漫长的建国

国家、土地、新人

王智明

一种方式。借着建国，获得独立主权、不再受制西方，第三世界国家一举实践了民主、工业以及文化的革命，尽管这样的革命仍然未竟其功，有待完成。因此在这篇短文中，我想从威廉斯的这个忽略出发，提出“漫长的建国”这个命题，针对会议的主题，提出一些观察和看法。

颠倒与复数

今年会议的主题是：“新人·土地·国家：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文化、思想意涵”。会议邀请函对本次会议的主旨与意义有如下的表述：“这次会议论题将集中讨论1949-1954年之间的‘新人、土地与国家’问题。所谓土地，首先指中国革命中的土地革命实践，当然也指涉这一实践对中国社会基体结构的翻

转和打造，从而构成新的人间状况；这种新的特定历史状况，既与人的特定状态互为条件关系，同时又会对人的特定状态进一步提出新的历史要求。而这样的翻转和打造，又为新中国的成立和进一步展开奠定新的历史前提和社会前提”。亦即，会议是以建国初期的土改实践为核心，去构想和反思人民与国家的联系。尤其关键的是，它预设了土地改革实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体结构，从而构成了“新的人间状况”，作为国家与人民互动转化的动态基础。换句话说，是土改的实践为建国的实现打下了根基，并在这个基础上改造人民，乃至创造了新的人民。

这篇短文首先想对这个命题的序列提出挑战，一方面颠倒这个序列，将国家的想象，而不是土改，作为建国的起点，另一方面给予国家、土地与人民这几个关键词一个复数化的想

象。这并不是因为我来自台湾，想要借这个讨论做出什么政治性的宣示，而是因为建国过程本就包含了各种多样的想象：从清末的立宪共和、君主专制，到国民革命、主权在民，乃至共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不同表述，其实都是“漫长的建国”过程中的有机元素，而共和国的建立本身则是这些不同元素竞合糅纳的结果。同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土地”也就经历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拉扯，城市与乡村的变动以及领土疆域的扩大与缩小，乃至后来自治区和经济特区的出现。这些变化，也都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反映了“土地”一词的复义性格。在这个意义上，“新人”一词的复义性不言而喻：它既包含了对旧社会的否定，也表述了对新世界的期待；它既是共和国所期待与召唤的子民，也是共和国借之以改造社会的想象。在两岸竞合的历史进程里，“新人”的意涵与可能更值得我们重视与期待，因为“新人”之存续关乎建国的成败。同时，我想透过颠倒顺序来强调国家想象在建国过程中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或许带了一点文化研究过度侧重文化想象的偏见，刻意忽略了经济结构对于文化想象的影响。但是在我看来，恰恰是 20 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在一连串的忧患与羞辱中，对于国家存亡有着超乎一般的关注，才使得富国强兵的建国大业成为凌驾一切的关怀。也就是说，在 20 世纪中叶，正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想象以及实践，

才使得土地改革成为战后两岸政权治国施政的主轴；也正是因着这样的想象，“新人”以及“改造”成为建国后不得不然的社会与文化工程。

国家：建国的断裂

最近颇受注目的一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对上述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切入点。《北平无战事》是根据刘和平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型国共斗争电视剧，故事以 1948 年在北平发生的一场贪腐案为起点，勾勒国共在军事对抗之外的各种斗争，尤其是围绕在北平解放前的币制改革。故事铺陈了两条主线，一是以蒋经国的铁血救国会为核心的国民党内部改革，另一则是以地下党和学生运动为主轴的反贪腐斗争，而这两条线索都交迭在方孟敖这个角色身上。父亲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的方孟敖，是国共都想争取的对象；作为国民党空军，并深受美国影响的飞行员，方孟敖可以说是标准的国民党官二代，但是他却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深恶痛觉。由于他的身份特殊，国民党想利用他对抗党内的贪腐集团，地下党也想吸纳他成为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地下党员。故事中的方孟敖，于是不仅仅是国共斗争史上一个可能的个案，更是“漫长的建国”的一个重要象征：即出身于旧社会的人民，是可以在爱国与共产主义道德的感召下改造自己，贡献于党和国家。易言之，

是因为对国家的热爱与对党的信服，方孟敖选择共产党并接受了组织交付的任务。对他和故事中的正派人物而言，他们对新中国的期待引导了他们的行动，没有了这个将临的乌托邦想象，地下党员，如崔中石，就算有再高的道德质量，也无法说服和改造方孟敖。不过，最后方孟敖并没有在北平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而是驾着飞机，载着一家老小和黄金，飞去了台湾。故事如此结尾，提醒了观众新中国乃是建立在两岸分断的基础上，建国大业仍未完成。

问题是，建国的断裂不只出现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也出现在新中国所依恃的意识型态、国家体制、道德纲领和人民治理里，而土改和新人的问题就在这些断裂中浮现与转化；抑或，土改实践与新人想象恰恰是为了处理和解决这些断裂而出现的。严家祺在一篇短文里便如此写道：“毛泽东思想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唱红打黑，造反有理’。”^[3]在这句或许高度简化的陈述里，“打土豪分田地”是促成阶级翻身的重要手段，也折射了一般农民对“土地改革”一词的认识。^[4]透过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的重新划归，农民取得了生产与生活的重要资源，也被赋予了全新的公民身份；这既是建国后的具体实践，也是建国前共产党对困苦百姓的承诺。因此，建国之必要不仅仅来自反帝、反封建、反贪腐等等理念，更来自于这些与人民利益相关的具体承

诺，也就是“人民重新主导自己生活”的期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不停追问：建国是否完成，又将如何完成？

从断裂的位置出发去思考建国，同时也意味着将共和国的建立放回世界史的脉络里，去追问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及新中国作为实践和理念的世界性意义。亦即，在世界史的脉络中，我们该如何思考共和国的国家性质？这包括了共和国的内部治理与传统组织的关系，^[5]以及它之于国际秩序的应对、转化和超克。

土地：商品化的起点

在《北平无战事》里，国民党失掉大陆的原因之一，就是币制改革的失败。经济的崩溃，不仅让国民党失去民心，也让经济成为战后国民党改革的重点。而国民党战后在台湾农村进行的土地改革，便是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展开的。台湾的经济史学者翟宛文引领一批学生，最近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上以“重探台湾战后农村土地改革”为题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值得借镜，帮助我们 从两岸分断的脉络来思考土改的意义。

台湾战后的土地改革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一是1949年开始施行的“三七五减租”，亦即规定政府每年向农民收缴的地租为正产物的千分之三七五，以减轻农民

的负担，并规定租期一律改为六年，在租期中非因法定事故，地主不得终止租约，以保障佃农权利。二是1951-1976年间所实施的“公地放领”，准许符合规定之承租农民依照规定程序申请承领，于缴清全部放领地价后，移转土地所有权，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目标，即中华民国宪法第143条“国家对于土地之分配与整理，应以扶植自耕农及自行使用土地人为原则”之规定。瞿宛文认为，这些举措是“以国家的强制性力量，大举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可以说结束了传统的地主经济，也削弱了原有农村地主阶级的社会经济基础”。^[6]她更指出，推动台湾战后土改的力量，除了国共内战这个因素之外，还有国家现代化如何发展的考虑。换句话说，从土地资源能够被更有效率地利用，进行生产的角度观察，“土地改革是与落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相链接的”，是“后进国家为了追赶西方、为了现代化，而用国家强制力量来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社会工程”。^[7]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土改的政治性就不只在于国共内战的脉络，更在于土地资源的利用、所有权的收归和移转，以及资本的引进和扩张。对于土改的效果，瞿宛文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农业剩余的流出与征收，即透过土地税、粮食采购、肥料换谷等方式，将农业生产的剩余转出，拿来贴补工业发展；同时透过农业用地的划定与限制买卖，间接造成后来的农村工业化、

城乡差距与所得分配不均。二是自耕农身份以及土地所有权观念的出现。她写道：“土改重要的影响不只是在于耕地分配上的变化，而也是在于其在都市周围土地上，催生了一个新兴的都市地主阶层”，而当人口增加，都市向近郊扩张时，“新自耕农刚刚才取得的承领地，便成为这第一波‘农地变更使用与出售’趋势下的主要目标”。^[8]也就是说，国民党战后的土地改革加深了台湾土地产权的现代化，并促成了土地的资本化和商品化，也造就了至今仍深受其苦的土地投机事业。

再从土地改革的历史过程观之，台湾的土改，不同于大陆的土改，乃是一场“兼顾地主的土地改革”。^[9]廖彦豪和瞿宛文便指出，就《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的拟定与施行过程来看，台湾本省籍的地主阶层“绝非被迫接受，反而是高度动员设法阻挡土改，并且成功地与国府高层及土改派进行博弈，迫使国府在土改的范围和作法上做出大幅度让步，因而使得台湾战后农村土改虽‘成功’实现，但实质上是一高度妥协的方案，并种下日后都市平均地权改革失败的种子”。^[10]同时，土地改革的成功推进，也使得农村必须从传统的乡庄社会逐步转化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透过地政系统全面掌握土地状态，透过国家议定契约与公定粮价，以及透过农会、信用合作社和土地银行作为农民与农业的信贷机构，国家全面介入与接管农村，

也让现代化以及如今的自由化话语，更进一步影响农地的使用与农村的未来。何欣洁就指出：

台湾土地财产权制度的建立，与战前的殖民现代化、战后国共斗争与工业发展目标环环相扣。六十年后的今日，二战中锻造的“国家”已在种种方面发生了质变，在战后宪法中所构筑的土地所有权、财产权保障框架，是支持与稳定此一制度而生的意识型态语言，随着战后国家工业化任务告一段落，此一语言也渐渐受到社会质疑，进而引发各式各样反征收运动，以“三代务农”的语言抵抗“国家产权”的架构。^[1]

换句话说，将土地改革的问题放到现代化进程里思考，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农民生活与农村发展的转变，也是国家力量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渗透和掌握，更是以现代化发展为名所进行土地资源释放与转化。对上述的作者而言，重探土地改革的目的，比较不在于重新指认那个历史过程，而在于探讨当前土地商品化的政策起点，以理解台湾当前所面临的种种土地争议以及抗争逻辑，例如农地征用、国地规划和农地转卖等等问题。土地所有权的观念究竟是财团赖以扩张、取得土地资源的利器，还是农民得以抵抗政商联合圈地行动的武器？我们又如何在所有权的私人性质基础上去想象公共的土地，如海洋、山川和田原？公共的土地资源又如何抵抗私人资

本的划分和入侵？这些都是瞿宛文等人试图从台湾的土改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思考。

将土改的问题和漫长的建国连系起来，我们或许可以问：土地改革是建国的前提要件吗？怎么样的土改才能在增进土地生产力的同时，避免土地的商品化？回顾共和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土改的意义，并且在这个历过程中考虑国家与资本的关系？所谓的“红色资本”难道不正是依恃国家的土地资源，在地产泡沫的腾飞与消退中，发展起来的吗？那么，土地改革曾经许诺的公平正义、分田翻身，又如何继续在今天的共和国里实现呢？

“新人”：现实的幻象

如果说土改是透过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激烈手段去改变旧社会的阶级状况，以实现共产主义所擘划的经济理想，那么“新人”的提出与想象就是一套道德的叙事，以召唤和模塑新中国的公民。在西方的政治理论里，公民的想象与国家的存在是紧密相连的：鲁索（大陆常译为：罗素）的《契约论》便想象公民与国家处于一契约关系，公民臣服于国家，接受国家的统治，是因为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可以为个人提供生活需要与保护，公民身份因而是一套权利叙事，指陈个人在契约关系中所被赋予的保障。然而，“新人”的想象却不太相同。“新人”

与共和国并不是处于契约关系当中，而是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承担和责任才产生的一种身份；它同时也是共和国对其人民的期待，因而有了召唤、模塑与改造等等的可能性。简言之，“新人”不是一种权利叙事，而是一种责任和伦理的叙事，是与新中国的国家任务相关的一种身份。桑春红在《毛泽东新人思想研究》中指出：

无产阶级所从事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其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与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一种制度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以彻底消灭剥削制度为前提，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觉悟的极大提高为条件。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有着高度思想觉悟并善于建设新社会的新人来实现。据此，如何培养和造就这样的新人便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就必须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用新思想和新文化培养造就日益众多的新人。^[12]

在桑的表述里，“新人”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崇高的目标而存在的，也是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他们的特质是具有“高度思想觉悟”并拥有“善于建设新

社会”的能力；同时他们也仰赖“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培养。换句话说，“新人”既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历史中间物”，也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未来主体；他们既要有抛弃旧思想和旧文化的觉悟，也要有毛泽东强调的“改变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的能力。^[13]在辩证的想象里，“新人”同时属于现在与未来。它是一种政治主体，而不是公民身份的想法。

因此，“新人”与漫长的建国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我们甚至可以说，建国的成败尽系于“新人”的存续。唯有“新人”才能承担共和国要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伟大使命，也唯有“新人”才能够，和值得活在那样的美好世界里。问题是，“新人”是否真实存在、如今是否依然存在？崛起的中国与“新人”又存在于怎么样的辩证关系中？

容我再次借用《北平无战事》里的几个角色，来展开“新人”与建国的讨论。除了方孟敖外，剧中最引人入胜的角色大概就是崔中石和谢培东这两人。崔谢都是地下党长期潜伏在国民党机关内的干部：谢培东是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的妹婿，也是北平分行的襄理，娴熟国民党的金融事务；崔中石则是北平分行金库的副主任，实际经手北平分行的金流往来。这两人不仅具备“四有新人”的特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同时还为了建国大业做出重大牺牲：谢培东牺牲了自己的女儿，而崔中石则陪上了

自己的性命。剧中，国民党掌握了崔中石的共产党身份，并将之逮捕；为了保护方孟敖的党员身份不被暴露，崔中石坚决向方孟敖表示自己不是共产党，并强调：方是不是共产党这件事情，不需要任何组织的认定，也不必透过他跟崔之间的关系来确认。换言之，党员身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方孟敖怎样想象与认定自己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在建国进程中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

崔中石的说法，固然是牺牲小我的权宜之计，但也意味着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存乎一心。是个人如何理解与想象国家，而不是国家或党所给予的身份，决定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也同时意味着国家的想象决定了人民的品格。的确，谢崔两人可以说代表了共产党人的不畏牺牲、舍己为人的精神与品格，而他们之所以勇于牺牲，是因为他们已然将自己交给了未来的中国。他们这种不吝牺牲自我，只求改变世界的心情，不正是共产主义乌托邦所召唤的“新人”吗？我们不妨进一步想象，新中国成立之后，谢培东会拥有什么身份？他的国民党关系和资产阶级成份，会在日后成为他的护身符还是夺命勾？在新中国，他会被改造的对象，还是改造他人的主体？他和革命群众将会处于怎么样的关系里？潜伏在台湾的方孟敖，又会经历什么样的命运？

透过以上的想象与提问，我试图思考的是：在漫长的建国过程里，人民与国家的互动实况究竟如何。作为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想象性中介，“新

人”会不会是一种“现实的幻象”，是借以测定国家与人民关系的想象图景以及国家向人民索求的责任叙事？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新人”是否与“建立文明社会”一样，都是国家向人民发出的道德要求，是傅柯（大陆常译为：福柯）所谓“生命政治”的一次历史实践？若然，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新人”肩上所承担的国家乃至世界想象呢？在当前中国，这个想象还具有什么意义与作用？

结论

从国家、土地与人民这几个侧面出发，我们不难理解 1949 建国的意涵是多元复杂，乃至充满矛盾的。尤其近三十年来在经济与政治上巨大的发展和变化，更使得建国的历史和思想意涵模糊不清，以致于人们必须面对“何为中国”“如何重新认识中国”的质问，乃至展开“作为理念的中国”的辩论。^[4]不过，不论是“天下主义”“文明国家”，还是“中国模式”，任何测定中国意义的尝试都不能忽略“漫长的建国”这个命题，忘却新中国曾经大声呼喊，矢志实现的乌托邦承诺，因为正是这美好的承诺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为之献身与牺牲，在这片干涸的大地上洒下鲜血和汗水。他们相信新中国将是自己可以主导生活的地方，这是建国的神圣承诺，也将是我们无可逃避的使命。

注释

[1] 雷蒙·威廉斯著，倪伟译，《漫长的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页362。

[2] 前揭书，页4。

[3] 严家祺，《崇毛引发中国大分裂》，原发表于《前哨》（2013.10），引自“和讯博客”网络论坛 <http://blog.boxun.com/hero/201312/yanjiaqi99/1-1.shtml>，2015年11月14日浏览。

[4] 韩丁的《翻身》将土改定调为一次阶级翻身的过程，强调农民如何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打碎封建枷锁，进行阶级斗争。不过，秦晖认为，土改的核心矛盾不在经济，而在阶级。他认为，“当时中国基本的政治分野，根本不是土改派和反土改派之间的对立，而是在独裁腐败、一党专政的维护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对立”。见秦晖，《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政治学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zA4ODU2NA==&mid=208412099&idx=1&sn=301a3d8fa9a38fbc3c66860b04d44f599rd，2015年11月15日浏览。

[5] 例如孔飞力的研究便考虑了中国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乡绅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见《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

[6] 翟宛文，《台湾战后农村土地改革的前因后果》，《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98期（2015），页14。

[7] 前揭书，页28、33。

[8] 前揭书，页55。

[9] 不过，温铁军也指出，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历程中，也一度尝试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来平均地权；其后不久他就因为山区小农剩余太少，不足养军，而把土地革命改变为‘斗土豪、筹粮饷’，并因此而受到左倾路线把持的中央的严厉处分，险些为此牺牲生命。此后井冈山和其他根据地也因此虽然‘扩红’三十万而‘苏维埃’革命未果。再后来红军历经艰苦长征，几次选择目的地才发现陕北，而仅以三万军力在陕北贫瘠农村立足……究其原因，把‘分田地’改革为‘减租减息’，把‘打土豪’改革为承认‘李鼎铭先生是个开明士绅’，亦即保持农村基层传统的小区精英自治，应是其中的关键”。见温铁军，《“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薛毅编，《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书店，2008），页5。

[10] 廖彦豪、翟宛文，《兼顾地主的土地改革》，《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98期（2015），页73。

[11] 何欣洁，《由乡庄社会到现代社会》，《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98期（2015），页190。

[12] 桑春红，《毛泽东新人思想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页3。

[13] 见孟永，《毛泽东新人思想理论依据考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第17卷第6期（2014），页12。

[14] 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台北：联经，2011）；许纪霖，《中国，何以文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赵刚、汪晖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理念》（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应斌编，《重新认识中国》（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15）。

探索 代化道路 主义和现 派的社 会 国民党左

李志毓

记得会议开幕致辞有如下一段话，我听了特别感动：中国曾经经历革命，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他能否创造一个新的体制来突破资本主义占有与剥削的惯常逻辑，亦或是支持他曾经反抗过的体制，即使以发展为名义。我想，今天我们坐在一起，来研究、反省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文化、思想涵义，一定是因为，我们有些共同的愿望还没有实现，我们对今天的时代状况有所不满，我们珍视的许多理想，或许已经失落。中国革命的漫长过程中的许多努力、成就和创造性的经验，还没有被充分地揭示和认识，没有变成我们实践的参照，许多痛苦的代价还没有被反思。我特别同意贺照田老师说的——我们希望能够走向一条更好的道路，让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身心，和我们所经历的那些痛苦不要白白的浪费。所以我们尝试研究中国革命的历程。

而我并没有直接研究中共的历史，我选择的是曾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的视角。

其实在国民党内部，一直不缺乏某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在研究国民党左派的时候，想的是，它有没有可能提供给我们一些不同于共产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如果他们的实践没有能够成功，他们的困境到底在哪里？以往学界对国民党左派的研究，过多地重视了左派联俄、联共的层面，而对社会思想的层面往往比较忽视。事实上，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在国民党内就始终不乏极具社会主义性质至少相当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论述。而抱持不同程度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却并非都是主张联共的左派，有些甚至还是反共的。例如胡汉民、戴季陶，都曾有一些社会主义思想，也都关心社会问题，劳工问题等等，但在国民革命时期，

他们两人都反对联共政策，并反对中共主导的农工运动。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在国民党内的回想和国民党左派，是两个相互关联的、但不完全重叠的问题。被今天我们称为左派的人，实际上思想非常复杂，他们并不都是信仰社会主义的，而被中共党史叙述称为右派的人，思想也很复杂，并不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

以廖仲恺为例，他是国民党左派的一个典型代表，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都是左派。他一生对社会革命抱有高度的热情，在联共之后更表现出了鲜明的农工立场。他在1924年前后广东各地的民团和农军的冲突当中，坚定地站在农军一边。他还参与制定了当时国民党的各种劳工立法，以保障工会自由，降低工人受到的压迫。他在1923年，在广东省长任上，制定出一个土地税收政策，试图核定广东的地价，通过土地税来调节土地不平均的问题，以实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理论。当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政策落实得并不好。但无论如何，他做过这样的实践。他还尝试了从军人手中夺回财政权，这遭到了军人势力的憎恶，最终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积极承担各种重任，但并没有积极去追求一个领袖的地位，这显示出他真纯的革命精神。

虽然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秉持劳工的立场，但是廖仲恺却从未信奉过阶级斗争，也很少从阶级的角度来讨论社会问题。他对于党治的理

论也是延续了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这样一套精英主义或者带有贤人政治色彩的理论，并不同于后来的改组派——陈公博这些深受共产党影响的这些左派国民党人。廖仲恺对于社会革命抱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中国要实行国民革命、社会革命毕其攻于一役，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能往乐观处看。但是他对社会主义却有一种坚定信仰，认为中国将来的前途只能是落在实现社会主义上。他认为，当时中国受到各种严重的国际压迫，除非是实行一种集产的社会主义，否则国家不能独立。

什么是社会主义？廖仲恺说：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以社会全体动员来作福于社会全体，生产之力不归一人而归社会，所以生产越多，社会全体之享受越多，人人有平等之机会，社会无偏枯之病。”但是，生产成绩如何，社会福利如何，仍要看“所能够利用之资本之大小，知识之多寡，机器之良窳，人民之勤恳”，这与资本主义并没有分别。廖仲恺说：“中国在这时代，自己经济的基础这样薄弱，而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这样深重，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社会主义的国家，依科学的组织用集合的（collective）的方法，解决生产问题不可。生产问题解决，其他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1]廖仲恺从集合生产和社会平等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的优势，他说：“在产业私有制

度之下，资本主义绝流而渔，操毋财而营商贾者，利乎人群生活之需，因钱币以购劳动，缘供给以肆征求，剩余价值之所归，咸趋如一。而嗷嗷待哺之众，乃与牛马牺牲同其命运。于是愤懑不平之气，酿成阶级之斗争，经济革命、社会改造之声，嚣然噪于天下矣。”^[2]他希望设法避免资本主义发达、贫富分化带来的阶级斗争，在发展国民经济、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为所有人谋取平等和自由。

在1932年曾经出任过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的陈公博，也曾经很清楚地表达过建立集中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构想，他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建设国民经济就离不开大量的资本，在民穷财尽的中国，内资集不起，又不能用外资，因为用外资必将受制于帝国主义。怎么办？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将一切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大产业收归国有，建立国家资本。第二，就是想办法维持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并尽量地去扩大这个阶层，去利用和充实社会资本。在农业方面，他也提到要建立合作化的生产组织，以村为单位，以农民协会为中心，成立生产合作社。同时他也提到要在每个省设立一种国营公司，国家要筹办大规模的国有电器和水利事业以帮助农民生产。另外国营公司还可以吸收大量的工人成为国家工人，这样不但可以集中财力、

物力建设国民经济，还可以避免贫富分化和阶级斗争。

在国营事业与社会合作组织之间，廖仲恺更重视社会合作组织，对于大规模的国有资本和国营事业，则表示出忧虑。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政治革命顿挫频仍，腐败势力，以利相结，扫除涤荡，尚不知竟于何时。公营政策之成功，自难企于现行制度之下。”因此，如欲用和平手段解决生产分配问题，就只能依靠人民的合作运动。“倘消费者能互相团结，以谋自助”，则资本主义之跋扈，可以消灭，民主的基础，可以养成。^[3]廖仲恺很重视合作社的发展，提倡广泛建立消费合作社，认为这种组织“简单易行”，可小可大，举措裕如，“远则为理想的国家奠定基础于将来，近则为社会除绞取之弊，为人民免生活之困苦”，或可于不知不觉之中，达成经济的自治，“友爱同胞之观念，因以增进，人类社会之本能，因以发达”。^[4]

在不易实现之外，廖仲恺还进一步指出一些国有公营事业的弊病。他说，公有公营政策的实施，若非人民在政治制度上，对于国家营业机关能实行有效监督，且能有适当的处理办法，则“其流弊所至，轻则浪费，甚则腐败，名则以利社会，实则有以饱私囊”，在“政治罪恶昭彰之国”，其流弊尤不易避免。而消费合作社则在监督管理方面，比国营事业要有效

得多。一方面，“合作社社员，虽仍以营业之任务，委托所选之少数人，然其对于业务之进行，比诸国家都市所经营者，监督之机会较多，且较直接而有力。”另一方面，消费合作社的经营，委托于选任之经营委员会，而社员全体大会，每年召开两次或四次，一切营业情况，均须向全体大会报告，经营职员有不如人意者，由大会改选，“流弊未易滋蔓”。至于国营事业，则人民处代议制度之下，监督办法只能依赖“代表”列席于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加以“会期甚短，而议案极繁”，虽有“贤能负责之议员”，也难以收到好的效果。人民不能直接任免国营事业的负责人，所谓监督精神，亦不免涣散了。^[5]

建设国有资本和国营事业，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通常会选择的发展模式，也是国民党左派的共识，廖仲恺对这一制度之弊端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对合作事业寄予很高的期待，不仅在于其经营范围可大可小，“其广狭大小，惟以社员之众寡、消费者购买额之多少为衡。苟能扩充及于全社会之消费者，则凡为人类所需用之物，合作社皆将有以供给之。”这不仅因为合作社相比于国有事业，更能发挥民众的监督功能，防止腐败、浪费和经营不善；还因为，合作社强调人民的自发性 and 主动性，“既本于人民之经济的自助，则其所结之果，以较凭借政治之机关，养成依赖之习惯者，佳胜多矣。”^[6]

鉴于中国传统社会长久以来的官僚制度、

官僚习气和人民对官员的畏惧、依赖及自发自主性的压抑，廖仲恺将互助合作组织与人民自主、自发的能动性结合起来，无疑是一种宝贵的见解。毕竟，所有的国家建设事业都需要依靠一个个的人来完成，而只有当一个人能对自己的生产生活过程施加影响，能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力，改变了、提升了自己的生活，才能让人更加热爱生活，热爱自己所属的那个共同体，才能调动起人的生命力和热情，焕发出人的尊严。改组派的陈公博说，政治的问题就是经济的问题，“我只相信经济，不相信除了经济以外，更有政治。”^[7]廖仲恺则看到，经济的问题也是政治的问题，内含人的主体性的问题。这一见解，不仅在国民党左派的思想中是独特而深刻的，对于我们今天来理解民权主义和民主的意义，也具有借鉴作用。

从廖仲恺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左派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是各种历史力量交织的产物，既有国际共产主义和苏俄势力的推动，也有国民党内部的思想与政治诉求。国民党内部的社会思想与政治实践，反映了20世纪中国一种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国家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思考与探索。在今天，这一历史实践，仍可为我们思考历史与现实提供思想资源。

注释

- [1] 廖仲恺：《〈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试从孙文主义出发的一种新研究》，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41页。
- [2] 廖仲恺：《消费合作社概论》，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27页。
- [3] 廖仲恺：《消费合作社概论》，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1页。
- [4] 廖仲恺：《消费合作社概论》，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28页。
- [5] 廖仲恺：《消费合作社概论》，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29页。
- [6] 廖仲恺：《消费合作社概论》，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29-930页。
- [7] 陈公博：《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陈公博先生文集》，香港远东图书公司，1967年版，第204页。

一、改造“旧人”变“新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建构现代国家的任务，集中在两个主题上：一是国民改造，尤其是对社会精英，包括干部和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所谓“新人”问题；二是组织问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接管官僚体系、接管工厂、接管农村和城市，采用怎样的组织路线？

这两个主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涉及到群众路线这个政治传统。群众路线不仅仅指群众观点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更是一种工作方法。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具体工作中，怎么样贯彻群众工作方法也许是更重要的。比如，在关于“胡风集团”的问题上，表面上指向群众观点与知识分子话语权的争夺；实际上却是共产党通过群众工作方法争取知识分子、改造“新人”。

很多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过程，都是群众工作方法在起作用。群众工作方法渗透到了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机制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学术界有很多具体研究，包括关于土改、接收官僚体系、工厂的历史经验，都非常详细地描述了群众工作方法是怎么实践的。甚至如何开会，也具有强烈的群众路线的烙印。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等文献里亲自谈过如何开会，如何在开会过程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共产党的会风很不一样，先有大会，然后分小会，大家畅所欲言；干部跟群众之间、普通干部之间没有等级，都在平等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会期特别地长，讨论了几天以后再总结。一个党派把工作细节注意到这个程度，不成功也是很奇怪的。胡风的跟随者舒芜就是因为参加了共产党很多会议，亲身感受了共产党的工作作风，进而被共产党争取过来的。

家？现代国家如何建构群众路线

吕德文

那么，群众工作方法是怎么样统合组织和干部这两大方面的？党的工作方法有两大原则，一是一般跟个别相结合，一是领导跟群众相结合。后一个原则可以融合前一个原则。只有深入到群众以后，才能发现个别，才能了解具体情况，然后上升为一般。所以说群众路线的核心在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革命年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对于党组织和干部来说，还算是比较容易贯彻的一件事情。建国前，因为有革命的压力，有迎接新中国到来的压力，干部不深入群众不行。比较难办的是，对那些并不需要急迫地走入群众的一部分特殊人群，怎么办？其中的重要群体就是知识分子。一个事实是，知识分子的工作直观看起来不需要接触群众，“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是两个世界。

费孝通在回忆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背景时说，他真心看不起知识分子，尤其是第三条

路线的某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的境界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匹配。这个知识分子的代表主动向中央上书坦陈他自己也有知识分子的毛病，要进行知识分子改造。从这一事例，我们可以知道群众工作方法强大到什么程度。

第一，它可以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觉悟，让他们自己认识到脱离群众的有害。费孝通的反思跟舒芜的反思如出一辙。他们的反思是完全自愿、真心实意的，不是党组织施加压力的结果。而这种经历，来源于他们亲身感受到了当时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觉悟”到知识分子群体确实跟群众脱离得很远了，而这种做派是要不得的。

第二，它有一整套的工作方法来让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共产党建政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个工作方法是非常有灵活性的。很多研究都说明，建国初期接管城市、接管工

厂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将国民政府时期的那些旧知识分子、旧技术官僚全盘接收过来。中国共产党非常自信可以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中国的“新人”。

这个自信来自于群众路线。就是说，因为有群众路线，那些掌握了权力——无论是掌握了知识的权力、文化的权力，还是管理的权力、技术的权力的“旧人”必须与群众相结合，“旧人”根本不可能颠覆政权。

在这个意义上说，干部的问题，或者说人的问题，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及其对社会运行机制的全新改造。旧机制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官僚制，依靠一个个的层级，通过命令、干部推行政策。新机制则是逆向运动的，它要求组织和干部在推行政策之前，必须深入群众，从中发现群众需要什么，现实情况如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了解群众需要和实际情况以后，再回来制定政策，再下去试点，再回来修改，最后塑造一些典型推广，如此循环反复。这就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所以说，领导跟群众相结合，让旧机制中国家权力和社会复杂性之间、干部跟群众之间的沟壑给弥合了。

今天我们谈知识分子改造这段历史，普遍认为知识分子受了很大委屈。但是，从新中国改造“旧人”变“新人”的逻辑上看，从群众路线的路径依赖来看，这个过程无法回避。

假设说没有这么一个过程，群众路线也是不完整的。而有了这么一个过程，群众路线所代表的新机制可以向所有特权人士宣示：你们必须跟普通的群众相结合；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国。

可见，一个“新人”的存在，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改过更新了，而是说这个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国家运行的机制，都是全新的。也就是有了“新中国”，才有了“新人”。

二、“下半身”转身

衡量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国家权力能不能深达基层。清末以降，中国开启了现代国家建设历程。国民政府走完了这个历程的一半，建立了现代政权体系，完成了“上半身”的转身；却未能完成另一半历程，国家权力无法深入基层，“下半身”无法转身。某种意义上，新中国之于国民政府，就在于它完成了现代国家转型，成功地实现了“下半身”转身。

群众路线的重要之处在于，领导跟群众相结合以后，同时把国家权力给渗透进了基层社会。这对于现代国家来讲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通过群众动员，群众被改造成了现代公民。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普通民众从家庭、家族、村社等共同体成员身份中解放

出来，成了“政治人”。群众都参与到国家政治里面来，都参与到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造过程中来。这在无形当中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新中国为什么新？首先是所有人都自愿抑或被迫地参与到政治运动里面去，没有例外。知识分子逃不了，普通干部逃不了，普通群众也逃不了。

今天我们容易从个体体验上去理解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却忽视了现代国家建构这么一个视角。如果从国家建设的角度上看，群众动员的方式、目标是好是坏不甚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动员塑造了“政治人”。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讲的“下半身”——基层社会自身的运转一直都没有改变。所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还是一个旧中国。只有经过了土改，经过了知识分子改造等运动，整个中国全部翻了一遍，也即韩丁讲的“翻身”以后，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国才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群众路线改造了官僚体系。中华帝国有非常成熟的官僚体制，所以韦伯说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但是，为什么它又还是一个旧中国呢？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权力没有跟人民分享，国家权力没有有效地到达基层社会里面，民众也难以通过官僚体系触摸国家权力，从而形成一种官民共治。士绅阶层将国家和民众分开了。群众路线不仅瓦解了士绅阶层，使国家整个官僚体系延伸到社

会深层内在，也让人民群众可以直接监督干部、可以触摸到国家机器的脉搏，从而完成着和旧中国充分区别的新中国的建构。

一

新时期是以对此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批判为前提展开的，这一前提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就是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为先导，开启了对广义革命文学漫长但却浅表的反思。说它漫长，是因为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其流风余韵仍随处可见；说它浅表，是因为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一反思仍然停留在相对单一的维度上，即停留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单纯控诉上。比如，这一反思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解构革命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通过将“新人”解读为“假人”，暗示社会主义革命与实践的空想与虚无。这个问题在农村题材小说中尤为明显，赵树理、柳青、浩然等作家反映互助合作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实践的小说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解构。换一个视角，

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解构不仅没有使我们靠近真实——艺术的与历史的——反而让我们距离真实更加遥远了。为此，本文试图以“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一外部视角解读浩然的《艳阳天》，探究小说中“两条道路”斗争的来龙去脉，以释放这条脉络中人物身上所积聚的历史信息，使人们看到一个更加复杂/丰富的浩然，使人们看到一个更加复杂/丰富的文本，使人们看到新中国初年那场复杂/丰富的社会主义现代实践。

浩然在新时期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他图解政治，用阶级斗争结构小说。毋庸讳言，浩然也是用“两条路线”斗争结构《艳阳天》的。

小说带入感很强，一开始，紧张气氛就弥漫字里行间。在工地上挖渠的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兼主任萧长春收到了村里托人带来的两封内容截然相反的信：一封

社会主义 原始积累

解读『艳阳天』的一个『外部』视角

鲁太光

是副主任马之悦的，他告诉萧长春合作社诸事大吉，无需挂念；另一封是团支书焦淑红的，她告诉萧长春社里问题又多又急，要他及时回去处理。萧长春有些担心，连夜赶回东山坞。他一回去就发现问题严重：在马之悦操纵下，看到小麦丰收的富裕中农们眼红了，正在背后串联，准备趁萧长春不在，按土地分红，不再把丰收的粮食卖给国家。随着调查深入，矛盾越发尖锐起来，站在萧长春一边，支持合作社，支持按劳分红，支持统购统销，坚定走互助合作之路的贫下中农，与站在马之悦一边，支持按土地分红，反对统购统销，愿意单干的富裕中农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先是被马之悦和“弯弯绕”收买、引诱的马连福在干部会上向萧长春“开炮”，后是马之悦鼓动富裕中农一边偷偷地把粮食卖给粮食贩子，一边吵着闹粮荒，企图逼迫萧长春违反政策，

去他们家里搜粮。萧长春识破了马之悦的计谋，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化解了这些矛盾。一直在背后谋划、观望的马小辫看到马之悦屡战屡败，忍无可忍，跳将出来，把萧长春的儿子小石头偷偷引到山上杀害了，企图以此引起合作社混乱，破坏麦收工作。萧长春强忍悲痛，领导社员专心麦收工作。一连串失败后，即将暴露的马之悦孤注一掷，打着乡长李世丹的旗号鼓动富裕中农去合作社抢麦子。就这样，矛盾越来越扩大，问题越来越尖锐，斗争越来越激烈，最后，以抢粮为导火索，东山坞的问题以“两条道路”斗争的形式，以“敌我矛盾”的形式爆发了。

二

我们的问题是：“斗争”真这么严重吗？

回答问题之前，我们先回到文本中去，看看以往文本分析中为人所忽视的一个“重要”人物——“弯弯绕”，^[1]看看这个富裕中农的另一幅面孔。小说中有一个“弯弯绕”在自家菜园劳动的场景：

这个小菜园是相当出色的。主人巧于调度，也善于利用。畦里种的是越冬的菠菜、韭菜、羊角葱；还有开春种下的水萝卜、莴苣菜。这期春菜下来，他就赶快种黄瓜、豆角、西红柿。这期夏菜过后，他又紧接着种上一水的大白菜。这园子常常是一年收四季。这还不算，他见缝就插针，没有一个地方不被利用。比方，畦埂种的蚕豆角，墙根栽着老窝瓜，占天不占地，白得收成。^[2]

观赏了“弯弯绕”的菜园风光，我们再看看其人其事：

黄瓜架那边突然一声：“哪跑！”

马立本吓了一跳，转过去一看，是主人马同利蹲在菜畦里拔草。

那草可真小，有的刚出土，有的还没有出来，你要是站在畦埂上看，根本就看不见。他拔的很认真，手指头使劲儿捏着，两只小眼珠瞪得一般大。

他又捉着一棵小草：“哪跑！”^[3]

目睹这样的场景，我们意识到，关于“弯弯绕”，除了作家想让我们看到的自私自利、精明算计的一面外，他还有吃苦耐劳、精打细算的一面。相比于“弯弯绕”“刁”的一面，作家无意中留下的这个“正面”形象其实更有意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其“刁”的背景：“弯弯绕”之所以那么自私自利、刁钻古怪，除了个性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因为穷怕了，苦怕了，饿怕了，因而，只好在自己心中开辟战场，保卫自己的利益，为此，甚至不惜牺牲集体与他人的利益。

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禁不住有些心酸。

实际上，浩然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浩然创作《艳阳天》的主要“生活基地”是山东昌乐东村。在口述自传中，浩然还原了当时东村窘迫的生存状况：“当时全村400口人吃一个食堂，社员每天定量6两粮食，平均每月18斤，下放干部每天定量9两，每月27斤。每天两顿粥，早上一顿，晚上一顿，不但吃不上菜和肉类，有时连咸菜也吃不上。一旦队里安排不好，食堂就会断炊，社员就会断顿，全队就可能会出现饿死人的问题。”^[4]在这饥饿年代，老实厚道的东村人也熬不住了，苦寻生计，许多人在秋收季节加入“偷盗”的行列。面对这样的窘境，浩然并没有像《艳阳天》中的萧长春一样决绝斗争，而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是党支部书记，村里的粮

食损失了，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看到乡亲们挨饿，他心里很是不忍。当年和浩然一块护坡的副大队长吴国瑞回忆说：“当年这种情况，真是难煞老梁同志，黑夜我和他一个班，我发现每次和他护坡时，他在坡里围着庄稼地不断地一边转悠，一边大声吆喝，有时也唱歌，那些偷者从老远处就能听到他的声音。我当时对他这种举动很不理解，就说，‘看坡别出声，哪有像你这样看坡的，你弄出声音来，不把小偷早吓跑了。’他说，‘就是想把他吓跑了呵！’”^[5]浩然的“慈悲”表明他是了解农村实情的。在口述自传中浩然还提到过他的一位房东志福爹的故事：他“在村南边自留地的地头上了夹了一圈箔障子，再挖一条沟，把水引到附近，再用极原始的提水工具浇灌，种了几畦菜蔬，致使他家除了有从公共食堂打来的粥和干粮之外，还有了另外的补充。”^[6]在“弯弯绕”身上，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志福爹的身影。这更是让我们意识到“弯弯绕”的不易。

在一篇创作谈中，浩然告诉人们《艳阳天》中“阶级斗争”这条主线的来源，他说：“《艳阳天》，早在1957年就开始酝酿了。那时候，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三大改造刚完成，一部分人留恋过去，总想往回倒退，因此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我住在农村的一位支部书记家里。

夜间，我们正熟睡，来人敲开门报告说，某队的一些富裕中农在坏人煽动下，把仓库打开了，要抢麦子。我和支部书记赶到现场，只见一群青年和老年的社员们，威风凛凛地守卫着仓库大门。他们说，抢粮的人已经被赶走……”^[7]浩然深受感动，以之为素材写了一部中篇小说，但由于“受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流毒的影响，不能本质地反映生活，给群众念了之后，他们并不感动，那位支部书记说：你写的故事不错，就是敌人不猖狂，群众也没力量。”^[8]浩然很重视这些意见，反复修改，却都不成功，直到“五年之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发表了。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心里豁然开朗。我立刻想起了那部失败了的小说稿，我又打起行装回到那个村庄，跟那里的群众生活在一起，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一边深入研究生活。这时候，我比较认真地学习了1957年前后党所发表的有关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文件，同时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那一场斗争，而且把这个靠山小村发生的抢粮闹事的事件，同当时国际上的反共高潮和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这些形势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它，研究它。”^[9]

这表明，浩然是用“五年后”的眼光看待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正是这后置视角使他放大了抢粮事件的严重程度。关于这个问题，

同样以农村题材小说闻名的赵树理有比较辩证的认识。在谈到“三里湾”的“斗争”时，赵树理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那时候，农村开始建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共产党的农村支部带领着一些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人已经走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为了保持个体生产的阵地，便千方百计来阻碍集体化的顺利发展，这样就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两条道路上，各有代表人带领着同情自己的人作为一个方面摆开阵势……”他还进一步强调说，“他们说他们‘摆开阵势’，说他们‘走的是两条道路’，不过是为了说话方便打的一些比方，实际上这两种势力的区别，不像打仗或者走路那样容易叫人看出个彼此来。尽管是同在一块做活、同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一家人，甚至是夫妇两口，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也不一定同站在一方面。就以一个人说，也有今天站在这方面，明天又倒向那方面，在一件事上站在这方面，在另一件事上又站在那方面的……”^[10]这段话点明了互助合作运动中矛盾的复杂性，也点明了人们按“阶级出身和思想意识”而“摆开的阵势”是一种松散的联合。

这个分析，对浩然的《艳阳天》同样适用，就是说，在《艳阳天》中，浩然将对立双方按照“阶级出身和思想意识”而“摆开的阵势”安排得过于整齐，将他们的矛盾表现为势不两

立的敌我矛盾，将他们的斗争书写得过于激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互助合作运动中“两条道路”斗争的认识。无论如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三

问题又来了：既然浩然知道农民的苦情，为什么还要这样写呢？

正如小说中所呈现的，东山坞之所以树欲静而风不止，除了地主马小辫暗中捣鬼、社干部马之悦退坡思想严重外，更重要的是“弯弯绕”们的“报复性反弹”：眼看着粮食丰收，他们再也坐不住了，于是，绞尽脑汁，想把粮食都藏到自己家中，最终导致抢粮事件爆发。因之，要想回答浩然为什么在小说中将自发、松散的冲突“改写”为自觉、整齐的冲突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弯弯绕”们“报复性反弹”的原因搞清楚，而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有关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的论述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梳理。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农政思想主要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第一，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由来及其命运出发，历史地呈现了封建制度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摧枯拉朽的进攻面前的全面崩溃，历史地呈现了经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后资本主义农场在小农经济

的废墟上大规模发展的“跃进”，历史地呈现了亿万小农在这一过程中破产并沦落为一无所有的产业工人的悲惨状况，也历史地呈现了残留的小农经济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极端脆弱性和保守性。正是从这个历史前提出发，从关于未来社会的整体规划出发，马克思得出了未来农村社会必须走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之路的判断，得出了“小农经济”必须升级为“大农经济”的判断。第二，基于上述整体判断，马克思对农民的两种历史命运——要么固守在小块土地上被资本主义的战车碾压得粉碎，要么放弃祖祖辈辈固守的小块土地，跟工人阶级联合，推翻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科学分析，也对农民的两种可能性——保守的可能性和革命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版图中，农村和农民的出路系于一点：小农经济与产生于其中的小农意识。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判断如下：如果无产阶级能引领农民克服小农意识，使之成为自己的同盟者，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则小农经济就有进入“大农经济”的可能；反之，则庞大的农民群体就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障碍，小农经济也可能丧失进入“大农经济”的机遇。

客观地看，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相当谨慎。虽然在特定历史时刻，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表达过对农民进步意识的预期，但整

体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以批判的眼光正视小农意识的一切。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农民意识的双重性进行了无情剖析，他们认为农民之所以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小农意识的理论判断，也得到了实践的检验。这主要体现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实践中，尤其是体现在列宁的有关论述中。

十月革命之前，列宁主要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农政思想，但随着十月革命胜利，布尔什维克初掌政权，列宁的社会主义农政思想却有所“退步”，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向农民“让步”思想。^[12]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俄国农民传统深厚，农民力量强大，出于“现实”考虑，不得不向农民让步。其后，在与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的论战中，列宁丰富了其“过渡理论”，提出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媒介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构想，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13]但列宁的“过渡理论”却没能得到展开，反而由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

而转向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执行，对保障国内战争胜利，巩固苏维埃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弹，为此，苏维埃政权不得不于1921年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中关于农村、农民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规定粮食税的数额比余粮收集制要低，农民在缴纳实物税以后，剩余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一律归自己支配，可以自由买卖；二是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使农民的余粮和其他农产品进入市场。^[14]显然，“新经济政策”是向小农经济的“撤退”。但吊诡的是，“新经济政策”仅仅实行了一年多，列宁就提出停止退却转向进攻的新策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经济政策”没有达到“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的初衷，^[15]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16]从这段话中，我们意识到，小农经济的回潮应是列宁停止退却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在斯大林那里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1927年，苏联粮食收成增加，但由于农民在获得一定积累后，不愿意再以低价出售粮食，国家粮食收购遭遇巨大困难，苏联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这一危机使斯大林断然放弃“新经济政策”，采取疾风暴雨的方式推进农业集体化，对小农经济发动大规模“进攻”。由于这一“进攻”采取了政治运动的方式，因而，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这一农业集体化的举措被后世诸多研究者批为“酷政”和“恶政”，斯大林也被批评为“罪人”和“恶人”。

四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已经逐渐接近问题的核心，即：在小农经济传统深厚、小农意识浓重的国家开展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实践之可能。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对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命运考察的基础上，曾给出比较可靠的论证。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承认俄国农村公社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的可能性，^[17]即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跨越资本主义农场生产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的可能性，但马克思又不是无条件地支持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是强调，

“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而之所以要有俄国革命，是因为“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18]就是说，需要俄国革命为挽救农村公社提供历史条件。综合马克思的叙述，可以看到他所谓的历史条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9]即“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20]即可以利用“世界市场”而参与到整个世界生产和交换体系中去；二是“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21]即“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之下，其次，如果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要靠农民来偿付）向那些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提供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22]即掌握政权的革命政府能用国家财政补贴农村公社。

按照马克思提出的这两个条件来看，在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确只存在着“理论上”的“可能”，因为，不论就俄国的经验来看，还是就中国的经验来看，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的条件下，

甚至不用冷战，只要资本主义竞争存在，在落后的农业国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无法享受到世界市场所能提供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积极成果”，反而为其所制约。因为，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来看，由于技术落后，工业落后，苏联产品的价格平均比国外产品高一倍，在这种价格下进行积累，只能建立在政府的强制性与世界价值规律作斗争的基础上，迫使国内市场附属于苏联技术落后的工业，而出口的农产品则按世界市场价格出售，使进口计划服从积累固定资本和以实物形式恢复流动资本的任务。这决定了苏联作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农业国的价值规律有其特殊性：一是积累“不是建立在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之上，不是同价值规律作用并行不悖，而是建立在与之进行殊死斗争的基础之上。这个矛盾将随着工业落后于农业而发展，只会随着我们将来成功地实现我国工业和运输业的技术改造而消失。”^[23]而在世界市场上的“损失”，又只能依靠对农村的抽取来弥补。而这，使马克思在落后的农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两个理论前提一一落空，更不用说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还面临着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我们在上文曾提到过，斯大林断然采用社会运动的方式，甚至采用暴力方式推动农业集体化，依靠农业集体化实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被后世许多研究者

定义为“酷政”或“恶政”，但大家都对其“恶果”津津乐道，却很少有人对其“恶因”进行探究。事实上，正是依靠这种掠夺性积累，苏联建设了强大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体系，这保证了苏维埃俄国在其后的世界大战中存活下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业基础，那么苏联——包括其后身俄罗斯——今天是什么样子，真的难以预料。

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物质基础极其薄弱，且周边政治环境异常险恶，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可资本的原始积累几乎不可能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完成。于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存亡大业，中国人民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自我剥削”。这一“自我剥削”最为重要的手段，就是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互为表里的体制。而也正是这一体制，尤其是其不断加速，压缩了改造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的空间。

五

行文至此，我们又回到了上文提出的问题上：在《三里湾》中，东山坞的中农，尤其是像“弯弯绕”这样的富裕中农，为什么会

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报复性反弹”，甚至不惜铤而走险？

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艳阳天》中，引发“报复性反弹”的导火索是统购统销，因而，只要我们把统购统销的由来交代清楚，就能够很好地印证这个观点。

在《建国以来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薄一波专文分析“统购统销的实行”，该文开篇直言：“如果说尖锐的粮食矛盾是促进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一，那么，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24]在严峻的形势下，靠建国头几年形成的以公粮征收为主、以市场收购为辅的办法掌握粮食，显然不可行。然而，困难很大，办法不多。最后，在陈云主持下，提出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其实，中央对这个政策的短板很清楚，陈云在政治局扩大会上讨论时就坦承这个政策的“毛病”是“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打扁担，个别地方暴动，都可能发生”。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那就要重新走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建设不成，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25]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更是直言：“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都是危险家伙。”^[26]简言之，

采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断臂自救”。

这就是东山坞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报复性反弹”的真实原因。就是说，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所走的，是一条抗争宿命的道路：不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为现代工业建设提供条件，则刚建立的新中国就有夭折的可能，就有退回黑暗的可能，而如果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则又会“妨碍生产积极性”。

其中滋味，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就是在这腹背受敌、捉襟见肘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赤手空拳，打破规律，推动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国家独立所必需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基础，不仅为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实践闯出了一条“窄路”，而且也为此后中国转型与发展积蓄了强大的动能与势能，故而有研究者将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称为“英雄时代”。

而这，正是浩然及其《艳阳天》的特异之所在：这部反映中国农业集体化的长篇巨著固然“放大”了农村社会的矛盾冲突，但正是这一“放大”艺术地凸显了当时社会主义新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也正是这一“放大”艺术地凸显了以萧长春为代表的农民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无边艰巨与无比坚定，及其背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实践

无尽悲壮的史诗品格。今天，在资本主义战车反复碾压下，乡土沦为“废土”，农民几为“流民”。在这残酷现实映照下，这一现代实践的史诗品格更加鲜明。而浩然，则和他笔下的萧长春等“英雄”一起，在我们面前巍然挺立，尽管他们的脸上和身上，布满“伤痕”。

注释

- [1] 笔者以为,要想全面理解《艳阳天》,除重点关注萧长春、马之悦等正反面人物外,更要关注绰号“弯弯绕”的富裕中农马同利,因为,无论就小说还是小说所反映的历史来看,萧长春、马之悦等固然发挥了重要的指挥/操纵作用,但互助合作事业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却取决于马同利这样的“中间人物”的向背,因而,对他们进行分析,不仅是理解小说的关键,亦是理解互助合作事业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实践的关键。
- [2] 浩然:《艳阳天》(第1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10-111页。
- [3] 同上。
- [4] 浩然:《我的人生》,华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45页。
- [5] 马进:《浩然与昌乐》,《潍坊晚报》,2012年3月25日。
- [6] 浩然:《我的人生》,华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48页。
- [7]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编:《浩然作品研究资料》(修订本),1974年4月,第34、35页。
- [8] 同上。
- [9] 同上。
- [10] 赵树理:《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522-523页。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页。
- [12] 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99页。
- [13]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第521页。黑体为原文所有。
- [14] 季正矩:《列宁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311页。
- [15] 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73页。
- [16] 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85页。
-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页。
-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2页。
-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页。
-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8页。
- [2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页。
- [2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页。
- [23] 普列奥布拉斯基:《新经济学》,三联书店,1984年第1版,第9页。
- [2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55页。

[2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63页。

[2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65页。

我觉得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其实有一种特别的视野、方法、问题意识。尤其是这几次会议的文章，放在当前中国的人文学界来看，的确是在进行一种新的探索实践。读书会的同仁们常说自己是通过一种社会史的视野来重新解读中国近现代的文学与文化问题，但是在我看来，各位的文章以及读书会几年来的学术积淀，其实内涵了两个根本性的方法论视野。首先，是通过会议主旨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史视野，除此，其实还有一个隐匿的视野也很重要，这就是精神史的视野。因此我的理解是，重新进入新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意涵，需要诉诸社会史视野与精神史视野的双重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撑开整全理解此一事件的可能性空间。

从这个双重视野来看新中国的建国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从社会史的视野来进行展开、

深入的过程，它更是一个我称为建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把这个建国这个社会史的变迁，把一个新的共和国、一种新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秩序、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真正地在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的人身上扎根下来。一个工人，一个警察，一个接管干部，这个社会史的变迁是如何在他们的心里扎下根来，如何翻转他们匹配于旧时代的旧有身心状态的这个过程，非常值得我们去关切和思考。其实，建心的过程，相对于外在因素，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上午的会议，有老师曾对何浩的论文有一个评价，说是跨到了历史学领域。但是我觉得，读书会所做的努力和传统历史学的研究实际是很不相同的。这并非要否认读书会在材料方面学习和借鉴历史学而做得非常丰富、扎实，而是要强调，读书会同仁都有一个很深的关怀，即对于每一个在历史

社会史与 精神史

『人民中国』的再 理解

罗成

脉络中的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人怀有身同感受、将心比心的这样一种深到骨子里的关切。所以，我认为只有在社会史视野和精神史视野这两个交迭的视域中来观照“新中国”的难题性，才能获得一种超越于传统思想史、文学史、历史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感觉、新问题。

首先，是一个重新进入和理解“历史”的视野。贺照田老师主编的《人间思想》第一辑，副标题是“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这里面展现出一个“事件”的理解方式。“事件”其实是当代中国史读书会的一条独特路径。它启发我们，今天来理解文学思想、社会思想，不能把它仅仅当作胡风、路翎，或者其他人的一个纯粹思想，而是要尽力地把它当作一种境况中的思想，一种流动状况中的思想，一种思想的事件。

比如，摆到历史中来看，比如胡风、路翎，

严格来说他们的思想并非像康德或者黑格尔那样，是在学院中间，由处于安稳状态下的知识分子来写作生产的。其实，中国近现代思想很多时候往往是在一种激烈的政治碰撞，现实对话，乃至一些充满了剧烈冲突的思想瞬间发生的。像胡风、舒芜、路翎，不仅是要去回应直接的对话者乔冠华，而且他还要回应当时的重庆氛围和延安氛围，那样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氛围及其政治感觉。所以他们的论述，并不是一种学院派的、与世隔绝的、象牙塔里的学问生产，而是一种境况当中，一种真正的历史政治状况当中的思想展开。这样的一种探索，我觉得同主流的、传统的实证史学其实很容易加以区分。两者的问题意识其实大不一样，当代史读书会的这种径路，并非不讲历史考据，也非止步于将这个历史史实加以语境化，而是要将“思想”

带入一种流动的政治状况、真实的历史状况中去，要把当时的现实社会结构及其背后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脉络搭建起来，从而把“思想”放在这样一个复杂关系中去加以再脉络化、再结构化的考察。从这一点上来讲，当代中国史读书会所主张的历史理解，也不同于我们过去的一句口头禅，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到今天来看已经被流俗化了，大家很容易把今天的事件和过去的事件作一个直接的比附，进而在一种比附的意义上直观地批评过去，或者批评现在。而就“事件的思想”“人间的思想”这种方法论而言，我要用两个词来加以概括与把握：再结构化，再脉络化。

就这一点而言，我读倪伟老师写作关于胡风的文章感觉非常有启发。我的本行是文艺理论，在文艺理论界，80年代以来对于胡风理解的主流观点是，因为胡风是一个历史受难者，基于人性同情与整个80年代历史形势的转变，所以胡风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等命题，就被直观性地再肯定为完全正确的文艺理论法则。但是实际上，这些常常被视为文艺理论的胡风观念，其所内涵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艺理论的问题域。仅仅从文艺创作法则来理解胡风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抽空了胡风观念由之而生、如此塑形、若

何效果的丰富历史意涵。如果我们有能力将它进行再历史化，或者说再政治化，把这样一个思想对象不是当作一种纯粹的理论生产，而是当作在流动的历史政治状况中间，一个思考者要非常紧张地去面对具体情势作出历史理解、政治判断、文学表达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才能真正把握思想本身内涵的历史性与政治性张力，而非简单将思想与历史、政治加以直观对立。由此，我们也才能真正看清此一思想的创造性与现实感的程度及其边界究竟如何。

比如，胡风自己把一种属于创作理论的观点，简单直观地视为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运用。甚至，胡风自我感觉这就是在向人民学习、走人民的道路。但实际上，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他的自我感觉为判断标准，因为胡风实际上仍站在知识分子立场来看待人民，并未真正地理解什么是人民的立场。进而，如果把胡风的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再做一个对比，我们就会看到，这种主观战斗精神，在他自己的作品当中其实也未必能够很圆融的落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状况当中，我们的问题意识并非要简单判定胡风的对或错，而是要看到一个真实个体，在这样一个结构化、脉络化的历史政治状况当中，他到底是怎样来做抉择的，以及为何会如此抉择。这种抉择所造成的后果，或许不仅仅是历史时代外加的，更关键的其

实还有抉择主体自身的现实感与历史感是否足够契合于同时代的真实状况。经由此种主体感觉与历史结构之间的关系辨析，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能成为有裨益于今天问题理解的充实来源。

如果说，“事件”是一个从社会史的视野中来获得认识论意涵的关键词，那么我想，“精神”就成了另一个从精神史的视野中为这一认识论赋义的关键词。我发现，这次会议中，姜涛、何浩、符鹏，很多作者的笔下都频繁地出现了如身心状态、知识感觉、伦理关系、理想渴求等这些问题表述。比如，符鹏在谈天津解放后接管工厂的过程中，开始实行一个所谓“三原”的原则（原职原薪原制度）。工人可能马上会觉得不开心和有疑问：为什么共产党来了，还跟以前一样，要继承旧的制度？精神史的敏感性，要求我们不把牢骚、苦闷简单视为牢骚、苦闷。对于一个思想的突破性理解、丰富性把握，往往正是从这种真实历史对象的苦闷性中获得的。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不好直观解释的那些历史细节，如工人反对接管的“三原”原则看上去是与“以工人阶级立国”通常理解有所不符的，但也正是在这些略显尴尬的细节中，那种历史的精神困境及其被翻转的创造性经验才能获得关注乃至充分展开。因此，工人的精神困境，胡风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苦恼，又或者像舒芜

那样，突然通过一个学习会议的契机，自己发现原来中共的工作是这样开展的，原来革命是这样一回事。思想史唯有从主体的困惑、苦恼、焦灼的瞬间当中，才能把握住其身心状态的历史意涵。所以，我觉得“事件”和“精神”其实连带一体的双重视野：抓住“事件”深入历史，带给我们一种充实的感觉；关注“精神”深入人心，则带给我们一种光辉的感觉。所以，社会史与精神史在思想史研究中结合起来所达致的解释效果应该是充实而光辉的。

因此，当代中国史读书会的确不是在普通实证主义史学的意义上来介入历史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历史认识方法论的独特性。毛泽东有句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今天很多人通过政治教科书的方式，记住了、熟悉了这句话。但是，大多数人学习到的是一个封闭性的定论，直观地将这句话理解为“星星之火，必定燎原”或者“星星之火，一定燎原”。但是，毛泽东所说的是“可以”，而非“一定”“必定”。什么叫“可以”？也就是说，星星之火其实不是一定能够燎原的，仔细看“可以”两个字，那其实是指一种“可能性”。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或者说中共的革命道路，其实都是在“可以”两个字上面做文章。怎么样把危机扭转为生机，怎么样把一盘散沙组织为强有力的基层社会，怎么样从城市革命走向“农村包围城市”，正是这个“可以”得以具体展

开、丰富深入的过程。“可以”决不是一种既定的状态，而是自觉到社会与精神的双重意识从而翻转社会、翻转人心的一场历史实践。从“星星之火”到“红旗飘飘”，这个“可以燎原”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中共如何与中国社会、中国老百姓真正结合到一起的过程，也就是群众路线的真实的也是历史的意涵所在。

回到根本上看，这样的历史性探究，其实同时也是一种深深的人文性关怀。这种人文性并不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不是说有一个美好的东西在未来，我们要去努力追赶。而是，这种理想性的社会感觉、身心状态其实已在新中国的打造、建立、建设的过程中曾经彰显。历史的资源已然摆在那里，我们需要努力的是，通过真正的历史分析、结构分析、脉络整理、精神整理，能够把这些资源及其内涵的历史经验真正攫取、重新激活。同时，这种宝贵的历史经验及其精神意涵，其本身也是可以成为我们抵抗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当今很多现实社会问题的有效资源。比起直接站在一种立场去批判另一种立场而言，更重要的其实是把原本团结、紧张、生动、活泼的那个历史过程与历史经验认识清楚，唯有如此充实而光辉的历史资源和精神资源，才可能是真实的与有力的。

我们今天讨论的既是建国问题，但又是放在“万隆会议·第三世界六十年”这样一个

主题下。刚才我结合社会史与精神史阐述了连带人心与世道来展开建国理解的问题，而我刚读过一本书，很偶然，但觉得其中的道理与刚才所谈及的建国理解有着潜在的连带性。香港的一位独立记者张翠容，刚刚不久前在大陆出版了一本《另一片海》的调查著作。因为我一直不太懂欧债危机与阿拉伯之春是怎么回事，正好我看到这本书，又是一位富有多年战地调查经验的独立记者撰写的，我就想了解一下。结果，在书中读到了张翠容对突尼斯底层民众关于“茉莉花革命”的相关采访，非常有感触。

我们普通中国人开始关注突尼斯，大约都是由于2010年10月份爆发的所谓“茉莉花革命”。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事件出来后，国内舆论有两派观点。一派观点支持“茉莉花革命”，认为那是自由民主的象征。另外一派观点，则要反对作为颜色革命的“茉莉花革命”。但是，当我读到张翠容的采访时，被深深触动了。她采访的都是突尼斯当地最普通的人民，这些各行各业的突尼斯人大多不赞同使用“茉莉花革命”这样的字眼。为什么呢？据说，这是一位法国记者最早使用而后风行于西方媒体的宣传修辞。但是，对于普通的突尼斯人民来说，茉莉花是北方的富裕城市和阶级的象征。因为突尼斯的经济结构长期以来南北不均衡：北方是富裕的工商业阶级，盛开在沿地中海

地区的茉莉花，象征的是北方权贵阶级的生活。南方的人民则多是饥寒交迫的底层，茉莉花根本就不能象征他们的真实生活。被西方记者用“茉莉花”修辞粉饰起来的所谓“自由民主”革命，在突尼斯普通民众自己眼中，它的本质其实是底层人民起来反抗这种地区发展的不均衡、阶级财富占有不公平的运动，反对的恰恰是北方富裕权贵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所以，突尼斯本地的知识分子，本地的人民，都是既不赞同“茉莉花革命”、也不赞同“颜色革命”的说法。由此来看，“茉莉花革命”这个命名本身就是脱历史化的，当然不对，但我们今天的某种直观对反的思维，由反对“茉莉花”“颜色”而完全否定了突尼斯革命，其实也是脱历史化的。其实就像张翠容所展现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够从“那一片海”的内在历史脉络和人心感受来理解的话，其实根本就不用那样直观对反地去反对什么“茉莉花革命”，而只要把突尼斯的真实历史状况揭示出来，其实足以说明根本问题：突尼斯革命是一场底层民众争夺有尊严的生存权战斗，并非那些西方国家挂在口头的抽象空洞、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服务的所谓“自由民主”革命。这就是作为事件认识论方法的再结构化、再脉络化的现实意义。按照这个道理，我们能够把40年代、50年代抗日根据地、共和国建国的种种状况有效整理出来，其实同样能

够成为今天的充实资源。

最后，我想用两句话来结束发言。一句是马克思的话，“以往一切哲学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另一句则是贺照田老师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拒绝成为自己，拒绝成为他人”。归根结底，新中国的建国问题其实是一句话：我们应该改造这个世界，同时改造我们自我的主体性，这样才能打造出一个新的中国，一种新的人民。这才是新的人民中国的根基所在。

中国 / 左派

按语

战后台湾人中国认识的形成与局限——从一个战后新生代的成长经验来看

我的中国 / 左派分与合

中（国左）派

中国 / 左派

按语：

这个专题的四篇文章缘起于2015年10月底在台湾中央大学举办的第二届“重新认识中国”会议之“综合讨论”场次。两届会议的幕后筹划可以回溯至2008年开始对于“超克分断体制”的讨论（成果发表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这个讨论小组后来变成读书会，成员也逐渐固定下来。我们都不满意自己知识学习中的西方中心论影响，也不满意反西方中心论的西方批判学者只能采取解构的姿态，只能占据社会边缘的位置发声，她们没有西方以外的知识来源，而我们至少有薄弱的条件可以加入积极建构（非解构）中的“知识生产的中国转向”，因此读书会倾向于“重新认识中国”。在2014年的第一届会议提出了“中派”（中国派）的知识计划，焦点当然是“中国”，而由于我们共同的左派背景，第二届会议就想厘清中派与左派的关系，因此就以“中国 / 左派”作为综合讨论的主题。

现在读者面前的四篇文章就是这场综合讨论的发言稿，现在经过作者修订发表。读者将会发现四篇文章长短不一、风格互异、关

怀不同，但是却包含了我们看待中国 / 左派以及中（国左）派的几种角度，读者或许更能藉此多面地了解这个问题在台湾的意义。

出生于1951年的郑鸿生在第一篇文章先讲述了战后台湾人如何从语言、建筑、饮食、族群意识等生活和感觉方面来形成对“中国”的认识，然后再讲述台湾知识人的“中国认识”受到哪些外在思潮的影响。由于两岸曾经人为地隔绝很久，大陆与台湾的“中国认识”亦人为地有所分歧，更何况大陆自身的中国认识也受限于西方中心的世界图像与话语。今日台湾年轻人在信息自由的自满下更无法察觉自己的“中国认识”之形成历史与限制，这和戒严时期的台湾菁英主动认识中国的蛛丝马迹以突破冷战封锁，大相逕庭。今日台湾年轻人和当年一样都有一群追求“进步”的少数菁英，他们知觉敏锐，渴望个人解放自由，趋向激进主义。然而不同于当年的，一方面，今日这些菁英过于关切选举政治与琐碎的眼前风云，年轻的智慧与德性迅速退化，另一方面，今日由于高教普及与信息易得而有“知识民主化”现象，大学生可以有底气

抗拒和批判学术权威，因此大批非菁英的青年也都能在政治或知识的议题上积极表态（按赞或吐槽），不过多数仍属于唯恐落后人的跟风主流（这个主流却必须装扮成激进或非主流，才能给青年进步前沿的自我感觉），社交媒体的特质更加深青年们的孤立或排斥恐惧（因此更有跟风的同侪压力），这和就业市场与前程的不稳定息息相关。青年恐惧在“爱台湾”的高压环境中被视为“不爱台湾”，外省（1949年前后随国民党迁台）第三代年轻人更面临积极表忠的压力。然而台湾年轻人的中国认识并不因为信息发达、知识专门而更深度切实，反而面对了信息知识都成为软实力与宣传战的一部分，出于各种目的之信息混淆（disinformation）充斥。当前的中国认识被灌注之讯息量虽然远超过郑鸿生的青年时代，但是往往强化增进的却非更多认识，反而是更多偏见。

第二篇文章作者徐进钰晚郑鸿生一个世代，徐进钰进入研究所学习时，台湾已经解严（1987年），他能较充分地接触到左派知识与中国讯息。这个时期里，许多1960年前后出生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成员（如陈光兴、

赵刚等）已经从海外留学返台，让徐进钰充分暴露在西方左派/新左/后马思想的浪潮中；接下来无论是1989事件或者徐进钰在1990年代（做为加州柏克莱大学博士生）田野考察的大陆经验，都带来很混杂或彼此冲突的中国/左派认识。徐进钰中国/左派之旅的内在冲突性因其时代而有代表性，旅途中的所有同路人都能感受中国/左派的冲突，有些人抛下了中国而就左派，有些人抛下了左派而奔中国，更有两者皆抛的旅人。徐进钰在他的文章里叙述了他周遭的思想-政治氛围，他知识的困顿求索，他情感的勿忘初衷；我认为他心路历程的自我描述很能表达台湾左派知识分子的处境与思想——我们都是徐进钰。现在有很多呼吁宣称大陆人不理解台湾人，这种呼吁往往设定了“我们-他者”的差异，但是我相信“徐进钰们”没有这种差异区分，徐进钰们的问题意识内在于大陆勇于反思的左派知识分子，表达了这个时代两岸非教条左派的共同困惑。困惑以问号取代了确定指向，新知识路径因而有了另辟的可能。总之，因为“徐进钰们”不自满于现成的普适路标，在中国/左派之旅的路上势必困顿而学。

困顿、困惑、不（自）满是第三篇赵刚的文章很常见的情绪，这些情绪是针对自身（洋左）、台社（民主左派或新左派）以及我们这个会议小组（中派）的批评反思；困顿不满的情绪可以成为突破思想怠惰的动力，打破很多现成普适的“政治正确”。赵刚的长文很难简单概括，从他文章的标题便可以知道他企图连结“中派”与“中国左派”，指出中派如何与为何“还是中国左派”。在很具启发性地阐释“中（国左）派”这个二合一表述后，我们发现赵刚重新界定了中国左派的边界，剔除了（我们都曾经拥抱过的）某种西方左派，并将“章太炎、王阳明，一直到先秦儒（礼运大同）与庄子（齐物论）”纳入中国左派。同时，他对中派的知识储备与地气连结提出了批判反省；可以说，中派带来的是更多的困顿。在这个意义上，赵刚对尚有“知识自尊与思想野心的知识青年”提出了邀请与挑战，希望“一代新人”不要再照抄我们这代旧人过去所转译改写的“批判指南手册”。

赵刚和徐进钰、郑鸿生的文章都整理了自身经验历程，很真切具体地传达出他们对于中（国左）派和中国 / 左派问题的台湾思考。

我个人还没有好好整理自身历程，所以在第四篇文章采取较为抽象的论述方式，不直接处理“中国左派”这个历史性的问题，而只探究中国 / 左派的一般性关系，希望能对台湾的左统、右统、新统之分合问题有所蕴涵。基本上，我呼应了赵刚的看法，就是中国需要重新认识，左派也需要重新界定（不能只等同于某种西方左派），否则中国与左派的政治分歧（进而表现为不同统派的政治分歧）难以克服。

感谢贺照田对这个专题发表的督促与玉成。

2016.01.11

（本专题特约主持：卡维波）

今天台湾人认识中国的格局，反映了从战后台湾新生代开始的成长与生命经验，从这个兼具外在的时势变化与内在的个人心理成长历程的视野，来反思这个议题应是别具意义。这里我想先谈一下中国认识的非属理论思辨方面，即是感觉的、生活的以及认同层次的，比如说语言、服饰、建筑、饮食习惯与族群意识等。底下就先从这几方面来展开。

语言方面：国语 vs. 方言， 以及语言声腔的中国感觉

我在 1957 年上小学之后，才开始从注音符号“ㄅㄆㄇ”学习国语。那时的小学老师，尤其是教初年级班的，虽然多是在地人，却是师范学校毕业的。他们在师范学校学到的是国民政府“国语推行委员会”制订的一套标

准发音，我们小孩子虽然讲不标准，但也是跟着用这套国语发音来读国语课本。在这样的环境下，总以为中国人从古时候起就这么说话的，而我的母语闽南语就只是一种岐出的方言。上了中学后，课本上开始有了文言文，然而对文言白话的差别也不会去深究。

这种成见长大后才逐渐破除，后来认识到汉语是历经几千年的演变的，而所谓国语也只是其中一种方言系统——北方官话——的标准化了的语言，而且“官话”还是比较晚近才发展出来的，大约是元代之后，相对而言是一种比较近代的、精简化的汉语（比如声调与韵母数目都减少了），而且很多中古汉语的发音方式都丢掉了（比如入声与浊音）。闽南语反而是保留中古汉语较多的方言之一，是比较接近汉唐时代的语音，因此用来读唐诗较合韵律。

战后台湾 人中国认 识的形成 与局限

从一个战后新生代的
成长经验来看

郑鸿生

虽然对汉语有此认识的少数人能够看清楚所谓国语 / 方言问题，但大部分人还是会将国语（或者是大陆称的普通话）与闽南语对立起来，将国语（或普通话）与中国牢牢绑死。

服饰方面：歌仔戏、京剧、 古装电影 vs. 汉俑、唐俑

在台湾传统社区长大的小孩，不论乡村还是都市，都是从小就看庙会歌仔戏与布袋戏的。我家旁边几步路就是一座妈祖庙，节庆的野台戏是社区盛事，小孩子都是跟着看的。1960年代中期开始有了电视，也会看到京剧。此外更多的是1957年开始，李翰祥等人在香港拍摄的黄梅调古装戏。不论是歌仔戏、布袋戏、京剧，还是黄梅调古装电影，戏里演员的服饰基本相同，让你以为中国古人从来就是这

么穿的。

这种刻板印象也是很后来才被打破。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很多古文物开始流出海外，古董市场充斥着眼花撩乱的唐俑，其中意象万千的妇女俑才让人惊觉他们的服饰不同于传统戏曲里的。多年前的一次西安旅游，去参观汉阳陵，又发现那些汉俑女性的发型是整个披到背后用带子打结的，服饰既不同于戏曲里的，也异于唐俑。这时我才能将台湾的南管剧团汉唐乐府，他们表演时的服饰，与我在汉阳陵看到的汉俑连结起来。

有了这些重新认识，才知道传统戏曲上的服饰基本上是明代人的服饰，包括发型。然后又进一步理解到传统戏曲的大发展是在明代，昆曲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地方戏就是在明朝中叶开始的。显然那时的戏曲演员就以当时的服饰来打扮，不管故事是发生在哪个年代，

如此延续到今，让我们以为古代中国人都是这么打扮的。或许当时的明代人也是这样，认为中国人从来就像他们一样穿着。

建筑方面：闽南式建筑、“中原式”建筑、徽式建筑与唐宋建筑

台南无所不在的那种有着神采飞扬的燕尾屋脊的大小庙宇，以及住家附近那座沉潜宁静、毫不张扬的孔子庙，这些闽式建筑是我小时心目中的古建筑。来到台北后看到故宫博物院与国父纪念馆，80年代后又有中正纪念堂与两厅院，这些被称为“中原式”建筑。这个建筑风格上的对比类似国语和闽南方言的差异，也带着正统与岐出的对比，让人以为传统建筑从来就应该像故宫博物院那样。

在90年代初我的第一次大陆之行却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先飞到北京，看到像故宫与颐和园那样与台湾那几座具有相同风格，却数量更多而且更为精致的“中原式”建筑。那次可说是亲眼验证了台北那几座“中原建筑”的道地及其渊源，虽然在规模与细致上相差甚远。

然而令我吃惊的是发生在接着的山西大同之旅。我们从北京搭夜车到大同，除了云冈石窟外，还参观了华严寺、善化寺等老寺庙。这些都是列为一级古迹的中国古建筑，我心里

却嘀咕着这里怎么会有日本建筑，尤其是善化寺的那座普贤阁，与我所知的日本寺庙长得很像。当然原来就曾听说日本寺庙建筑风格来自唐代，而就在山西大同这个近乎边城的地方看到了这个残存的风貌。善化寺是辽代古迹，而辽代建筑还保留着唐风，虽曾历经修缮，风格却未有多大更动，保留至今让后人得以追溯回味。而90年代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再现，他们的著作和事迹也让我们窥见中国建筑的一些片段，从而理解到所谓中原式建筑其实只是明清两代北京的标准建筑模式。

在后来历次的大陆之旅，我们在江南一带又看到颇为不同的、青瓦白墙的徽式建筑，江南园林与皖南建筑是其典型；在扬州则看到北方与江南风格的揉合。有了这些亲眼目睹与感觉，就会理解到原来那个“中原式”建筑风格正统观念的无效与误导。

饮食习惯：大盘共食 vs. 小碟分食；茶叶 vs. 茶末

在饮食上，现代中国人最能引为特质的是同桌共食，一张大圆桌，大家共享放在大盘上的同一道菜。这个中国饮食方式的一个特征，不仅使用刀叉的西方没有，东亚使用筷子的韩国与日本也没有。

然而后来在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上的细节看到，当时汴京市民在酒家的饮食方式竟然是分食的，每个人面前一堆小杯盘，各吃各的，就像今天的韩国与日本。由此也认识到同桌共食是明代以后的习惯。

饮茶方式也是一样。从小喝茶就是用热水冲泡各种茶叶，后来喝到日本人将茶叶磨成细粉的抹茶觉得奇怪。再后来在台北的紫藤庐喝茶，才从主人周渝广博的茶道知识中得知以前中国人也是将茶叶做成茶饼，泡茶时将茶饼拨块磨成粉末再冲泡的，而宋代人的斗茶就是以茶末泡茶时所引起的茶杯里的风波。多年前在西安法门寺，参观地下挖掘出来的唐代茶具，也看到一组金色的磨茶器。中国人以散开的茶叶泡茶是明代以后的事，据说与明太祖认为茶饼引发炒作与浪费而禁止有关。现代日本人以茶末泡茶显然有唐宋茶道的遗风。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很多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上认为是“中国的”事物，其实是明代以后才形成的。

族群意识：中国人的纯种与混血

我们从小接受的中华民族教育让人以为中国人，或狭义来说的汉族，是一个单纯血统的种族，例如黄皮肤、黑眼睛这些特征。在这种意识之下，日本人与韩国人也都有其

互相无关的单纯血统。当然长大之后知识渐长，这些错误观念就一一破除。

其实无须太多现代理论，也可以从纯粹的历史书上认识到中国人，或狭义的汉族，是个在东亚大陆上经过数千年大混血的混杂体。当然日本与韩国也都有类似的过程，只是程度与复杂性有别。以我们所知的历史来看，中国有过三次的大混血时期：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秦始皇统一这一时期、秦汉之后的所谓五胡乱华时期，以及唐宋之后的辽金元入主中国时期。当然中国各地又有它在地的特殊移民混血历史。可以说血统上并没有所谓纯粹的汉人，当代的基因研究也没能找出一个核心，可以让人指出这就是汉人的源头或标准，就像拨洋葱，拨到最后并没有一个核心。汉人、华人或中国人这些称谓与其说是血缘的，不如说是文化的或甚至是文明的。

虽说不论是历史知识或当代基因研究，都清楚表明血缘性并非中国人称谓的主要因素，但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血缘性还是经常成为各种社会的与政治的纷争的潜在心理因素。

台湾战后影响中国认识的几个主要外在思潮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现代中国人对自己社会的知识累积的匮乏，这些较为正确的

自我认识大半只存在于少数专业人士的知识库里，一般人无从知晓。在如此缺乏社会的自我知识累积的情况下，一般而言，追求进步的中国人就容易接受外在强势思潮的影响，以此来“认识”自己的社会与历史。接下来我就以台湾为例来说明。

台湾战后出身的几代人，除了受到现代化冲击下劫后余生的台湾式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的熏陶外，基本上历经了三种外在思潮的影响来认识中国，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只能做一些概括的描述，其实每一种思潮的影响都是个大题目：

首先是从50年代起的国民党反共民族精神教育来认识中国。虽然国民党的这一套民族主义，就像其他民族主义那样，极其不接地气，尤其是作用在曾被日本殖民五十年之久的台湾，但是这套中华民族话语却是台湾战后新生代生命成长的第一个启蒙力量，是第一次精神初恋，是超越小我，追求大我的一个很给力的教育。这个力量是后来1963年青年自决运动与1971年保钓运动的基础动力，然而这种极为自我中心的心态，却吊诡地经过改头换面之后，也成为分离运动的内在驱力。

再来是60年代起美国思潮开始向台湾社会传布而形成的对中国的重新认识，可以概括为从美国自由主义视野来认识中国。对于台湾战后新生代而言，这是在国民党的中华

民族教育之后的第二个重大生命启蒙，追求的不再是国族这种大集体，而是个人与自我的发展。其中起重大作用的是殷海光、柏杨、李敖等人，与此相配合的60年代出版业荣景，以及美国新闻处出版的印刷精美的大量中文图书，用来宣传美式民主自由、现代化理论、现代文学与前卫艺术。

殷海光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柏杨的反传统（批判“酱缸文化”）以及李敖的个性解放与青年崇拜，十分契合台湾战后新生代进入青少年反叛期的生命成长需求，以及他们在苦闷的联考教育体制下寻找出路的渴望。这套可以笼统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构成了如何认识中国的强大指引，一直延续至今。

当时随着思想界对美国的开放，欧美60年代青年运动的各种思潮，也透过各种管道渗入台湾。虽然这些东西在少数的进步知识青年圈子起了不小作用，也引发对中国认识的反思，但是整个60年代的思想氛围基本上还是亲美反共的。

直到70年代，才在保钓运动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这两个重大事件的冲击下，开启了从左翼观点，尤其是中共革命路线的观点，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新视野。虽说这是战后台湾青年的第三个启蒙，但是这视野在当时戒严的环境下却必须以十分隐讳与拐弯抹角的

方式来表现，不像美式自由主义那样可以公然宣扬，只能局限在少数进步分子圈内，因此就一直没能在台湾社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然而作为广义的左派思潮，尤其是苏联垮台后欧美流行的各色各样西方新左思潮，倒是在解严之后的台湾思想界与社会运动界流行开来，并且提供看待当代中国的思想资源。

这三大思潮——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正是西方现代启蒙运动几百年来来的三大思想支柱，在战后台湾借由各种政治或社会载体，影响着台湾战后几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认识。今天台湾对中国认识的纷纷扰扰，不管统独蓝绿，也无论政治或社会运动，基本上脱离不了这三种西方启蒙思想的笼罩、纠结与局限。然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不接地气的思潮（甚至僵化为意识形态），不论互相如何争论，都在共同努力打造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并且与前述因对社会自我知识的积累不足，而形成在生活与感觉层次上对中国概念的各种成见，互相为用，互相加强。

当然在1949年跟着国民党撤退来台的，还有从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出来的一些人物与思想，例如新儒家、一贯道与“人间佛教”等。这些人物与国府的关系，除了早期的一贯道外，大致相安无事。然而他们在当年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中却比较缺乏吸引力，也没能形成具有改变社会的政治动能，因而在社会上一直

有着“保守”的形象，被“进步”知青视为“落后”中国的苟延残喘。

可以说，今天台湾人认识中国不脱以上这些东西方的认识框架，及其各色各样的变种，而如今在这些东西方“意识形态”对当下的全球困局显然已是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讲“重新认识中国”即意味着如何超克这些“意识形态”的框架，而从中国自身来认识中国。这也意味着中国这概念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或左翼思想，以及新儒家等，是同位阶的，是个有待大家一起来论述、来成全的理论。兹以此短论来做为这次会议主办者卡维波的这个“中国作为理论”知识计划的呼应。

我曾经以为左派跟中国都是很清楚的定义，也以为这两者是合而为一，但随着成长与认识，对于这两个主体与领域的认知，却开始不稳定，甚至动摇，而对两者的关系也开始怀疑是否真的合而为一。这样的困惑引导我的知识关怀与构成，也逐渐塑造我的社会参与。而这样的求索过程，我相信也是我这一代在战后台湾经济快速成长后出生关心社会与参与改革的世代，必须经历的知识与情感挣扎与撕裂。

比较清楚意识到左派的意义，应该要追溯到1980年代初期，我在高中青年时期，开始在朋友的介绍下，阅读当时还是禁书的1930年代左翼作家，包括巴金、茅盾、萧红、沈从文的小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并且进行的工农专政，有一种为老百姓出口气的景仰与崇拜。在那个白色恐怖慢慢式微的年代，

对于国民党的不满，大陆左翼的思想成为苦闷的出口，而这样的寻求30年代的工农小说，如同当时阅读台湾宋泽莱、吴浊流等乡土小说一样的真实，透过从小教科书的教导，台湾/大陆/中国三位一体的想象真实，并没有任何的不安，愤怒的对象只有一个，就是欺压工农中下阶层的国民党，大陆左翼的思想，成为反抗与自我解放的慰藉。我还记得听朋友舅舅从香港偷带回来的《黄河大合唱》的录音带，在朋友家的地下室，那种激昂亢奋的感觉，没有太多隔阂（除了对于语音一开始的不习惯），我至今都还能唱上几段歌词与曲调。这个阶段，对我而言，中国革命走工农运动路线就是左派，中国/左派是合而为一。透过当时30年代禁书、音乐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与认同，以及对于国民党的反抗，连结天生当然的祖国想象，伴随对于自身阶级的反省，

我的中国 / 左派 与合

徐进钰

构成了以阶级为左派的认同。这个阶段对我而言，是阶级左派 / 祖国中国的合一。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进了大学，对国民党的不满，开始被慢慢茁壮的“党外”力量所吸引，与此同时，开始接收本土意识的召唤，特别对当时最底层的原住民（被称为山地同胞）议题最为关注，这与自己童年在矿村成长中周遭同学很多原住民矿工子弟有关。这个阶段回想起来比较像民粹派的想法，就是回到底层社会去认识，但又不屑当时学院流行的慈善救济团体，相信社会阶级矛盾只有结构性解决，而无法透过自愿性的慈善来弥补。这个时期的台大的异议（反抗国民党）社团中有着台湾史读书会，阅读史明的《台湾四百年史》，相对于国民党的中国（大陆）意识而起的本土意识，在反抗国民党的心理下，开始茁壮。但总体而言，关心底层，回到社会是这时期的主要想法，

对于台湾独立的看法，觉得不是主要的矛盾，阶级左翼的想法还是主要的关怀，这也使得自己同时结交当时党外知识圈中的夏潮与新潮流这两个统独立场对立，但都在阶级议题上，采取关心底层的姿态的团体。这段时期，接连发生的矿灾，超过百位原住民矿工的死亡，让我更加深认为台湾阶级问题才是根本矛盾。这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仍有期待，仍是重要召唤力量，开始囫圇吞枣式的从朋友那里拿到《资本论》的影印本，试着阅读，背了一些句子，但没有系统性地学习辩证法，反而是在大学中修习了郭博文教授的“西方哲学思想”。这时期学生社团中流行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坊间也有翻译书（马库色的《单面向度人》等，大陆译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但回过头看，总体而言，还是相信左翼，就是认为阶级问题最为根本。

这个阶段对我而言，是个阶级左派/本土认同的结合，相信自己在社会认识与矛盾的解决上，必须台湾优先于大陆，但也谈不上反中。

开始有系统性思考左右问题，是读研究所时期，那是1980年代的后期。这时候台湾解严，强人政治结束，各种诉求的社会运动，包括性别、住宅、族群等议题都大鸣大放，而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教条左派的批评，透过当时我开始读研究所的都市区域研究的书籍，慢慢成为自身的反省，尤其是性别议题，更成为日常生活中不断刺激自己思考的问题；而这同时，参与台湾住宅运动（无壳蜗牛运动）更是自己在研究所最后阶段的最重要社会参与，而其标榜的超越阶级运动，更成为当时我对于左翼的反省认知的参照点。当时，来自陈光兴所鼓吹的人民民主抗争，也让自己越来越像自由派，而不是左派，对于原本坚持而觉得处于根本价值位置的阶级问题，开始模糊，开始认为自己要避免阶级化约论的危险。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期间的思想真的十足反映了当时西方后冷战时期的批判思维，思考的转折不是来自自身社会实践的反思，比较大的影响是来自西方理论的移植。看似对知识开放多元，其实是越来越狭隘。原本对于左派的想象开始变得不稳定，开始疑惑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跟自由派（或人道主义者）区隔。而这同时，却又相信左派不应该是民族主义者，

相信左派价值无国界也无族群差别，于是对于族群的认同以超越的态度以鄙夷眼光看待。当多元民主成为这时候的信仰，却鄙夷族群问题，实在是我这个阶段的矛盾。回想起来，应该是包括六四事件的影响，使得我的中国认同（或者对中国革命的想象与仰慕）动摇，而本土的召唤中，也有许多族群的措辞令我不安。这个时期应该算是个西方马派普世化的想象。

这种实则自由派的“假左派”的知识状态，持续到1990年代我出国读书时期。这段时间专业的训练要求越来越强，对于西方批判理论的学习越来越专，也越来越对于普世的、好的价值，诸如市民社会、社区草根、社会网络参与等跟我专业相关的概念与价值有更多的研读，尤其是在讨论城市与区域发展的议题上，深受英国第三条路的影响，强调社会网络的重要。但是经常限于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就是当研究分析完了，那又如何？这些概念如果在具体经验中不存在或者不能实现，那是概念的问题？还是现实的问题？经常反问自己，在什么意义上，我可以说自己还是个左派？但是专业制度化的现实，往往又将自己拉回到如何在台湾刚萌芽的这套以西方社会科学为审核准则的求生中，而无暇他顾。而这个阶段，由于研究的关系，开始进到大陆做田野调研，也认识了大陆的同行。我进行的是台商研究，多次跑到大陆的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北京

等地，也了解台商对于大陆经商的一些态度，包括自傲到自卑的状态都有。大陆对于台湾而言，在这些商人的论述中，其实经常只是廉价以及建立关系好做生意的空间，少数会谈利用机会多认识祖国，但多半就是一个机会，并承认这个机会有很大的限制。妙的是这阶段也在台湾听到支持两岸交流的统派也同样类似论调，用商业机会来界定两岸关系，我听了觉得心情复杂，也不是认为这样说就是错，但是觉得这样的商业机会如果也存在其他地区，那么“统”的意义是什么？对于年轻时想象的中国革命，在真实旅行中，其实是越来越幻灭，不过也问自己，如果中国大陆必须改变路线，那背后复杂的道理真的是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而已吗？如果中国对我这个向往左派乌托邦的人而言，不再是工农革命的出路，那么又是什么？还记得读过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书《脱钩》（*Delinking*），对于毛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提的“去连结”，所带给我的热情想象，而今安在？有趣的是，这段期间每到大陆旅行时，年少读的教科书或者小说的“祖国”模样，有时会让自己堕入历史的记忆感觉，例如在上海淮海路、外滩乃至于在北京机场看到告示牌上的地名，都会有些情绪牵动，说不清楚，觉得既亲近又陌生。亲自接触大陆的人、地、物后，越来越不敢说自己了解大陆，回到台湾看到评论，尤其有关大陆体制的批评，

总觉得不踏实，似乎就是用一种标准去套大陆，看到不合，就加以批评。但是自己相信的那套西方的价值或概念，又很难丢弃。这段期间，我应该是多元模糊左派 / 不反中的本土派。

2000 年中前期，随着学术位置的建制化，专业化的知识某个程度让我疏远了社会运动，一旦疏远，就更难介入参与，即使每年秋斗还是会如礼行仪地参加，但越来越觉得疏离，觉得自己行动上越来越不像左派，也越来越不知道台湾左翼在做什么。有时想来，觉得制度的作用真是出乎意料地大，当然也知道这不应该成为自己逃脱的借口。在知识上，其实还是不断希望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超过 20 年自己思想的源头），想要找到出路。而这段时间，适逢台湾民进党执政，一方面看到其实对于台湾社会发展，民进党真的跟国民党没有差异，而开始失望，而且因为之前与民进党部分政治人物有朋友关系，更厌恶那种执政后分享甜头的嘴脸；而另一方面，民进党所进行的族群动员，我爱台湾的运动，在我这一被召唤的所谓本省人，情绪复杂。我讨厌国民党，特别是里面权贵外省人，也曾经想要推翻它，但是看到我的朋友中有可贵情操的也多是外省人朋友，反而是周边的所谓“勇敢台湾人”里，特别是从政的，却有许多贪利不堪，尤其后来陈水扁集团在执政的中期出现的贪腐，更令我有被背叛的感觉与愤怒。而民进党的族群动员，

只是让我觉得作为掩饰贪腐的手段，并造成人之间的不信任，以及让外省人中的弱势者（例如老兵）更加承受这个社会集体的敌意等问题。这样的动员，让我反而对于族群议题更加厌恶，而没有想把这议题放进我的左翼议程里面。某个程度这个时期我还是相信族群问题的虚假，是在掩饰真实社会矛盾。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期间在《新左评论》上发表的关于台湾分离主义的文章，对我而言，意味着新左核心的知识分子把台湾族群动员作为议题在处理，推动我开始思考左翼要如何看待两岸的分离，如何不是就族群而谈族群，如何勾连社会的矛盾？可见当时还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参照的对象。这段时间也因为工作关系阅读了许多西方（或者华裔学者但在西方大学工作）有关中国发展的书籍和文章，这其中争辩集中在到底中国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还是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我是透过这样的过程，逐步认识（或者误认）中国的发展。我认为自己在这阶段是个犬儒左派/族群上特别厌恶“自我感觉良好”的台湾意识的反中派。

而开始真正接触大陆思想界的朋友，也开始阅读大陆讨论中国发展的文集，是在2000年中期以后，一方面是我完成升等工作，免除被学校评鉴的要求，开始思考做些对自己更有

意义的工作；在这样的思考下，又意外接了台社主编这个工作，让我有机会接触来自大陆朋友的文章（还包括韩国知识界朋友的文章），刚开始阅读时，非常困难，归因于我跟这些朋友处在不同的知识状态与继承，从问题发问、论证方式到引用文献基本上都存在或多或少差异，我所受学院训练反而无法问一些迫切而且深刻的反省社会的问题，西方（尤其是美国）经验实证科学经常变成无病呻吟的假问题，或者只是操作性问题，大量引用文献，其实多是非常表面的引用。但无论如何，对于我这个习惯被西方学界典范规训的所谓“学者”而言，实在不知道如何跟这些文章对话，觉得他们的发问都有清楚的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意识，与台湾大多学者发文参照的知识系统很大差异。因为作为主编，必须耐心地阅读，慢慢地从好奇到惊讶自己的无知跟需要学习，但是不可讳言，这样的学习很是困难，因为那挑战了我多年的知识养成以及发问架构，特别是涉及中国思想等文献，在我的学习中几乎空白（或者应该说过去因为鄙夷，学过也很快就忘了）。而这同时，也因为台社里面部分同仁为了寻求台湾与两岸出路，讨论分断体制，其实一开始并不知如何与自身状态接轨（殊不知自己的知识状态就是分断体制最好的例子），但因为参与台社的工作，迫使自己思考自己知识体系形成，如何受到世界体系以

及冷战对立的塑造。在这过程中，也逐渐了解对于左派的认同很可以从历史的、民族的、社会的发展去看待，而这很有助于我对于自身价值信仰的质疑，认为不应该只是简单地对西方左派价值进行接收。不过，要想建立取代自己过去借由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知识架构，其实是非常煎熬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对于左派的历史性社会性有充分了解，而要与过快把问题都拉到普世立场的思维习惯断裂，从而无法再借由自己原有的知识体系直接获得答案；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历史、知识训练的缺乏，以及最困扰我的中国现实政治经济与左翼社会思想之间的断裂（汪晖所谓代表性断裂），使得自己越来越无法用一种简单的西方批判语言发声，但也无能从深刻历史—现实反省出发进行社会批判。这样的状态，让自己越来越失语，左支右绌，有时甚至质疑自己是否老到变保守。这是一个对我个人而言重整的时期，重整左翼的思想，也重整自己到底对于中国的想象是什么，以及这两者在什么意义上没有断裂。

对我这一代人而言，曾经青少时期坚定的（简单的）中国=左派认同，对于中国革命期待，到中国意象逐渐开始模糊，乃至自己左派认同也开始模糊，到重构这个中国 / 左派的“/”，回头看，如果对于我而言，中国不再是革命乌托邦，但也不只是市场经济的

连结，也不只是历史文化的继承，有可能成为置身其中发展有别于西方知识架构与文明改造的可能的场域吗？这样的中国 / 左翼的连结对我来说，只能说问号越来越多！！眼看自己既有知识架构在溃决，新的体系在打造，或许这不是坏事，而是一种生命学习的尝试！

为了2015年秋末初冬的这场研讨会的最后一场座谈，卡维波给大家出了“中国左派”这样一道命题作文。他认真出，我也试图认真回。这样，多少也就算是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社”（台社）的一个长期成员立场，对已经开了两次的“重新认识中国”研讨会，作了一个回应。同是台社长期成员的卡维波的意思很清楚，我们以“重新认识中国”为核心旨趣而标志的“中国左派”，和我们长期以来以台社为某种当代左翼知识分子的集结的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为何？左不左，这个问题对他人，好比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或许不成为问题，甚至是个自找麻烦的问题，但它对我们而言则是切身的问题。我们“台社人”（孙歌多年前的赋名）对于“左”的情感是历史的，难以切断。再加上去年发生的太阳花事件，更让我们痛察“左”被一向为我们所反对的反动力量所

收编的荒谬感……。这促使我们必须面对“什么是左派？”这一问题。以下是对相关问题的一些带有自问自答况味的讨论。

一、“中国左派”是一个 可以成立的正当概念

首先，作为一个概念，“中国左派”成立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举一个反面例子。如果说，“中国自由派”，在自由派的理论思维中，是一种矛盾而意义费解的怪异能指——“特殊的普世”？或它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前置词，指的是这个被指涉的自由派恰巧是中国人……，从而难以成为一个有效概念的话，那么，“中国左派”则没有这个困难，因为在左翼思想传统里，尤其是第三世界左翼传统里，国际主义与某种民族主义两者之间远非对立，

派 中 (国左)

赵
刚

而阶级与民族这两个概念也是不能够彼此化约的。

这是就概念的抽象层次而言。若是回到历史语境中，也许“中国左派”这个概念就更饶富想象与论析的可能。此处，我想粗浅地提出两个思考方向。首先，中国的近代知识分子为何那么容易被左翼思想吸引？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本来就有很强的因子在那儿，让知识分子得以以他们的认知与情感方式理解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我想到的当然是好比“大同”“天下为公”这些思想因子，以及一种天地万物的一体观。清末民初的很多左翼思想家，特别是章太炎，在对强权逻辑的顺应与抵抗中复杂地斗争，并不放弃一种中国式的天理与王道观，以及其后的某种思想主体的尊严。遵义会议期间中共对王明路线的反省与清算，

以及之后 1950 年代中共与苏共的十年论战，也或可视为从共产国际或是苏联左派回归一种“中国左派”的斗争。

其次，左派（或就此而言，右派）固然是一种方向性的运动，企图定义现实引导现实，但左派右派也免不了被现实的力量所定义。在当今地缘政治的现实中，“左派”经常是被西方，尤其是美国，所定义的。作为“后保钓”或“后冷战”的海归左派集结的台社，对于左派的理解与定义，其实一直是不批判地接受西方（学院）新左派的关于“左”的定义的，而又非预期地将这个左派的姿态与行话千山万水传递到太阳花。但如果我们回到历史，什么是“左”，并非总是由西方所定义的，而更是受到中国的“定义”。以台湾为例，1920-30 年代受五四深刻影响的、反抗殖民的且受到中共影响的左翼群众运动是如此；1947-1949 年间在

国共内战之下的反独裁、反饥饿、反迫害的“左翼运动”更是全中国的左翼反抗运动的一有机部分；1970年代初发生在台湾与北美的保钓运动也是如此。因此，“中国左派”并不是一个突兀的概念游戏，而是重新连接上一种由中国的历史语境所定义的“左”的传统。让“中国”脱离了当代台湾“左派”的自我认知与想象中，其实是整个去中国化的一个部分展现。

因此，虽然我们都知道左派右派也者是现代性产物，是源自西方的概念，但这并不等于说“左”与“右”的分野仅有一种或数种固定标准，而是一直被重新定义的。“左派”唯有在重新定义自身的尖锐历史与道德意识上，才有可能发现自身的危机。职是之故，台湾的“新左派”如果不把自己摆在一个历史的语境中，就没法对自身提出一个尖锐的提问：这个左派是否是历史终结的一个“左翼”版本？当今中国大陆流行的知识政治的感觉是“反左”，这当然是有历史背景的，但如果只防范“中国左”，而在无意识的层次上完全接受“西方左”，那难道不会是一种思想的懈怠？“横的移植”如何能够深刻地面对自身的问题？这是我们对各种“维权运动”后头所应有的思想与理论运动抱有大期待的原因。

因此，就今日而言，提出“中国左派”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上与一种第三世界追求独立自主的传统结合，在反抗今日的霸权

历史终结说的同时，寻求适合自身的现代出路，并展现一种向世界提出另类路径，从而对世界有所贡献的思想抱负。

那么，“现实存在的 (really-existing) 台湾左派”成立吗？不成立。首先，概念上，现存的左独或独左，对族群民族主义的“台湾优先” (Taiwan above all)，完全无能展开任何批判的视角，从而让一种原本有各种潜在进步可能性的“阶级”话语，在一种深具极右倾向的政治话语框架中被死僵收编。于是，有点类似“阶级”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的情境，“左”在这个“台湾优先”框架下，只能是一种最狭义的“社会正义”（“社会”与“正义”都高度可疑），即在“自己人”（也就是所谓“公民”）中间“资源分配”，好比见诸所谓“陆生是否该纳入健保”的各类离奇讨论中。历史告诉我们，这不但左，甚至是激烈地反左。太阳花之后，一些“左翼”台派中青年成立了“社会民主党”，恰巧反映了台派、独左、左独的这种反左。

耙梳历史脉络，我们可以看到，“现存的台湾左派”是内战、分断、冷战与帝国主义影响下所形成的政治力量，与，好比陈映真所述说的，台湾历史上的反帝与反殖的左派（1931年“九一八”之前，以及二战后直到白色恐怖开始的集结）殊无系谱关连，他们的理论库存除了从西方挪用来的现代化、文明论、历史终结，或偶而加上的社会民主之外，并无

其他纵的继承。非但没有继承关系,甚至可说,这个主要是由当代地缘政治所形成的“现存的台湾左派”,是“历史上的台湾左派”的否定。严格说,“现存的台湾左派”与“台湾”与“左派”都有一种暧昧奇特的断裂关系。用台湾学界爱用的话:很吊诡!

就当今的政治现实而言,似乎不必多说,它依赖美日反中,并不“独立”。邱义仁的名言:“不抱美国大腿抱谁大腿”,已经说明事实了。太阳花之后,一些学运头面人物(当然可说是“现存的台湾左派”),立即绅士淑女西装革履赴美述职,并请求美国重新思考与中国关系。

当然,我所指的是“现存的台湾左派”。如果“台湾左派”指的是一种历史中的斗争轨迹或是一种未来理想的投射,那么它可能是很有意义的,但前提则是,这样的台湾左派得首先把自己从一种族群民族主义的魔咒中解放出来,进而有雄心地把自身视为“包括在中国左派与世界左派之内”的一种运动。台湾相对于大陆的边缘性、它的移民历程,它的被殖民历程及其反抗,都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有机构成。如此想象的“台湾左派”,是中国左派的一不可化约的特殊组成,而且应有其独特贡献。

讨论至此,似乎也就等于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何今天在台湾有必要谈中国左派?我们的合理意图是:在新形势下,尤其是所谓的中

国崛起下,以一种既内在于台湾又内在于中国的立场,重新构建一种不论是对内或对外都抵抗霸道追求王道的左派论述。这个立场既然确定下来了,那么接着就可以谈两个比较小的问题。

其一,中国左派需不需要中国(人)意识、认同?在一更高的层次上,我倾向于说不需要。“中国人”加“左派”,并不等于中国左派,例如王明,或任何的“本本派”。另一方面,非中国人的左派,例如西方与第三世界的毛左,赞成与否,也不妨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左派”。因此,中国左派与一种法国左派或一种东南亚左派并不见得全然无关,中间可以有某些对话或交集。的确,中国左派并不意味着只有中国人才能参加,但是,在很具体的开创层次而言,中国左派的建立与发扬,的确需要一种具开动性的精神动力,而那似乎是要有一种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与现实的一种理论性自觉,也就是对中国(人)的认同与承担。简言之,“中国左派”可以而且应该与世界共论共践,它要敞开大门面向世界,是普世的,但建立与开展则是民族的责任;责任是要有人承担的,从而从不曾是“普世”的。

其二,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中国左派与中共的关系?中共要革命,不能像自由派一样纸上谈兵,必需要接地气近人民,这是毛和王明等共产国际派不同的地方。贺照田在

这场研讨会里也指出了“左翼知识分子”相对于胡适等的启蒙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在历史之中的革命活力。但话说回来，中共似乎并不曾在理论层次上圆融地把“地气”或“传统”给充分言论，从而形成一种形式与内容和谐相洽的“中国左派”重构。举个也许不甚妥当的例子来说吧，天安门前到底摆不摆孔子像，似乎不只是一个举棋不定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圆融论述的理论问题。

中国左派无法绕过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历程，这是肯定的。但它会倾向于认为中共的斗争是中国长历史进程的一个现当代展现而已；必要而非充分。由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的身家记忆情感被卷进了这个既丰富又痛苦的革命进程中，对于“左派”的论述有太多历史的包袱，台湾的知识分子反而可能正因为没有包袱，从而可望更可以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挥洒论述“中国左派”。若是提到中国左派的思想资源，以我自己的浅薄印象，中国左派的思想系谱似乎可以上接鲁迅（文化偏至论）、章太炎、王阳明，一直到先秦儒（礼运大同）与庄子（齐物论），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非民族国家、非资本主义的想象，是对断碎世界、断碎人生、断碎知识的超越，有潜力重构知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并重新激活“主体问题”的想象。在如此理解与定位中国左派时，它首先（如非仅仅）是一知识计划。

二、作为一知识计划的中（国左）派

如果说中国左派首先是一知识计划，那就无可避免地要自我厘清它与诸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等）之间的异同与距离关系。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纯粹学理”性质的知识计划，而必然是高度政治性与现实性的。它必需要把“面向大众”“介入现实”当作知识计划的要素。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名”的问题。在台湾，因为殖民高压统治、白色恐怖的清剿以及国府近现代史教育的畸形，“左”与“右”在常民政治生活中并不曾确立过任何现实有效的所指；它们不是政治词汇。事实上，不像在西方在第三世界在中国大陆或几乎在全世界，左和右这两个字在台湾，对一般大众而言，是一个没有历史与政治内容的能指，大概仅仅在小众圈里有某种封闭性的文化意义吧。大众根本不在意一个政治人物、一派政治力量，或是一种政治论述是“左”还是“右”。事实上，整个以启蒙为框架或基调的政治论述，在台湾都找不着它们的耳朵。换句流行话说，它们接不了地气。2006 年，台社曾以“民主左派”或“自主公民”等话语介入红衫军运动，但都像是在嘈杂的市集中的寂寞的风铃般地失败了。因此，一个被现实所导引的思考会是：如果我们不想把关于“中国左派”的思索完

全限制在这个小小的菁英的论述圈中，那么“中派”会是一个更好的名，比较能“接地气”，与人民大众首先能产生活语上的亲近性。独派民众也许反中国，但他们不会反中道、反中庸。在中文语境里，“中派”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可以被想象为是对于党派的、褊狭的、僵固的彼是？二分定势思维，有一种超越的想象。当然，现实语境内，“中派”这个名不得不让它产生一种与台派对立的印象。但这也有好处，能迫使中派政治化，卷入现实，但坏处是要避免的，也就是要避免在一中一台的意识型态对立之下，把中派本来作为一个有知识与思想野心的格局拉低。

因此，虽然“中派”作为一个初生的、有各种可能性的概念，不完全等同于多少有些系谱连绵的“中国左派”，但在很多情境里，和“中国左派”也不妨可以是交互使用的概念。理想上，“中派”能够形成一种学术思想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回路，出现一种“人民的中派”，再回过头来影响中派的学术，巩固并扩大一种“学术的中派”——这是中派的两翼。而若以“中国左派”之名，恐怕将注定最多只在小小的读书界里内部循环流动。

那么，作为一个知识计划，中（国左）派的抱负与困境为何？

作为一个知识计划，中（国左）派在形成它自己时，不可避免会以西方知识传统为一

种对话对象或使力点。例如，中派会质疑那种非得以个体、公民、“社会”、民族国家，“阶级”、进步时间观，或抗争性自由理念，为必要认知要素或架构的学术思想操作。历史地看，这个质疑并不是来自学术游戏的欲望，而是来自我们自身在企图解释当代台湾社会时所遭遇到的困境：西方概念、理论或思路的不适用、削足适履，或不接地气（即，知识生产只是在学术圈内部循环）。因此，我们是在西方概念的惯习操作运用中，渐渐产生了一种不适甚或无效的自觉，一步一步地艰难地反省，走上“中派”。这是我们这一辈的经验谈，说出来，不外乎是希望青年们的冤枉路能够少走些。

中国左派是左派，是因为仍然还乐意共享左派的某些视野，例如，我（们）相信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生产力、生产关系……）是能部分说明中国——我们并不像右派一样自满于对它的亟亟否定，猴急于帮马克思主义盖棺材板。但关键是，中（国左）派同时认为：这些要素也要被“中国”说明。洋左（甚至某些土左在某些时期）倾向于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解释东方、中国乃至国民党的统治，但中（国左）派与洋左之不同，就在于前者不打算简单地、学舌地，以阶级或没有阶级来解释（包括台湾的）中国历史与社会。同理，更不打算以市民社会或缺乏市民社会来解释中国，或因此之故，台湾。

因此，我们在鼓励青年时，也必须要诚实交代我们所经历的困境。“中派”的最大困境是来自于，我们习惯于使用西方语言、概念、语法来表述我们所叙述的“现实”，我们想要逃脱，但我们（目前）并没有一种真正可说是“中派的”语言或语法。在一种不得不是西式的语言和语法中，以此为不可逃脱的现实，追求更贴近我们的状态的新语言，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好比，如何找到更适当的语词及话语来更好地说明在中国的“国家”“社会”或“民族主义”？

“邯郸学步”是中派的思想抱负之后的一个立即可见的危机。

（跟前面的“首先”离的太远）由于很多原因（包括没有具体细致的对中国的研究的累积），中派的知识野心往往变得太大，所欲重新评估的不仅是思维认识、概念理论，还包括规范价值。这不可避免地会让中派的论述可能过于抽空。这很矛盾！我们一方面因为西学不接地气而走向“中派”，但另一方面，“中派”似乎又把我们导引到一个经常被否定地谓之“传统”的遥远过去，这对于缺乏历史感的、对自身文明文化不同程度“文盲”的我们，是有心无力的。例如我们很羡慕，好比这场研讨会里，孙歌所精彩评述的沟口雄三先生的毕生努力；特别是他企图找出中国文化的“基体”以及中国历史运动的“矢量”的努力。

但这样的努力，对于我们这些完全隔离于祖先知识家底的不安的、事实上的西化知识分子而言，又很无力。我们侧望台湾的文史哲界，似乎也找不着能理解我们的苦闷的同行；总觉得他们的“中学”经常是“以西方为方法的”。

我们的眼找不着我们的手。因此，第二个危机是如何不陷入一种“眼高手低”。

但是对这个危机，我倒是有有一个关于出路的思考。如果说，中（国左）派的“中国”，其实意味着“接地气”，那么“地”就一定得是“地方”，某种特殊性或特定性。地气如河，有源有流，“中派”如果在知识准备上无法从源开始，那就不妨从流回溯，也就是多接触此地共时的人民百姓，与他们多学习，理解他们的沉默、失语或寓言；这或许是另一种版本的“向人民学习”。这里仅举一例：我们如何能理解那些赞成死刑的大多数的沉默的老百姓，尽管他们硬是不接受你那一套西方道理？这里牵涉到的一个认识前提是：人民是传统的一种载体。放弃这个前提，那中派就有可能落入国粹派或保守派的“中国”想象中。“人民”当然有其二重性；他们的“进步”与“保守”是复杂共构的（暂且用这两个词汇；中派对于何为进步与保守的问题，应该要抵抗一种教条的清晰与确信的姿态）。向人民学习，因此是一个全新的、没有依傍的学习经验。这或许是中派作为知识计划的

最复杂的一部分！

但我们这些人都快届退休之龄了，这个工作起头得太晚了，而之所以一直没有起头，又是因为受到西方的学术与政治的霸权的惯性制约。所以，无论是叫中国左派或中派，现实上，它首先是向有主体自尊的青年人发出的思想邀请！如果你安心于当一个庸俗自由派或普世社运派甚或教条马克思主义者，那当然没有接地气的问题——既然有了西方的“天圆”，又何必还操心于中国的或任何空间的“地方”呢？中派从不是要放弃普世的天理、公理的追寻，但是，这必需要建筑在一个和“地方”的深刻互动过程上。

由于中派作为一个知识计划，所欲立者大，因此论述经常不可免的是在好比，天人关系原理、政治组织原理，与道德宗教知识原理等“元层次”上进行，从而让它不得不看起来像是某种“大文明的左派”。这个姿态在人类的将来也许非属必要，但在今天，这个姿态是可取的。在一个“犹太—基督教—自由主义”的西方文明霸权下，是应该鼓励“伊斯兰派”“印度派”……的多元并陈，以促成真正意义的现代多元世界。

但一个问题反覆地又被唤醒了：“中派”要如何才能“还是中国左派”？“左派”是一个现代性产物，意味了对政治经济学旨趣的一定关心、对于社会压迫与不平等的敏

锐——这是左派的本初。对于这些“社会性”议题，中派要如何能维系一种介入？不致失去话语权？如何面对两岸？如何面对大陆的“新工人”？如何面对区域经济整合？如何面对 TPP？如何构思新的政治与社会制度？……这些议题。易言之，中派的思想挑战也包括了要如何产生一种中派的“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专注于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重新认识中国”，是否仅是在认识论层次上磨刀，而忘了砍柴呢？果如此，那这个中（国左）派不就是与这一百多年来，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这块大地上的具体存在的“中国左派”运动失去了历史联系了吗？值得提问的是：中派应该要和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体论旨趣寻求一种关系性吗？

尽管有这些问题浑沌未明，但我仍然认为中（国左）派的提出，虽远远还达不到提出一个中派的政治理论或社会理论目标，但至少已能指出某种“西方左派”的无效甚或反动。先前，台社的，或某种社运的流行立场是“不统不独、支持社运”，企图把“中国”问题扫到“社运”的地毯下，并把这样的立场自我恭贺地称为“左派”，尤其是一种“新左派”，以别于陈映真等的“老左”。今天的中派至少要与这样的“左派”划清界限——尤其是太阳花之后，因为这样的“左派立场”已被台派霸权的新情势所收编了。

第三个危机因此是：如何“不忘本初”？

三、中派的阳谋

“中派”是不是统派？是的话，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统派？我们的工作位置在哪里？我想“中派”还并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中派不是政党，不需对此表态，虽然个别人的情感上是反独、反帝、反殖，将“中国”作为参与奋斗的对象，但目前无法也无必要作超过自身能力的表态宣说。中派的目前近程目标 (end-in-view) 是松动独派、台派的知识霸权，使“中国”成为一个知识的合理探究对象，使“中国”成为一种方法。而将“中国左派”内在于“中派”所造成的一种知识感觉，是让我们得以和其他据说也是要“重新认识中国”的思想趋势有所区分，例如一种文化主义或儒教主义的“重新认识中国”。

再说一次，我们首先企图针对的是有知识自尊与思想野心的知识青年，期望大家共同调整一种已经走不下去的知识感觉——这是我们的阳谋。

一个中（国左）派在他的政治感觉与道德情感上，免不了是一个，暂时这么说吧，“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企图“救亡图存”，但“救亡图存”所救的不只是土地家园以及政治共

同体，也包括了身份、心灵、主体性、思考感觉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救亡图存”决不是以变成他者而取得被承认，以活以存。最近重读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我鲜明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的、台湾的也是第三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陈映真，他所争的核心之物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所争的那种主体性与尊严。而我并不认为这种心灵动力可以被今日已经污名化了的“民族主义”所能适切表达的。或至少，这种民族主义和独派或台派的族群民族主义是鸡兔不同笼的。

“中派”不是一个干净词，在台湾尤其是。但不干净正好反映了它的发展潜力。像自由主义多整洁啊，但似乎已经冰冷如尸了。所以，最后，“中派”要向所有不愿意在干净清楚同时也是简单童蒙的框架下思考问题，做学术的朋友，尤其是青年朋友，提出邀请，共同参与这个政治虽不正确但却是在追求主体尊严且有广阔知识挑战能量的知识计划。

2015/10/30 初稿于重庆

2015/12/09 修订于台中

派 中国 / 左

卡
维
波

一、统派、台派、中派： “中国 / 左派”在台湾

这场综合讨论的主题为“中国 / 左派”。这个题目有很多面向，例如，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究竟和左派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左派所设想的中国方案，与儒家的、自由派的中国方案有什么关系？上述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问题对台湾有什么意义？又对台湾的统派政治有什么蕴涵？这场综合讨论以及本文或许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企图开始在台湾脉络下展开相关思考。这篇文章考察“中国 / 左派”关系的蕴涵乃是针对台湾统派（左统、右统、新统）之间关系的思考。

台湾曾流传所谓“统左”与“左统”的区分（“统”指中国统一），字面含意则是争论统优先于左，还是左优先于统，这隐然就有中

国与左派之间的张力：据说左统倾向于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认同，而统左则接受后三十年的发展。不论统左 / 左统之分有无实际对应，这样的概念区分还是有意义的，只不过现在外界多以“左统”泛称之，为了讨论的简洁，因此以下我不特别区分二者。

台湾既然有左统，当然也有右统，特别是近来有年轻一代的政治明星投身在右统的阵营中引起注意。所谓右统，源自“反共不反中”的政治立场，在冷战后与台独兴起的环境下突出其国共和解、两岸统一的主张，其核心则是对中国（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而非左派或共党的认同。某些右统所诉求的政治符号都曾是压迫左统的白色恐怖，因此左统与右统的矛盾是突出的。

最近台湾的《中国时报》社论认为，左统与右统因为历史恩怨、意识形态而终究无法

调和，因此不认为这些互相对立与力量分散的左右统派能实际发挥作用。《中国时报》从而寄希望于逐渐众多的两岸经贸往来之受益者，认为后者由于生活方式与事业发展而与大陆形成命运共同体，乃是务实的“新统派”^[1]。然而，新统派如何从“自在的”新两岸共同体走向“自觉的”存在、主动积极的认同（包括政治意识）？或曰：由于台独的反中仇中必然会转向寻求内部的敌人（亲中卖台），因此其敌意与排斥可以催化新统派的自觉意识；但是我认为其前提还是在于有“旧统派”的媒介作用，提供自觉所必要的意识形态、政治路线与“内部敌人”的具体想象。

无论新旧统派，最终仍都需要一个不同于台独的“中国想象”。然而“想象”不仅仅止于中国的事实现状，还要包含（建立在中国的历史道路）中国的“可能性”（潜能、愿景等等），因此还是要回到各派对中国方案的设想、对中国的认识。更详细地说，由于台独采用的是现成既定的中国想象，而其对中国的想象不仅基于当前台湾或国际媒体与学术对中国现实的呈现，也有冷战或更长久的历史根源与投射，且几乎构成了整个台湾主流对中国的认识。相对的，统派话语因此历来都必须包含对于中国的重新认识，1970年代海外的“重新认识中国”运动与香港的“认识祖国（关心社会）”运动，均皆如此。对此，我再多说几句。

台湾在政党政治上有所谓蓝绿之分，在更根本的层次上有统派独派之分，近年则出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台派”。如果说独派相对于统派，那么台派呢？我认为台派的出现并非偶然，这名称是在两岸实现三通、中国崛起态势益发明显之后出现的。台派把“台湾独立”的重点从“独立”转换到“台湾”，俨然自居为台湾的化身、代言。如果说独派相对于统派，台派便是相对于中国。台派所营造的是：中国是台湾的天然敌人他者，台派（台湾）就是“天然独”。台派因此依照着它所想象的“中国”造出相反相对的“台湾”，台湾与中国是清楚绝对的二分：不但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也不是台湾的一部分——台湾内部不能存在中国，必须去除“中国因素”。

台派所化身的台湾，理应代表全体，包括蓝营在内，因此所谓“独台”必须整合到“天然独”之内；易言之，台派如果有什么知识一政治计划的话，应该是要整合台湾为边界清楚的整体，绝对与中国二分。但是它需要克服几项困难：首先，台派在政治上徘徊于中华民国与台湾共和国之间，既无法爱中华民国又无法扬弃中华民国；既然无法确定爱国主义，也就很难整合蓝绿、整合台湾。其次，其现有的公民政治无法处理在台湾的中国人、中国因素，甚至连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也是纸上空谈。至于在知识计划上，多年来

台湾号称走向本土或本土化，学术体制也已经逐渐脱离在地知情人或买办角色，但是在基本的知识框架上仍无法摆脱知识殖民的处境，而是学术代工或（骄其妻妾地）融入西方知识生产的一个分工环节，因此积极拥抱普适的文明进步主义，期盼能够表现青出于蓝，比西方还文明进步，与其说是为了实现世界主义的公民政治，不如说是为了能被西方视为友邦家从。不过，普适文明等等这些也都是外来“知识政权”，对于立意要摆脱“外来政权殖民”的台湾台派，却没有积极地在知识上去克服这些外来“知识政权的殖民”，因此只好自诩“空白主体”（台湾后殖民辩论中出现的名词）——因为既不愿继承中国文化，也没有自身传统的底色，只能自诩空白而任人挥洒。

台派虽然没有真的实体，但是台派和香港“本土派”一样都以中国想象来建立自我。这个“中国”的起源大抵都可以回溯到西方18世纪下半开始做为西方话语知识对象的中国，是个缺乏哲学的汉学研究对象，也是个缺乏法律的、契约的、市民社会的中国。这个中国话语还嫁接了在这之前针对伊斯兰、奥斯曼帝国的东方主义，因此接续出炉了中国文明停滞论，之后有日本的中国种族退化说，冷战时期的东方专制主义，最后海外反共者则加上缺乏华夏精髓的中国，以上种种造成了主流眼中今日欠缺普适文明价值的中国。

面对这种台派与香港本土派话语下的中国，左派或统派要如何论述中国？如果只宣称“中国是个假问题，其实只是阶级问题的转移”，那也只是一失语而已。毕竟，台湾统派所主张的统一之正当性如果只能从普适性质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普世价值等等而来〔例如，“当两岸都实行普世公认的自由民主〔或社会主义〕时便可统一”〕，那么这是一个没有中国的台湾统派。这终究也是一种变形的台派。

说台湾统派没有中国，可能过于严苛，各个统派应该都是有“中国想象”“中国问题意识”的。左统的中国是建立在两岸无产阶级联合的社会主义中国（阶级国家），右统的中国则是建立在传统历史文化的中国（文明国家），新统的中国则是建立在现实经贸与日常交往的共同体（民族国家）。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左统派有没有话语来容纳非左派的台湾统派？撇开双方在历史与政治上的分歧等等，两者是否永远处于互相排斥的关系呢？第二，从民初中国左派诞生起，和当时其他左右思潮与运动一样，都有着“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意识，显然当时无论左右派都有很清楚的中国主体，在中国与左（右）派的主—客关系里，中国不是处于客体的位置。那么台湾左派在这一点上是否不同于中国左派？有一种台湾左派便是要建立自身的主体性，而

不是要建立中国主体性,虽然这未必就等于“左独”,但是由此可以看出以主体性或主—客关系的语言来谈“中国/左派(统派)”可能会衍生台湾主体性问题,也就是“中国/台湾”的政治问题;故而中国/左派关系或许也是对“中国(大陆)/台湾”关系采何种取径的隐喻。

为了解决统派所面对的这些政治难题,我在第一届“重新认识中国”会议不从政治角度而从知识角度提出了中国派或中派的概念,“中派”不从政治角度的主—客关系来论述中国,不是主体化中国(也不是客体化中国),而是理论化中国,在不同的领域或问题上尝试看到(一)中国特殊性所内涵的普适性,或者(二)普适理论无法涵盖的中国特殊性。^[2]在这样的知识生产之中国转向里,并无政治中国与历史文化中国的区分,也就是拒绝民族国家与文明文化的二分;其蕴涵之一便是思考:有无可能统一台湾左派与统派的中国想象?能否趋同台湾左统与非左统派的中国认识?中国派初始的工作则是批判地接合今日大陆学者对于中国的思考,让台湾的中国论述与大陆的自由派、左派、儒家的争议结合,同时也让大陆的争议各方都能看到台湾的中国论述之相关性。这应该是“重新认识中国”的第一步。

这篇文章要考察中国/左派的三种关系,其蕴涵则是针对了台湾的左统(统左)/右统/新统的异同分合,因为当我们考察中国

与左派(左统)的关系时,也等于连带考量了右统与新统在这个关系中的定位。一般都认为左统与右统的对立来自左右之分,一致之处则来自于“统”,但是这些不同统派所欲统一的“中国”是相同的吗?如前所述,左统的中国想象核心是社会主义中国,右统则是传统中国或历史文化中国,新统却是现实中国。三种统派的中国想象是歧异的,他们的中国认识是分裂的——或许中派的重新认识中国之知识计划有助于中国认识的统一。再者,左统或左派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可(recognition),是否仅仅来自社会主义而非中国?右统或新统对于“中国”的认可也有类似问题(因为他们的中国认识都是分裂的,认可的都是中国的某部分表现——认可文化博大精深、认可经济强盛等等)。不同统派的这些认可差异,是它们除了领导权争执外,在政治上分歧的来源。另外,在一些问题上(如经济、文化等),不同统派的本质认同或核心承担是不同的(例如,左统对于经济平等、右统对于文化传统……的本质认同或核心承担),或者不同深浅程度的认同与承担(亦即,认同但非本质认同、承担但非核心承担);再者,不同统派有不同的专门擅长;这些差异既是分歧、也是互补的可能来源,端视我们能否从实用的角度使这些差异共存。

二、中国 / 左派的三种关系

以上铺陈了当前中国与左派（左统）、右统、新统的现实政治纠葛，但是这篇文章不会直接去处理这些纠葛或给出明确的政治方案，因为在没有松动人们的许多信仰假设前，直接的政治倡议徒然制造立场的壁垒。接下来我要借着厘清中国与左派的一般性关系，来逐渐开展中派的知识—政治论述，特别是左统、右统、新统的可能分合。

为何要处理一般性关系而非“历史”关系呢？邱士杰曾论证台湾的左派在历史过程中与统派是合而为一的，是中国的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何他认为无须区分左统或统左的原因。不过，历史或事实都还需要上升到一般性才能产生“可能性”，才能使历史在当前现实里发挥作用。如果只停留在中国 / 左派的历史关系或事实关系，那么便无法从过去走向未来，从现实走向可能。对于寻求不同统派、不同左右立场的“中国共识”而言，考察中国 / 左派的一般性关系还是必要的。例如，王明与毛泽东是否都是中国左派呢？赵刚在前面文章中认为王明不是。但是无论如何，对王、毛二人而言，中国与左派的关系是不同的，如何描述与解释他们的不同，就必须从（个人）历史上升到更一般性的范畴。不过，一般性的抽象关系理应建立在具体的历

史关系之上，限于我的知识研究，恐怕无法在这篇文章达成如此完整的目标，故而只能在此以较为抽象的方式来做一些知识面的铺陈。

中国 / 左派的关系常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来概括，但是这至少有三种理解方式：一种是中国在实践马克思主义方面具有主体性（主—客关系）；一种是西方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做为一种普适的学理学说怎样应用到中国的特殊情境（普适—特殊关系）；最后一种则是中国为体、马克思西学为用，或者反之（体—用关系）。中国 / 左派的这三种关系（主—客、普适—特殊、体—用）分别对应了政治角度、知识角度、实用角度。最终我要说的是：政治角度涉及的左右领导权争执与认可麻烦，可以从中派的知识角度来寻求新的共识，并且以实用角度来发挥不同统派的专擅能量。

我将先从主客关系谈起。由于左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着西方现代的先进意识与运动，左派可以说是改造中国的支配主体，然而在改造中国过程中，左派又似乎必须成为被迫适应中国现实的客体，这种互为主客是过去常见的修辞。然而，主客关系必然涉及左派不太谈的承认或认可斗争，也就是客体要反客为主、寻求另一主体的承认（亦即，要求承认“我不是客体，而和你一样也是主体”）。毕竟，无论是否互为主客，中国一直有被贬抑的印象观感（这往往是做为客体的表

征)，因此，从细微的“中国人不文明”到更广泛的中国认可问题（例如诺贝尔、奥斯卡、世界经典、奥运、洋娃娃等等西方界定了人类各方面的卓越），或现在所谓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或者缺乏民主自由、社会歧视弱势、传统在现代无用且落后等等。这个认可问题动员了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感，或者对普世价值的选择，或者对丧失传统文化的焦虑等等。虽然我们可以口头上宣称中国与左派互为宾客，但是左派所能建立的中国主体性，其实往往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主体性，或者中国人民（人民民主专政下跨阶级的“分享”主体性），而没有中国文明文化或中国某些特殊性的主体性等等，亦即，左派与其他派别没有共享的中国主体性。当前左派思想与理论中缺乏直接建立这种共享的中国主体性的资源，无法满足认可政治的完整需求（即，认可“中国”为主体，而不只是认可中国的单一面向）。然而，就算左派建立了共享的中国之主体性后，左派是否丧失了自身的身份认同？（中国）左派因而陷入两难。

其次，我将从不同于主客关系的普适—特殊关系来谈中国与左派：中国与左派，哪一个普适，哪一个特殊？或者两者都是特殊，或者都可能在历史过程中上升为普适？这涉及中派所说的“中国”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知识范式竞逐，但是却不直接关乎主—

客关系所导致的“领导权”（左统、右统、新统，谁领导谁？）与“认可麻烦”（对中国不同面向的认可或不认可，以及建立主体性所带来的身份政治纠葛，也就是为巩固自身主体而进行的排他性认同，或者为扩大主体疆界而丧失自身的认同）。这是以普适—特殊关系谈论中国/左派的优点。中派的知识计划如果先从知识范式的转换开始，重新认识中国、重新界定中国左右派，或有可能改变中国/左派、左统/右统/新统的政治想象。

最后，现在似乎有迹象显示大陆官方要更趋向中国而非左派，偏向中国传统文化，淡化社会主义，更重视中国的认可问题。那么社会主义或左派的未来是什么？一些智库的谈法又是如何处理中国与左派的关系？其中值得注意的提法是体—用关系，深究之后将会发现：意义含糊的体用关系提法之所以尚有新意，乃是区分领域的后果（体—用或许是传统提法，区分领域则是现代性的特征）。我会在文末讨论何以这是实用的角度，以及其对台湾统派的蕴涵。

以下我就逐一谈这三种可能关系。

三、中国/左派的主—客关系 (与“认可麻烦”)

在这一节里我要说的是：虽然主—客关系

不必然固定而可能权力流动、主客易位，但是却必然有认可斗争，也就是建立主体性的斗争。为了建立主体性而巩固主体边界，认可因此涉及了排他性的身份认同，这确实是个“麻烦”。而左派（特别是缘起西方左派的理论）则缺乏话语资源来建立中国（文明、传统）的主体性，解决中国的认可麻烦。同样的，右派或者自由派、新儒家等也只能建立中国片面的主体性，这样的片面性或者导致了排他性的中国身份（例如排除了许多看似反儒家的现代元素），或者因为扩大主体疆界（例如吸纳了许多西方现代个人自由主义文化）而有丧失中国身份的焦虑，也陷于认可麻烦之中。

主客关系是指主体支配客体或者客体去适应主体的关系。在主客关系里，一般的印象观感是：“主”能够保持其主体核心大致不变的身份认同（同一性），可是“客”却因为要适应而改头换面、丧失主体性。中文讲的“橘逾淮而为枳”就是主客关系的一个极端例子，橘为了适应淮北而变成了枳，这未必是说实际上淮北的地貌与气候长期下来没有因为生长枳而改变，但是主客关系的认知最终还牵涉到强势的支配（力量或权力），而不是变化与否的问题。中国 / 左派的关系有着更大的背景，那就是中国的西方化或现代化；而人们之所以认为现代与中国的关系是主客关系，正是因为人们主观地觉得西方现代是强势支配中

国适应现代的过程。这当然也是帝国主义问题。

对中国现代的理解，以“冲击—反应”之说（即，西方现代的冲击使得中国不得不现代化）最为明确地表现了主客关系，而这说法最符合印象（或许事实）之处就是西方现代的全球强势支配。当然，我们可以反对冲击—反应之说，而提出（例如）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是因为中国传统原有的大同思想；也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上半有自主意识的道路选择、与底层群众的互相启蒙（贺照田有精彩论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的现代化的资源则是至少明清以来许多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改变等等——这是所谓“在中国解释中国”的历史诠释策略。不过这似乎无法否认中国是在西方的强势支配现实下做出适应与改变，也就是说，中国因为在西方现代的结构力量下，不得不救亡图存，走上左派路线。

传统的左派思想比较强调结构的（最终）决定力量，也就是科学的、不以人主观意志为移转的强制。但是当代偏向后现代的批判思潮则认为：一面倒的、纯然压倒的主客权力关系（例如，中国单方向地被现代化），毕竟夸大了结构的独霸，也就是夸大结构决定力量的全面性以及忽略结构内部的矛盾，甚至忽略了被支配客体的能动与抗拒、挪用与转化、反客为主的可能等等。事实上，倾向后现代

的左派对权力有不同的理论理解，因而主张主客关系有其飘忽不定的性质（所谓权力流动），一方面有看似客观的强势支配现实，也就是所谓结构性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有局部脉络里的颠覆反转、反抗主体的能动。

可是无论主客或权力关系如何地不稳定或流动，主—客必然蕴涵着现实政治领导权的斗争以及认可的斗争。在今日，许多左派或自由派都会非难中国的认可斗争，认为遮蔽了阶级问题或导向民族主义；而且认可确实是个麻烦——因为争取认可往往需要同时维持与描述一个稳定统一的身份认同，而在寻求稳定统一的中国身份认同过程中往往会表现出形形色色的排他性，例如忽略少数民族的中国身份，或者坚持某些道德行为与伦理价值的中国身份，或者激进反对/坚决拥护传统文化的中国身份等等。

认可问题当然不是中国身份独有的问题。在当代我们看到形形色色要求被认可的身份认同构成了当前（如性/别或族群）社会运动在要求重分配的左派政治之外提出的另一项重要政治要求。有些人甚至将之提高到正义的层次，宣称除了分配正义之外，还有认可正义。第三世界有色人种及其文化文明的认可要求也被认为有正当性，甚至分离主义往往也会以认可斗争为其核心。传统左派的一般倾向是否认“认可政治”可以和分配正义相提并论，

因为传统左派强调物质基础，认为认可仅仅是次要或衍生的。不过，正如很多人指出的：“要求认可”并不是孤立的，而可能同时有其他附带的运动与脉络，因而对所谓物质基础的斗争也会产生影响效应。在我看来，认可政治不仅仅和分配政治有交集蕴涵，左派的分配政治甚至暗含了认可政治，就是要建立和分配相关的经济—阶级的主体性；所以，左派也有认可要求，例如要求认可的是中国的经济—阶级面向，而不是中国的文明传统面向。

由于认可要求往往附带了具有排他性质的身份政治，因此有些解构倾向的左派力图解构稳定统一的身份以化解认可要求。这看似是针对认可麻烦的一条思路或出路，但是如果对身份的解构只是纯粹理论操演，也就是对于身份认同进行近乎公式化的解构操演，把所有身份认同都同一化、去历史化（例如将所有民族身份都解构），这显然是不足的。毕竟，我们在当代的各种社会与政治运动里都已经看到认可政治的复杂性：要求认可，可能是巩固一种排他性的身份认同，也可能是扩张一种吸纳性的身份认同；可能是一种去历史的身份认同，也可能是恢复被东方主义化的身份认同。更何况，左派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往往是拒绝被解构的——君不见左派的派性坚持是很常见的。

当前中国的认可政治还有其特殊的复杂

性。例如中国的要求认可究竟是认可与西方同等价值，还是与西方不同价值？还有，认可政治很多时候是关于文化文明的评价，但是今日中国主流话语却倾向于符合西方经济发展价值的认可要求，想要因为GDP等等而被认可。有些左派虽然批评中国的经济制度向西方价值看齐，但是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文化文明不向西方价值看齐的倾向则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这样的字眼往往就构成了自动否定的理由。在这方面类似的是，当前不仅仅有港台右派，还有港台多数的“本土”社运左派（或自承左派），他们不认可中国的理由都是因为中国比不上西方现代文明，例如中国政治与社会文化、西方所代表的普适价值不同，或例如中国放弃了或没达成西方现代的进步价值（像西方新左派文化所揭示的价值）。港台右派自然在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都追求西方的主流价值，但某类左派虽然在经济领域里追求非西方主流的价值，在文化领域里却拥抱西方现代或者普适性的主流价值、进步价值（因此谴责伊斯兰的反同性恋）。凡此种种，都显示了认可政治的复杂与麻烦，以及左、右、新统派在认可方面的必然分歧——这些分歧归根究底则是：左统认可社会主义中国、右统认可传统或历史文化中国、新统认可现实中国，以及由此分歧所衍生或连带的各种对中西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的认可或不认可的

复杂组合。

总之，当我们以主客关系来设想中国 / 左派时，即使我们对权力不采取单向固着的观点（亦即，领导权可能因势而流动，不必固着于左统领导右统或右统领导左统），即使我们以解构身份政治来化解认可要求，认可政治的纠葛或麻烦却终究无法避免——归根究底，是因为左派并没有足够的话语理论资源来论述中国的认可，亦即，承认与建立“中国”的主体性——这里的“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名称，也不是哪一派可以武断决定的“中国等于中国的某一面”（例如中国就是中国劳动人民、中国就是中国文明传统、中国是中国民族国家等等），而是名符其实的“中国”——故而必需追究中国（实）之所以为“中国”（名）之理，即，何以中国。因此，首先要回应“何以中国”^[3]这个知识计划的问题，才能避免武断地拟定“中国”的主体性。在中国—左派的主客关系上，尽管我们可以说，历史现实是中国改造了左派为中国所用，而不是被迫按照左派世界图景来改造中国，但是很明显的，越贴近西方左派的理论话语，便越缺乏构造与认可“中国”主体的资源，也就是无法回应“何以中国”的知识计划。即使不从主体性而从价值认可的角度也仍然躲不开认可麻烦，毕竟左统、右统与新统所认可或不认可的中国面向终究是分歧的

(例如,左统所不认可的中国新自由主义面向,恰恰是新统所认可的)。

由于“认可”和西方认识方式里的主客二元、支配克服他者的倾向有关,亦即,认可是内建于主客关系之内的,那么,可不可能有不建立在主客关系上的“认可”?下面讨论的体—用关系或许就是一种取代主—客关系的思维。

四、中国/左派的普遍—特殊关系 (与“中国作为理论”)

上面提到,在没有充分讨论“何以中国”之前就从政治角度谈中国或左派的主体性,那么不同统派不但会展现排他性的身份政治,也会有对中国不同面向的认可分歧。故而我倾向不能只从、也不必急于从政治角度或主客关系来发展中国/左派的关系;相反的,我们可以先从知识角度来探究中国/左派的关系,反思我们的知识框架,探究“何以中国”,而不是在西方流行话语、旧有的左右窠臼中谈论统派。下面我要从普遍(普适)/特殊关系来讨论中国与左派的关系,毕竟,普遍/特殊是构成知识的重要关系。

普遍/特殊关系和主客关系常被误以为是相对应的,因为两者都被想象成一方是核心不变的,另一方是被动适应的。但是主客关系真正的区分是在于主体性与强势支配,而这

并不是普遍/特殊关系的本质——特殊方可以是强势的支配者,或者特殊方可以主动地适应普遍性,而不是被迫适应的客体。事实上,有的特殊方往往因为其强势支配或主动适应,因而被误认为具有普遍性,或者其支配权力的知识策略最终成为其上升为普遍性的条件。总之,普遍/特殊关系不同于主客关系。

从普遍/特殊关系来看左派与中国的关系,或者西方现代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左派或马克思主义是普适的,而中国是特殊的。第二种,左派或马克思主义是特殊的,而中国也是特殊的。这是比较为人所接受的两种可能。不过,其实还存在着另外两种可能,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都是普适性的,或者马克思主义是特殊的,而中国则是普适的。在后两者的可能里,如果中国具有普适的潜能,那么从知识层次而论,中国就是具有理论的地位,可以解释特殊现象。在我看来,有些特殊具有上升为普适的可能或潜能,有些特殊则没有,但是这并不表示后者没有价值或没有知识方面的价值。中国可以做为理论而某些区域或国家不能做为理论,这不应该被混淆成认可政治的问题。

总之,中国具有普适的可能,中国作为理论,并不等于认可的斗争,而是重新认识世界,同时也是重新认识中国(知识生产的中国转向)。当然,认识或许会随附着认可(或者“误

认”)的成份,但是却不是赤裸的权力支配,毕竟这必须是求真的活动。(在此我约略解释“中国作为理论”:当前全球的知识生产其实是以西方现代为核心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世界、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等等,这就是“西方现代作为理论”。如果要开展与之竞逐的另类范式,以中国来解释中国、解释世界,那么需要改变什么样的知识生产条件?需要如何重新设想中国?中国具有超越特殊事实的潜能而可成为普遍吗?其知识—权力的政治为何?“何以中国”?……这便是“中国作为理论”所面对的问题,但是无法在此详论^[4]。)

下面我想用个例子来谈以普遍/特殊来设想中国/左派的关系;我想要显示“中派”的一个论旨:中国不仅是左派理论的实践或应用例子,而且可以解释左派的理论。2007年前后,大陆曾有关于“秦之后的帝制中国是否为封建社会”的争议,这个争议的背后实质和19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以及社会史论战基本相同。争议的一方认为,将帝制中国描述为封建社会,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论影响,但是中国社会有其特色,不同于欧洲的封建主义,不应该用根据欧洲的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西方理论来套用在中国。这也就是认定:普遍的西方左派理论并不适用于特殊的中国。这样的中国特色说法,看似有反马克思主义中隐含的西方中心论意味(至于马克思是否真

的是历史普适论还是历史特殊论、东方例外论、多线发展观等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个中国特色的说法否定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据与正当性,当然不可能是官方说法。争议的另一方则认为,由于专制的中央集权与封建的地方分权矛盾,有些否定“帝制中国为封建社会”的提法旨在强调中国为专制社会,其主要矛盾因此不是在地主与农民之间,而是在官僚与人民之间,这里的“人民”则包括地主。这是其与新民主主义矛盾的地方。更进一步说,反官方说法的人认为:就是因为西方封建社会的上层权力分散薄弱(不是专制),因此才发展出契约关系,连农奴都可以有法律的法治保护,这也替西方民主与率先现代化铺了路;而中国的缺乏封建主义,则成为中国无法像西方走向民主、反而走向东方专制的重要因素。最终,看似反西方中心论的(反对照搬马克思主义五阶段论),却是直奔西方中心论而去(认定中国乃东方专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关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有翻案,认为中古欧洲以降也不是过去所说的“典型”封建社会,而欧洲是封建社会的说法只是西方现代早期的建构。从这翻案思路来看,西方现代早期对发展出契约民主的欧洲封建持正面看法的论调,恐怕也含有与“东方专制”区分的西方中心论因素。^[5]

论争至此,不但中国是个特殊,其原来

参照的普适欧洲也变成另一个特殊。在晚近这场辩论里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或中共革命之历史正当性的主要辩论者是李根蟠，他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许多不同于欧洲的特点。李根蟠自问自答地说：这可能使一些学者疑惑，具有这样特点的社会算不算封建社会？如果不从欧洲中心论眼光而将中国称为变态封建社会，那么就不得不结论说：“中国封建社会比西欧封建社会更发达，更先进，更具典型意义”。李根蟠更进一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揭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欧封建领主制的更具典型意义的封建社会新类型，不能不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最后他说：“用西方某一时期形成的狭窄的特定概念量裁中国的历史，量裁中国人在实践中形成的鲜活的历史观念，才是真正的教条主义，才是‘西方中心论’，才是骨子里的‘西化论’”。^[6]

我未必同意李根蟠在这场辩论中的立场主张，但是他不经意地显示了两点：第一点是我之前说过的，特殊未必就是受西方中心论支配的客体，就像李根蟠指出的：中共革命实践在普适性的马克思理论指导下产生了自己的观念与认识，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教条。第二点则是：特殊到了非常特殊、无法被现有理论辨识时，却是有潜能上升为普遍的。中国

封建社会的非常特殊使之自成典型，从而还能成为新的普适的马克思理论，这是我说的中国做为理论的表现。但是中国之所以在这问题上有这种理论潜能，是因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比西欧长，其形成基本没有受到外来因素的重大影响，由于拥有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由于农民有较多的自主权和较高的积极性，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李根蟠）^[7]。用我的话说，中国在这问题是特殊中的特殊，必须另寻普遍才能解释。然而，并不是任何特殊都能具有成为普适的条件，中国因为是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并且中国还形成了诸如连续性等“原理”（何以中国的原理），从而使得中国有成为理论的可能。此外，中国做为理论的普适位置，并不代表中国即是强势支配，事实上，在西方现代知识范式主宰的情况下，中国走向普适，反而是对支配的超克。

在我看来，李根蟠的最终说法蕴涵着：表面上马克思主义仍是普适的，中国则是特殊的，可是中国封建社会做为典型，而且具有更新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潜能，其实已经具有普适的意义。李根蟠可能不会将马克思主义区分为欧洲或中国，但是事实上欧洲封建社会是不具有典型意义的特殊，原本建立在解释欧洲封建社会的那部分（欧洲）马克思主义，

自然没有解释中国封建社会的那部分（中国）社会主义普适了。无论如何，这显示一种可能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者简化地说，中国，可以用来解释封建社会，（或许能进一步）解释世界。

当然，李根蟠的封建社会论点未必正确，但是这无碍我们从其论点中抽绎出中国与左派（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普适—特殊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地说：中国与左派固然可能都是特殊而迈向普适，两者进行普遍性的竞逐（contending universalism），但是中国与左派也有可能都占据普适的位置而走向特殊，而形成类似西方女性主义辩论中的父权与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竞争解释。所谓“竞争解释”就是说：（例如）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普适理论各自都要去解释世界，都认为各自才能对某些特殊作出更真实完善的解释，而各自的性别与阶级范畴是最激进的，是解释世界的最基本范畴——这是特殊性的竞逐（contending particularism），不过这样的竞逐在目前实际的知识状态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解释可能各有擅长，各有不足，但是也可以互相丰富，只是还没有办法将对方纳入从属的衍生位置。这是一种理论的多元主义，其假设是世界有许多无法彼此化约从属的领域，无法从单一领域的原理去解释所有领域。这种理论多元主义的概念在宽泛的应用上，可以使

得像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或者像中国 / 左派）在知识上的分歧、政治上的冲突被悬置，彼此相处共存，而这都是因为区分了各自擅长的不同领域，亦即，各自在不同领域更能满足实际需要。在下一节可以看到“领域区分”的重要性。

不过，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都是在同一西方现代范式下的理论，都还可以统一在同一知识范式下，所以这不算是激进的理论多元主义。如今对于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如果能够不止于解构而能更积极建构新的范式，那么就可能产生更复杂的知识状态。

五、中国 / 左派的体—用关系 （与“领域区分”）

如前所述，西方女性主义有所谓“父权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二元系统”的说法，而二元系统区分了父权与资本主义各自作用之领域，例如父权是再生产领域，而资本主义是生产领域。这样的领域区分似乎就可以避开主—客关系的纠葛，不必追究女权（对抗再生产领域中的父权）在左派运动（对抗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中是否有主体性，或者左派在女权运动中是否仅为尾巴主义。不过，像生产 / 再生产这样的领域区分（或其他方式的领域区分）并不是全宇一致的，被区分的

领域也未必都是截然分隔的（在某些社会中的生产与再生产不是分隔的）。事实上，这些复杂性涉及了关于“领域区分”内同时存在的相反趋势：除了公与私外，西方现代性要求的像法律/政治/经济/美学/宗教/科学等等我们熟习的领域区分，都是以其独立自主专业等为标竿，这些领域区分使资本主义现代性更深入社会肌理与个人生命史，以及强化专业菁英社群的支配权力。如果这类领域区分不够区隔，则被视为不够专门化和现代化，有待排除领域中的传统落后因素（例如专制政治的干预、私领域被侵犯等）或“危机”（例如非营利领域被商业精神殖民）。但是晚期现代性的发展，在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等扩散之下，市场原则侵入教育等领域、全球治理以法律为工具、普世价值干预主权领域、日常生活的美学化或性化、“民主化”成为全宇原则（如亲密关系的民主化）等等，都逐渐打破了某些领域区分的分隔自主。近年来像“交织性”（intersectionality）这样名词的流行，宣告阶级/族群/性别/性/年龄/残障等等“领域”的交织，既反映了当前现代性的越界动力，也同时强化了这个动力的全宇性，促成它打破或重整早期现代开始发展的领域区隔自主趋势，这正是当前全宇化霸权的需求——将特定领域较为充分发展的权力或逻辑（可能原本就内在于现代性，如个人主义化、

理性化等等）积极向其他领域扩张应用。

前面提到的“理论多元主义”固然在知识上反映了像“竞争解释”乃是早期现代所发展的领域区分之后果，但是理论多元主义坚持某些领域的独立自主或至少相对自主，反而在此刻具有抗拒“全宇化”霸权的倾向。在理论多元主义看来，“交织性”这个概念的危险性，在于将交织性（与其道德进步主义的解决药方）当作自然与现成的常态，政治正确地强加在所有社会或领域中，于是在以争取平等、自由、民主等名义下更促进了全宇化霸权的发展，许多社会的文明化运动或女权运动的一些诉求都有这样的倾向^[6]。因此我所谓的“理论多元主义”必须在许多微妙的地方留意与抗拒各种形式的全宇化趋势，例如将西方理论照搬到其他社会就是必须留意的。像父权/资本主义在前30年的中国社会里就不会是双元系统，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根本不同之处，因此并不能清楚区分生产与再生产领域。总之，在挑战西方中心论的知识范式情况下，基进的“理论多元主义”在不同国家社会的领域区分上也未必一致。

回到中国/左派的关系，上述领域区分的策略已经出现在当前中国大陆某些智库的写作中。虽然智库的写作是以体-用关系来处理中国/左派的关系，但是我认为“领域区分”

才是体—用关系得以应用的关键。

我特别要提出的文章是署名“学而思”撰写的《论中体西用和核心价值的重构》，它多少透露出当前大陆思想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可能变化趋势。学而思这篇文章对中国与左派的处理方式表达在下面这一段：

核心价值观明确提出以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为体，以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为用；在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为体，自由主义为用。在社会主义和中华文化传统的关系上，则坚持中华文化传统为体，社会主义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也就是说，政治经济与文化价值两个领域是区分的，前者是社会主义（左派）为体，后者则是中国为体。易言之，这不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固定体用安排，而是随着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核心价值）而变化体—用的安排（注意：“核心价值”在此成为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这显然是因应了中国情境的区分方式）。当然，体用关系还有其他组合可能，例如国家治理现代化（政治）以自由主义为体，以社会主义或中华文化为用。

像上述的体—用安排就避开了主—客的

认可麻烦：体—用并不与主—客对称（体并不等于主体，用也不是客体），而且做为“用”不代表着被贬低，因为有时体无大用，而用更为重要，因此体—用没有认可麻烦。

体用本身的意义是挺含糊的，但是这种体用谈话比较是实用的角度，有别于政治（主—客）或知识（普遍—特殊）的角度，因为这里述说的体用关系并未多谈体用之间、不同领域之间的一致性 or 冲突矛盾。例如社会主义（体）与自由主义（用）之间，或中国文化（体）与社会主义（用）之间，可能都存在着分歧冲突，但是却被当作共存的现成状态^[9]，悬置了激烈的知识分歧与政治斗争，只求应付实际需要，这便是一种实用的角度。但是之所以分歧冲突能够相处共存，乃是因为区分了不同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核心价值），易言之，中国 / 左派之所以在体用谈话中悬置了分歧冲突而共存，乃在于先行区分了不同领域。再重复说一遍：体—用之分是为了使矛盾分歧能够共存，但是能够共存的关键则是区分领域，在不同领域中有不同的体用安排，以应付各领域的实际需要。

但是同样的领域区分策略却未必能适用于主客关系、普遍 / 特殊关系，因为这和实用角度的特点有关。实用角度的优点是当双方有分歧时，无需求其一致（像知识角度的追求共识），也无须不断斗争（像政治角度的追求

支配或主体性)，只要试图稳定或长期共处并存。因此在不同领域里的体用安排可以不同(例如在政治领域为体，却在经济领域为用等等)，无须追求一致或者斗争，就能应付不同领域的需要，不必贯彻主客关系，也无须穷究终极真理。

体用之分的实用角度对台湾的左统 / 右统 / 新统的分歧冲突则是有启示的。一般认为右统强调中华文化与民主体制，左统强调经济平等与反帝反殖，新统则是现实经贸交往逐渐形成共同体，这俨然有领域区分的可能。前述智库写作是从政府治理来考虑领域区分，但是台湾统派做为民间的运动来说，则可能采取不同的领域区分方式与策略，例如以左统 / 右统 / 新统的各自擅长做领域区分，以及各自的本质认同或核心承担来区分体用。例如：首先可以区分出诸如经贸交往、传统文化、理论思想、激进政治、选举政治等等不同的领域，在不同领域内，有的是左统为体、右统为用，有的是右统为体、新统与左统的合理成份为用等等。当然，具体提议还需要另文分析，且有待统派政治的开展以及重新认识中国的努力。

结语

中国 / 左派的三种可能关系所代表的三种角度，对台湾统派发展的愿景首先是从知

识角度来重建统派的中国想象，希望能够将不同统派的政治角度之差异引领到使彼此的分歧相处共存的实用角度，而能达成各领域实际所需的结果。

注释

* 本文缘起于第二届“重新认识中国”会议之综合讨论场次，于2015年10月31日在台湾中央大学文学院举办，主办单位：亚际文化研究国际硕士学位学程（台湾联合大学系统）。

[1] 社论，《统派的困境与再生系列 1——共同体概念的新统派发芽了》，《中国时报》，2015年11月12日。朱延平导演的《大宅男》（2015）非其本意地或无意识地再现了新统派的狂想，电影为了两岸市场而将操大陆口音与台湾口音的年轻人无区分地置于台湾校园生活，夹杂着大陆用语，但是没有任何解释（apology），完全不谈他们的身份出身或如何混杂，仿佛一切天经地义，把在台湾的中国因素“自然化”。类似的处理在《小时代》等电影里已经存在。朱延平创造这个无区分两岸的飞地不是出于政治意识而是商业考量，甚至为了避免些微的政治意识而损害闹剧的流畅，因此完全不触及电影中人物的身份来历或混杂过程，仿佛电影中年轻人是天然共同体——“天然统”（蔡英文曾说台湾年轻人都是“天然独”）。

[2]（一）与（二）对应着我后来说的“普遍性的竞速”与“特殊性的竞速”。

[3]“何为中国”（葛兆光教授书名）是探究中国的事实，但是“何以中国”则是要探究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之（原）理（张志强的论点），我认为这就是将中国理论化，不止于解释中国的事实如此，还要显示中国的可能性。中国既然作为“理论”，就还不是完全的“实在”（名实相符），还有待此理论的开展与检证，但是也不仅是名称而已。

[4] 可参考注脚3，以及宁应斌，《中国做为理论：中国派的重新认识中国》，《开放时代》，2016年第一期。

[5] 冯天瑜、侯建新是主张“帝制中国非封建社会”之主要学者。黄春高则介绍了不少欧洲封建的翻案文章。书目略。

[6] 李根蟠，《“封建”名实析议：评冯天瑜〈“封建”考论〉》（网络搜寻可得）。

[7] 同前注。

[8] 参见宁应斌、何春蓁，《民国愁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2）第八章、结语等对于道德进步主义的女权、文明化之动物保护，以及“亲密关系民主化”的批判。

[9] 另一篇智库文章，修远基金会的《社会主义3.0：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则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会长期共存。大抵可以看成是同样思维趋势。

大人物 思想

李淑珍：二十世纪“中国通史”写作的创造与转化

『中国通史』写作与创造的转化

李淑珍

一、楔子

宣统二年(1910),正是中国危急存亡之秋。流亡日本的报人沧江,每日与好友明水围炉相对,彻夜不眠,痛论天下大事。心灰意冷的明水不明白,在列强环伺、财穷民困、国将不国之际,何以沧江还能一派天真,坚信中国不亡。

非也,沧江解释:若中国真无可为,他只有蹈东海而死,何必继续救国事业?“吾之不忘吾国,以吾国有使吾不能忘者存也。”^[1]

于是,沧江历数中国国民性之所长:以数百万人团结为一政治团体,巍然立于世上数千年,就非任何民族可比。而“四民平等之理想”“国民自营自助之精神”“同化他族而未见同化于他族”等优点,岂不亦足以令国人自豪!总之,“我国民未尝有一事弱于人也。而今乃无一事不弱于人,则徒以现今之恶政

府为之梗。”^[2]因此,国人不可怀忧丧志,一定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

说到这里,他慷慨激昂、热泪盈眶:

微论吾国今日未遽亡也,就令已亡矣,而吾国民尚当有事焉。苟国土而为人占领过半矣,则犹当学拿破仑时代之普鲁士人。使国土而分隶于数国也,则犹当学19世纪中叶之意大利人。使国土而为一强国并吞也,则犹当学蒙古时代之俄罗斯人,与夫今日之匈牙利人。夫安有以五千年之历史、四万万之子姓,而付诸一往不返耶!^[3]

沧江的雄辩与悲愿感动了明水,也感动了万万千千的年读者。那个时代,除了“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谁还会有这么激动人心的健笔!这篇发表于《国风报》的长文《中

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让年轻人欲罢不能、热泪直流，十六岁的钱穆也是其中之一——因为这篇文章，钱穆开始长达八十年的历史研究，希望从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4]

接下来的一世纪，企图透过历史研究寻找中国未来的人，前仆后继。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写作类型——“中国通史”——也随之诞生，百年间在华人世界就出现不下六七十种著作，很快由附庸蔚为大国。《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透露了20世纪“中国通史”写作运动的创生环境。而更令我们好奇的，是“中国通史”作品本身。

我们要问：就内容而言，这些著作勾勒出中国史轮廓，分别提供了哪些不同的视野？它们是否能有效建构现代国族认同？就方法论层次而言，这些著作如何因应新时代的需要，兼顾学术客观性与文化通俗性？又如何延续旧有史学传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5]

本文将以某些共通的标准来检视六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通史作品。我们会发现，它们有相似的问题意识，却有不同解题途径。基于儒家、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立场，不同史观透过历史指出的中国未来方向极为分歧，但是彼此之间往往存有“批判性地继承”的关系，潜在的思维方式十分接近。只是，

史学界日趋专精，通史学者的道路日益寂寞。而他们的首要目标——塑造新“国民”——既与传统“天民”理想抵触，也在多元主义、全球化时代进退失据。20世纪兴起的“中国通史”，会在21世纪消失吗？这是我们最后要讨论的课题。

二、浑沌开窍——“中国通史”的出现

1. 中国无史？——梁启超与中国新史

诠释之所以必要，来自“时代断裂”所造成的“读者与文本之间的断裂”。“中国通史”所以出现，来自清末沉闷时局中“中国无史”的危机感。何以在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度，竟会出现这样的质疑？因为，传统史学为个人提供的道德鉴诫功能，已不能满足晚清衰乱之际对民族主义的强烈需求。

在传统儒家人文之教下，史学一向与经学相辅相成。经学言常，史学言变；变以显常，常以御变。孔子知道之不能行，退而作《春秋》：“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经书所述抽象难知的“道”，透过历史具体展现于人间。而光怪陆离的人世现象，借由经学的是非褒贬，而得以拨乱反正。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

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6]

即使昏君暴主、乱臣贼子依然史不绝书，但“公道自在人心”，史家对他们的身后褒贬，保证了人间的道德秩序。——这是传统史学的“经世”意义。

传统史学也帮助人解答人生困惑。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篇中，除了八书纪录制度、十表表列世变之外，本纪、世家都以人物为主，列传七十篇更占全书过半。何以人物传记会占偌大份量？因为，太史公“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要探讨治乱兴废、吉凶祸福之际，人事与天命如何拉锯；再者，“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要让壮志以终的岩穴之士名留青史，为他们讨回身后公道。^[7]“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史记》纪传体展现了人的千姿百态，让读者在历史上找到角色认同对象，也找到安身立命之道。——这是传统史学经典提供的“生命教育”。

可是，“中国果有史邪？”“于乎，中国之无史也”的扼腕长叹，却在 20 世纪初此起彼落。^[8] 身为强烈国族主义者的晚清知识分子，一方面默认了西方现代性价值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却又要拥抱本国历史传统的独特性。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紧张，他们从“历史真实”

与“历史表述”的落差找到解决之道。换言之，问题不在于传统积重难返，而在于史家未能恪尽职守，呈现中国历史的真相。^[9]

不错，对中国“历史”（history as the past）怀抱浓厚情感与信心的梁启超，也是最强烈挾伐中国传统“史学”（history as study）的人之一。更早之前（1902）他发表的《新史学》与《中国史叙论》，大破大立，前者严厉指责历来官私诸史，后者要从历史上塑造“中国”国族认同，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里程碑。

他在《新史学》这篇文章中，将当时欧洲民族主义之兴盛、列国文明之日进归功于史学。中国却不然：尽管中国史学传统丰富，从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到杂史、传记、地志、学史、史论……汗牛充栋，占了《四库全书》十之六七，可是它们却无法成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此中原因，在于中国旧史学之六个通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因此他大声疾呼：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呜呼！史界革命

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10]

换言之，“史学革命”关乎民族命脉，不是少数专家的事，而必须是全民运动！

其实，中国本来也有“通史”传统，《史记》就是二千年前的“世界通史”。^[11]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也谈到，梁武帝欲打破司马迁、班固以下断代为书之弊病，上起三皇、下迄梁代，撰有《通史》一书，为史籍标“通”之滥觞，可惜此书久佚。此后著作“通史”者，有记录典章制度的郑樵《通志》、杜佑《通典》，编年体的司马光《资治通鉴》，以及收录词章文献的裴澹《太和通选》。章氏并说明“通史”有六便、二长、三弊，其说不可谓不详尽。^[12]

可是这些对梁任公时代的人来说都嫌不足。因为，它们虽是“通史”，却不是具有民族意识之“中国”通史！

在梁启超看来，旧史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读者设定。

夫著作家必针对读者以求获其所希望之效果。故缘读者不同，而书之精神及其内容组织亦随而不同，理固然也。^[13]

可是，“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读，盖属疑问”，基本上它们是不打算让一般人阅读的。古代

官吏多半珍藏秘府之中，每朝之史必在易代之后才发布（故梁氏当时看不到清史），可见其带有半秘密性质。官吏如此，即使私家作史也非大众取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是为贵族人臣写的；司马迁《史记》欲“藏诸名山，传与其人”，是供少数学者研究；而司马光《资治通鉴》，则主要让君主及臣僚阅读。这样的历史，或为帝王养成忠顺臣民，或为好古绩学之士之谈资。至于人日常生活饮食、民众自发事业等史实，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厌忌。总之，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者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14]

梁启超时代尚无“大众史学”（public history）一词，但他显然已意识到“国民史学”之重要性；即使历史不能“由国民来书写”（history by the citizen），也应该“书写国民生活”（history of the citizen）、“为国民书写”（history for the citizen），^[15]才能塑造“新民”。

对于中国新史的轮廓，梁启超也成竹在胸。他虽未能如愿完成一部“中国通史”，但他的《中国史叙论》（1902）成为“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

带纲领性的宣言书”。^[16]他主张，近世史家要跳出“一人一家之谱牒”，而撰写“国民全部之经历”，包括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等各个面向。只是，“我国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相对于诸夏、汉人、唐人、震旦、支那等称呼，“中国”只是他权宜的命名。^[17]——“‘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无中生有”，没有比这段话说得清楚了！

一刀一斧地，他用力劈凿出中国史的雏形。有了“国名”，他还从“地势”“人种”（六种族）、“纪年”（孔子纪年）等方面区别内外，划分出“中国”与他人之不同，把动态、复杂的变化转为静态的模型。谈到时代区分，他模仿西方历史分期，将有史时代分为三段：“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至当代），则是“世界之中国”。^[18]其中“中世史”几乎涵括了所有帝国时期，坐实了某些西方人以为传统中国停滞不动的说法。他亦自知不甚妥当，可是，“中国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运动进步常甚迟缓。两千年来，未尝受亚洲以外大别种族之刺激，故历久而无大异动也。”^[19]

梁启超短短数页《中国史叙论》，对未来的通史写作留下巨大影响。许多人开宗明义就从种族、疆域、纪年论起，[如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1931）与《中国通史要略》（1946），

金兆丰《中国通史》（1937）、柏杨《中国人史纲》（1979）]。许多人则模仿任公，以汉族对外关系的变化来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如柳诒征《中国文化史》（1948）、柏杨《中国人史纲》）。不管是否在选材、分期上受梁氏影响，这篇文章唤起了中国人对“中国通史”创作的高度关注，是可以肯定的。

2. “中国通史”运动之分期

格于篇幅，本文将“中国通史”此一史学类型（genre）的出现与梁启超“新史学”紧密扣连，但必须声明，梁启超绝不是催生“中国通史”的唯一力量；他只是开创这个运动的弄潮儿之一。

“国史”（national history）观念，基本上源于西方（见下文），透过日本之中介而传到中国。19世纪末，日本学者那珂通世之《支那通史》、桑原鹭藏之《中等东洋史》对中国学者有甚大影响。^[20]与梁启超同时的章太炎（1869-1936）等国粹运动学者，也曾努力透过保存“国粹”（包括历史、小学、典章制度等），以恢复汉族历史记忆。^[21]以章氏为例，他在1900年即著有《中国通史略例》，时间还早于梁氏的《中国史叙论》。章氏试图综合中国既有史书之长，以《表》《典》《记》《考纪》《别录》等体例，融会心理、社会、宗教等西方新思想，作《中国通史》百卷。^[22]此书虽然未成，但他所提

出的“黄帝血缘论”，其后仍成为清末民初国族建构理论的重要根据。^[23]在章、梁二氏之外，大力提倡以“民史”取代“君史”、并实际投入新史写作的，也大有人在：曾鲲化的《中国历史》（1903）、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2-1906），以及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1906），即为著例。^[24]

综合言之，“中国通史”之所以能在20世纪诞生、壮大，首先是因为“时代断裂”，产生了对新国史之内在需求；其次因日本“东洋史”传入，提供中国人写作范例；再者，民族主义、进化史观、唯物史观之风行，引导新史观之建立；最后，教科书的需求及出版业之推动，则提供了学者持续投入“中国通史”著述的外在助力。^[25]

20世纪的“中国通史”写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末到1949年；第二阶段由则1949年到20世纪终，又可划分为中国大陆和台湾两个地域。

很明显地，第一阶段内忧外患不断，但它却是中国通史创作的鼎盛时期。因为，即使在推翻满清之后，“时代断裂”的问题也一直没有解决。民国肇建举步维艰，要如何透过历史定义“国家”？五四运动反传统声浪甚嚣尘上，要如何证明中国历史的意义？对日抗战，中国弱点完全暴露，又要如何在历史上肯定民族价值，鼓舞人心士气？即使写作环境恶

劣至极——藏书全毁、妻离子散、空袭不断、物质匮乏——急迫的时代问题，仍促使各种“中国通史”的作者，包括钱穆、吕思勉、范文澜、缪凤林、张荫麟等人，不只“科学地整理国故”，还对中国的种族、疆域、特质、历史分期等问题再三致意，企图透过历史诠释肯定民族精神，挽救国家危亡。

第二阶段时期，无论在大陆或台湾，国家威权都日趋巩固，两岸政党剥夺了史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自发性的爱国热诚变质为僵化的意识形态灌输。在大陆，文革时期一切史学工作几乎停止，文革之后马列一言堂的情况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在台湾，学界研究日趋专精窄化，并以此作为学术评鉴标准，大大降低了学者创作“通史”的能力及意愿。解严之后，台湾本土化日甚一日，为了抗拒中共的统战，学者往往不愿探讨台湾与中国历史的关联性，也无法建立有力的“中国通史”史观。大学共同必修课以“历史”取代“中国通史”之后，《中国通史》著作也只能以“历史系教科书”的形式延续，而难以发挥社会影响力了。

三、三类立场，六种史观

限于篇幅和学力，本文只能以六部“中国

通史”作品为分析对象，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以下将根据它们的国史观，粗略分为三类政治立场，每一类政治立场再呈现两种不同史观。它们分别是：

1) 保守主义立场：

甲. 国粹史观——柳诒征《中国文化史》

乙. 士人史观——钱穆《国史大纲》

2) 社会主义立场：

甲. 时势史观——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

乙. 唯物史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3) 自由主义立场：

甲. 人权史观——柏杨《中国人史纲》

乙. 资本主义史观——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26]

本文所以选择这六部著作来讨论，是根据几个标准：

(1) 叙述完整（内容涵括上古到近代）。^[27]

(2) 史观明确（六部作品均然）。^[28]

(3) 具学术创见（如钱穆、吕思勉作品）。^[29]

(4) 具社会影响力（如钱穆、范文澜、柏杨、黄仁宇作品）。

为了方便比较，下列十个议题，将是我们检视这些通史著作的共同标准：史学目的、读者设定、中国定义、民族立场、历史分期、国史动力、传统评价、人之能动性、近世乱源、

国族未来。各个史家的特色，就从对这些议题的不同答案中彰显出来。

1. 保守主义立场——国粹及士人史观

甲. 国粹史观：柳诒征《中国文化史》

在西潮强烈冲击下，寻找中国文化的个别性、确立中国的特殊性，是前辈学人柳诒征（1880-1956）与钱穆（1895-1990）系念的目标；不约而同地，他们都在中国的儒家传统中找到了答案。

柳诒征是清末民初自学出身、刻苦勤奋的学者，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其后主持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1948年膺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在二三十年代的史学界，与陈垣、陈寅恪齐名。^[30]《中国文化史》一书成于欧战之后，^[31]正是中国知识界为东西文化优劣取舍争论不休之际。相对于五四运动初期对西方文化一面倒地接受，欧战暴露出西方文化弱点，引起梁启超等人深刻的反省，转而以发扬东方文化为己任，更进而以儒家精神为解决人生问题的要义。^[32]柳氏之作，即可谓从史学上为国粹辩护。

柳诒征认为，研究历史，不仅是要综合人类过往时代复杂事实，分析因果，更要“求圣哲立人极参天地者何在”，以启发后学，贡献世界。^[33]因此，他在《中国文化史》中开宗明义说：“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

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此学者所首应致疑者也。吾书即为答此疑问而作”^[34]

中国之特殊性何在？虽然他列举了幅员广袤、种族复杂、年祀久远等特征；^[35]但默察其意，柳氏心目中真正能定义“中国”的，乃是唐虞哲王所拈出的“中道”：

盖其时哲王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治大字。混合殊族者以此。^[36]

换言之，相对于政治学上以“土地、人民、主权”等定义“国家”，柳氏则希望透过更具文化意涵的“德治”思想为中国定位。只是，由于政治史非该书重点，读者无法检视“德治”在中国的落实程度，使得作者所标举的理想难免有悬空之憾。

柳氏像梁启超一般，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一）自邃古至两汉，是中国民族创造独立文化阶段（相当梁启超所谓“中国之中国”）；（二）东汉以迄明季，印度文化输入，与中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相当梁氏所谓“亚洲之中国”）；（三）明季以来，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激荡磨合，至今未已（相当于梁氏所谓“世界之中国”）。^[37]

在第一个时期，他探讨黄帝制作、唐虞让国、夏代忠孝之道等等议题，根据《周官》推断周代礼制，更盛称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服其教者。力争人格。则不为经济势力所屈。此孔子之学之最有助于人类者也。”^[38]

到汉朝为止，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有宏大的气象，何以它会在第二期中衰？柳氏认为：秦以前创业开国者多为圣贤，而其后革命起事者无赖居多，他们不识治国之道，更不解文化之可贵。再者，科举之制在此时期出现，虽然可以混贵族平民之阶级，但悬利禄以为饵，大损人民人格，违背古代教育之义。加上中国缺乏宗教信仰，而自汉以降交通西域，佛教遂得以乘虚而入。^[39]

作者对佛教之传入、风行不加臧否，未以儒家立场论其利弊得失。^[40]不过，他对于“异教”的看法中立，但对于“异族”的态度，则立场鲜明，不脱汉人本位。在他看来，跨越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宋、辽、金、元、明等政权，长达一千四百年的国史第二期，是“异族蹂躏中夏时期”，但也是“异族同化于中夏之时期”。论及元魏、辽、金、夏、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他的重点多不在于各族之创制，而在于他们之汉化。^[41]

进入国史第三期之近世，与上世、中世有三点不同：其一，东方文化无特殊进步，

西方文化输入别开新局；其二，从前中国屹立于四裔诸国之上，此后则与世界各国并列；其三，大陆的历史变为海洋的历史。^[42]他从元明海上交通开始谈起，除了介绍国内发展之外，还透过西教东来、西学输入、国际贸易与鸦片之祸、外患与变法、译书与游学、机械之兴……等主题，全面性地展现了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政治、文化、法制、经济上的冲击。

不过，虽然柳氏以“欧美之发明机械”为“近世事变最大一因”，^[43]但他并未把中国近世衰败尽皆归咎于西力冲击。在他看来，清乾隆中叶以降内治极腐败，“虽无外患。亦无以自保”，不可怪罪外人。^[44]那么何以清代中叶以后政治如此不堪？柳氏并未在“专制恶化”或“异族统治”上作文章。相反地，他别具只眼，认为清人称颂之“地丁摊粮，永不加赋”政策，其实弊端重重：它使国民自此排斥对于国家之赋役责任；国用因此恒苦不足，不得不开捐纳、征厘金、借洋债；而官吏薪水也不敷生活，遂使贪污之风不可收拾。^[45]

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中国还有一个先天的困境：自秦汉以来不断开边，至清初开拓更达于极点，可是幅员既广，各地文化相去甚远，破裂易而整理难。“非有特殊之才德。及适当之法制。而又值群众心理厌乱思治。能以向心力集中于一政府者，未易统治此泱

泱大国也。”^[46]

从以上历史分期看来，读者可能会感到，柳氏似乎和传统儒者一般，有美化三代、厚古薄今之嫌。然而，由于受到崇尚“进化论”的时代风气影响，通观全书，作者时时不忘“进化”二字，以证明中国文化在各阶段都有其正面意义。譬如：战国固然穷兵黩武，但也是极平等极自由之时。九品中正制度虽然造成阶级之分，但好处是地方绅士可以抵抗君权。两宋无力对抗外患，元世汉人受制于蒙古，但其时文物则仍继续进步；宋代审美之风，更胜于唐代。要之，“历史进化之迹。随在可见。而民族之能力。亦不必随国运之盛衰而消长。”^[47]

可是，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柳氏却显得犹豫迷惘，难以用“进化论”来预期。现代中国在经济上，明知机械工业之害，违反人道，但是迫于各国经济竞争，仍不能不随欧美轨辙前进。在政治上，种族革命虽完成，但武人专制、强藩割据，政治革命尚未成事实。在法制上，由德治而趋法治，由官治而趋民治；先弃中国旧法以从欧美之旧法，又欲弃欧美之旧法而从其新法。这些改变的功效如何？归宿如何？他都没有把握。在文化上，欧战以后，欧美自讼其短，世界思潮 徨无主，中国学者则在俄国过激主义、欧美文化、中国文化之间冲突徘徊，^[48]不知何去何从。全书未作结论，

戛然而止，留下不确定的尾声。

乙. 士人史观：钱穆《国史大纲》

钱穆的《国史大纲》，是百年来学界评价最高的一本通史。正因为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后继者要另辟研究蹊径，也往往以《国史大纲》为“假想敌”。只是，他们可以发现钱氏诠释中国整体社会时的盲点，但很难在理解中国大传统上超越他。

同样认同儒家传统，钱氏作品较柳氏来得通透，更能贴近读者。比方说，为学应“有益于身，有用于世”，论史则应体察“世运兴衰，人物贤奸”，钱氏的说法，较诸柳氏所谓“求圣哲立人极参天地者何在”，更为清晰平易地点出儒家史学的目的所在。

像柳氏一样，钱氏著作也采用“纲目体”，以文言文夹叙夹议。但柳氏只是汇集札记心得，平铺直叙，许多问题点到为止，未作深入发挥；而钱氏则透过雄辩之《引论》和立体的章节结构，以更斩截、更有系统，也更具民族热情的方式呈现其“士人史观”。虽然政治史占了全书主要篇幅，但是作者以极高之才识将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发展亦纳入讨论，人物、事件、制度穿插交织，生动叙事与深入分析兼顾，使他的作品成为宏伟的国家史诗，更能唤起读者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轰动一时。

由于文化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处于劣势，使得柳钱二人不得不保持相当的“防卫性”，与当时的“宣传派”“考订派”辩难，钱氏尤其明显。在界定“中国”时，钱氏未像柳氏一般直接拈出“中道”之类意涵，而是透过与西方对照，呈显出中国的特殊精神面相，以批驳当时流行的中西历史比附。因之我们在《引论》中，是从“中国不是什么”发现“中国是什么”：

中国已往政制，尽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49]

既然中国历史发展自有内在理路，钱氏便扬弃以“中国受外力影响”为标准的三段式历史分期法，而迳以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等朝代来断代。在他看来，中国政制并非专制政治，而是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逐渐接近，政权逐步解放。中国学术思想也与欧洲中古宗教不同，它的发展趋势是平民学术思想（百家学）从宗教与政治下独立，进而指导政治与社会。中国社会组织，同样既非贵族封建，亦非工商资本社会，而是自成一“四民社会”。^[50]

他认为，尽管进程迟速不一，自秦以下，中国社会逐步朝向经济地域扩大、文化传播

普及、政治机会平等等方向进行。而转成民族、创建国家的主要动力，来自某一种“文化演进的使命”。^[51]这个使命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是在先秦奠定之“大同观”“平等观”“现实观”思想基础上，建立大一统政府；以地上王国代替天上神国，以大群融合消融小己对立。^[52]这个王国中所标举的“德治”理想，与柳诒征所述若合符节：

教育主于启发与自由，政治主于德感与平等，对异族主于与我同化与和平，处处表示其大同之瑰抱。此乃先秦学术共有之态度，所由形成中国之文化转成中国之民族，创建中国之政治制度，对内对外，造成此伟大崇高之中国国家，以领导东亚大地数千年之文化进程者。……^[53]

谁来承载、落实这个理想？柳氏没有明言。钱氏则主张：整个士人阶层都负有这个责任，成为沟通政府与民间之桥梁。从孔子自由讲学开始，战国游仕兴起，促成秦汉统一新运。两汉农村儒学，创下文治政府传统。魏晋以迄隋唐，士族门第延续不辍，形成变相贵族。宋代士阶层出现新觉醒，以白衣之身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引领以下一千年风潮。……明白地说，“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54]在某个程度上，

《国史大纲》之叙事，即是以“大一统王国”之盛衰分合与士阶层之荣辱消长为主轴，尤其以知识分子“大群理想之有无”为天下兴亡之枢纽。因之钱氏特重吏治，因为澄清吏治才能宽养民力，厚培国本。^[55]只不过他没有点出：吏治澄清的时代，在中国史上其实并不多见。

出人意料地，论近代中国乱象病源，钱氏并不归咎于西方挑战，反而远溯唐代安史之乱，以之为中国盛衰关键。他以三章篇幅全面剖析中唐以后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尤为识者所称道。但是，造成帝国中衰的不只是战乱，更包括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士族门第消融之后，社会平铺散漫，易招致王室政府骄纵，民间贫弱乏人赈济；而士人也往往以仕宦为鹄的，忘其先忧后乐之使命。明、清时代专制黑暗真正形成，士大夫转而逃入故纸堆避祸，于是政府与民间沟通之桥梁遂断。因此，像柳诒征一般，他也认为，纵使未受西力侵略，清末中国仍必大乱。^[56]

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钱氏显得比柳氏笃定。他相信，以中华民族四五千年之深厚文化潜力，当可以克服数百年、数十年来之积病。他也相信，孙中山之三民主义，革除当前政治社会污点，发扬中国既有文化，维持“政治领导社会”之局，和“专求运用社会力量推翻政治”者不同，足可引领未来中国。因此，“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

世界新使命之开始”，成为钱氏所热烈期盼的历史新页。^[57]

今天从“建构国族认同”的角度来看，《国史大纲》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首先，为了建立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钱氏和柳诒征一样，都对最早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给予极高评价。柳氏赞美始皇时代之郡县法制、地方自治、道路开通；^[58]钱氏则推崇秦代确立中国版图、抟成中国民族、创建中国政治制度、奠定中国学术思想、统整各地制度文化风俗，因之“秦政不失为顺着时代要求与趋势而为一种进步的政治”。^[59]严格来说，这不合于批判秦代焚书坑儒、滥用民力之儒家传统，但是为了强调国家一统之必要，这两位现代儒者转换了历史评价的标准。

其次，为了要成就一个民族国家的想象，钱氏也如柳氏一般，以汉族为叙事主体；即使论及少数民族统治，亦视其“汉化”深浅为政权成功与否之枢纽。^[60]由于写作时身处抗战非常时期，钱氏甚至比柳氏更“严夷夏之防”：他谴责唐人不严种姓之防，又不重视文化教育，以致酿成安史之乱；而宋代能矫唐人弊，严华夷之防，重文武之别，则赢得他的赞美。^[61]谈到元代，柳氏尚能肯定蒙古民治、驿传制度，^[62]而钱氏则迳以“暴风雨之来临”形容蒙古入主。对于清代之评价，从标题“狭义之部族政权之再建”已可看出端倪。^[63]外

来文化中，他肯定已中国化之佛教，^[64]而仅以不到三页之篇幅处理西力东来，且语多负面，和柳氏以十章以上内容介绍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有褒有贬的做法，大异其趣。

再者，为了强调“大一统”的理想，钱氏往往不提社会上的阶级差异，这点也和柳氏不同。柳氏在谈到封建制度时提及：

（中国）外观虽号统一。内部之文化实分无限之阶级。自太古以至今日。无论何时何代。举不能以一语概括其时全国文化之程度。此实治中国历史者所当知之第一义也。^[65]

柳氏指出，唐代食衣住行均有阶级差异，清代学校、科举亦有阶级之别。^[66]只是基于“礼教”观念，柳氏并未批评这样的差别待遇：“唐虞以来，礼教最重秩叙。……恶专制而倡革命可也。恶阶级而奖称乱不可也。”^[67]相形之下，钱氏强调先秦诸子之平等观，汉代政府之平民性，乃至科举制度之消融社会阶级——总而言之，自秦以后中国即无贵族。^[68]平心而论，即使在封建组织解体之后，中国社会仍长期存在着士庶之别、良贱之别、主奴之别；贵贱尊卑不仅表现于食衣住行、婚姻、丧葬、祭祀，而且在法律上也公开保护官吏及其家属，使其强制性更大。^[69]自秦之后中国固然无“世袭贵族”，但“社会阶级”的确存在，只是阶

级之间相去不如西欧之远，而升降也比较容易罢了。^[70]

此外，虽然《国史大纲》也留意关系农民生活之田制、税制、兵制，但还是相对忽略了中国低层文化。^[71]他又美化士人与“大一统政府”之合作关系，低估了文官集团与皇室政权之间的长期紧张。^[72]而将汉以下政府视之为“政权开放”之“平民政府”，亦有引喻失义之嫌。^[73]总之，钱氏过度强调汉族士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使得这部通史社会涵盖面不足。否认族群差异、阶级差异，不仅不能说明过去，更妨碍未来建立一个更有包容力的国家。

不过，我们不能忘记钱穆写作的时代，和《国史大纲》所设定的读者。这本书是钱氏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中国通史”课程（1933-1939）之结晶。当时的中国号称统一，实则军阀割据未已、国共明争暗斗，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分歧日益扩大，加上日军侵略日亟、抗战全面展开，国人颠沛流离，青年尤其徬徨。钱穆好友陈梦家的鼓励之下，“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为时代急迫需要计”而援笔为文。^[74]在相当程度上，他是以长者的身份对知识青年指点迷津：他不仅要召唤国魂、鼓舞年轻人对国史的信心，更要激励他们献身大群，成为乱世的中流砥柱。全书特别着重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正因为

那是现代知识青年的角色认同对象。《国史大纲》的意义不仅要从史学知识、国族建构上来看，更要从史学教育上来衡量。

职是之故，钱穆对北朝诸儒（如苏绰）、北宋诸儒（如范仲淹、胡瑗）、明末遗老（如顾炎武、王船山）推崇备至，因为他们砥志励行、坚苦卓绝，终能在黑暗的时代拨乱反正。^[75]另一方面，士阶层既关系国运，钱氏也不免爱深责切：东汉士人看重形式道德，不重事实效果，以致无法铲除宦官势力；中唐进士轻薄、朋党相争，遂招黄巢之祸；北宋变法党争，诸君子疾恶已甚，排斥异己为奸邪，反为群小所乘。论及晚近中国之弊，钱穆更以“士大夫之无识”为最大病症。^[76]其实平心而论，晚清民国变乱纷乘，原因包括人口增加、耕地减少、新帝国主义兴起等等，士大夫岂真为其祸首？然而“风俗之厚薄奚自？系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秉诸“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之儒家传统，知识分子若自诩为国之栋梁，自当以最高标准自我要求。

我们可以说，在多种通史作品中，《国史大纲》给予“人的能动性”最大的肯定。它即使有若干缺失，但瑕不掩瑜，其经典地位是难以动摇的。

2. 社会主义立场——时势及唯物史观

甲. 时势史观：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

吕思勉(1884-1957)和柳诒征一样,也是自学出身而卓然成家的学者。他长期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埋头耕耘,著述极富(世传他曾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读过三遍),虽然声光不盛,但其博瞻深为史学界所肯定。^[77]他曾是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的老师,备受钱穆敬爱,但从著作看,几乎难以发现他和钱穆的师承关系。师弟二人世界观之不同,由吕思勉下面一段文字即可窥出:

我们现在的社会,实截然分成两概。一为上中流知识阶级,一为下流无知识阶级。我们所见,所闻,所想,实全与广大的为社会基础的下层阶级相隔绝。我们的工作,所以全是浮面的,没有真正的功效,不能改良社会,即由于此。不可不猛省。^[78]

整体而言,老师的学术立场比学生来得开放,政治社会态度比学生还要激进,他所见的中国也更为复杂。

吕氏开宗明义就反对“历史是前车之鉴”的传统看法。时代变化如此之剧,前代经验哪能作为后事之师?历史应该是“维新的佐证”,不是“守旧的护符”,“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

系者也”。^[79]他认为研究历史最重要的辅助工具,就是社会学。只有社会学能说明枝枝节节的现象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也只有社会学能够说明文明之由来,评判得失,而指示我们未来的路径。^[80]

早在1922年,吕氏就曾开风气之先,以白话文撰写国史。《白话本国史》强调“用新方法整理国故”,并重视“社会进化”。^[81]1940-1945年抗战期间,他身处孤岛时期的上海,更改著述组织架构,又写了一部《吕著中国通史》,忧患之感更深,民族意识更强。他依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名目,将历史分为“典章经制”“理乱兴亡”两部分,上册《中国文化史》谈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衣食住行、学术思想的流变,下册《中国政治史》才记载朝代兴亡、外交武功,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吕思勉“重常人,重常事”,“求(一般)状况非求(个别)事实”,^[82]上册可谓全书精华,充满顾颉刚所誉“石破天惊之论”。尤其在社会制度的部分,他讨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等一般史学家较少触及的范围,甚至提出超越时代的主张,令人耳目一新。譬如说,他认为家庭的起源并非因为性欲需求,而是来自远古游猎时代对于女性劳动力的掠夺。换言之,家庭奠基于“女子的奴役”,而其需要出于两性分工的经济理由。因此,“贤母良妻只是贤奴良隶”,“家庭制度是女子之

敌”。现代女学生开始熟练社会事务，对家政生疏，正是女子进步的象征。^[83] 他不仅主张一切男女秉持“天下为公”的志愿，参与社会，甚且主张家庭制根本就不值得维持：因为大家庭明争暗斗，小家庭又难以养老抚幼，独身、晚婚才合乎人性。^[84] 虽然他除了婚姻、族制之外，鲜少提及女性在中国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但是如此旗帜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在百年来的通史写作中已经绝无仅有。

和柳诒征、钱穆相比，吕思勉对大传统较持保留态度，对常民生活更为重视，而且不特别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他相信，个别文化中有共同的原理存在；各文化之间也彼此交流互动。研究中国史，既是为了预测将来的进步，也是为迎受外来文化而做准备。^[85] 综观吕氏全书，他似乎同时为唯物史观、进化论及传统“时势”观念等三股力量影响。对前二者，他选择性地接受；而和前二者相应的第三者，则更深沉地渗透字里行间。

就唯物史观而言，吕思勉相当程度地接受了它的经济决定论：“一切社会制度，皆以经济状况为其根本原因”。^[86] 虽然如此，他并没有将它的“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硬套在中国社会上。相反的，吕思勉以更合理的方式，为中国历史上的财产制度分期：有史以前，是原始共产的“大同”之世，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有民主政治的雏形；^[87] 有史之后，

进入“小康”，封建时代阶级制度形成，拥有武力的统治者凌驾小民，但是统治者之剥削尚属有限。东周以后“资本主义”兴起，可谓“乱世”，大地主田连阡陌，大工商业者富可敌国，贫者却穷无立锥之地，此一趋势愈演愈烈，先秦诸子莫不有志于矫正此病态。新朝王莽轰轰烈烈的大改革，即为儒法两家思想之实践，意图回到小康以前的时代。可是王莽“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努力毕竟落空了，中国社会改革运动至此长期停顿，“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消极治理思想，乃成为此后政治家的金科玉律。^[88] 长期苟安于“资本主义”的不只中国为然；中国目前的问题和全世界相同，都是坏的，且坏得极为相像。^[89]

尽管此一“乱世”状况不惬人意，但吕氏明白反对头脑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90] 更反对以国家的力量推动大规模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工作。因为，尽管立法用意良善，但是“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中国太大、交通不便，中央政府本就难以严密监督，大改革更会增加普通官吏作弊的机会。与其由在上者操刀，他宁可诉诸民众之觉悟和行动。^[9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吕思勉与正统马列主义者对现实社会虽有类似的“诊断”，却有不同的“处方”。他的“处方”接近温和

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虽不见得有效，但对手的“处方”却证明的确后患无穷。^[92]

除了部分“唯物史观”之外，吕思勉也受到“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虽然上述由“大同”而“小康”而“乱世”的社会发展，很明显地是一种“退化”，^[93]但更多时候，他相信历史是走向“进化”的。古代部族林立，进而小国互相吞并、再形成更大的统一国家，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将来世界各文化更会合流而生一新文化，就是一种“进化”。^[94]中国学术思想，由先秦两汉诸子之“否认（乱世）现状合理性、注重整体社会变革”，经过王莽改革失败后，转为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同样否认社会现状合理性、但改由个人内心下工夫”，再变为宋明理学之“肯定（小康）社会合理性、要求个人各尽本分”，则是正、反、合的“辩证法的进化”。^[95]他甚至下了一个大胆的论断：“社会上新旧两事物冲突，新的大概都是合理的。”^[96]

在唯物史观与进化论的表面之下，吕氏史学潜伏着传统的“时势”观念。时势乃客观之存在，非人所能左右。世运只能向前进，要想改革，只能顺其前进的趋势而加以指导。^[97]英雄有所成就，多半是因利乘便；不知审时度势，总难免功败垂成。历史上与其说“英雄造时势”，不如说是“时势造英雄”。可惜人之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用旧经验应付新

时代，往往制度才定出来，即已不能适用。^[98]因此，人在历史上的能动性是受到相当限制的。

“势”的运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的统一。秦始皇能尽灭六国，乃是顺着部族时代、封建时代、战国时代以来列国互相吞并的趋势，符合人民长治久安的期待。^[99]可是当时人不明此理，以“封建”为当然，而“统一”为变局，视秦灭六国为无道之举。于是群雄揭竿而起，逆势而为，重行封建。可是不过五年，汉高祖就剪灭异姓诸侯，天下复归统一；而同姓诸侯势力，也在七国之乱后消戢。可见“统一”乃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后世即使有三国、南北朝、五代的政权分裂，但是社会文化久经统一，所以政权分立总是不能持久。^[100]

同样地，儒学之兴衰、功过也可以用“时势”标准来审视。战国时代唯有法家切合时务，是以秦用之以并天下。可是“时异势殊，则学问的切于实用与否，亦随之而变”，天下统一之后，需要与民休息的道家；民生安定，则需要兴起教化的儒家。因之儒家之兴起，乃有其必然之势，并非汉武帝一人之功。^[101]吕氏对儒家的评价褒贬互见：儒家的确有高远理想，有哲学立足点，亦有实践之大体方案；可惜其“大同”之义不传，所传多是“小康”之义，但“小康”时代封建、农业社会之道德和政制，如何适应商业兴起、大家族不复存在的新时代？强欲以

已进步的社会迁就“小康”伦理体制,回复“大同”境界,无异于削足适履。^[102]尤其是宋学,能够治心不能治世,不适于竞争,却从11世纪起就指导中国文化,莫怪乎中国要迭招外侮了。^[103]是以他认为儒学功过不能相掩。

问题是:身处滔滔世变,当事人如何判定何为顺势,何为逆势?即使是史家,也一样要靠“后见之明”才能看出“时势”之行进方向。吕思勉其实也向往“大同”再现(亦即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实施),只是他认为必须在“国家”(“阶级时代的产物”)消失的前提下才能实现。^[104]事实证明,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都还是在“国家”的框架下进行的。他对时势的掌握,也并不准确。

吕思勉不以单线的朝代兴替为探讨主题,而将制度文化复线呈现,因之我们看到财产制演变分为三期、官制演变分为六期、兵制演变则是八期、外族威胁又分为三阶段……各个制度/现象之间,并无必然的相应关系。同一种制度之演化,譬如由部分民兵、全体皆兵,再变为部分民兵、极端募兵、兵籍世袭,又变回全国皆兵,也不见得有什么清楚的“指导原则”可言。^[105]和“进化”之具有清楚目的性相比,“时势”会转弯,会换轨,它的运行方式难以揣测,暧昧不明。既然如此,我们恐怕只能当事后诸葛,难以洞烛机先。就指引未来方向而言,吕思勉的著作不如钱穆来

得斩截明白;但就呈现中国历史的复杂性而言,吕思勉提供了更值得玩味的图像。

《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中透露出作者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倾向,可是过了几年下册出版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热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不再谈未来世界各族文化融合的远景,而对中国之能否生存忧心如焚。在这一点上,他终于和钱穆有了交集。下册名为《中国政治史》,实则所谈几乎均为中国与外族之交涉,汉族本位主义强烈。他强调中国民族伟大的同化力,和随着同化相伴而来的疆域的扩展。^[106]不过同化须渐进,同化未达相当程度之前,与后进民族之间的界限不可撤废,否则就难免遭到五胡乱华这样的祸事。^[107]可是何以鲜卑人汉化之后,反而因骄奢淫佚而亡?他将此归咎于“野蛮的侵略民族必然的命运”:中国虽然供给其骄奢物质条件,但骄奢意志乃其所自有,不能怪罪中国文化。至于拒绝汉化者如女真人金世宗,则被吕氏认为是“民族成见最深”,造成汉人和女真之间深刻的仇恨。^[108]

在历数元、清少数民族政权暴政及汉族光复运动之后,他忧心忡忡地谈到日本侵华后的状况:不论在经济或文化上,除非解除外力的压迫,否则中国民族没有生息发展的余地。“我们今日一切问题,都在对外而不在对内。”^[109]尽管时局极沉闷,他用梁启超“中国不亡论”的说法安慰自己:数万万的大族,

数千年的古国，岂会没有前途！？百感交集的他，以梁启超所译拜伦诗《哀希腊》为全书做结：

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期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期的天骄。……祇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110]

随着时局的恶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世界主义者终不能不转变为民族主义者。“民族”存续的危机感，毕竟超过了“民生”“民权”的关怀。“救亡压倒启蒙”，^[111]在这里找到另一个印证。

乙. 唯物史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书香世家出身、北大文本科国学门毕业的范文澜(1893-1966)，三十二岁以前是一个博通群经、信而好古、在大学任教的“学究”。可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改变了他——他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以“安内重于攘外”为名，迟迟不肯抗战，令他怒发冲冠，终于由一个经生转变为革命家。1940年他历经艰辛来到延安，欣喜地发现自己成为群众中的一份子。在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期间，他奉毛

泽东之命，写出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的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简编》(1941-1942)，往后更成为中国大陆高校历史教学使用率最高的教材之一。^[112]

在这部“简明扼要的，通俗生动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的中国通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特点：其一，作者深厚的传统文史背景，使该书不管是在考古资料或文献史料上，都丰富扎实。其二，他书写大众，也为大众书写，文字力求浅白，叙述富故事性，每章结束都附“简短的结论”，便利读者领略要旨。其三，身为半路出家的马列主义者，他对马列教条的掌握在此时尚未十分纯熟，所以容易出现理论的破绽，但也因此较能尊重史料，而未完全受意识形态左右。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他认为，因为要了解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前途，就必须先了解这两种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113]既强调“人类共通”的唯物史观，又展现中国特殊性，便成了本书重要的着眼点。

范文澜的唯物史观，在全书结构及历史分期中明显展现。根据马克思主义之历史发展理论，范氏将中国历史分为原始公社(黄帝至禹)、奴隶占有制(夏商)、封建制(西周至清鸦片战争)三阶段。封建制之下，又分为西周至战国之“封建制度”(初期封建社会)，和秦以后之“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后者长达二千

年的期间内，再分为秦到南北朝、隋唐到鸦片战争等两时期。他认为，将封建社会分成数个时期，可以打破“中国社会三千年没有发展”的谬说。^[114]

可是秦始皇不是已经“废封建，行郡县”了吗？何以范氏仍主张“封建制”占了中国史的绝大部分？他没有解释，但我们可以推测，在马克思的历史发展“五阶段论”中，西欧中古封建制之下一阶段是资本主义，但中国却迟迟未见成熟的资本主义出现。^[115]既然中国资本主义迟未现身，他只好牵强地把“封建制”无限延长。只是他对“封建”的定义，和本文讨论的其他史家都不同，在他看来，“封建”与其说是政治上诸侯分封、地方分权，不如说是周公所制定的社会上“君臣父子夫妇上下亲疏尊卑贵贱等等的礼”；^[116]因为只有后者，才持续了两千年。

为了要符合唯物史观中的“经济决定论”，他在介绍各个朝代时往往先谈生产方式或经济状况，再谈政治外交。而漫长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时代中，上半段（秦汉至南北朝）标题虽以对外侵略、外族内侵为重点，下半段（隋统一至鸦片战争）就特别强调“封建经济”之发展、破坏、复兴、停滞。至于文化概况，因为是“上层结构”，所以他将之放在每个阶段的最后面，也尽可能用最简略的方式带过（在二十二章中只占三章）。不过，因为作者原

有的古典素养深厚，他谈文化概况虽然简赅，却往往令人眼睛一亮。

尽管他努力要将章节结构安排得合乎马列教条，但是仔细检视内容，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他的经济决定论并不完全。也可以说，此处他尊重史料，未强依理论曲解史实。经济因素（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农工商业发展）虽被放在首位，但是它并未“决定”其他领域的发展；相反的，经济往往受政治影响（例如隋文帝和唐太宗时代^[117]），或与政治、文化现象“平行”，未必互相关连（例如经济繁荣的宋代，政治上却“怯弱可耻”^[118]）。即使同是经济领域，农业与工商的发展步调又往往不一致（例如中唐、北宋农民疲困，而工商却很发达^[119]）。这一点与吕思勉有相似之处：吕氏也重视经济因素，但他基本上把社会各种制度分章处理，不将之视为“受经济决定之有机整体”，这样可能比较符合历史真相。

其实，相对于不完全的“经济决定论”，“阶级斗争”才是本书着墨最多的地方。“一整部历史只是阶级间、阶层间相互斗争、联合的历史，而联合也是为了斗争”。^[120]他认为，原始公社解体之后，财产从公有转为私有，阶级社会就开始出现。^[121]既有统治与被治阶级，就有阶级压迫、阶级矛盾，而最关键的是土地问题，即农民和地主争夺所有权的问题，^[122]这和吕思勉之凸出“平均地权”议题

相似。于是我们看到，春秋时代国君和卿大夫不事生产，人民则有沉重的战争负担；^[123] 两汉人民遭受皇帝、贵族、官僚、地主、商人、豪强之多重剥削，某些西北贫民冬日无衣、整日躲在草窠里，自卖为奴、卖妻为婢者十分普遍；^[124] 中唐以各种新税法榨取穷人，更益以皇帝、功臣、官吏、藩镇、宦官、佛寺、胡客、武人之额外剥削……^[125] 范氏所举的例子，固然开启我们看历史的不同角度，但是也不乏过度解释的情形。例如：将货币看成“统治阶级剥削人民财物的重要工具”，或称南宋政府之成立慈幼局、药局、居养院等社会福利机构，是欺骗人民的小惠政策，都似乎矫枉过正。^[126]

和本文所论其他史家相比，本书最可贵之处，是让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现身。吕思勉亦重视平民生活，但是他只谈衣食住行等“风俗”或“制度”，看不见个别的人的面目。在范文澜笔下，底层百姓平时的生活甘苦，可以从生产方式、租税负担、户口增减、工商业发展、民间信仰（如魔教）等方面看出。而在战时，战争负担、死亡人数、死伤惨状、战役经过，也透露了小老百姓的苦楚。

当然，作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历代农民起义。身为正在发动农民革命的中共党员，自然格外注意历史的教训。他发现，战国时期土地兼并、兵连祸结，但是却未发生农民起义；

秦国统一天下之后，才有陈涉、吴广首度揭竿而起。这是因为：秦以前诸侯并列，各国互相支援或监视，平民难以起事；秦统一之后，皇帝孤立，人民攻击对象比较单纯，只要驱散官僚就可推倒皇帝。^[127]

可是，没有正确领导的农民起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生动地描写：西汉末赤眉军拈阄推十五岁牧童刘盆子为帝，刘盆子披发赤足，吓得要哭。在皇宫里置酒大会，众人吵闹，一人拔剑大骂：

你们这伙老佣工，今天想讲些君臣礼节，却被你们闹翻了，小孩玩还不至此，都该打杀！

众人不服，互骂起哄，兵士们跑进来抢酒肉吃，互相格斗，卫队上殿杀百余人才平定。这样的事说明了什么？

他们纯是农村饥民，被贪污残暴的统治者逼得无路，不得不起义求生。他们没有政治军事知识，缺乏组织和纪律。贪财物，想回家，老皇帝姓刘，必得找个姓刘的作皇帝，不知道联络其他阶层，利用他们的力量，充分表现农民的纯朴性，保守性，自私性，狭隘性。所以击破王莽政权后，起义果实，却落在豪绅地主间知识分子刘秀的手里。……他恢复了汉朝，也恢复了所有旧制度。起义

农民，一无所得。^[128]

类似状况，历代一再重演，“完全证明农民没有进步阶级领导，起义决不会有好的前途。”^[129]所以，各位同志，我们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是范氏的弦外之音。

范文澜同情农民的艰苦处境，但对其能力带着强烈保留。最合乎中国社会性的道教，也被他批评为“集中国传统鬼神迷信贪污淫秽一切黑暗卑劣思想的大成”。^[130]如果中国的“小传统”不那么值得肯定，那么“大传统”又如何？除了墨家、法家之外，其他思想流派都受到他的唾弃。墨家有刻苦生活、自我牺牲、严格纪律、言行一致、分财互助等美德，法家韩非则是战国唯物论者、懂得斗争的重要性，是以赢得他的赞美。^[131]而儒家、道家维护封建道德，替统治者制造尊卑秩序；佛教受统治者供养，吮吸民脂民膏，都受到他强烈谴责。^[132]不过，某些个别儒家思想家，或因平等主义（宋代张载、明代泰州学派）、民族思想（王夫之），或因革命思想（黄宗羲）、反理学（戴震），还是受到他的肯定。

在民族立场上，范文澜也持汉族本位。因为对国民党“先安内（剿共），再攘外”之政策深恶痛绝，当谈到北宋外患时，他特别加上一句：“忍辱求和就是甘心投降的初步，专力防内就是对外屈服的原因”。^[133]

如果外患能够解决，他所向往的国族未来是什么状况？在政治上，他相信民主政治的可能性，特别大书18世纪华侨罗芳伯在荷属西婆罗洲所建民主共和国“兰芳大总制”，并将之与同时代建国之美国相比拟。可惜，美国出现在资本主义已发达的地区，而“兰芳大总制”却仍不脱封建主义之人治，^[134]中国民主政治只好期诸未来。在经济上，他的立场显得暧昧：他极力推崇王夫之“耕者有其田”的主张^[135]，因为这是主张小农可以拥有土地，合乎抗战时期共产党“土改”之诉求。可是，当提到王莽企图恢复井田失败时，他又斩钉截铁地说：“承认私有财产制度的社会里根本不能合理的解决土地问题”。^[136]如此一来，小农分得土地自耕的梦想，又被打破了——而事实上，后来土地也确实国有化了。剥削小农的不再是地主豪绅，而是党与国家。从小喜读《桃花源记》的范文澜，在延安“清爽快乐”地以史学研究推动共产革命大业时，想象得到他的乌托邦实现时是什么景况吗？

3. 自由主义立场——人权与资本主义史观

甲. 人权史观：柏杨《中国人史纲》

1968年，台湾外省作家柏杨（1920-）因为翻译“大力水手”漫画无意间触犯政治禁忌，而有九年牢狱之灾。入狱期间，无桌无椅无稿

纸，参考书更极度匮乏，他却能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三部史书，《中国人史纲》即为其中之一。在逼狭燥热的牢房中，他蹲坐在墙角地上，用稀饭糊上报纸作成硬纸板撰写，和着文字的不仅是他的汗珠，也是他的血泪。^[137]在这样特殊的情境下完成的作品，自然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柏杨出狱后，《中国人史纲》于1979年初版；虽有审查制度的干预，^[138]但本书仍大受欢迎，不断再版（到1981年已有八版），1985年更当选为当年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十部书之一。^[139]直到今日，它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仍不容小觑。

为什么《中国人史纲》会这么受欢迎？这一方面要归功于作者生动的文采，另一方面则与它强烈批判中国儒家文化、符合戒严时代台湾异议传统有关。如果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是靠“政治”力量风行，那么柏杨《中国人史纲》可谓是拜“反政治”气氛之赐而大行其道。

和一般学院人士以同侪为写作对象不同，以写小说、杂文起家的柏杨，对读者——包括学生与社会人士——的需求十分体贴、敏感。没有注释，没有考据，没有参考书目，却有大量精简的图表，增加了可亲度。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字流畅优美，擅于描写具体细节，使读者——尤其是白色恐怖时期未曾亲履大陆土地的台湾年轻人——得以想象遥远的时空。

一开篇，他就以五十余页篇幅介绍中国的“历史舞台”，亦即地理环境。为了要说明中国的土地广袤，他先从空中鸟瞰开始：

如果是二月天气，我们在宇宙飞船上会眺望到，最北的黑龙江千里冰封，那里的中国人还穿着皮衣皮靴，从口中吐出的热气会立刻在睫毛上凝结成冰。而最南的珠江这时却仍滔滔奔流，那里的中国人正额上淌着汗珠。……这说明这个舞台南北距离遥远的程度。^[140]

空中看过了，他再带读者降落下来，跨上马背，透过清朝从北京到各地驿站的官定行程表，说明中国领土的庞大：北京到昆明，限期六十天，加急四十天；到广州，限期五十六天，加急三十二天……他又补充：

加急多半用于军事行动，凡加急的驿站递送，本身的动作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电影镜头。驿马以四足离地的速度狂奔，铃声可传到一公里以外。下一驿站听到后，日夜都在待命的驿卒，立即上马飞驰。当后马追及前马，两马相并时，马足不停，即在马上将公文书交递。驿马往往因狂奔过度而倒毙……这种速度当然不适合普通的商人和旅客，但它正是庞大国土的动人标志。^[141]

这样生动、甚至诗意的描写，正是小说家写历史的殊胜之处。只是，中国历代疆域变迁极大，以清朝盛世领土范围作为代表，是否恰当？还待思量。

《中国人史纲》之能吸引戒严末期的读者，还因为它对中国大传统的强烈批判。在史学上，柏杨把钱穆《国史大纲》当作箭靶：

（《国史大纲》）虽然用一种看起来极其深厚、充满新鲜刺激的辞句作为标题，可是内容却仍是古老的考据手段，和保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既得利益，他最大的毛病是传统性的：说不清楚。^[142]

可是，《国史大纲》“说不清楚”的究竟是什么？柏杨并没有说清楚。而他所标榜的，则是“中国人的立场”：

我们的立场是中国人的立场。不同于“奉旨修史”的官员立场，也不同于以王朝为主，以帝王将相为主，以统治阶层自居的立场。……我们反对“成则帝王，败则盗寇”的史观。……我们坚持的标准是国家民族和人道人权，不掩饰污点，犹如美国历史不掩饰吊人树一样，同时也展示出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文明所作的尊严贡献。^[143]

“中国人的立场”，是柏杨在儒家文化之外寻得的替代性传统 (alternative tradition)。和钱穆观点完全相反，他认为周代即以法律、礼教固定贵贱阶级；后代贵族和平民依旧严格对立，只有“科举”一条若有似无的狭径供庶民攀升，而贱民连此机会都没有。^[144] 只是，虽为平民百姓打抱不平，他不像范文澜能扩大史料范围，从而挖掘庶民社会生活的丰富面向，只能从历代民变中找到老百姓的历史身影。甚至连钱穆所关心的兵制、田制、税制等关系民生的重大制度，柏杨也很少提及。为求文章之故事性、可读性，他又将叙事重点放在政治史（包括宫闱生活、朝廷斗争），结果反而落入“帝王将相年谱”之窠臼。这么一来，上层斗争、下层造反，除了连篇累牍的砍砍杀杀之外，实在看不出中国史之建设性意义何在。^[145]

为了要打破既有成规，柏杨刻意在“纪年形式”做改变。他绕过复杂的年号，以耶稣纪年为纪年，好让现代读者立即明了史事的时间位置；此外，他不以王朝为断代单位，而以“世纪”为单元来叙述，好彰显尽管王朝兴衰更迭，中国永远屹立不摇。^[146]

其实，吕思勉在《吕著中国通史》已纯用公元纪年，但未特别标榜。史事加上公元纪年的确方便现代读者，也有助于中西历史的比较；只是，为什么中国年号就因此必须完全删掉，不能与公元纪年并存？得失利弊

两两抵消，意义不大。柏杨以“世纪”而不是以“朝代”为时间单位，更有待商榷。因为，尽管深度历史发展未必与朝代起落完全吻合，但比起机械化地以百年为单位切割，后者更容易失去对时代脉搏的动态掌握。

在介绍完中国的“历史舞台”——河湖、山岳、长城、城市、地理区域——之后，柏杨带读者进入“神话时代”（从盘古到神农）、“传说时代”（从黄帝到尧、舜）、“半信史时代”（夏、商）和“信史时代”（自西周“共和政治”有文字史料记录开始）。综观全文，中国历史在他笔下是意义不大的朝代循环：

中国历史一向是环绕着一个圆圈盘旋：一、旧王朝统治阶级腐败灭亡。二、军阀或变民集团乘机夺取政权，发生混战，杀人如麻。三、混战的最后胜利者建立新的王朝，组织新的政府，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四、经过一段安定或繁荣的时间。五、又回到第一：统治阶级腐败灭亡。——如此这般，像走马灯一样，循环不已。^[147]

虽然基本上不脱循环史观，但柏杨还是在第一章勾勒了中国历史线性发展的大致轮廓。它包含了战国到西汉、唐、清、中华民国等四个“黄金时代”，其中再杂以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时代”，以及明王朝之“大黑

暗时代”。^[148]整体而言，在柏杨眼中，中国史之和乎繁荣时期，远远不及分裂或黑暗时期。自唐中衰以后，世道即每下愈况；使中国疆土“汹涌地膨胀”的“第三个黄金时代”——清——为时甚短，为中华民国冠以“第四个黄金时代”之名，更似乎是作者在检查制度下的违心之论。

柏杨像范文澜一样，对中国的“大传统”——以及其承载者——抱着极大的怀疑。除了传统文学——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他衷心喜爱，其他文化思想总难逃他的批评。他肯定孔子的教育理想，但是对其政治生涯则百般嘲弄。^[149]他认为，儒家的基本思想是复古或至少维持现状；读儒书的士大夫好比印度的刹帝利，或西洋中古僧侣教士。道学家更往往言行不符、人格分裂，鄙视艺术、厌恶发明。^[150]对道家系统，他也没有太多理解：李耳的思想是“对强梁世界的一种消极反应”；魏晋“清谈”，是“穷嚼蛆”；谈到“道家”和“道教”不同，他以“狗”和“热狗”不同为喻。至于佛教，它与大乘等“佛家学派”之区别，亦如“狗”与“热狗”之不同。^[151]

在诸多思想流派中，柏杨真正肯定的似乎是法家，因为法家勇于变革。他所推崇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管仲、公孙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几乎都带有法家

色彩。他们抑制特权、减少贪污、提高行政效率，使社会建立秩序，国家由弱而强。^[152]“大黄金时代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一种只向前看的心理状态”，^[153]因此他对战国时代公孙鞅在秦国的变法——“中国唯一一次辉煌变法”——致以最高礼赞。但是，同样勇于变革的王莽并未赢得他的青睐，因为王莽是儒家，儒家必然崇古；王莽的改革眼光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154]

矛盾的是，严刑峻法的法家能满足他建立强大“国家民族”的想象，可是却违反他对“人道人权”的渴望。由于个人的切肤之痛，他对中国历史上的酷吏、冤狱特别敏感，尤其是专门制造政治犯的军法系统，更是挞伐不遗余力。在他笔下，汉代的“诏狱”、武则天的酷吏、明代的厂卫和廷杖、清代的文字狱，^[155]腥风血雨扑面而来，令人不寒而栗。柏杨说，冤狱与酷吏乃是“无限权力政治制度”下的产物，此制一日不除，中国人权就一日无保障。^[156]可是，这个“无限权力政治制度”，不正是由他所赞叹不已的“嬴政大帝”，依据法家韩非、李斯的主张所开创的吗？他既要歌颂秦朝的开疆辟土、大一统思想、“以暴力手段来对付儒家学派崇古思想”，^[157]也就很难不概括承受专制体制下对人权的蹂躏。

汉人变法一再失败，证明汉族文化很早就失去创造力，只有靠胡人血液的输入才能增

加它的活力。因为重视少数民族，柏杨以相当篇幅描述五胡、辽、金、元、清等政权变化，也仔细处理中国与四域的关系，为其他史家所不及。只不过，从北魏、金到清，汉化日深的外族最后总是堕落衰亡。^[158]总而言之，要问中国近代乱源，早在先秦儒家形成时即已埋下；它所以未痲溃疽发，乃是因为历来外族新血输入，使中国得以带病延年。一旦外族也被儒家思想腐化，那中国就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在这种状况下，现代中国要能不亡，只好期待另一支“胡人”新血——西方新兴文明——来让中国人复。事实上，打从神话时代开始，柏杨就在每章最后一节列上“东西方世界”大事，作为和中国的平行对照。但直到19世纪，中国才遭到近代西方强烈的冲击。君父合一的帝王制度、家奴制度、磕头、绝对父权、宦官、文言文、建筑衣着禁制、科举、八股、缠足等生活方式都被推翻，疑古、多元民族主义、重视工商及科学艺术、民主政治、男女平等……则挑战旧有的儒家意识形态和农业封建思想。^[159]而这就是中国未来应走的路向！

笔者以为，就“史学建树”和“促进中国国族认同”而言，柏杨之“破”实大于“立”。他意图开创不同的历史视野，但新的尝试不见得成功。他所揭露的“中国人”——包括帝王将相与平民百姓——的黑暗面，远大于他

们对“全世界全人类所作的尊严贡献”。如果说，钱穆对中国传统有溢美之处，那么柏杨的批判则未免矫枉过正。像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一般，他因为亟于解决现代中国的国族困境，愤而全盘否定传统中国文化，终致陷于“为救国而亡天下”之险境。^[160]

柏杨的立场，和50、60年代《自由中国》《文星》等外省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十分相似。他们一方面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却极诋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菁英文化）。他们痛恨中国的贫弱，认为儒家文化对此难辞其咎。至于如何解中国于倒悬？他们企盼的眼神投往现代西方，特别是自由、民主、人权等自由主义价值。^[161]事实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国民党威权统治才是他们真正要批判的对象，中国传统文化却做了代罪羔羊。不幸的是，外省自由主义者的中国史观影响到后来的党外异议份子；随着柏杨对“酱缸文化”的批判、《中国人史纲》的风行，台湾解严之后“去中国化”的呼声甚嚣尘上，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乙. 资本主义史观：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黄仁宇(1918-2000)生命中最重要经验，也许是在抗战时期在滇缅边界进入入伍的那几年。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肄业、蒋介石嫡系成都军校毕业的他，想不到戴手套踢正步的

“现代化”军事教育，在战场上完全派不上用场。战争拖了几年，国府征兵、派饷已经山穷水尽，更不用说交通、通讯、器械的补充。士兵完全谈不上训练，只要不在霖雨、疟疾下病死，或是将机关枪偷出卖给土匪，就已经是万幸。^[162]面对美籍军事顾问的嘲笑，黄仁宇不禁要问：问题真出在中国百姓善良，但国府贪污无能？他所生存的20世纪中国，真的只有战乱衰败，一无是处？

另一件影响他至深的事，则是1980年，因学校人事缩编，他被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New Paltz)解聘。年逾六十，妻小嗷嗷待哺，他充满羞辱感。但在这个重大危机中，他更深刻地体会：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中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在短时间难以看清，需要将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看得出来，是谓“历史的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他的成名作《万历十五年》，乃至后来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以及其他作品，莫不环绕着相同的主题：我们该如何透过长远的历史定位，为现代中国找到意义？

《赫》书在美国写成，书名即刻意流露出异国情调，强调远观的距离感。和本文所论其他史家不同，黄氏是唯一一位受过美国史学博士训练的人。他看中国的观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

影响。他们都认为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完全不同，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已经过时，也都同样用“现代化”或“富强”来衡量一个民族的价值。但是，黄仁宇反对美国汉学界用道德观点评判中国文化，也不欣赏专业史学短时段、小范围的研究。他要开展“大历史观”，并为一般读者而写作。^[163]

“资本主义”是黄仁宇为中国问题找到的解答。《赫》书伊始，他就以在新帕尔兹所见苹果专业生产流程，点出中国小农经济之缺失。不同于吕思勉、范文澜之模糊概念，他强调“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包括资金广泛流通、雇用专业经理人和服务业共通使用（交通通讯保险律师等）。而以上条件之能充分发挥，在于社会上商业信用已经展开，私人财产得到保障，而其背后有法律支持。为了使农业社会的管理方式进入商业社会体制，近五百年来多数先进国家，从威尼斯、荷兰到英国，都经历过困难重重的改组，造成许多战争、革命。现代中国的混乱，正是因为处在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中。一旦社会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全民生活都听金钱制裁，这个国家才算真正的现代化。^[164]

基于这样的观点，黄氏对传统中国历史有如下的诠释：

1) 公元前中国即因防洪、救灾及防御北方民族侵犯的需要，在管理统治技术未成熟的情

况下，就构成统一局面。由于地理环境所迫，政治上过度早熟，使中国人付出至高代价。^[165]

2) 青铜时代刚结束，秦汉大型帝国即出现，文官治国，实行中央集权，以致下层无从产生地方性的组织制度，只好造成一个理想的公式（如《周礼》），笼罩在亿万军民和犬牙交错的疆域上，以道德代替法律，以礼仪装饰行政。中央集权愈甚，愈不能照顾地方需求。民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政府组织就捉襟见肘，无法掌握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166]

3) 中华帝国晚期之社会结构，有如“潜水艇夹肉面包”，上层是大而无当的文官集团，下层则是成千上万的农民，中间缺乏联系。政府无意为民服务，只以“尊卑、男女、长幼”等价值管教人民。整个系统在承平时维持表面均衡，一遇变量即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167]

4) 组织管理因素也可以解释汉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由于游牧民族全民皆兵，部落组织接近军事动员，与农业社会武装冲突时易占优势。但是战胜之后，他们往往就被汉人同化，因为流动的组织难以管制一个固定的社会。^[168]

5) 明代坚持复古内向，采取非竞争性立场，其时欧洲则开始现代化，由农业体制进展到商业体制，中国在世界史上之优势乃告逆转。^[169]

《赫》书写到元顺帝即止，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著作中看出黄仁宇如何以“大历史”为

中国现代史定位。黄氏眼中的中国现代史轮廓，乍看混乱，但有“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他认为，20世纪初中国的问题在“贫”而不在“不均”，特别是农村耕地分割太小，无法存积资本。待专制皇权于1911年被推翻，而文官体系亦因废除科举而动摇，基层的情形更失去掌握。民初立宪、议会无效，因为它仓促制造，不是历史产物。行宪失败后，军阀割据遂不可避免。但他认为军阀割据不算太坏：私人军事力量，以人身关系联系，用不正规的财源支持（如鸦片专卖），至少还可以维持若干地方的秩序（一如唐代藩镇及五代十国），不致让全国鱼烂而亡。

在此背景下，黄仁宇认为，蒋介石政权是有意义的：他创新中国高层机构，使它在形式上具有全能性之政府、统一军令下之国军、全国通行之币制、数百年未及施行之征兵法，并获得外强承认。只是这些措施仅行于城市，没有农村基层组织支持，以致被评为贪污无能。同样的，中共政权也是有意义的：虽然牺牲了三至五百万人命，但它的农民运动改造了中国之基层，保障最下层之权力。中共今后该做的工作，是提高人民经济生活，并重定法律（如公司法、劳动法、保险法、对外贸易法、国家赔偿法），作上层机构与下层组织之间制度的联系，以经济、法治方法管理国家，脱离官僚垄断。^[170]而未来，黄仁宇预见中国

历史将与西方历史融合为一，人类全面整合，共同迈向资本主义。^[171]

柏杨和黄仁宇，一个向往西方民主人权，另一个向往西方资本主义，他们分别代表了“自由主义”在政治（宪政法治）和经济（私有财产、自由市场）上的两个面向。黄氏著作出现最晚，对当前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最强，娓娓道来的文学笔法，加上媒体炒作，使得文章在台湾《中国时报》副刊上连载时，即风靡一时。他的理论，既肯定海峡两岸政权，又赋予在当今社会引领风骚的中产阶级管理阶层历史的重要性，恐怕也是他的书洛阳纸贵的原因之一。

黄氏作品反映出，1949年前史家关注的“如何使中国富强”的问题，仍在他心中萦绕；但相对于钱穆以“人物贤奸”解释“世运兴衰”的传统史学立场，黄仁宇“能否以数目字管理”的衡量标准，突显出当代史家愈来愈以“非人格”（impersonal）、非道德因素解释历史的倾向。^[172]只是，他所看到的“全球化”趋势，是否真的方兴未艾？而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是否能在—党专政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继续顺利发展，彼此不相干扰？则还有待未来一百年后的人从“大历史”的角度去检验。

史观		史学目的	读者设定	中国定义	民族立场	历史分期	国史动力	传统评价	人之能动性	近世乱源	国族未来
保守主义立场	柳诒征国粹史观	参天地、立人极	大学生	中道之国	汉族本位	依外来文化冲击分为三阶段	国粹	肯定大传统	人格因素重要	欧美发明机械；清代政治腐败	不确定
	钱穆士人史观	有益于身、有用于世	大学生及知识分子	有大群理想之地上王国	汉族本位	以朝代为单位	士人	肯定大传统	人格因素重要	安史之乱	三民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立场	吕思勉时势史观	认识进化，改良社会	大学生	未作定义	汉族本位	各种制度分期不同	时势	对大小传统各有褒贬	时势造英雄	资本主义为害	以社会学引导社会组织彻底改造(温和手段)
	范文澜唯物史观	显示社会发展，探求未来出路	一般群众	由黄帝传下来之华族	汉族本位	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	阶级斗争，农民起义	抨击统治阶级及儒家	不完全之经济决定论	封建制之落后保守	共产主义民主政治
自由主义立场	柏杨人权史观	了解中国人苦难根源	高中以上学生	从地理、人种上界定	多元民族主义、大中国思想	四个黄金时代，余为分裂黑暗	外来民族带来新血	否定大传统	中国人之破坏性大于建设性	明代专制	现代人权国家
	黄仁宇资本主义史观	了解历史长期合理性	报纸读者(高中以上学生)	未作定义	多元民族主义、从中西比较观点审视中国	三个帝国阶段	长期停滞	否定大传统	管理技术比人格因素重要	儒家意识形态与经济脱节	与世界一同迈入资本主义

表 1

四、20 世纪“中国通史”的转化

1. 民族主义与国史建构

甲.“中国通史”叙事内容的转变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用如下表格简单归纳不同史观对十个议题的看法：(表 1)

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出这六位史家对十个议题的观点异同：

- 1) 史学目的：六位史家都有强烈现实关怀，企图透过历史研究摸索中国未来。
- 2) 读者设定：柳诒征、钱穆、吕思勉的著作是由大学上课讲义转化而来，大学生是他们设定的主要读者群，范文澜、柏杨、黄仁宇则诉诸更广大的社会大众。就内容来看，钱穆的著作对有志从政的读书人有激励作用，范文澜同情劳苦大众（特别是农民），而柏杨、黄仁宇观点则对中产阶级有吸引力。
- 3) 中国定义：范文澜、柏杨从种族/地理上下定义；保守主义两位史家虽未必排斥西方政治学上的定义，但更倾向于从文化精神层面思考中国之特殊性。
- 4) 民族立场：大多数为汉族本位，惟柏杨、黄仁宇能肯定多元民族，而黄仁宇更以中西比较观点审视中国。
- 5) 历史分期：各有不同分期法。
- 6) 国史动力：保守主义立场强调菁英文化及其承载者；社会主义立场重视社会下层力量；

自由主义者期待外来文化输入，以救赎封闭保守之汉族文化。

7) 对传统评价：除了保守主义者之外，都对大传统(特别是儒家)抱怀疑或否定态度。但是，他们对下层社会文化（如宗教信仰、农民习性）也有强烈批评。

8) 人之能动性：保守主义者肯定人格、道德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其他史家则倾向于保留，甚至否定人格因素。

9) 近世乱源：大都数史家认为内忧——而非外患——是中国近代战乱来源。

10) 国族未来：除了柳诒征之外，其余史家都对中国未来路向怀抱相当信念，但他们所预见的远景十分不同。

乙. 中西国史的共通性

如果我们将中国国史写作与西方比较，可以看出一些共通点。

西方“国史”运动，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兴起的现象。相对于前此的“城邦”“帝国”“封建国家”等政治单位，“民族国家”在法国大革命后出现，至今不过两百多年。“民族国家”的政治人物为了促进全民的国族意识，对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天主教会等“国际主义”，乃设立大学历史系培养专业历史学者，并开放官方档案供学者研究。可以说，在民族主义形成期间，史学亦成为一专业学

科,专业史家对民族主义有推波助澜之功/过。就中国而言,虽然官方的动作远不如民间积极,但代表民间的梁启超,推动史学革命以鼓动民族主义,与西方如出一辙。在此情况下,“民族国家”成为史学研究基本架构,“国别史”(德、法、美、日……)、断代史、专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都在此框架下进行,更不用说“中国通史”这样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了。^[173]

根据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的研究,西方民族主义可以大分为两个类型:一为透过“革命”(亦即推翻传统)来界定国族社群,如法国、美国及苏联;另一则透过“共同文化遗产”(亦即继承传统)来界定,如德国。但不管如何,国族认同并非自然生成,以上二种民族意识都需要想象和创造。由知识分子所建构的国史,就是国族认同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174]这种情形,我们也在现代中国/台湾看到了。保守主义立场的国史,易为国民党所利用;社会主义立场的两种史观(特别是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者若合符节;而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品,则迎合了两岸中产阶级温和改革的诉求。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史存在某些共同弱点:它们往往排斥少数民族,肯定军事扩张,维护特定阶级利益,^[175]而且通常忽略女性。除了少数例外(如柏杨、黄仁宇肯定少

数民族,吕思勉支持女性解放),中国国史也有类似情况。

我们所探讨的这几部作品之带有不同程度的排他性,固然与作者之视野局限有关,也与其单线的叙事方式有关。而这种单线的叙事方式,则是受启蒙史学影响。诚如印度裔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言:

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这种物化的历史是从线性的、目的论式的启蒙历史的模式中派生出来的。^[176]

在本文所介绍的几本中国通史著作中,除了柏杨有循环史观倾向,吕思勉有暧昧不明的时势史观之外,不管是受进化论(柳诒征、吕思勉)或马克思主义(吕思勉、范文澜)影响,或相信国史“于和平中得进展”(钱穆),这些论述里面总有目的论(teleology)的假设存在。换句话说,虽然历经波折起伏,整个国族历史总是完整一体地,朝着某个方向、某个目的地前进。而前途总是光明的——不管是因为延续伟大的传统而光明,或因为唾弃腐败的传统而光明。但事实上,这几部作品完成之后,时移势异,世事变化何曾如同他们所逆料!?

可以说,以上“中国通史”写作都意图

建构“新”的国族认同，但是它们都不自觉地对强大的排他性，无法完整地包容各种民族、阶级、性别、地方立场。我们不禁要思索：如果“中国通史”不愿沦为只是汇集琐碎史实的“教科书”，而仍志在发挥史学之“定位”功能，那么它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2. “中国通史”的未来

甲. “致用”“博通” vs. “客观”“专精”

如果不透过一家之言式的“中国通史”，而透过各撰专史、断代史，以集体合作的方式来认识中国历史，情况会不会改善？如果不那么亟于“致用”，不那么讲求“博通”，也许史学作品会比较“客观”，也比较“专精”？——笔者对此并不乐观。

当然，当前史学界风行的专题论文形式，亦多以“国族”为研究单位，但其议题多采多姿，多元之性别、阶级、地方、族群观点，正可以弥补“国史论述”单线、目的论叙述之不足。可是如果我们承认后现代史学对历史致知客观性限制的若干观察，那么可以说，“博通”者之“大叙述”固然容易流于主观，但“专精”者也未必就比较客观。在各从所好、众声喧哗之际，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史学研究日益零碎艰深，失去为时代定位的功能，与社会大众脱节的严肃问题。集腋未必成裘，聚沙未必成塔，一百个中国历史专题研究汇整的论文集，无法

等同于一本首尾一贯、条理井然的“中国通史”。正如许多放大的路标照片，无法代替一张完整的地图，因为后者才能显现大范围坐标，提供定向指南功能。当然，“地图”永远和实际见闻有巨大落差，也每隔一段时日就需要更新修正，但若没有一张参考性的“地图”，我们很难开始旅行。

其实“中国通史”的出现，既是“新史学”的产物，又和“新史学”的主流相克。钱穆《国史大纲》书成，轰动一时，但当旁人询问傅斯年对此书的意见时，傅氏的回答是：“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钱穆注重通史，傅斯年则主张先治断代史，甚至不许专治明史的学生上窥元代、下涉清世。^[177]除了“博通”“专精”各有所好之外，钱氏重视“致用”，也与标榜“科学”的史料学派主流不合。傅斯年反对史学普及工作，反对“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178]而《国史大纲》《引论》批评“科学派”治史：

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179]

钱穆虽然也批评“革新派”（包括“经济革命派”），但他和反主流甚至左派的学者更为投缘。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即参考《国史大纲》，只是解释不同而已。^[180]

说起来，这还是梁启超的“错”：“新史学”是他提倡的，两种不同现代史学传统也都得过他的背书。多变的他，曾经渴求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注重史料的搜集和别择，^[181]把历史列入“文献学”而非“德性学”。^[182]但才过几年，他又改弦易辙，回复传统“以史明道”的主张，鼓吹把历史当作“学做人的教科书”；甚至后悔从前教人走捷径、钻研小题目，“为学问而学问”，忽视了“大规模的做史”。^[183]只不过，他的晚年定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其实，通史作者通常会认为自己“专精”“博通”兼具，“客观”“致用”并存。钱穆的考据工夫之精湛，由《先秦诸子系年》等早期成名作品可以看出；范文澜写通史，也大量利用“科学派”之考古发掘结果，不是仅依赖文献史料。而平时重视“专精”“客观”的史学专家，在国族非常时期也常常跳出象牙塔来，撰写具有强烈现实意识的史学作品。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东北之后，欲以《东北史纲》证明东北早为中国所有，^[184]其中所透露的民族情感与时代关怀，和钱穆并无二致。

只是，两方渐行渐远，长久下来，形成

两种不同传统。虽然社会舆论偏好博通、致用取向的史学作品，但是在学术界内，专精、客观却形成坚不可摧的评价标准。学界多半视通史作品为通俗著作，学术性（亦即客观性）不高。而通史作者须有通识，亦非目前史学训练下一般学者所能。吊诡的是，多数历史学者应教学需求，必须对大学新生教授通史课程，可是通史之教学与写作均不受肯定——它只是一个“必要之恶”。

可是，如果科学家都致力于撰写“科普”作品，与大众沟通，史学家更没有理由不从事“史普”写作（或曰“大众史学”），为社会追寻每个重要议题的历史线索！透过长时间的跨距，对一个问题、现象、制度、机构、地域……的来龙去脉进行探索，我们才不会是暴起暴落的新闻事件中茫然的视听大众，而可以为当代体制找到渊源，为当代事件找到脉络，从而能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不过，这样的深远的“历史意识”，一定要透过“中国通史”才能获得吗？也未必尽然。

乙. 从“中国通史”转向“通史”

“中国通史”因清末中国之衰亡危机而兴起，它是否会在21世纪中国强大之际衰微？除了以上挑战之外，新时代的中国通史还要面对其他的问题。本土意识浓厚的台湾人，对无法涵括台湾历史的“中国通史”愈来愈不感

兴趣；大陆人士撰写“中国通史”，还必须将全球化考虑进去——因为它在改革开放后之强大，实归功于世界市场之开放——，但这又违反中国民族主义，恐怕会令大陆史家踌躇。

笔者并不否认以上六位前辈学人的贡献；事实上，能以一己之力完成“中国通史”这样首尾通贯、见解突出的鸿篇巨制，他们的学力、毅力都为吾人所望尘莫及。这些著作都有继续传世的价值，但读者必须清楚它们的长短所在，不能受单一观点笼罩。我们一方面乐见既有著作诸峰竞秀、众水分流，但另一方面也有所期待：未来的学者，有没有可能写一部跳脱“汉族/男性/中央/特定阶级”观点的“中国通史”，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笔者以为，应该有人继续撰写“通史”，但未必是“中国通史”（或“台湾通史”）。换言之，史学的会通精神——不管是“纵通”或“横通”——应该保存，否则难以发挥定位功能；但是会通不一定要在“国族”的框架下，以“国史”画地自限。^[185]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考虑回到尚未出现“中国”的“通史”时代。“通史”的范围可大可小，街史、村史、校史、县史、江河流域史、经济区域史、社会阶层史、族群史、女性史、亚洲史、世界史……，何者不可入史？以议题言，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生老病死……通通都是史学家应该关心的问题。只要作史者能观照到各主题

的“长时间、多层次、整体系”（当代史家曾华璧语），从而让读者能够领略它的“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钱穆语），这样的历史就合乎“通”的精神。就笔者所知，西方学者（包括专业及业余史家）在此方面的努力已有相当成绩，值得我们参考。^[186]

笔者承认，史家本人必然带有自己的国族印记，难以全然摆脱；再者，近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乃一不争的历史事实，不应漠视。只是，庞大的史学研究队伍中，至少有一部分学者可以考虑跳脱既有窠臼，尝试“国史”之外的其他可能。笔者相信，新旧取向不会互相排斥，反而能使史学研究范畴更为扩大，内容更为丰富。

丙．“国民”至上，“天民”安在？

可是，纵使以上管见能够成立，笔者仍不能无憾。因为，自从“新史学”（亦即“史学专业化”）开始后，不管是“中国通史”或“通史”（更不用说断代史、专史），都难以追回中国纪传体传统的灵魂；史学所寓含的人文宗教性意义，已经烟消云散。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我们不再“把历史当作学做人的教科书”，史学不再有“生命教育”的功能。

以《史记》为最高典范，传统纪传体是一个充满生命图像的画廊。在那里，我们流连忘返，透过已消失的生命曾经历的挣扎，思

索我们自身的奋斗，我们生命的意义，和我们可能的归宿。我们知道过去的人像自己一样，曾经有血有肉地活过；也知道自己会和过去的人一样，总有一天会逝去。每一个人，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承先启后。在那里，我们知道人的面貌有千万种，而生命境界有高下之分：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篇）

正因为从前“国家”观念不强，所以不仅佞幸之臣地位低下，连“安社稷之臣”也不能安居最高位阶，因为那个位置要留给正己化人的“大人”。不过，即使不能成为“大人”，我们也可以“天民”自勉：“国家”“君主”不能宰制我们的心灵；赋予人道德秉性的“天”，才是我们的最高归属。阅读不同的生命样态，史学提供了个人安身立命之道。

“中国通史”的出现，改变了这个状况。“国史”设定特定阅读对象，也转换了读者身分认同：“国族”取代“天”成为人们最高忠诚所寄，“天民”被改造为“国民”。而堪为全民表率模范“国民”，则或由士人、或由无产阶级、或由中产阶级来担任。更进一步说，当史学愈来愈强调“时势”“进化规律”“大历史”

之后，个人之能动性就日益消失。我们愈来愈看不见个别、完整的人的身影，而只感受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无可奈何。庞大而无情的力量对人的左右，远超过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握。——也许这真的是历史的事实？但是，纪传体史学那种天真、乐观的信念，以及随之而来的生命教育、道德教育，也随之消失了。而这，要靠什么来弥补呢？

五、结论

“先有经典，后有诠释”，似乎是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中的通例，但检视 20 世纪各种《中国通史》著作，却出现“没有经典，只有诠释”的现象。脱离儒家史学传统的中国现代史学，宣称“中国无史”，在忧患重重的时代背景下，针对“中国通史”这个无形实体(entity)进行诠释，在诠释过程中创造各种文本。在众多文本的竞争下，最能解释时代的作品成为“准经典”，可是这些作品的时代烙印却又成为它的局限，使它们的“经典性”载浮载沉。从好的方面来看，各种版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坏的方面看，却是“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和西方以“国史论述”抗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天主教会等“国际主义”不同，中国的“国史论述”（不论是基于保守主义、社

会主义或自由主义立场),是在“对抗帝国主义”背景下产生的。它们往往有浓厚的汉族本位主义,并对“国家统一”怀抱深切的期待。但也因为如此,它们很难正视中国内部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也鲜少公正地评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更无法从亚洲史、世界史的视野为中国史定位。当然,为了成就“国家史诗”,“民族”所不能涵盖的阶级、性别、地域也常被牺牲。

更值得思考的是,儒家“以史明道”“把历史当做‘学做人’的教科书”的传统,在现代史学专业化的过程中,也被抛弃。当历史只是“国家史诗”,不再是“生命画廊”,不能让人“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时,读史所能为个人提供的“安身立命”功能也就消失了。史学界今日所面临的“存在的困惑”,与此无关系。

不过,20世纪“中国通史”写作运动仍有其重大意义。它延续了传统史学讲求博通、经世致用的精神,在国族存亡绝续之秋,发挥了巨大的指路功能。虽然,如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所言:人需要历史获得以自我了解(包括“小我”与“大我”),可是一切理解都无法逃脱无常。我们寻得的意义,也必然有其历史性的限制。^[187]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生命画廊”或“国家史诗”,都是史家企图克服“无常”的尝试。结果也许终归失败,但是这些“知

其不可而为之”的事业,已经见证了人面对巨大无情的力量的奋斗。那么,史学工作本身,也就已经是一种生命教育。

注释

- [1]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饮冰室文集》第十册(台北:台湾中华),页1。
- [2]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页9-14,29。
- [3]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页39-40。
- [4] 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犹记风吹水上鳞》(台北:三民,1991),页19。
- [5] 虽然重要中国通史作品多有书评问世,回顾百年来中国通史撰述的学者也不乏其人,但是前者缺乏各书之间的比较,而后者则大多点到为止,只谈一般风评,甚少就各书主题深入对照。
- 回顾性作品可参考: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1947;黎华赵,《张荫麟研究》(师大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1)所列专表;李东华、黎华赵,《总论》,收于高明士主编,《中国史研究指南》(1),台北:五南,1990;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8月1日,
<http://www.guoxue.com/economic/ReadNews.asp?NewsID=3908&BigClassID=17&SmallClassID=23&SpecialID=110>
- [6]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 [7] 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阮芝生,《试论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史学评论》第六期,1983年9月,页63。
- [8]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2003),页214-215。
- [9] 沈松桥,《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页92-93。
- [10]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全集》(台北:文化,1973),页611。
- [11] 在时间上,《史记》上溯五帝、下至汉武帝;在空间上,除了华夏民族活动场域之外,司马迁也纪录了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地区的历史。今日看来其视野自然不足,但就当日而言,已是华人所知世界的极限,故谓之为二千年前的“世界通史”。
- [12] 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台北:世界,1984),页80-84;何炳松,《自序》,《通史新义》(台湾:商务,1965),页7-10。
- [1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台湾中华,1985),页28。
- [1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页28。
- [15] 此一诠释参考:周梁楷,《大众史学:人人都是史家》,《当代》,206期(台北,2004年1月),页81。
- [16] 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页1。
- [17]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第三册(台北:台湾中华),页3。

[18]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页4-12。

[19]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页12。

[20] Ying-Shih Yu,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Erik Lonroth et al ed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1994), p. 161.

[21] 王汎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页99。

[22] 章炳麟,《中国通史略例》,收于氏著,《廛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272-275。

[23] 王汎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页95-108。

[24] 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收于氏著,《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69-82。

[25] 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页2-4。

[26] 笔者在此必须声明:本文就此六本著作来分析其政治立场与史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一政治立场必然与某史观相互对应。例如:持“时势”史观者,在政治立场上未必主张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也有可能以“时势”观点看历史发展。

[27] 根据此一标准,刘师培及夏曾佑二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虽然在史学思想、方法、体裁各方面有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突破,但是前者处理上古到西周时代,后者则只论及隋代,无法看出二人对整体国史的观照,故未纳入本文讨论范围。

[28] 在台湾各大学“中国通史”课最常用的教科书——傅乐成的《中国通史》(台北:大中国,1960初版,1986再版),未被本文纳入讨论,因为:该书综合史料学派研究成果,力求平实客观,但多述史实而鲜少议论,缺少历史解释,以致史观并不明显。不像本文所讨论的六位史家,傅氏避免提及国史发展的规律或背后的动力,这虽然显示了他的谨慎态度,但也使得他的作品失去国史著作的“指路”功能。对傅氏作品的看法,亦可参见:李东华、黎华赵,《总论》,收于:高明士主编,《中国史研究指南》。

当然,若仔细寻绎,仍可发现:作者虽欲踵继其伯父傅斯年之史学思想,标榜追求客观真相(页789)，“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主观的议论,虽新颖动人,也尽量割爱”(自序, p. i),但是在字里行间,仍不免流露个人主观。例如:

(1) 他秉持汉人本位,支持帝国扩张(称颂汉武帝北伐匈奴、“为中国历史写下光辉的一页”;强调隋文帝以汉人身分篡周而统一,使中国不致被异族鲜卑征服,见:页160,308)。

(2) 他对历史人物之道德表现颇多臧否(批评秦始皇自大自私、奢侈残暴,也批评曹操打击士族,使社会失去道德瞻依,见:页105,117,252),不同于傅斯年之主张排除伦理与政治于史学之外。

(3) 他对南北朝、隋唐时代的佛家、老庄思想都有微词,认为儒学不失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较好方法(页333),但对于民初新文化运动之抨击中国旧学,他又推崇备至,认为此运动实为“促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之一”(页787),前后态度颇为矛盾。

(4) 他虽自认客观,但在章节处理上,将他所专长的唐代史分成五章详细铺陈,而国祚超过唐代的南、北宋,则只以三章处理,比例有失公允。

[29] 顾颉刚在抗战胜利后,以学术标准回顾中国通史写作,批评大多数的作品千篇一律、互相抄袭,也只有三部真正完成。他最推崇的是吕思勉和钱穆的作品,认为前者“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而后者“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张荫麟《中国史纲》虽好,但为未完之作。见:《当代中国史学》,页85。

[30] 区志坚,《书评:柳诒征评传》,http://www.hkbu.edu.hk/~sinohum/v.3-11.htm,页1。

[31] 根据王家范所述,该书“起于1923年讲义,1925年起在《学衡》连载,至1932年正式出版。”见: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页2。

[32]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台北:正中书局,1959台再版),(下),页287。

[33]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页iii。

[34]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页2。

[35]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页2-6。

[36]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页50。

[37]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页1-2。

[38]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页300,305。

[39]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中),页1-8。

[40]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中),第二、九、十、十五章。

[41]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中),页15,及第八、二十、二十一章。

[42]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页1。

[43]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页198。

[44]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页136。

[45]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页72-76。

[46]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中),页110。关于“中国统治技术”的问题,要到黄仁宇的书才有更周延的处理。

[47]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页344;(中),页52,299。

[48]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页213-214,228,229,285-287。

[49] 钱穆,《国史大纲》(上)(台北:台湾商务,1978),《引论》,页21。

[50] 钱穆,《国史大纲》(上),《引论》,页12-21。

[51] 钱穆,《国史大纲》(上),《引论》,页21-22,30。

[52] 钱穆,《国史大纲》(上),页87,267。

- [53] 钱穆,《国史大纲》(上),页 88。
- [54] 钱穆,《国史大纲》(下),页 419。
- [55] 例如:他称赞范仲淹《十事疏》从澄清吏治下手,再求富民强兵;王安石变法之失败,则在于“仅看重死的法治,而忽视了活的人事”。见:钱穆,《国史大纲》(下),页 419-420, 430-432。
- [56] 钱穆,《国史大纲》(上),《引论》,页 25-28。
- [57] 钱穆,《国史大纲》(上),《引论》,页 29, 701。
- [58]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页 374-392。
- [59] 钱穆,《国史大纲》(上),页 85-91, 92。
- [60] 钱穆,《国史大纲》(上),页 198。
- [61] 钱穆,《国史大纲》(上),页 343, 375。
- [62]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中),页 272-276。
- [63] 钱穆,《国史大纲》(下),页 473, 619。
- [64] 钱穆,《国史大纲》(上),页 275, 283。
- [65]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页 34。
- [66]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中),137-138;(下),页 101-102。
- [67]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页 125。
- [68] 《国史大纲》(上),页 87, 109, 307。
- [69]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台北:里仁,1984),页 177-320。
- [70]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54 台一版),页 81。
- [71] 严耕望,《我对中国通史讲授的几点意见》,《治史答问》(台北:台湾商务,1995),页 117。
- [72]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均见于:《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1978),页 1-75。
- [73] 徐复观,《良知的迷惘》,《徐复观杂文——记所思》(台北:时报,1980),页 106-108。
- [74]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1986),页 191。
- [75] 《国史大纲》(上),页 216-218;(下),页 416-417, 650-649。
- [76] 《国史大纲》(上),页 143, 374;(下),页 450;《引论》,页 28。
- [77] 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治史答问》,页 90-96。
- [78]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 344-345。

- [79]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初版于1945)(台北:五南,1995),页119,3。
- [80]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324。
- [81]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商务,1923),页ii。
- [82]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页79-80。
- [83]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10,30-31。
- [84]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40-42。
- [85]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4-5。
- [86]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15。
- [87]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51。
- [88]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82-96;(下),410-412。
- [89]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324。
- [90]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101-102。
- [91]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101-102;(下),页412。
- [92] 吕氏之“唯物史观”之不彻底,也可由他对学术思想的想法看出:“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看似虚悬无薄,实则前进的方向,全是受其指导。”见:《吕著中国通史》,页299。
- [93] 他说:“视古代为黄金时代,不但中国,希腊人也有这样思想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根本是两件事。讲物质文明,后世确是进步了。以社会组织论,断不能不承认是退步的。”见,《吕著中国通史》(上),页86。
- [94]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5。
- [95]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页474-475。
- [96]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273。
- [97]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页387。
- [98]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104。
- [99]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52-53;(下),页389。
- [100]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57-60。和钱穆不同,他认为中国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其实很低;因为地大人众、政治放任,所以改朝换代往往刺激不动人民的感情。见: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页519。
- [101]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305-306。
- [102]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304-305。
- [103]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页475-477。吕氏将历代武功亦归于“时会之适然”,因为中国国情本不适宜向外侵略。蒙古之能建立大帝国,在他看来也是“适宜天幸”,偶然性居多。见:《吕著中国通史》(下),页494。

- [104]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 61-63,101-103。
- [105]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页 157-179。
- [106]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页 379,382。
- [107]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页 418。
- [108]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页 442,487。
- [109]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页 555。
- [110]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页 555。
- [111]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现代中国思想史论》(台北:风云时代,1991),页 22。
- [112] 范文澜,《范文澜自述:从烦恼到快乐》(1941),《中华文史网》。《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收于《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页 349-360。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页 6。
- [113] 范文澜,《中国历史研究会序》,《中国通史简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年不详)。(原书初版于1941-42)
- [114] 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页 6。
- [115] 虽然吕思勉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滥觞于战国,历史悠久;但范文澜用严格的标准审视,不认为传统中国有成熟的资本主义。连商业兴盛的明朝,在范氏看来都只算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但随即又被清漪扼煞。见: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页 68,89-9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 612。
- [116]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 35。
- [117]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 258,260。
- [118]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 346。
- [119]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 290,364,368。
- [120]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 764。
- [12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 16。
- [122] 范文澜,《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页 108。
- [123]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 48-49。
- [124]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 109,112。
- [125]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 282-288。
- [126]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 285,418。
- [127]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 100-101。
- [128]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 127。

- [129]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134。
- [130]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230。
- [13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86-87,91。
- [132]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90,204,212。
- [133]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356。
- [134]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689-692。
- [135]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754。
- [136]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页230。
- [137] 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柏杨回忆录》(台北:时报,1996),页253-253,312-313。柏杨,《柏杨历史研究丛书总序》,《中国人史纲》(上)(台北:星光,1979),页xii。
- [138] 譬如说,本书(初版)关于满清攻台之役的记述即被刊削留白,见(下),页842。
- [139] 《柏杨回忆录》,页366。
- [140]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页4。
- [141]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页9。
- [142] 《柏杨回忆录》,页313。
- [143] 柏杨,《柏杨历史研究丛书总序》,《中国人史纲》(上),页9。
- [144]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页94。
- [145] 柏杨可能不认为砍砍杀杀就没有正面意义。在他看来,“中国人真正的英雄气概和高贵的精神价值,在反击(异族侵略、官员迫害)中全部显露。”见:《中国人史纲》(上),页49。
- [146] 柏杨,《柏杨历史研究丛书总序》,页5,7。
- [147]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页333。
- [148]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页49-53。
- [149]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页173-177。
- [150]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页160,272,343;(下),页673-674。
- [151]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页179,357,372;(下),页508-509。
- [152]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页405。
- [153]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页239。
- [154] 白永瑞(2004)。

- [155]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页292-295;(下),页522,726,897。
- [156]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页295。
- [157]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页232-245。
- [158]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页441;(下),680。
- [159] 柏杨,《中国人史纲》(下),页931-934。
- [160] 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页28。
- [161] 李淑珍,《徐复观在台湾——兼论外省知识分子在台湾思想史上的意义》(上),《当代》,198期,2004年2月,页72。
- [162]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台北:时报,1991),页95。
- [163] 黄仁宇,《黄河青山》(台北:联经,2001),页282,290,579。
- [164] 黄仁宇,《开场白》《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北:时报,1989),页6-10。
- [165]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26-29,46。他跳过绝大部分的上古史,而从孔孟、秦始皇开始谈起,因为此后统治技术的问题至此才变得迫切。
- [166]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xv,33-34。
- [167]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台北:食货,2000),页330。黄仁宇,《新时代的历史观》(台北:台湾商务,1998),页15。
- [168]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232。
- [169] 黄仁宇,《新时代的历史观》,页17。
- [170] 黄仁宇,《新时代的历史观》,页44-56。
- [171] 黄仁宇,《黄河青山》,页574,578。
- [172] 《赫》书每每以著名历史人物(如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作为篇名,但是作者重点却不在臧否人物是非,而是在说明个人作为难以扭转制度性缺陷。
- [173] 周梁楷,《大众史学:人人都是史家》,页77-79。
- [174] Georg G. Iggers,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Since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Critic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p. 134.
- [175] Georg G. Iggers,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Since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Critic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34-136.
- [176] 杜赞奇(Pransa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2。
- [177]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页202,146-147。

- [178]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1期,页3。
- [179] 钱穆,《国史大纲》(上),《引论》,页3-4。
- [180]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收于同名书,页12。
- [18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页31。
- [182]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全集》,页320-321。
- [18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7年演讲)(台北:台湾商务,1990),页236-241。
- [184] 彭明辉,《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以考据与经世为主轴的讨论》,收于:魏格林、施耐德主编,《“中国史学讨论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台北:稻乡,1999),页271。
- [185] 如果仍有心从事“中国通史”写作,为了避免单线叙事方式容易造成的排他性,史家或许可以模仿(长篇)小说叙事技巧,多线进行,融汇交织,以便容纳不同声音。但这方面非笔者所长,还有待于方家。
- [186] 以下介乎通俗与学术间之西方“通史”作品,可供大家参考:
1. Jared Diamond,《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王道还译。台北:时报,2000。
 2. 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廖月娟、王道还译。台北:时报,1998。
 3. Robert Levine,《时间地图》,冯克芸等译。台北:商务,1997。
 4. Margret Wertheim,《空间地图》,薛绚译。台北:商务,1999。
 5. Rosalind Miles,《女人的世界史》,刁筱华译。台北:麦田,1998。
 6. William H. McNeil,《瘟疫与人》,杨玉龄译。台北:天下远见,1998。
 7. Jack Weatherford,《金钱简史》,杨月荪译。台北:商周,1998。
- [187] Richard E. Palmer, *Hermeneutic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11-119.

人間現場

香城故事 (四)

（四） 香城故事

任强

九、“老革命”上访记

钟摆八声，“老革命”连续五天准时来到了县政府。门口保安哭丧着脸，却没人敢拦他。第一天的时候，他们还曾经趾高气昂地尝试过，结果“老革命”当场褪下他那条饱经风霜、据说是从抗美援朝战场缴获的美军军裤，拍着当年被美国鬼子105毫米榴弹炮削成一马平川的屁股，大义凛然地把他们祖宗八辈骂了个遍。

不用人指路，他拖着那双忠心耿耿、已然刷得泛白的美制翻毛大头军靴踢踢踏踏地挪进了县长办公室。

“刘县长，我给你作揖了！”老革命说着，作势要拜。

“那不敢，您是长辈啊。”一阵虚情假意的忙乱！

“我反映的情况组织上总得给个说法吧！”

我闺女在路边捡了个孩子，大冬天的，她不能见死不救，就抱回家收养了，结果‘孙痞子’楞要开除他们两口子。天底下有这样的王法吗？啊！我倒是要问问，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咋能干这国民党都干不出来的事？”

闻听此言，刘县长一副不耐烦神情，打了几声矫揉造作的哈哈后，一本正经驳斥到：“老前辈，您反映的情况这两天都已经反复核实了，的确是您女儿、女婿违规生了二胎，按纪律必须‘双开’（开除公职、党员劝退）。计划生育是国策，我说了不算，您说了也不算。香城镇党委政府是按规定、依照事实处理的。”

“事实？”老革命恼羞成怒了，恨恨地高声叫板，“我告诉你什么是事实！我，一个有四十二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山上打游击那会，你还在娘胎里没露头哩。别说是你，就是你老子老刘县长在位的时候，他也得耐心听我老

李说道。1943年，我刚刚十五岁，就入了队伍，跟那个三八大盖一般高。被小鬼子撵得满山跑，白天只敢窝在山缝树丛里，晚上没人了才能出来找点吃的，忍饥挨饿，吃了上顿没下顿。那帮老兵会糊弄人啊，说把裤腰带勒紧点就不饿了。他奶奶的，全是骗鬼的话，我把裤带都勒断了，照样饿得睡不着觉。从那以后，就落下个毛病，贪吃啊，看见啥都想咬一口。你那个狗日的秘书不是说我昨天咬他了吗？这个我承认。不过，我不是故意的，是情不自禁。他把我堵到办公楼门外不让进，还不正眼瞧人，我就只能看见他那个肥嘟嘟的大耳朵。想起以前的苦日子，我就把它当成是猪耳朵了，所以就痛痛快快地啃了两口……这都是闹革命落下的病根！

“想当年，挨饿还是小事，小命朝不保夕地在裤腰带上提溜着，不知道哪天就吹灯拔蜡！在大田庄，被坏人告了密，一排人被日本兵和汉奸九支队给堵上，活活烧死了，惨不忍睹……我是从死人堆里捡回了一条命！”

“好不容易盼到小日本投降，刚啃了几天舒心馒头，又接着和蒋介石争天下。跟着陈赓，咱随大军从山东一路南下，打到海边。在二野，咱们县整整组了一个团的队伍，（活着）挨到解放的，只剩下不到一个连。香城就我、山里的蔡九、富贵庄的老崔仨人是喘着气回来的，其他全完了，死在哪里都不知道。后来给（家

属）的骨灰（阵亡烈士）全他娘骗人的，那年头活人都顾不上，更别提死人了……”

“再后来抗美援朝。刚过鸭绿江，就一口气急行军十八天，拿人当骡子使唤，腿都走散架了也不能歇。我受的那个罪，够你八辈子受的……老天爷也是他娘的势利眼，那年又下了几十年不遇的大雪，不少人就这样活活给冻死了。美国鬼子仗着武器好欺负咱，那炮弹天天就乌泱泱地往阵地上落，从早到晚不消停，比六月天的蚊子还密。我就是在那受的伤，屁股被美国鬼子的炮弹片给削去了大半拉子。血水汨汨地往外冒，把两条裤腿都灌满了。蔡九帮我到处扒拉那炸飞的屁股肉，后来倒是找到了，却没用，缝不回去了！零下二十多度的天，老早被冻成了冰疙瘩，我操老天他奶奶……”

老革命越说越激动，干脆把屁股掉转过来对着刘县长，又要脱裤子亮功。

“不用看了，不用看了，我知道您的确劳苦功高”，刘县长尴尬地拉住“老革命”的双手，用让自己都感到害臊的亲切语气说：“要是您个人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解决。可这次的事情是公事啊，咱不能公事公办，您说是吧！”

“好！咱共产党员不讲私事，那咱就来谈谈公事！”“老革命”义正辞严地接过话茬，挺了挺已然鼓不起来的胸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坚定的马列主义战士，我代表香城被欺压的老百姓，强烈要求把‘孙痞子’这

个祸镇殃县的败类清除出党，绳之以法。”

“老前辈，话可不能乱说，诬告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刘县长稍显烦躁地提高了嗓门。“放心，要是说错了，我就一声不吭任你处置，哪怕把牢底坐穿，也心甘情愿”，老革命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翻了翻眼皮。“我打听过，知道‘孙痞子’是你刘县长的爱将，当年也是你提拔的他。不过，你是你，他是他！咱共产党员眼睛里不揉沙子，谁要是想掺私货，可别怪我连底兜出来。”

“哦。那我倒要请教下老前辈，孙福明究竟是如何违法乱纪的？”刘县长冷冷的语气里透着威胁。

“他违法乱纪的地方多着呢，我给你细细掰扯掰扯。你刘县长去过香城，327国道沿线那一溜溜的小饭店知道吧，每个饭店门口都站着几个妖里妖气的‘狐狸精’比赛亮骚。朗朗乾坤之下，青天白日照着，‘孙痞子’连着几年放任不管？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该有的立场？这是香城镇党委政府领导的方向？白天还好，到了晚上，粉红灯笼一挂，饭店就变成‘窑子铺’了。这是事实不？是我诬陷吗？”

刘县长有点尴尬，晃悠着溜光水滑的脑袋乱咳嗽，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孙痞子’年纪轻轻，不瞎也不聋，为什么不管？他不敢啊！被人攥着把柄呢。打铁还得自身硬，他的卵子被人家捏在手心，早就被

捏成一块废铁了。去年七月里，孙痞子在香城跟女人乱搞，被他老婆抓了现行。就在镇政府大院闹腾，丢人啊！这事不止我一个人知道，你县长也有所闻吧。事后，他还指使‘郑屠’把在场的人都威胁了一遍，扬言谁把这事传出去就叫谁滚蛋。你刘县长要是还不信，就派人去香城调查，要是与事实不符，我就把卵子割下来，扔大街上喂狗！”

眼见着刘县长陷入了半真半假的沉思，“老革命”不慌不忙地要了杯茶，润了润嗓子：“他不仅作风腐败，还任人唯‘坏’。就拿开饭馆的‘郑屠’来说吧，那是个什么东西？一身的匪气，十足的流氓！就知道坑蒙拐骗，欺压良善，是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货。早年我当镇长那会，都懒得正眼瞧他。可‘孙痞子’却拿着当成宝，听说这次还想提名他当副镇长候选人。为啥啊？一丘之貉！香城是落入流氓恶霸手里了，完全被那些鱼鳖虾蟹占领了。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流氓聚成了群，就会把那儿的正气吞掉。夜晚的街上，一片花花世界，婊子们满街招呼。共产党几十年的心血算是白费了，香城完了……”

“前几天，孙痞子‘恶人先告状’，跑到你们领导那里嘀咕我，说我胡搅蛮缠，倚老卖老，打砸镇政府。你们偏听偏信，还叫老干部局的人找我谈话。荒唐，太荒唐了，简直叫人笑掉大牙。不错，我是掀了他的茶几，摔了他

几个杯子。要是有力气，我还想掀了他狗日的春床呢。你们领导以为是因为他罢了我闺女、女婿的工作，我故意找茬。不是，绝对不是。你们要是这么想，就是门缝里瞧人，把老同志的衷心看扁了！

“那天，我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镇长，想找‘孙痞子’谈谈心，看着香城这么一天天地腐烂下去，我痛心！痛不欲生！我觉得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给他提提醒，泼点使他改邪归正的凉水。我进了书记办公室，他坐在那里，屁股都没抬一下，不冷不热地叫了我一声‘老李’。虽然他态度有点倨傲，一点也没礼貌，可咱不是轻易为老不尊的人。我忍着！用尊重的语气想跟他谈谈我女儿女婿超生的真实情况，刚说了两句，他就不耐烦了，说有很多文件要处理，要我去找刘副书记。借口，完全是借口！我以党性起誓，那天他醉眼朦胧、哈气连天，他绝不是打算看文件，他是想睡觉。可我还是忍了！告诉他再困也得等我把话说完。接着，又跟他反映香城‘黄赌毒’的问题，却不想触到了他的痛处。‘孙痞子’做贼心虚！不但不虚心接受，还反过来教训我，让我自己到温凉河里洗洗封建的老脑筋，为香城经济发展多着想。我还想忍，可实在忍不住。香城镇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不能让他这种淫荡的念头占上风。重症必须下猛药，要挽救他就必须对他当头棒喝！于是，我心如刀绞地动了手。

“结果，‘孙痞子’却依旧执迷不悟，一错再错，竟然打电话叫派出所的‘吕大脑袋’来吓唬我。士可杀不可辱！我，把脑袋掖在裤腰里干革命的人，不止一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共产党员，不会被这种鬼把戏吓倒，也不能被吓倒！为了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我只好把派出所能看见的玻璃全给砸了，把那辆‘只会吓唬好人，从来抓不住坏人’的警车也给拆了。我就是要香城人民看看，究竟是正不压邪，还是邪不压正！！我就是要让香城人民知道，香城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不是流氓恶霸的天下！更不是妓女嫖客的天下！”

“我承认我的行为有点过火，可用心良苦！我是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用不得已的办法来挽救党和政府在香城的名誉。你们领导去香城打听打听，哪个香城百姓听了这个消息不拍手称快！要是老百姓说我做错了，冤屈了好人，我就吊死在香城镇大门口，给‘孙痞子’和‘吕大脑袋’谢罪！”

“老前辈，不管怎么说，您也不能打砸东西，那是违法！”

“刘县长，您尽管放心，该领什么罪我就领什么罪；该赔偿的东西我一文不少地罚。不过，‘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孙痞子’的违法乱纪怎么处理？你得给我个明确答复。你要是为难，就吱一声，我到市里、到省里去反映，我就不信咱共产党掌权的政府就没有说理的

地方！”

……

“对了。我还听说，‘孙痞子’有重大贪污受贿的嫌疑。去年，全镇兴修小水利，从省里到县里拨下来二、三百万块钱，老百姓又集资了几十万，结果就只修了富贵庄、东林庄两个不起眼的水坝子，其他钱到哪里去了？今年，香城全镇分任务栽枣树，明着说是‘逼民致富’，实际上是为了个人捞好处。三五毛钱一棵的枣苗，‘孙痞子’通过‘郑屠’明目张胆地卖十块，中间那么多的差价到底被谁捞去了？这个数目可不小，至少上百万。我看别说是‘郑屠’一个小小的站长，就是‘孙痞子’也未必就敢一个人这么干！不过，咱有一说一，这些事我没有真凭实据，都是道听途说。领导上要是用得着，回头我再发挥下余热，去调查清楚，再来给你们汇报汇报……”“这事不用您老人家出马”，刘县长沉吟着挥了挥手，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个手势表明刘县长已经下定决心要做出牺牲了。

“老前辈，您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下午就跟书记汇报。看来孙福明这两年是变了，越来越骄傲。年纪轻轻地不学好，不尊重老同志，不尊重老领导。这种风气决不能助长，我一定勒令他上门给您赔礼道歉。至于打坏的那些个破烂东西么，不值几个钱，就算了。绝对没人敢让您赔偿，这事包在我身上。”

看到“老革命”气色有点缓和下来，刘县长又用跟他身份不相称地殷勤语气补充：“人无完人！您老人家消消气，也别老揪住他小辫子不放，还是多从大局着想”，边说，边亲热地起身拉住“老革命”的双手，“时候不早了，就委屈您老人家到食堂一起吃个中饭吧”。

“老革命”并不推辞，颇识大体地微笑着表态：“那就让领导费心了。咱知道党的纪律，不会得理不饶人。个人意见归个人意见，只要你们领导上决定的事，我坚决拥护。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能‘治病救人’，只要孙福明别骄傲，我看他干事情还是有点魄力的……”

在去食堂的路上，刘县长漫不经心地嘱咐：“既然孩子确实是在路边捡来的，就赶紧让您闺女、女婿去县福利院开个收养证明。只要是经过正规批准的收养，就不算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这事我让胡秘书帮着协调……”

十、“大背头”小传

“大背头”的历史是老许告诉我的。按照老许的总结，“大背头”截止目前的一生可以简略概括为：靠“两举”上台，被“一举”下台。

“大背头”家从上八辈子算起就是贫农，祖宗八代的最大理想就是能攒点钱，买几亩土地来自家折腾。到了“大背头”和他爹这一

辈，终于时来运转，靠着党的好政策，“大背头”家借势土改，仗着人多，轻轻松松翻了身。虽然早已过了上学的年龄，他爹还是逼着“大背头”去读了几年书，好歹混了个高中毕业，成为那个年代农村正经八百的知识分子。那几年读书时候，由于年龄优势明显，大背头自然而然成为了学校的“孩子王”。这个在“小圈子”里有名、有利、有地位的经历彻底改写了“大背头”的人生选择，他从此变得对折腾土地毫无热情，对折腾人却充满了向往！

为了坚定自己选择的人生新道路，也为了在村里造成有利于他新抉择的舆论氛围，“大背头”毕业回村以后经常态度认真地消极劳动。生产队下地干活时，“大背头”总是有意无意带上一张报纸或者一本小说。劳动间隙，男社员们抽烟扯淡，女社员们三五成群议论家长里短，只有“大背头”一个人默默不倦地用眼睛数方块字。再加上他锄地时经常把草留着，把苗铲去；收麦时，他经常把镰刀对着别人的小脚腕子挥舞；在几十次的咒骂加脚踹之后，村大队书记终于妥协了，把他赶去放牛。“大背头”的理想是折腾人，大队书记让他折腾牛的决定显然是无法让他满足的。只要没人看见，他就毫无客气地用放牛鞭往牛身上比较隐秘的地方猛戳，通常的选择是公牛的卵子或者母牛的奶子，几乎天天把牛戳到满山遍野乱窜，非得出动全生产队的人才能找回来。大

队书记终于绝望，也彻底觉悟了。在“大背头”他爹又送了两瓶好酒之后，大队书记代表全体社员跟公社提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请求，“这孩子天生爱学习，只适合教书，不适合参加农业生产”。就这样，“大背头”占用了村里的一个招工名额，摆脱了“泥腿子”命运，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或许是因为之前读书太努力，到学校任教以后，“大背头”对知识失去了兴趣，这也导致他到马庄中学（县三中）任教半年以后，就被时任校长阎福才毫不客气地从主讲初一语文调整为专管体育。鉴于既没有器材，又没有场地，他的体育课除了教授不标准的广播体操和眼保健操以外，基本以“野玩”为主。在这个新的岗位上，“大背头”结合学校和学生实际情况，提出了“劳动锻炼+伙食改善”为一体的教学思路，并获得了校长和学校食堂的首肯。春天到了，他就带着学生满麦地里溜达着挖野菜；夏天到了就沿着河边柳树粘知了，偶尔也借游泳的名义摸鱼抓虾；秋天就上山捡野酸枣，顺带着寻几只大青蝎子来油炸了下酒；冬天基本上是以备战和打靶的名义挖战壕和操练匍匐前进。凭借着贪玩天赋和放牛时练就的野外生存本领，“大背头”终于迎来了教学生涯中的春天，他逐步成长为最受学生欢迎、知名度最高的老师，还顺带着俘获了一颗幼稚的芳心（几年以后，这颗“芳心”成为了

他的前妻)。

教学生涯上了正轨,“大背头”却并不十分受用,总感到莫名的委屈和不过瘾。好在1966年及时来了,这种任性而又狂暴的节奏触动了她骨子里的“痒”!天生就拥有狐狸般嗅觉的“大背头”半推半就地抓住这个机会,开始高调而又节制地折腾人。这是个爱憎分明的年代,也是命运多舛的年代,有多少人人为之热血沸腾,就有多少人为之脊背发凉!

1966年7月,由县委宣传部、教育局两个部门组成的3人工作组进驻马庄中学,宣布学生不放暑假,不参加夏收夏种,停课闹革命。靠着上八辈都是贫农的过硬后台,“大背头”第一个被工作组相中,指导他成立了马庄公社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万山红遍战斗队”,并由他担任指导员。工作组指示,“万山红遍战斗队”的当务之急就是挖出马庄中学暗藏的“黑线”,彻底揭发和打倒时任校长阚福才。阚校长出身富农,毕业于国民党时期的县师范学校,工作组理所当然地认定他是“阶级敌人”。为了完成这个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大背头”睁开“火眼金睛”,依靠“阶级斗争”的显微镜,借助超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发表了一篇爱憎分明的批斗演说。

是日,为了给自己壮胆,“大背头”挥舞着一只皮鞋上了台:“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

要进行批判,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咱们马庄中学的情况和全国形势一样,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资产阶级在这里已无藏身之地。但是,百尺之虫,僵而不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还在用各种办法来负隅顽抗。阚福才就是资产阶级在我校的代理人和幕后黑手,我手里的皮鞋就是铁证”。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备战、备荒、为人民’,要‘节约闹革命’。阚福才,这个暗藏祸心的黑帮帮主,却公然违背最高指示,贪图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奢侈浪费。大家都穿布鞋,全校就他一个人穿皮鞋。不仅穿皮鞋,还每天把头发梳的铮明瓦亮,就像被老母狗用舌头舔过一样地溜光水滑!一双皮鞋多少钱?那可以买十双布鞋。咱们学校很多学生一年到头都穿不上一双新布鞋,鞋帮子上补丁摞补丁,有的还露着脚趾头。他倒好,哼!……”

“今年春天里,公社组织全校教师、学生到高桥大队支农。大家伙都光着脚丫子在地里干得热火朝天,就他一个人在地边上溜溜达达,指指点点,不懂装懂。咱们弯腰玩命干,他挺直腰杆站着看,那态度跟地主老财对待贫下中农没什么区别。后来虽然装模作样下地干了一会,却既不脱鞋也不脱袜子。这是什么思想?我看他是骨子里不屑于与贫下中农为伍,不屑于参加生产!”

“在学校,他以权谋私、拉帮结派,故意

打击贫下中农群众，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去年，县里给我们学校三个到县师范学校的进修名额，都是谁去的？全是他自己以前班上教过的学生，全是他的孝子贤孙，一个（出身）中农，两个（出身）富农。我八辈子贫农，根正苗红。报名的时候，他却说我‘你一个教体育的半吊子去凑什么热闹’，直接就没让我报名。我虽然是教体育的，可干的也是革命工作啊。再说，高中部的李胜，三代贫农，他可不是教体育的，不也照样没选上！

最后，“大背头”斩钉截铁地宣布：“毛主席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阚福才的反动‘小尾巴’在裤裆里掖得很深，可他掖得再深，也挡不住群众的火眼金睛；他的屁股虽然是两瓣的，可他一半屁股坐在资产阶级怀里，一半屁股坐在地主老财怀里，没给贫下中农群众留一星半点，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必须把他打倒，再踩上一万脚！必须踩烂他的屁股，让他遗臭万年不翻身！”

“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及其走狗！”

“打倒黑帮帮主阚福才！”

……

伴随着台下山呼海啸的口号声，“大背头”兴奋的红透了脸蛋，心里的一丝犹豫和隐忧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在口号的督促下，他觉得

自己必须干点什么。于是，他举起了那只皮鞋，以“黑手高悬霸王鞭”的姿势，伴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勇气往阚福才脸上疯狂抽去……

这次批斗会彻底改变了“大背头”在学校的民间地位，虽然表面上阚福才依然是校长，“大背头”也依然是一名普通的体育老师，可他的话比较长还管用。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以前，每天上、下学的时候，阚福才都威严地站在校门口抽烟；现在，站在那里抽烟的是“大背头”，并且有四名把门检查的“红卫兵”陪着。第二年开春，根据毛泽东革命的“三结合”^[1]指示，“大背头”理所当然地被结合进了学校领导班子，并担任马庄中学的革委会副主任。

作为一个闲不住的人，“大背头”上任以后的第一把火就是以“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为依据，把马庄中学折腾成了农业中学。申请报告递上去以后，无论公社还是县里都没有人敢有丝毫微词。不到半个月，县里就出台了文件，从马庄中学驻地所在的马庄大队和相邻的高桥大队划拔出五百亩土地，交给学校开办农场。不仅如此，“大背头”还以建设高标准试验田的名义从县里一并要来了一万块巨款。由于对吃鱼比较感兴趣，“大背头”就光明正大地打报告用这一万块钱挖了一百亩鱼塘。开挖那天，照例先把以阚福才为首的四类分子批斗一番，并勒令他叼着一只皮

鞋参加了挖塘劳动。

看到指导员如此“革命”，他领导下的红卫兵们再也沉不住气了。“破四旧”吧，心有余悸！上次在“大背头”的带领下，本来想去龙王堂把朱龙王的庙给拆了，没成想被附近几个村的一帮革命群众给揍了回来。为了找回脸面，只得回学校把图书馆里1949年前出版的书焚烧殆尽。后来虽然采取“夜袭”的方式偷拆得手，可回家却被爹娘骂得天昏地暗。一帮大孩子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革命”却安全的方式——教贫下中农背诵毛主席语录！从此，马庄集市上的各个路口多了一群戴着红袖章、扛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红旗的红卫兵，拦着赶集的农民背诵《毛主席语录》。不会背诵或背不全的，当场学会才能上街。背错的，当场训斥，训斥不服的就拉到集上“游街”。这样轰轰烈烈地搞了大半年，基本上无人可抖了。连走路大喘气的老头老太，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随口说出“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魂深处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等最高指示。

红火的日子过了不到两年，“大背头”就尝到了被其他革命群众“造反”的苦头。1967年底，以“大背头”为首的“万山红遍战斗队”没有参加对公社党委的再次夺权，也没有组织红卫兵出席对时任公社书记张仁寿的批斗大会，他因此被以公社武装干事为首的另一

伙造反派“红翻天战斗队”（属于“六大”造反组织^[2]）宣布为“保皇派”，认定他是“形左实右”的“八大”造反组织走狗。两派从此开始互贴大字报，展开了偶尔伴随着石头砖块的“文攻武卫”。1968年下半年的一天，“大背头”独自在供销社排队买包子的时候，被“红翻天战斗队”的三名队员发现。双方展开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口水大战。“大背头”器宇轩昂，一手高举着“红宝书”，一手拎着肉包子，唾沫星子四处飞溅，把“红翻天战斗队”的三个革命群众抢白得面面相觑。动嘴占不到上风，他们只好动手了。三人怒目高喝：“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一边喊，一边把“大背头”摁在地上拳打脚踢。“大背头”迎着拳头毫不退缩，虽然被揍得血流满面，可他还是不服气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来，被揍得实在受不了了，他只好委婉地求饶，再不敢喊“毛主席万岁”，改口喊“最高指示‘要说服不能压服’”；看人家还不停手，又继续改口：“向革命群众学习！”“我是贫农，群众不能斗群众。”看他已诚心服软，三人才骂骂咧咧地罢手。一顿胖揍还不算完，三人又把“大背头”当成俘虏押回了设在公社大院的“红翻天战斗队”指挥部，准备改天把他和公社书记张仁寿放在一起开批斗会！

“大背头”被抓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公社。

“万山红遍战斗队”的大孩子们顿时抓了瞎，他们还真不敢随便闯那帮以公社基干民兵为骨干的“新造反派”老巢去救人。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正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大背头”的父亲、三个叔叔、两个姐夫、五六个叔伯兄弟，还有两个舅舅闻讯赶来了。他们带来了各自要好的几十名亲戚庄邻，联合“万山红遍战斗队”一百多名红卫兵，组织了一只近两百人的营救队伍，一路高呼着口号，奔向了公社大院。人多自然势众，对方一共才十几个造反骨干分子，根本没敢跟他们照面就跑光了。一通发泄式的乱砸过后，“大背头”连同被关押在一起的公社书记张仁寿被放了出来。撤退的时候，被“红翻天战斗队”折腾怕了的张书记主动要求“大背头”一伙“专政”他，死皮赖脸地跟着“大背头”回到了马庄中学。

自从被革命群众“专政”后，大背头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造反行动。狂热的头脑渐渐冷静下来，他决定要静悄悄地纠正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于是，他再不勒令老校长阙福才在批斗时要嘴叼皮鞋，也不再卖力批打校内的其他“四类分子”。相反，他却热衷于送点顺水人情给他们，比如批斗他们的大会尽量提倡文斗而不是武斗，让他们在校内可以自由活动，晚上也不再关他们禁闭，而是允许他们回家睡觉吃饭。在老校长女儿读高中的问题上，他爽快地同意对方作为“可

教育好的子女”入学，等等。“大背头”的新政策让学校的“四类分子”们感激涕零，也让校外的其他“专政对象”们艳羨不已。实事求是地说，1968年底以后，马庄公社所有的群众专政对象若是能被发配到马庄中学的校办农场改造，他们全家私底下总是要衷心庆祝一番的。

对待被打倒的公社书记张仁寿，“大背头”不仅没有继续“专政”，反而冒着被揭发的危险，格外关心他的生活。他安排张书记负责看守学校农场的鱼塘，还拨了两间教室给他住，并同意他的妻子住到学校照顾他。当然，“大背头”白天照常对张仁寿进行例行批斗，有时候迫于形势还斗得穷凶极恶。比如1969年国庆节时，适逢建国三十周年大庆，马庄两个最主要的造反派自然都要押着“专政对象”游街批斗以示“造反”成果。在中心大街上，双方不期而遇，为了分出谁更“革命”，双方在当街对各自的专政对象展开了“拷打”比赛。一方让专政对象弯腰九十度，另一方就让专政对象必须脑袋触着地；一方用脚踹专政对象的屁股，另一方就用脚踹专政对象的肚子；一方用手扇专政对象的脸蛋，另一方就用鞋底抽；一方打断了一根棍子，另一方就非得打断两根棍子才住手。如此折腾了一个上午，所有的专政对象都被揍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双方才喊着口号各自收队。是夜，“大背

头”手拎猪头肉，怀揣云南白药和一瓶老白干，悄无声息地摸进了张书记宿舍进行抚慰。大背头与张书记就这样结下了心照不宣的“专政”友谊！

1970年1月起，在中央的过问下，山东的“六大组织”被清算审查。自然，被他们打倒夺权的各级领导也重新回到了各自岗位。马庄也不例外，张仁寿重新掌权，成为了公社革委会主任。鉴于自己的切身体会，张仁寿重新上台后虽然不敢明着停止马庄公社的各类批斗大会，却也尽其所能地冲淡了“阶级斗争”气氛。紧接着的“林彪事件”，彻底摧毁了马庄革命群众对“折腾人”的热情，“大背头”也在这一年开始了新的人生道路。在张仁寿的支持下，“大背头”于1972年被送到县师范学校学习进修，两年后毕业回来，就立马被公社借调为宣传干事。

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伴随着李仁寿由公社革委会主任、副县长、县长的一路升迁，“大背头”也先后担任公社宣传干事、镇委副书记、镇长、镇党委书记等职。他的仕途在1987年达到顶峰，不仅被任命为马庄镇的党委书记，还被推荐为县级后备干部。

志得难免意满，“意满”的男人往往会为情所扰，“大背头”也未能免俗。这个人老心不老的家伙，这个已有一女一子的半大老头竟然在五十岁时二度恋爱了，他恋爱的对象

是一个尚未婚配的姑娘。坠入情网的“大背头”享受着幸福滋味，天天要精心打扮一番才肯出门（据老许指认，他的发型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留起来的），这自然瞒不过跟他一样精明的老婆。这个对看家护院处心积虑的妇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了“大背头”的现行。大闹的结果以双方离婚收场！“大背头”也被县委从马庄镇党委书记调整到香城镇人大任职，再后来又到了镇政协，完全沦为了乡镇“闲人”。二度青春之花在“大背头”的脸蛋上开放了不到一年就萎缩了！这就是“大背头”靠“戳（牛）卵子”“哈卵子”（溜须拍马）上台，因“举卵子”而下台的故事。老许他们说，正是这场虚情假意、让人感到丢脸的“随便”葬送了“大背头”的仕途。“大背头”却并不以为然，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错误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

一个偶然的午后，我在香城镇大院遇见了已为他人妇的“那位姑娘”，她是来看“大背头”的。看着“大背头”这个老奸巨猾的人，竟然乖乖像孩子似的任她摆布，老脸上布满皱纹遮不住的羞涩。我相信了“大背头”的话。

（未完待续）

注释

[1] 1967年3月,《红旗》杂志的一篇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新政权命名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以及革命委员会组建原则的“三结合”方针。要求从上到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按照这个指示,马庄中学的革命委员会由一名出身贫农的原副校长任主任,“大背头”任副主任,还有一名副主任是马庄大队书记。

[2] 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临沂地区各革命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7年1月24日夺取了前地委专署的大权,4月9日正式成立了临沂地革委。在如何看待地革委的性质问题上,群众之间产生了极大分歧,一派认为地革委是“大杂烩”“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必须彻底砸烂;一派认为地革委是已经实现了“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左派政权,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浴血奋战的胜利成果,不能拆台,只能补台,更不能推倒重来。这样,临沂群众便逐渐分裂为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别:前者为“六大组织”和后者为“八大组织”。由于执掌山东文革大权的王效禹推行“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路线,动用全省的力量支持“六大组织”,打击“八大组织”,导致两派长期武斗不止,临沂陷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最混乱的历史时期。文革中临沂地区的武斗规模之大,波及面之广,破坏之严重,影响之深远在山东乃至全国都极为罕见。据1978年12月2日《大众日报》不完全统计,武斗期间临沂地区的群众共有四万多人被抓捕、关押、惨遭毒打,其中有569人被打死,有9000多人被打伤致残。当地驻军中有2000多名指战员也遭到毒打,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打伤致残。临沂成为十年动乱中山东有名的“重灾区”。1969年“九大”前后,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解决山东问题的《五·二五批示》和《十条》开始纠正王效禹在山东的错误路线,但收效甚微。1970年1月开始,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各级革委会开始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深入揭发清算王效禹的错误。至此,临沂武斗才渐渐得以得以平息。

作者简介

(以姓氏拼音为序)

程 凯 1974年生，曾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左翼文学。著有《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2013）；近期发表论文包括：《“硬译”于文化革命的主体性》《从解读鲁迅出发的反思革命政治》《和平意愿与中共的政治动员：1950年的“和平签名运动”》等。

符 鹏 1983年生，201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目前的研究兴趣集中在英国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史研究，尤为致力于当代工人阶级的历史、政治、文化与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何 浩 1975年出生于重庆，200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目前主要关注1940年代至1950年代中国革命历史经验。

姜 涛 1970年生，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著有《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巴枯宁的手》《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等。

卡维波 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特聘教授，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成员。现为《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主编。研究领域主要为社会政治理论、性/别

研究。代表著作有：《民困愁城：忧郁症、情绪管理、现代性的黑暗面》（与何春蕤合著）、《卖淫的伦理学探究》《性工作与现代性》《身体政治与媒体批判》等。目前兴趣在于关切当前中国思想状态。

李淑珍 1961年生于台湾台南，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中国思想史、台湾文化史和当代儒学《东周丧葬礼制初探》及《安身立命：现代华人公私领域的探索与重建》等书。目前任教于台北市立大学，以史学从事生命教育。

李志毓 2009年人大清史所博士毕业，现任职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政治史。出版专著《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译著《幸运儿》（商务印书馆，2014年），发表《汪精卫的性格与政治命运》《1928年国民党内激进“左派”的“党治”理论》《国民党“左派”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论”》等论文十余篇；关注中国现代社会思想与社会运动，目前希望通过研究国民党内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路线之展开与曲折，探讨中国革命的复杂历史过程。

鲁太光 1970年代生人。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供职于《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研究兴趣有二：一是注重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相关左翼文艺理论为指导，研究“革命文艺”，尤其侧重于研究“革命文艺”自“新时期”以来遭遇的价值逆转，力图将“革命文艺”放置在具体的历史境遇、理论境遇与文学境遇中发掘其历史合理性、理论合理性以及文学合理性；二是注重追踪当前文学创作现状，尤其侧重于研究

文学创作与文学生产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力图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重构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图景。

- 罗 成 1982 年生于湖南长沙，2009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博士后，现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目前主要关注现代中国的文学思想、文化研究、审美教育。
- 吕德文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长期从事田野调研，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和城市基层治理。已出版《洞村的圈子》和《乡村社会治理》两部专著，即将出版《找回群众——重塑基层治理》和《街头政治：城市暴力的兴起》。
- 莫 艾 1974 年生，1998 年毕业于中央美院中国画系，2004 年至 2008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史论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致力于中国现代艺术史研究。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美苑》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 任 强 1975 年生，政治学博士，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相关研究，并关注社区及乡村发展。
- 王智明 现任台湾中研院欧美所副研究员，清华大学人社系与交通大学社文所合聘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亚裔美国文学、文化研究以及学术建制与思想史。著有专书 *Transpacific Articulations: Student Migr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n Americ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编有《东亚脉络下的钓鱼台：继承、转化、再前进》(与刘容生和陈光兴合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启蒙, 狂飏, 反思: 保钓运动四十年》(与谢小岑, 刘容生合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以及 “Asian American Studies in Asia”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3.2 [2012])。目前正在进行关于外文学门学术建制与思想史的相关研究。

- 谢丹琳 历史学硕士, 曾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 现就职于厦门大学学生工作部。
- 徐进钰 台湾大学地理与环境资源学系教授, 国际批判地理学组织 (ICGG) 的执行委员,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前总编与社长。研究领域主要为资本主义下多变的城市区域发展面向, 新自由主义中空间政治, 以及东亚国家经济特区计划中有关主权、边界与地缘经济关系。代表著作作为《异议》(与陈光兴合著)。
- 张 侃 1972 年出生, 浙江温州人, 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 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所长、两岸和平发展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曾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香港中文大学 AOE 计划(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区域社会文化史。
- 赵 刚 任教于台湾东海大学社会系。近来颇乐于“尚友古人”, 但于身心滋养中

又怕“脱离现实”。结合古人与现实是其很想要达成但同时又深知自己并无才能达成的一个愿望。

郑鸿生 台湾台南人，1951年生。1973年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留美电脑硕士。现从事写作，著有《青春之歌》（2001）、《踏着李奥帕德的足迹》（2002）、《荒岛遗事》（2005）、《百年离乱》（2006）、《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2010）、《寻找大范男孩》（2012）等。

约 稿 函

一、《人间思想》旨在承接陈映真先生《人间》杂志的精神脉络，扎根现实，深耕社会，呈现当代人的思想与情感、困惑与怀抱。

什么是“人间思想”？我们没有答案，因为“人间思想”并不现成，它潜在于 20 世纪以来的诸多思想、写作与实践之中。在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政治理论、历史学、社会学甚至艺术实践中……在这些被整合进各个“学科”的写作与文化生产中，总还有些一言难尽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这许多的写作总还写不尽心中块垒？一次次面对现实的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一次次逼上梁山的写作与颓然搁笔，那些写不清道不明的，是我们的“情感剩余”还是“现实剩余”？

“人间思想”并不现成，它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人和艺术人，在各自的现世牵连与写作实践中，培养出一种共同的人间视野与现实关切。“人间思想”所关怀的，是乡土，是家国，是田野，是纠结离散的记忆，是“人-民-群-众-我”的身世与命运。为此我们谨以本刊向所有知识界、艺术界的同仁约稿，让我们从人间出发，在人间思想，为“人间思想”，共同塑造一种“感同身受、有情有义”的写作方式和思想姿态！

二、本刊欢迎所有心怀人间的写作者投稿。同时本刊特向诸位同仁征集近代以来汉语写作中具有“人间思想”气息与性质的文本，以备在未来开辟“人间思想档案”专栏。

三、来稿请以 WORD 文档书写，并附上作者姓名及联系方式，以电邮形式发送到《人间思想》（简体字版）信箱：<renjiansixiang@163.com>。本刊将在一周内以电邮形式回复作者表示收到投稿，若您投稿后超过一周未收到回复，敬请再次来信确认。所有稿件将于收稿后两个月内回复是否采用。

四、来稿请勿抄袭、改作或侵犯他人著作权；其言论内容均系作者一己之见解，文责自负。

五、本刊采用稿件在发行之日起三月内付给稿酬，并于出版后按照作者提供地址寄赠样刊两本。

六、投稿者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在本刊刊登所投出著作，并保证不做一稿多投，所有列名作者同意《人间思想》（简体字版）和亚际书院以网页等电子文档形式进行传播，文章在本刊刊发两年之内，作者不得将同样稿件以单行或结集方式在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再行出版。

人间思想 05：新人 土地 国家

出版者

人间出版社

发行人

吕正惠

社长

林怡君

顾问

陈光兴 吕正惠 孙歌 许江 张颂仁

主编

贺照田 高士明

执行编辑

袁安奇 唐晓林

设计

北京两维马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印刷

崎威彩艺有限公司

登记证

局版台业字第三六八五号

ISBN: 978-986-92820-2-4

定价: NT\$ 300

初版一刷: 2016年04月

缺页或破损, 请寄回人间出版社更换
有著作权, 侵害必究

策划

亚际书院

出版

人间出版社

地址

台北市万华区长泰街 59巷 7号

电话

02-2337-0566

电邮

renjianpublic@gmail.com

新人土地國家 / 賀照田, 高士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人間, 2016.04

344面; 17×23公分. --(人間思想; 5)

簡體字版

ISBN 978-986-92820-2-4(平裝)

1. 中國政治思想 2. 中國大陸研究 3. 文集

570.9207

105005212